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浪废真金——中共十大元老



## 引言

从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并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十年动乱”中拨正了中国的航向，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并成功地过渡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为忠实地再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我们从众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选了 10 位，把他们的伟大和平凡奉献给读者。

## 第一章 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总书记。

毛泽东说：“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

1945 年 4 月 21 日，初夏的延安还是好季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大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在作报告。

当讲到陈独秀时，代表们静声聆听他说道：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是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做白话文，听他说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独秀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闪光的东西，也有不少值得后人吸取教训的地方。

### 江南乡试

1897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两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戊戌政变前一年，康有为、梁启超等正摇旗呐喊，鼓吹变法，维新运动紧锣密鼓。中国正面临瓜分豆剖，与知识阶层爱国图变热情高涨的氛围很不适应。这时，18 岁的陈独秀第一次离开家乡安庆，到南京参加苏皖两省考举人的科举考试——江南乡试。陈独秀虽出身于“习儒业十二世”的书香门第，但自幼就对科举考试不感兴趣。6 岁的陈独秀常因背不出《四书》《五经》而

遭到严厉的祖父的毒打。1889年，祖父死后，家里又请来塾师，教他八股文，以备应试。陈独秀非常讨厌八股文，对塾师大为不满，学业无进。为此，家里为他换了好几位塾师，仍不奏效，最后决定由大哥孟吉教他读书。孟吉忠厚老实，性格温和，拗不过弟弟，总顺着陈独秀。孟吉知道陈独秀不喜欢八股文，于是教他读《昭明文选》。陈独秀的学业决定了他日后必仕途无望。

陈独秀性格刚强、果敢、坚毅。章士钊曾说他如“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具有“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的拚搏精神及勇气。小时候，陈独秀挨祖父的打，总是“无论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气得祖父经常骂：“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不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狠强盗，真是家门不幸。”陈独秀还极富同情心。他曾在自传中说，我“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哭”。陈独秀的母亲查氏望子成龙心切，希望他考个举人，看到儿子常因读书和祖父、塾师闹别扭，常忧伤地对他说：“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陈独秀自幼丧父，母亲很爱他，他也很爱母亲。母亲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都对他产生很大影响。为不使母亲悲伤。1896年，陈独秀不抱希望地去参加县府考试，以为会名落孙山，以向母亲证明自己的确不是料子。

结果却出人意料，面对“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陈独秀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文选”上所有的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一篇皇皇大文，但那篇连自己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的文章竟在院试中获得第一名秀才，喜讯传来，母亲喜上眉梢。陈独秀为自己能给母亲带来高兴而感到慰藉。

院试后，查氏命陈独秀准备参加次年的乡试。通过院试使陈独秀更加鄙薄科举，但母命难违，还是违心“用功读书”，勉强研究八股文，准备考试。

1897年夏，陈独秀带着母亲的重望与期待，来到南京，这位少年第一次目睹大世界，带着好奇心去感受。南京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思维的灵感剧烈地冲击着那颗早已厌恶科举仕途，仅仅为着让母亲高兴而来应试的心。理智终于战胜情感，他不能再听从母亲了，于是他转向康梁派。江南乡试是陈独秀一生第一次重大转机，科举在他心目中寿终正寝，救国、维新在他思想中迅速酝酿。从此，陈独秀的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他开始忧国忧民。历史也为这位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的重要思想转变写下重重的一笔。

### 思想界的明星

当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位小闯将，他认准了目标，就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江南乡试后，当他认识到康梁的维新变法适乎时势时，立即和皖省维新人士汪孟邹、李光炯等密切交往，阅读《时务报》，讨论康梁文章。当时，康有为等正受到乡里“瞽儒”们的攻击，他很愤恨，经常在大庭广众下“为康先生辩护”，被人指责为康党、孔教罪人，然而他却全然不顾。

陈独秀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百日维新”失败了。血的事实证实了清王朝顽固派反对任何革新，于是一大批先进分子包括陈独秀转向孙中山的革命派。

1901年，陈独秀在日本参加青年学生革命组织“励志社”。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于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开

赴东北战场，当时清廷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义勇队，陈独秀十分气愤，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慎五人闯入学监姚文夫家中，当场挥剪剪去姚的辫子，抒发割发代首之恨。此事在留学生中轰动一时，陈独秀也因此被遣返回国。

归国后，陈独秀立即在安庆组织拒俄爱国演说会，愤怒控诉沙俄在我国东北奸淫掳掠、残杀无辜的罪行，号召大家“思起而救亡”。1904年，陈独秀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以唤醒民众赶走侵略者，推翻满清统治为己任，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用“三爱”的笔名在第1期至19期上发表了近50篇作品，用流畅的白话文，以古喻今，多种文体揭露和批判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同时，陈独秀还把启发民众和直接革命斗争结合起来。1905年，他组织革命团体“岳王会”，自任会长，以武力反抗清政府。岳王会在辛亥革命时期，为安徽和江南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建立，清王朝统治被推翻，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夺去。袁一上台，就加紧打击革命势力，在政治上废除国会和约法，在思想界大肆提倡“尊孔读经”，企图复辟帝制。极端仇视民国的陈焕章、康有为等也成立孔教会，鼓吹“定孔教为国教”，宣扬纲常不变，要人们维护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掀起一股复古逆流。

面对袁世凯篡权，世风日下的状况，孙中山先生仍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进行反袁斗争，以图民国真正实现，而这时陈独秀却在酝酿着另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当时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陈独秀，就是：为什么英美资产阶级革命及日本的明治维新顺利进行？而中国的变革如此艰难？经过认真的思考，通过对中西变革史的深入比较和研究，他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中国人民还未觉醒。“吾国这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制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动心。”他认为中国人没有觉悟是造成今日危殆之势的根本原因。为此，必须进行启蒙，把人民从封建专制和它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1915年9月15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自2卷1号易名《新青年》）。《新青年》如一声惊雷，预示着春天的到来。《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则是领导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是民主和科学，陈独秀高举这两面大旗，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作了坚决的斗争。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首先倡导的是民主思想，他把欧美的民主立宪政体作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要达到此目的，首先，人必须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陈独秀认为所谓独立自主的人格就是人的解放，就是：“脱离夫奴隶之羁绊”。是非荣辱、善恶行为，以自身为本位，诉诸自身的意志而课以功过，不听命于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开发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陈独秀热烈呼唤着人的解放，“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要使国民真正建立自主意识，

必须对压抑、束缚自主意识的封建思想进行彻底否定，因为封建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把人变成听话的工具。

陈独秀说：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都是残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纲之说，把人们束缚在罗网之中而不自知，“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陈独秀还大声疾呼：青年男女们，应努力奋斗，脱离附属品的地位，完成自我。国民要自觉地居于国家主人之地位，自己建设政府，自己议定法律，不要对伟人抱任何幻想。

陈独秀倡导的独立人格精神及国民政治思想，在五四时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它启蒙了一大批青年，使他们在五四运动中，走上街头，高呼“民主”、“自由”的口号，昭示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举起的另一面大旗是科学。科学在五四时期被理解为一种思想方法。陈独秀说科学就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概念，综合客观的现象，诉之主观的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一致。陈独秀吸收孔特关于人类思想进化的第一阶段是宗教迷信时代，第二阶段是玄学幻想时代，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时代。

新文化运动成效最显著的是文学革命。陈独秀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最早的一位勇猛战士。早在 1916 年秋他即与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讨论文学革命问题。当他收到胡适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时，十分快慰，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紧接着自己又写成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认为单纯的政治革命，不能改造社会，还必须辅以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的革命，而中国现在的文学不过是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

因此，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论》的发表，掀起了文学革命的高潮，也引起了反对派的非难。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攻击怒骂，陈独秀表示：国语文学，达意状物，天经地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皆有肉无骨，有形无神，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受这种文学熏陶，国民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等劣根性，要有尽有，此的确是革新政治的大障碍，因此革新文学势在必行。他还发誓：若有明目张胆高呼文学革命者，“予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

在陈独秀的推动下，中国新文学诞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 Q 正传》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们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大事业。鲁迅说，陈独秀先生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胡适说，如没有陈独秀先生不容匡正的坚决态度，就不会有文学革命。可见，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将地位。

陈独秀连放重炮，发起呼唤新世界的阵阵轰鸣。以其新颖的思想，饱满的热情和才华横溢的文章赢得了青年的尊敬与喝彩。1917 年，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人托

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思想，开发新思想……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20多年后，虽然陈独秀已脱离共产党，毛泽东仍没忘怀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对斯诺说：那时，“我特别喜好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替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1919年，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写信给陈独秀，希望给他们坐在黑狱之中的青年以指导。

在陈独秀与他主编的《新青年》启发下，中国青年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脱颖而出。

五四时期，许多青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毅然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探求新知。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走出研究室，像普通战士一样投入枪林弹雨之中。1919年6月11日，他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新世界散发，被反动当局拘捕。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营救运动在各阶层人士中展开。毛泽东说，陈独秀因平日揭发“赛因斯”和“德莫克拉西”，才被当局所怀恨，他才被拘捕，我们要营救他，因为他是“思想界的明星”。

### 总书记的悲剧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因陈独秀当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没能参加中共“一大”，但鉴于陈独秀在新文化时期的显赫声望与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重大功绩，“一大”选举他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9月，陈独秀离开广东，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向警予、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蔡和森接替李达任宣传委员，张国焘任组织委员。

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通过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陈独秀关于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的观点占了上风。“三大”宣言中写道，“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三大”选出中央局的成员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蔡和森管宣传兼《向导》主编。

陈独秀在中共“八·七”会议后被停止职务，共产国际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从而使党内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和陈独秀持相同或相似政见的人十分不满，他们逐渐结合起来，自称“陈独秀派”，为陈独秀鸣不平，并在党内搞分裂，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起初他们的活动遭到陈独秀的反对，陈独秀不赞成用他的名义反对新中央。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整日闭门思过。他自己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反省期间。”他痛恨国民党的疯狂屠杀，痛骂“那畜辈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他不满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他的组织处理，认为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甚至1928年，

共产国际和中央邀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也遭到拒绝；他对当时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深表忧虑，认为革命低潮时期，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应退却与防御。

正当陈独秀处在苦闷、彷徨之际，他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深受托洛茨基影响的吴继严向陈和盘托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听了吴继严的话，陈独秀十分兴奋。1929年4、5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又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给陈独秀看。看后，陈独秀茅塞顿开。他首先发现他在中国革命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许多意见上和托洛茨基不谋而合：他曾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又要求退出国民党，而托洛茨基在1923年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是中国执行国际指示断送了大革命，而托洛茨基“早已在你们（指共产国际）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提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从托的文章中，陈独秀感觉找到了中国革命中所犯机会主义的根源。

对大革命失败根源的认识是陈独秀倒向托派极其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使陈独秀和“陈独秀派”结合起来，并指导他们的活动。

1929年夏，陈独秀经常与彭述之、尹宽等人学习讨论托派文件。1929年8月1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反映了他的托派思想。在当时中国的性质问题上，托洛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陈独秀说封建残余在大革命的转变时期受到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在国民党及其政权性质问题上，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陈独秀说：“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外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

在当时革命形势和策略问题上，托洛茨基认为“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中国革命高潮“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在革命现阶段的低潮时期，我们“应提出总的民主主义口号”。陈独秀特别热衷于“国民会议”，在10月26日和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

“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希望通过召集国民会议这种和平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建立苏维埃，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及其他下层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

陈独秀的基本观点表明他已完全背离了中共“六大”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根本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反对中央领导的民主革命，把革命搁置到不定的未来，认为当前只能进行国民会议运动，从而取消了当前革命，成为不折不扣的“托陈取消派”。

陈独秀逐渐与彭述之、郑超麟等托派分子相结合，加紧进行分裂活动。他猛烈抨击“八·七”会议、“六大”以来的党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并要求把此信在党报上发表，因时局紧张，中共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发表他的信，于是他又指责中央是“用专横态度来掩盖错误”，并公开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与此同时，他们到处活动，拉人转向托派，至1929年9月，成员达50多人，并自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任书记。

陈独秀等人的分裂活动早被中央注意，早在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就告诫全党：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已侵入党内，很可能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形成反对派，全体党员必须严重注意这一倾向。

8月，中央找陈独秀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并要他与托派断绝关系，但陈置若罔闻。

10月6日，中共中央向陈独秀发出书面警告：“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但陈独秀一意孤行，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它”。

鉴于陈独秀等在政治上、组织上已完全背离中央，且不听劝告，中共中央于1929年12月15日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把陈独秀清除了党外。

陈独秀被开除后，立即于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称“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的不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同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纲领大肆攻击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要求恢复托洛茨基及中共开除的人的党籍，要求改组共产国际、联共和中共中央，重新决定国际、联共及中共的路线。同时还正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任书记。1930年3月，又出版《无产者》月刊，于是，他们又被称为“无产者社”派。

“无产者社”是中国托派第一个小组织，在其先后成立的托派组织还有“我们的话社”、“十月社”和“战斗社”。四个托派组织均自以为是，他们都写信给托洛茨基，自我标榜而攻击其它托派组织，希望得到托洛茨基的赞扬，使自己的组织居于领导地位。

托洛茨基则希望中国四个托派组织统一起来，但托派各组织之间为了名位而相互倾轧。

1931年春，在托洛茨基的要求下，通过陈独秀的周旋，四个托派组织勉强在5月1日于上海召开托派统一大会，并根据托洛茨基的意见，选举陈独秀为托派中央总书记。在统一大会闭幕词中，陈独秀满怀激情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

该担负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会后，陈独秀还信心百倍地报告托洛茨基：“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1931年9月，陈独秀创办托派机关报《火花》，12月创办托派内部理论刊物《校内生活》。并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国民党，他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火花》第一期上就刊登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和白色恐怖。

托派理论的荒谬、路线的根本错误和组织的涣散，使刚统一起来的托派组织又处于四分五裂中。仅一个月，因陈派骨干马玉夫没当上“中委”，便跑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5月23日托派中央机关遭破坏，五个常委被捕了四个，中央工作陷于瘫痪。陈独秀在困境中力图重整旗鼓，组织临时常委会，维持一年多后，1932年10月15日，又因谢少珊叛卖而被捕。从此，托派组织仅苟延残喘而已。

#### 陈独秀前四次被捕

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积极投入了反清和反帝的斗争。并创办多种进步报刊，撰写大量的爱国反帝文章。同时以实际行动组织参加了若干反清反帝的团体，从事进步活动，因此颇遭当局忌恨。

1913年8月，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兼任安庆师范学堂校长的陈独秀，因国民党人反对袁世凯而组织的“二次革命”失败，便从安庆逃到芜湖避难，被芜湖驻军逮捕入狱。

这便是他历史上的第一次被捕。不久，在当地知名人士大力营救下，获得释放。

1919年5月，北京发生了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这时陈独秀也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6月11日他在北京前门外散发传单，遭密探逮捕，押往北京警察厅。当夜，当局又派军警查抄了陈的住所，搜去书籍、文件等。由于陈独秀这时已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各界人士和报纸舆论都进行营救和声援。9月16日陈独秀被释放出狱。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9月，他回到上海，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引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10月4日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住宅里，陈独秀与妻子高君曼一同被捕。这次，各界进步人士为营救陈独秀又做了大量工作。除有保人外，还交了保证金500两白银，使陈独秀在关押两天后即保外候审。10月26日，租界会审公堂以陈独秀“违背禁令”，出售禁书《新青年》杂志等罪名，按照《新刑律》第221条的规定，着陈独秀罚洋100元充公，抄出书籍等予以销毁结案。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第四次被捕，这天，法租界捕房巡捕闯进陈独秀的住所，将陈逮捕，同时查抄了书和文件等物。陈被捕后，党组织立即领导、发动各阶层，开展了大规模的援救活动。8月15日，北京报纸刊登了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十个团体的“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宣言书。在强大的群众力量压力下，租界会审公堂判决陈独秀罚洋400元，交保释放，抄出的书籍底稿一并销毁。

#### 陈独秀的第五次被捕

1927年，陈独秀因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被撤销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职务。以后他进行反党派别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陈纠集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1931年5月，他和彭述之等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立中央机构，由他任“统一委员会”的书记，并发行刊物《火花》等。

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10月15日，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密探先到东有恒路春阳里210号房屋拘捕谢德培、罗世凡、彭述之、濮一凡、宋逢春等5人，搜出各种文件106份、俄文共产主义书籍34种，然后又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拘捕了病中的陈独秀，并抄去中、日、俄三国文字的共产主义书籍多种。

10月17日，租界捕房将陈独秀等11名押解到设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并将搜获的各种书籍、文件也送交法院。经推事赵钰镗简单讯问案情，捕房律师厉志山陈述破案经过，认为属于“危害民国”的案件，根据上海市政府的意见，于10月19日将陈独秀等人解送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

军法司有关人员陈独秀等两度审问，始终未得军事上的线索，认为所供均非军事，该人等又非现役军人，犯罪地点又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7条前段规定不符，军法司自认无权管辖。于是派员携带陈独秀等人案件材料于22日去汉口，向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

24日蒋介石来电，谓陈独秀等系犯“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尊严。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决定把陈独秀等案件交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审判地点定在南京。

#### 移交江苏高等法院审理

10月26日，军法司奉命派官员将陈独秀、彭述之等先行押解江宁地方法院。由地方检察官吴绍昌将陈等姓名、年龄、籍贯讯问完毕，即签送看守所暂押。

曾有记者问陈：是否请辩护律师？陈答：我等案件是政治问题，也可说是学理问题，似无需请人辩护，如欲请人辩护，须有钱才行，但我系一穷人，而信件来往每月仅一次，哪有时间作请人准备，如开庭审判急促，则我更无法延请辩护人。

因陈、彭等人经济窘困，无油水可捞，而审案人员还要遭群众骂，因而在陈等关押了半年后，才选出审判人员前往南京。

陈独秀、彭述之和本案其他人员利用这段时间共同聘请了章士钊、彭望邨、吴之屏、蒋豪士、刘祖望等五位律师为他们义务辩护。

江苏省高等法院派来检察官朱隽进行侦查起诉，所提出的起诉书，大意是陈独秀于1927年因工作不力，被共产党开除总书记职务，此时共产党内部分裂为两派。陈侧重于托洛斯基一派，与“干部派”意见不合。1929年，陈纠集一批被共产党开除的共产党员，如彭述之、王子平等在上海组织中共左派反对派团体，并出刊物《校内生活》、《火花》两种。

起诉书说，陈等一面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肆意攻击国民党政府。竟指责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主张第三次革命，要以革命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意在“危害民国”。

被告人所为，仅只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到暴动程序。被告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用文字作叛国宣传，应负刑事责任。

## 第一次开庭审理

1933年4月14日上午，江苏省高等法院在江宁地方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陈独秀等10人的案件。

出庭审判长胡善称、推事张秉慈、林哲民、检察官朱隽、书记官沈育仁。

旁听者约100余人。

法庭传陈独秀等10人到庭，查明身份后，由检察官陈述拘捕经过。法庭命彭述之等9人退至待审室，单独审问陈独秀。陈当时两鬓斑白。胡须寸余长，面容消瘦，神态却很泰然。

法庭简要讯问陈之历史后，又问为何被开除共产党党籍？

陈答：因意见不同。

问：共产党分几派？

答：分托洛斯基派和史丹林（斯大林）派。

问：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的最终目的如何？

答：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之目的。

问：被捕10人之中，你认得几人？

答：我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为政府侦查，我只能将个人情形奉告。

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

答：这是事实，我不否认，理由有三点。（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穷至极点，军阀官僚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困苦无饭吃；（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步步退让，十九路军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所谓“长期抵抗”只是四个字，行动上是不抵抗。根据这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这时法庭传彭述之到庭。

问：何时与陈独秀认识？

答：1921年在莫斯科。

问：你加入陈独秀一派，是不是因为佩服他的文字？

答：没有什么佩服不佩服的，我对解放中国的主张与陈独秀一样。

问：你什么时候被共产党开除？为何原因？

答：与陈独秀同时被开除，因为政见不同。

问：你是不是托洛斯基派？

答：其实不能称为托洛斯基派，他只是一个领袖而已。

问：共产党的基础是什么？

答：工农。

问：托洛斯基派在上海有多少人？

答：我们的组织是宣传主义的，力量不大，人也不多。

问：你是中委吗？

答：是的，我与陈独秀同时被选出。

问：第三国际对你们有无接济？

答：没有。

问：你反对国民政府吗？

答：当然反对，不然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问：你有无暴动？

答：没有暴动，文字宣传有的。

法庭又先后传濮一凡、宋逢春到庭讯问。

濮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怎能做委员，我是冤枉的。

宋说：我以前是共产党托洛斯基派，但自去年 10 月 5 日被捕，以后因病保释，就没活动了。说我是共产党候补中委，我不便鱼目混珠，请法庭也不要指鹿为马。

### 第二次开庭审理

4 月 15 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开庭进行第二次公审，旁听群众增多。

法庭先后传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竞豪、梁有光、王鉴堂进行讯问。

王子平供：1926 年参加共产党，1927 年到莫斯科读书，1929 年 1 月因在莫斯科与托洛斯基等人接近，故被开除党籍。回上海帮彭述之刻写蜡纸，印《火花》、《校内生活》两种刊物，以前不认识陈独秀，这次被捕才认识。

何阿芳供：1927 年参加共产党，同年 9 月到莫斯科读书，1931 年因意见不合，被开除回国，干印刷工作，只印过《火花》刊物一次，与陈独秀等不认识。

王兆群供：本人原为中学教员，从未参加过共产党，因住在谢少珊处，与彭述之同时被捕，为何事不知道。

郭竞豪供：原名彭道之，是彭述之的兄弟，警察局说我 1925 年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又说我 1929 年参加托洛斯基派，均属不确，因我从未到过长沙，1929 年也未到过上海。那天去朋友家借钱，就被抓来了。

梁有光供：我住友人家中，15 日夜闻敲门声甚急，友人跳窗出去，我怕有事变，也随之跳窗，堕地即被捕，对其他事均不知情。

王鉴堂供：从我家搜出的书籍是以前房客薛某之物。后楼租给市政府的王某，巡捕来搜查时，王某已外出，因我亦姓王，故将我捕来。

法庭再传陈独秀、彭述之、濮一凡、宋逢春四人到庭。

问陈：托洛斯基派的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陈答：是的。

问宋：这一文件上有你名字？

宋答：这是 1930 年的事，此文内容在骂我，依文字内容，可为本人的反证。

问濮：你与共产党是否完全无关系？

濮答：本人研究文学，对其他所谓主义完全不知。

### 第三次开庭审理

4 月 20 日第三次开庭，这次是最后法庭审讯，允许律师辩护及陈独秀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总计达 200 多人。

审判长胡善称等人上堂后，律师章士钊、彭望邨、吴之屏入律师席。随后带入陈独秀等 10 人。

经过一番审理后。

胡善称问：“是否尚有抗辩？”

陈独秀大声说：“有抗辩。”

这时，大厅里一片安静，只听陈独秀说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两次叛国。”

旁听席上传出阵阵哄笑。

陈独秀最后说：“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法庭宣判无罪。”

陈独秀抗辩后，章士钊律师起身为陈独秀辩护。

章士钊的“辩诉状”与朱隽的“起诉书”一样，准备了很长时间。他认为陈独秀，第一，言论无罪；第二，行动无罪；第三，说叛国危害民国罪毫无根据。

审判长问陈独秀与斯大林干部派有何意见时，陈“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章士钊说，陈独秀“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多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

章士钊深知陈独秀的苦心，于是他说：“此义陈独秀必不自承，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之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章士钊的辩护时间足足有 53 分钟。

章士钊发言结束后，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台下哗然。有人赞道：“法庭审讯史上的新记录。”

下午 6 点 35 分，法庭辩论在王鉴堂“放我回一回一回家去”的结巴声中结束了。

6 天后，即 4 月 26 日下午 2 时，宣判的最后时刻来到了。陈独秀虽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紧张，脸色发白。

“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 13 年，褫夺公权 13 年。”朱隽检查官的声音如晴天霹雳，久久在大厅回荡。

陈独秀的脸色这时更加发白，眼里闪着愤怒的火光，耳朵嗡嗡作响，13 年！出狱时他 67 岁，也许，他将毙命狱中。

不知什么时候，法庭一片安静，朱隽宣判结束了。突然，陈独秀咆哮道：“裁决不公，我要上诉！”

彭述之、王子平、何阿芳等人也一起吼了起来。

一时律师、旁听席上人也纷纷叫道：“判得太重。”

胡善称见势不妙，立即宣布：“宣判结束，退庭。”

被斯诺称为滑稽戏一样的公审陈彭案终于结束了。

5 月 27 日陈独秀收到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后，亲笔写出上诉状，指出法院判词“于理于法，两俱无当，所以不服而要求上诉”。6 月 15 日由蒋豪士律师将上诉状，带往上海，并与章士钊律师研究后，递交国民党最高法院。

同时提起上诉的还有宋逢春、濮一凡、王光群、郭竞豪等人。

最高法院受理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上诉案件后，拖延了一年多才于 1934 年 6 月 30 日审理终结。同年 7 月 20 日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进行宣判；撤销原审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宋逢春、濮一凡、王光群、郭竞豪的褫夺公权部分；将陈独秀、彭述之减轻改为各判有期徒刑 8 年；有关犯罪所用

的书籍、文件均予没收。

法院宣判后，即把陈独秀、彭述之等关押在江苏第一监狱即南京模范监狱，执行徒刑。

### 宋美龄到监狱“看望”陈独秀

判刑后，国民党想劝降陈独秀，不少要人都来狱中探望劝降。

一天，宋美龄带着铁道部长顾孟余也来到了监狱，他们还提着一些礼品，顾孟余以前是北大教授，又是《新青年》同人之一。

宋美龄笑着对陈独秀说：“我是代表中正来看你的，他叫我代向你问好。”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说：“谢谢蒋先生。”

寒暄几句后，陈独秀不客气地对顾孟余说：“你当官了，架子很大。”

顾孟余顿时不知所措。

这时，宋美龄插言道：“陈先生讲话，还是文人味，什么大官呀？你要想当个官，不全在你自己。”

陈独秀正色道：“我不是当官的料。”然后他望了望顾孟余讥讽道：“我哪有顾先生会当官啊。”

宋美龄见陈独秀话里含讥，有点坐不住了。顾孟余也不是滋味。出门后他对宋美龄说：“这老头子，给他脸面他不要。”

这期间，陆续来劝降的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徐恩曾出门后对人说，我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但交谈之后，我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都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好起来并给陈独秀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

慢慢地，陈独秀的案几上书多了起来，朋友又送给他两个书架，不久陈独秀的狱室几乎成了书房。

有时社会上一些不相干的人也来看陈独秀。陈独秀见了几次后，对典狱长说：“这哪成啊，我还要用时间看书，有些人你通知我一声，不认识的就不要来了。”

典狱长问：“他们送来的礼物和钱怎么办？”

陈独秀说：“人都不见了，钱、礼物当然不收。”

典狱长说：“这是对你的优待，来看彭述之的人，要登记，说清关系，我不同意就进不来。”

陈独秀赶忙说：“谢谢。”

### 陈独秀一面揭露国民党一面与“托派”保持联系

狱中的陈独秀并未忘却国家的兴亡和人民的忧苦。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企图亡我中华，人民在血泪中挣扎，而这时的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南京，却见达官贵人们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到处歌舞升平，整日纸醉金迷，陈独秀愤怒写下《金粉泪五十六首》。

其中谴责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屈服退让、卖国求荣的诗有：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

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

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

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表现作者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深恶痛绝和强烈反抗的诗有：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

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赢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

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猛烈鞭挞国民党尊孔重礼、复古倒退的丑恶嘴脸的诗有：

“消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

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

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

国消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金粉泪》揭露国民党残暴统治下人民困苦生活的诗有：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  
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  
白发媪翁双跪泣，乞留敝絮过冬天。”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  
商贾不知遗教类，但愁歇业忍饥寒。”

而这时狱中的陈独秀仍与狱外托派保持联系，他通过郑超麟妻刘静贞把上海托派的文件找来，又让她把自己对外面托派的意见带出去，企图遥控托派，后因观点分歧，陈独秀逐渐与托派疏远了。

#### 身体虚弱的陈独秀在狱中得到妻子潘兰珍的精心照料

陈独秀一生三次婚姻，早年受父母之命，娶了高大众为妻，但思想差距甚远。陈少年得志，而高目不识丁；陈倾向维新革命，而高恪守古训。随着陈独秀社会活动越来越多，长年在外，二人婚姻已名存实亡。那时高大众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是个新派人物。她酷爱文学，活泼洒脱，长相也好，深得陈独秀喜爱。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问题，渐生感情。陈独秀后来又把高君曼带到日本留学，处得很好。1910年，两人不顾家庭和乡里的反对，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自由结婚。但好景不长，高君曼希望过一种稳定宁谧的生活，只想做一位教授夫人，而陈独秀走南闯北，屡遭风险，使高十分不安，加上陈独秀在生活上放荡不羁，于是高不能忍受，两人最终分手。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隐姓埋名，住到上海熙华德路，结识了潘兰珍。当时潘兰珍曾被流氓欺骗，痛苦万分，只身独居陈独秀楼后，孤苦伶仃。二人常常见面，潘兰珍端庄秀美，质朴无华，虽生在农村，但久居城市，开朗、大方、腼腆、羞涩，陈独秀很喜欢她。而陈独秀内在的气质、丰富的知识与潇洒的谈吐也深深地吸引着潘兰珍。两人相识不久，就同居了。

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因和陈发生小争执已在一个月前回娘家去了。当她在报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的陈独秀时，惊喜万分，惊的是同陈独秀结婚多年，竟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喜的是自己嫁给陈独秀，终生有了依靠。陈独秀被捕后，为了不牵连潘兰珍，提议与她断绝关系，但

潘却不畏艰险，立即收拾行装，赶赴南京。她到南京后租了一小屋，揽活挣点钱，过着艰辛的生活，省吃俭用，节约钱买吃的送给陈独秀，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她都在狱中服侍和陪伴陈独秀，风里来，雨里去。三年如一日，直到陈独秀出狱。

### 陈独秀不愿写检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每天都要轰炸南京。8月中旬，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一间房屋顶炸塌。穿着背心的陈独秀慌乱中钻在桌子底下，玻璃碎片哗哗往桌子上掉。事后濮德治跑了过来，见陈独秀在拍灰，忙问，“没事吧？”陈独秀恢复了平静说：“没事，好像外面的窗子震塌了。”

第二天，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独秀北大时的学生陈仲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塌，说：“我去找胡适商量一下先帮你保释出来。”

陈独秀将信将疑：“这样行吗？”

陈仲凡说：“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释放全国政治犯，日机轰炸，是个机会，也可能答应保释你。”

几天后，中苏文化协会的黄理文陪同周恩来、叶剑英到监狱看望陈独秀。

陈独秀大喜过望，周恩来握着陈独秀的手，说：“仲老，你受累了。”

陈独秀见周恩来还称他“仲老”，手足无措，忙请客人坐。

黄理文说：“经过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恩来、剑英同志多次交涉，蒋介石同意我们提名单分批释放政治犯，我们也想到了你。”

陈独秀十分感激地说：“谢谢。”

周恩来说：“主要是党中央及各方民众的共同努力。”

周恩来看陈独秀明显衰老了，于是转了话题，说：“听说仲老这几年在监狱中还写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过人啦！”

陈独秀忙找来《东方杂志》等刊物。

周恩来翻了翻说：“好、好。”

过了一会周恩来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何打算，黄理文见话题涉及机密，连忙退了出去。

这一次，周恩来、叶剑英与陈独秀谈了很长时间。

周恩来、叶剑英走时，陈独秀坚持往外送，直到典狱长委婉暗示，他才停住了脚步。

周恩来、叶剑英等走后很久，陈独秀才慢慢回到房间。

又过了一天，陈仲凡兴冲冲跑来说：“我与胡适、张伯岑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

陈独秀一听气坏了，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炸死狱中。谢谢你和适之、伯岑，我也不要人保了。”

陈仲凡劝陈独秀说：“写悔过书，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

陈独秀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出门时，陈仲凡对送他的罗世凡、濮德治说：“老头子还是那个脾气，你们劝劝他。”

这时，胡适也喜笑颜开地来了，他说：“仲甫，我找了兆铭，他已同意保释你出来。”说着，拿出汪精卫的回信。

陈独秀忙接过汪精卫给胡适的信，信上说：“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说：“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找麻烦。”

8月21日，星期六，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公文说：“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林森知道汪精卫、蒋介石已同意释放陈独秀，又碍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面子，也乐得做顺水人情。于是他从笔筒中抽出毛笔，写道：“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

林森令人将“指令”立即送别司法院办理。

司法院见政府已有批示，当即给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国民政府将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3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

隔日，监狱方面告诉陈独秀，国民政府及司法院已同意将他减刑释放。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潘兰珍却高兴得流下了泪。

典狱长和几个狱卒来贺喜，见濮德治、罗世凡、潘兰珍、陈松年都在屋里，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

陈独秀对濮德治、罗世凡说：“司法院讲我‘深知悔悟’，我听了很不是滋味。”

罗世凡笑着说：“先不管它，出去再说。”

濮德治压低声音说：“出去再写份声明。”

陈独秀说：“只好如此了。”

中午，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村到狱中接陈独秀，并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待所（今湖南路10号）。

陈独秀心里不悦，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个平民好。”

这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来狱中，请陈独秀到他家中，陈独秀连忙答应。丁默村只好作罢。

罗世凡、濮德治两人含泪和陈独秀告别，陈独秀见他们很伤感，眼睛也红了，摆摆手，低头进了车子。罗世凡说：“人出了名就不一样，先生判刑比我们重，出狱却比我们早。”

到了傅斯年家，陈独秀急着看《大公报》发表的短评《陈独秀减刑了》。见上面有“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陈独秀对傅斯年说：“说我爱国可以，说我‘深知悔悟’实难接受。”

傅斯年转移话题说：“罗家伦问你可缺钱，我说陈先生要钱，我那儿有。”

陈独秀说：“不要，不要，已够麻烦的了。”

8月25日陈独秀给申报馆编辑部写了一个短函：“爱国诚意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傅斯年见陈独秀太认真，说：“恐难刊出。”

陈独秀听了，有点不高兴地说：“算是我写了，不刊是他们的事。”

一天，朱家骅到傅斯年家来见陈独秀。朱家骅是蒋介石亲信，任国民

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陈独秀知道他来一定有事。果然，朱家骅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给你们10万元经费和5个名额，你看如何？”

陈独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是装点门面。”

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生硬，坐了一会就走了。

罗汉这时找来，劝陈独秀去延安。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三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联合抗日，没得到回音。当年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党委逃脱。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8月下旬经上海到南京。

陈独秀见到罗汉，十分高兴，问：“你跑到哪儿去了？”

罗汉将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临了说：“陈清晨希望你回上海领导反对派工作。”

陈独秀摇头，说：“上海那一班人搞不出什么名堂。”

罗汉又说：“我到南京后，见到叶剑英，叶叫我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开个保释名单。”

陈独秀听说罗汉与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马上来了精神。两人又捡起5年前的话题，谈到回党内工作问题，陈独秀问：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么样？”

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不然怎么积极地保释你呢？”

陈独秀点点头，沉吟半晌，说：“你再与叶剑英谈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罗汉答应了。

8月29日，郑超麟也被释放，见到陈独秀，二人都很伤感。陈独秀：“你还好？”

郑超麟摇摇头：“一身病，想到安徽乡下养病。”

陈独秀说：“彭述之、罗世凡回上海去了。濮德治回安庆老家了。”

“想不想去上海？”郑超麟问。

陈独秀摇摇头，说：“反对派活动，不会有结果。”

第二天，陈独秀送郑超麟出门，走了很长一段路。陈独秀心里清楚，从此二人很可能见不上面了。

从街上回来，潘兰珍老远就喊：“包先生来了。”陈独秀知道是包惠僧，忙加快了脚步。包惠僧当时是国民党内政部参事，陈独秀出狱后，他常来坐坐。

陈独秀进屋时，对包惠僧说：“刚才上街，忘了买宣纸。”包惠僧说：“不急不急。”上次包惠僧来，请陈独秀题字，没有宣纸作罢。

中午，潘兰珍留包惠僧吃饭，包惠僧问：“傅先生呢？”

潘兰珍说：“前几天这里炸了，傅先生见这里不安全，搬走了。”

包惠僧忙问：“你们住这里行吗？”

陈独秀说：“还可以。”

当时包惠僧想接陈独秀、潘兰珍去住。陈独秀说：“不去了。哪儿都一

样，常见面就可以了。”

隔日，陈仲凡坚持要陈独秀到他家去，陈独秀见陈仲凡家房子宽敞，便答应了。到了陈仲凡家，陈独秀潘兰珍住到楼上。

在陈仲凡家住了几天，陈独秀上街买来宣纸，抄了岳飞《满江红》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上款题：“赠惠僧老兄”，落款“独秀。”墨迹干后，陈独秀换了一件出狱后新做的深青包对襟褂子，用报纸夹了刚着墨的宣纸，信步往莫悉路包宅而去。

包惠僧见先生来了。忙叫妻子夏松元做饭。见陈独秀刮了胡子，他笑着说：“精神多了。”

包惠僧将陈独秀的字张贴于壁间，点头说：“好！‘莫等闲’三个字，看得出陈先生是老骥伏枥呀。”

陈独秀喝了一口茶说：“上次与孟真谈话，见他很悲观，便想到了这几句。”

见陈独秀提到傅斯年，包惠僧说：“听佛海说，胡适推荐你去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写自传？”

陈独秀摇头，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我也怕见生人。”

包惠僧点点头，起身给陈独秀加水。

谈到今后去向，包惠僧说：“听潘兰珍说，蒋介石答应你当劳动部长？”

陈独秀笑笑，说：“适之、佛海还叫我参加‘国防参议会’呢。”

“听佛海说了。”包惠僧说，“他说老头子顽固，没答应。”

陈独秀不悦，说：“我怎能答应呢？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与蒋介石不共戴天。他叫我当劳动部长，参加国防参议会，真是异想天开。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不用等到今天。”

“听说高语罕去见了蒋介石。”包惠僧说。

“高语罕是无耻之徒。”陈独秀正在气头上，也不管是不是老朋友了。

吃饭时，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这几天日本飞机轰炸更紧，码头上逃难的人已是水泄不通了。

陈独秀本想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消息。当时日军已占张家口，正紧攻大同，每天轰炸南京。于是决定先去武汉。

临行，陈仲凡赠了一首诗：“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膏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训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诗中流露出了对陈独秀铁骨性格的敬佩之情。

陈独秀也当即挥笔写了《和瞭玄兄赠诗原韵》：“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骋郊邑，兼之征尘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意即前途艰辛、秉性不移。

9月12日，星期天，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叮叮当当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

陈独秀忧虑地看着淡黄色的江水一波一波向后浪去，不禁一阵心酸。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眼前的大好河山就蹂躏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见陈独秀半天无语，潘兰珍轻声问：“老头子，发呆啦？”

陈独秀回过神来，合上半张开的嘴唇，眸子里，仍闪烁着悲哀的光芒。

“我想写一本抗战小册子。”陈独秀双手紧握栏杆说。

“不会坐牢吧？”潘兰珍穿着一件橄榄绿的裙子，两眼忽闪忽闪的，睁得很大。

“这和以前不同。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毛泽东要抗战，蒋介石也要抗战。”陈独秀说。

陈独秀到汉口后，在汉口住两夜旅馆。包惠僧是武汉人，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何成浚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

这时武昌一个姓半的慕陈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到武昌城双柏庙后街他家去住。

陈独秀搬到双柏庙后街 26 号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见罗汉兴冲冲的样子，陈独秀想：大约有了眉目。

罗汉 8 月底启程，在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到西安后，因山洪爆发，不能到延安。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与罗汉谈到他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尚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我们深切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空的前面，过去一切是是非非都不要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9 月 2 日，罗汉到西安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也到罗汉房间会谈，王若飞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

林伯渠将陈独秀希望回党内工作的要求电告了延安。

9 月 10 日，毛泽东和张闻天（中共中央总负责）回电西安七贤庄，提出与陈独秀事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心情沉重地说：“陈独秀的脾气和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过相当困难。”

回南京后，陈独秀已去武汉。罗汉到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博古。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博古、叶剑英都认为关键是第一条。陈独秀去武汉前，与叶剑英、博古谈过话，以后又与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博古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又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

罗汉问：“由毛泽东与陈独秀谈可否？”

博古透过圆形近视眼镜片看了一眼罗汉，说：“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恰当，因为他们个性都很强，有闹翻的危险。不如等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许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与独秀交换意见。”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前一项我已声明同托派脱离关系。”

罗汉忙问：“是么，我怎么不知道？”

陈独秀从一束信札中找出一份手稿，说：“你到西安后，我请包惠僧发表了个声明。”

罗汉接过来看，上面写到：“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罗汉用手托住下颌：“报上没见到啊？”

陈独秀沉吟一下，说：“我找了《中央日报》的编辑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不知为什么没发出来。”

罗汉拿着字条子说：“我最担心你不肯公开声明，现在不怕了，后面两条更不成问题了。”

陈独秀说：“后两条好办，我写一封信，你抽个时间再去趟南京。”

罗汉点点头。

去延安的事一时定不下来，陈独秀便潜心写抗日小册子。1937年10月2日，星期六，陈独秀写了一篇短文《从第一双十到第二十六双十》，被《宇宙风》散文杂志刊出。

10月6日，星期三，陈独秀到武昌华中大学讲演《抗日战争之意义》。同日，武汉文化界举行盛大集会，邀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一再表示抱歉：“华中大学事先约好，实在分不开身。”

陈独秀又成了“红”人。毕竟坐牢太久，从华中大学演讲回来，陈独秀就病倒了。

双十节前一日，雨下个不停。

这时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来到陈独秀住处拿着伞敲门，见潘兰珍开门，忙拿出名片说：“我是《抗战》周刊记者，想采访陈先生。”

躺在床上的陈独秀正百般无聊，见记者上门，忙穿衣起床。记者见陈独秀桌上摆的药，说：“明天是国庆节，所以冒雨来了，想不到先生病了。”

陈独秀笑着说：“不妨、不妨，难得雨中来客。”

记者问了一些集中现金、征集壮丁问题后，问：“听说陈先生要办刊物，确否？”

陈独秀说：“没这个意思，现在各派杂志都肯登我的文章，我何必自己去办刊物呢？”

又问：“报上说，陈先生今后要去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答：“我的个性不大适宜做官，但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

问：“明天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

答：“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打算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记者看看表，已是下午6点，于是起身告辞，说：“我还要过江。”

1937年10月15日，陈独秀恢复了一点精力，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胜利》。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不能盲目反对唯武器论。半年之后，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批评了唯武器论。毛泽东说，“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

并不像陈独秀说的那样，各报都肯刊登他的文章。《扫荡报》刊登了陈独秀在华中大学的讲演稿后，有关方面下了禁令“暂缓登载。”

在汉口青年会讲演后，罗汉与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检讨，回党工作。”

陈独秀不同意写检讨，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董必武见陈独秀很任性，不好再劝。

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

罗汉去南京又找了博古与叶剑英。博古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要有个书面检查。

陈独秀忙上忙下，闲下来时，便常思念濮德治，狱中两人无话不谈，此时稍一分开，就又依依不舍了。濮德治到安庆后不久，接二连三收到陈独秀从武汉寄来的信。

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后，11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见濮德治来了，十分高兴。在新老朋友中，濮德治既是亲戚，又是难友。

陈独秀递了《宇宙风》第49期给濮德治，上面有《实庵自传》广告，称为：“传记文学之瑰宝。”

濮德治说：“到底出来了。”

陈独秀说：“还是你与世凡劝我写自传。现在亢德又来信催我要稿，怪我没有按时写下文。”

濮德治说：“你接着写就是。”

“哪能呢。一则我没有时间，到处在请我演讲；二则流于粗制滥造。”

濮德治说：“说的也是。”一天，陈独秀对濮德治说：听说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教书，你去一趟郑州，看他愿不愿出来，我们几个合作还可以做点事。”

濮德治买了一张去郑州的火车票，第二天就去了郑州，找到了罗章龙。罗说：“陈先生好意我十分感激。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活动。”

濮德治回来把罗章龙的话告诉了陈独秀。

“罗章龙没有讲别的话？”陈独秀问。

“罗和我没私交，我们谈不下去，我看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像是在谈恋爱。”

陈独秀无可奈何：“差不多了。”

12月，刚出狱的王文元到了武汉，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

王文元、陈独秀、濮德治三人经常谈论局势。王文元提出办刊物。陈独秀不同意，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须抛弃，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濮德治、王文元问陈独秀，有什么新方法？陈独秀说，“我们可以与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战线。”

王文元一听很对劲，忙问：“这与史派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王文元说：“听说谭平山想拉你组织第三党？”

陈独秀说：“拉我组织第三党的还有朱家骅，但我向来不愿受人摆布。”

提到组织联合战线，濮德治想起陈独秀刊登在《宇宙风》第52期上的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在那篇文章中，陈独秀认为鲁迅并不根本反对联合战线政策，但反对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一概联合。

“鲁迅若在世，他是一定要反驳你的。”濮德治说。

陈独秀想到鲁迅反驳陈其昌，说：“鲁迅也是人，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向来反对贬他，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也反对抬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我很敬佩他不附和别人。”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小册子，收进了报刊“暂缓登载”的演讲稿。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他赞成陈独秀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

思想，鞍前马后为之奔波。渐渐，一些民主人士对罗汉冷眼相待。开始，罗汉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说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

二人大吃了一惊。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6年后的1937年11月29日，王明飞抵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陈云、康生。

王明到延安后第5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啄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看到这篇文章，陈独秀打了一个寒颤，似乎预感到什么。11月20日，《解放》刊登“冰”文《陈有行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时隔半月《解放》的调子突转180度。

罗汉也疑惑不解，在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与你是主张抗日的，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人，可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陈独秀、罗汉哪里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和他们有关的政治局会议。

谈到中共中央提的与陈独秀合作的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声色俱厉，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却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有人反对，说：“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也有所不同。”

王明大叫：“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王明又加重语气，说：“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

王明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议结束后，王明到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1938年新年，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陈独秀一时目瞪口呆，脸色发白。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叛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关”，将这场陈独秀是汉奸的风波推向高潮。

康生说：“1931年‘3·18’事变……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国民党外交次长）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托匪格拉斯……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康生这么卑鄙，竟无耻到无中生有捏造人的汉奸罪名。”

陈独秀十分气愤地说。

罗汉也阴沉着脸：“他不仅陷害你，连我也陷害了。”1938年3月16日，

逃难到汉口的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张西曼、陶希圣、林庚白 9 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函，为陈独秀抱不平。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如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

第二天，《扫荡报》将此信转载。

《新华日报》发表“幸之”的短评，驳斥王星拱等 9 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林庚白看了报上的信，发现和原来签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为新文化运动起见，”现在成了“为正义为友谊。”

于是林庚白写信给《新华日报》，提出对该信不负责。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发表一个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以为断。”

陈独秀看了此评论，十分气愤。

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不讲道德。”

当时，陈独秀也写了一封《给 新华日报 的信》，因是盛气之作，《新华日报》拒绝发表。

3 月 18 日，陈独秀急急打开《新华日报》，并没找到自己的信，却找到了张西曼来函，声明对前信不负责任。

周哀南发表“政治家的风度”一文，讽刺林、张二人登报“署名而又声明不负责任的来信。”“听说林、张二人精神上很不舒服，林庚白虽然带着他的后备太太在各大小馆子里出现，但兴趣大不如前，……张西曼则好几天蛰江汉路贯忠里的 20 号的楼上，颇为憔悴。”

于周哀南和林庚白、张西曼的笔墨战，《新华日报》发表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说“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汉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托派汉奸行为以为断。”

陈独秀把他给《新华日报》的信寄给了《扫荡报》，《扫荡报》于 3 月 20 日刊出。

陈独秀在信中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关于声明与托匪脱离关系问题，他说：“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

最后他质问康生等人：“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

针对陈独秀的信，《新华日报》3 月 21 日发出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

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

短评又说：“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辩护……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底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新华日报》同时刊出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他们三次与陈独秀会见的经过。

陈独秀一眼便看出，他们是证明自己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罗汉对陈独秀说：“你上次给陈其昌的信，已明确不隶属任何派别，何不把这封信发表，他们不是要脱离托派的证据吗？”

陈独秀说：“这样老彭他们又会不高兴的。”

罗汉说：“顾不得那么多了。”

陈独秀便将去年 11 月 21 日给陈其昌的信底稿找了出来，连夜抄了一遍，公开发表。

《新华日报》见陈独秀发表了“给陈其昌的信”，没立即作出反应，双方暂时收兵。

4 月，徐特立约何之瑜从长沙到汉口，调解这场笔墨官司。这期间，周恩来也多次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徐特立来看他时说：“事情是解决了的。”

但陈独秀估计王明、康生不会善罢甘休的。

4 月 8 日，他给长沙的何之瑜去信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日，他们自己既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造谣诬蔑……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帐。”

何之瑜 2 月初曾写信邀请陈独秀暂避长沙，在岳麓山下从事著述活动。陈独秀又担心湖南乡间土匪多，离武汉又近，于是写信称“湖南非乐土”没答应。

罗汉对陈独秀说：“你的事情有了一个段落，我的事怎么办呢？”

陈独秀知道罗汉是指康生的文章，说：“康几次提到你有汉奸行为，你也要有个申明才好。”

罗汉便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他知道《新华日报》不会发表，便投给汉口《正报》。

4 月 24 日，《正报》刊登了罗汉的信。罗汉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关于领取日寇津贴事。罗汉反驳说：“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三百元成交。真可谓廉价之高峰……”；关于和美国侦探联系事，罗汉反驳说：“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8 年 4 月 3 日，张国焘以祭黄陵为名，逃到汉口。4 月 14 日，周恩来找到住在大华饭店的张国焘，接他到八路军办事处住，并劝他回延安。张

国焘说：“我与毛泽东、王明不能志同道合。”便想溜之大吉，最后选择周恩来提出的三个办法中的第三个办法：“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发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提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

陈独秀当时并没见到张国焘。他想，大约是张国焘本人希望见他。看到报纸的当天，他写信给贺松生说：“张国焘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我并未见到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几天后，张国焘在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

十多年没见面，张国焘富态多了，肥头大耳，挺着肚子。

但气色很不好，看上去很疲惫。

陈独秀见他这样，皱眉道：“你不是一直干得很好吗？”

张国焘唉声叹气，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之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像软禁一样。”

陈独秀问：“今后怎么办？”

张国焘说：“我去见了蒋介石，只好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了。”说着，张国焘似乎意识到什么，干笑了一下，说：“走老蒋这条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有别的路走，我当然要走别的路。”

陈独秀见张国焘投靠老蒋，立生反感，便应付张国焘。

张国焘没注意陈独秀的冷淡，又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

“成立一个党不是容易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

“你好像没信心？”

“没信心也没有耐心。”

话不投机，张国焘很快便告辞了。

天渐渐变暖，被康生、王明搅了一阵子之后，陈独秀打算离开政治，老归山林，做一个地道的平民百姓。

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很不愿见他。去年10月，刘仁静还给李福仁、伊罗生写信，对陈独秀汉口演讲表示失望。

刘仁静来意，陈独秀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还是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托派。

刘仁静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他们很生气。”

陈独秀听出，刘仁静讲“他们”，意思不含自己。刘仁静1935年被托派临委开除“党籍”。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说：“我早就知道了。”

“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地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

潘兰珍说：“他要是一直不走，怎么办？”

陈独秀想了一下，写了个条子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潘兰珍答应了，将条子收好。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留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只见条子上写道，“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

刘仁静怅然无言，没有落坐就走了。潘兰珍知道老头子不喜欢他，就没留他再坐。

### 陈独秀之死

1938年6月，陈独秀从安庆辗转宜昌、重庆，然后到四川江津，并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在江津。

陈独秀死时，潘兰珍、陈松年和代表他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场。

关于陈独秀最后的日子，罗学蓬写了一篇文章，曾被多家报刊转载。这篇题为《陈独秀的最后日子》说：

陈独秀先生是1942年5月27日逝世的。

江津市档案馆存有一份1942年5月29日出版的《江津日报》，一版上有如下一则消息：

一代人杰溘然长逝

陈独秀前晚逝世

急性胃炎不治享年64岁

本报讯一代人杰陈独秀于本月27日晚9时40分急性胃炎与脑充血齐发，医药罔效，溘然长逝于县属鹤山坪乡寓，享年64岁。陈氏生于1879年，安徽怀宁人，字仲甫，原名仲，一名由己，号仲子，别号熙丹仲子，日本及法国留学生（此处有误，陈氏未去过法国——笔者注）。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青年杂志，后因思想左倾，主持共党，被拘南京模范监狱。抗战军兴，旋即出狱入川，隐居津门，研究小学，贡献颇多，今不幸逝世，实为学术界之一大损失。先生身后萧条，亲友学生，将集议救济办法。6月1日发柩于县城南郊，殆抗战胜利再移运回原籍。

笔者曾在10年前陪同诗人孙静轩踏访过陈独秀先生的旧居和墓地。

在离城30余里的鹤山坪上石墙院，笔者邀来了当年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在这所大宅院里并亲眼目睹陈独秀之死的几位老人。老人们介绍的情况，犹如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一页业已发黄的历史书：“陈先生死得不松活，在床上拖了10多天才落气。”年逾80的吴元珍老太太说，“陈太太人年轻，和陈先生的儿子又合不来，急得只晓得哭。这石墙院是杨家的，我那阵跟杨二太太帮佣，杨二太太去劝陈太太，我也就跟着去了。隔着天井，看见杨家的佃户胡庆和跟他大娃品中正在一个脚盆里给陈先生净身。净完身后就把陈先生抬到凉床上，用白绵纸搓索索裹缠陈先生的身子。然后再给他穿‘老衣’。换老衣，装棺，都是品中爷俩干的。”

当年的“胡大娃”已是60出头的人了，但提起陈独秀之死，依然记得很清楚。他说：“陈先生和潘兰珍来到石墙院，当时乡下人大都不晓得陈先生是哪个，以为是个有钱的下江人。我还是从杨庆馥杨二爷口中知道陈先生是陈独秀的。我对陈独秀还是很崇拜的，因为我曾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也晓得他当过共产党的总头头。这样一个大人物落魄到了石墙院寄人篱下，总归是让人同情的。他当时的日子已不好过，没啥经济来源。我还听说陈太太托吴元珍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

我有心帮帮他，又没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后来，我看陈太太在院子边上开了块地，种上些时鲜蔬菜，陈先生也常去帮忙。我看不过意，也常常主动去帮着淋淋粪、松松土。

“1942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天下着小雨，就听见潘兰珍在石墙院大声痛哭。我马上想到是陈独秀过世了，因为他已经卧床好多天，江津、重庆都有不少头面人物坐滑竿上山来探望。没一阵，杨庆馥就跑出院子，喊我老汉去跟陈独秀换老衣，我也就去了。

我们爷子俩为他净了身，穿上老衣，再把他放进棺中，空隙处再用石膏粉、杠炭灰、谷壳灰配的混合物塞紧。在我们忙的过程中，大约有10多个人守在侧边。我认识的有陈独秀的三儿陈松年两口子，陈独秀的学生包惠僧、台静农，从江津赶来的邓仲纯、潘赞化、何之瑜，从白沙赶来的邓蟾秋、邓燮康两叔侄，还有几位生面人。”

作为杨家之后的杨明兴老人介绍的情况则显得更全面一些。他说：“陈独秀两口子住进石墙院，是我父亲杨庆馥特意去请上门的。我曾祖父杨鲁丞是光绪特科贡士，对经史有一定研究，还写了好几部书稿。国学大师章太炎1918年初到重庆时，我曾祖父曾带着书稿到重庆请教，谁知章太炎随便翻了翻，竟批了‘杂乱无章’四个字，气得我曾祖父吐血，回江津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我父亲仰慕陈独秀的大名，便去请他来石墙院，为我曾祖父整理遗稿。本来，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好请的。但因为一者江津城里经常闹空袭，有钱人物纷纷往乡下搬；二者陈独秀、潘兰珍和邓仲纯的老婆吵了架，被邓夫人恶言撵出了‘延年医院’，在城里居无定所。所以我父亲上门一请，陈独秀夫妇就来了。开始，陈独秀两口子和我们一起吃饭，父亲待他犹如上宾，陈独秀整理遗稿也很卖力，《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就是经他整理后出版的。可后来，陈独秀就把其余遗稿丢在一边，埋头写自己的文章去了。时间久了，我父亲就有些不高兴，再加上陈独秀几次对从江津来看望他的朋友说：‘杨鲁丞的《群经大义》很多是转述前人的注疏，创见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这话传到我父亲耳中，他心里更加有气，脸上有时就不那么好看。陈独秀感觉到了。又实在无处可去，就提出分伙立灶。我父亲同意了，还把全副锅盆碗盏借给他两口子用。虽是这样，有了啥好吃的东西，父亲也时常请他们过来一起吃，或者给他们送过去。”

唐宝林先生在他撰写的《陈独秀传》里认为，陈独秀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家乡，几十年来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反动政府的通缉对象。由于长年没有正常的饮食，他早就患有肠胃病；狱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久治不愈，时有发作。入川后，又过着贫困潦倒、寄人篱下而近乎靠人施舍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思想上找不到一个知音，精神上，眼见亲人一个个先他而死，这种种因素，终于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而导致了他的逝世。

唐先生算是国内研究陈独秀的权威，他的分析自然都有道理。但我认为，造成陈独秀死亡的直接原因有两条：一条是，陈独秀相信了本地一土医生的单方，说长期用胡豆花泡水饮用，可治高血压，故而长期坚持不辍。不料那次所服的胡豆花，是在霉雨季节里摘的，未能干透，有的已经发酵变色，泡时水呈乌黑色，味亦发苦，陈独秀不知此物发酵后含有毒性，服后已觉胃中不适。其二是，正在此时，包惠僧由重庆特意来看望他，为款待这位挚友，

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双石场割了两斤肉，他还带着包惠僧到菜地里，摘他亲手种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包。由于陈独秀平日难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晚饭时，又吃，到夜间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夜不成眠，天亮前吐了一地。

这一天是 1942 年 5 月 13 日。此后几天，陈独秀就卧床不起了，潘兰珍请来乡下郎中，烧“骨炭灰”用水服下，帮他消膈食饱胀，也没啥效果。到 18 日，开始发烧、昏迷、说胡话，一直拖到了 25 日晚，才落了气。

### 猪圈里有块墓碑

有关陈独秀安葬的情况，是吴元珍讲述的，虽说她牙不关风，我们还是听了个明白。

她说：“埋陈独秀那天，来了好几百人，有当官的，也有大户绅粮。双石乡公所还组织了上百个乡丁来沿途护卫，一路放火炮，点冲天铳。从石墙院到埋陈独秀的‘康庄’要走 30 来里路，队伍拉了好长好长。陈松年端着遗像走最前头，后面是八人抬的黑漆棺木，衣衾棺木都是白沙的大绅粮邓蟾秋送的。陈太太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由杨二太太和吴白林的堂客扶着，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就打起花圈，跟在后头走。陈先生活时我们没觉得他有啥，死了，才晓得他了不起，连县长那么大的官，鞠躬时，还只能站在最后头。”

为了看看陈独秀的墓址，次日，我们步行到了城西五里处的“康庄”。“康庄”是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为避日机轰炸而修建的一处简易别墅，陈独秀生前曾在此小住过，死后，也埋在这里。

我们去时，墓地已经荡然无存。我们访问了住在“康庄”里的一户农民。这位社员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说：“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异地说：“这两年不晓得咋个搞起的？来看陈独秀坟的人多得很。”

我们队长说陈独秀是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我就没懂这个道理。”

诗人说：“陈独秀不是坏人。”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

当我们听说他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我们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独秀陈先生之墓”几个大字出自台静农的手笔，墓碑上端已缺了一只角，“独”

字没有了偏旁，变成了一个“虫”（蜀）字。

我和孙先生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心情难以言表……因为，那块一代人杰的墓碑已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

## 第二章 李大钊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1905 年，李大钊 16 岁时，应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后因科举终止，转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读书。在这个新式学堂里，他开始接触新学，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开阔了眼界。

1907 年夏，李大钊考入公费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1 年，辛亥

革命爆发。北方革命党人发动了滦州起义，但不久失败，起义军重要领导人白亚雨英勇就义，临刑时，他立而不跪，视死如归，所表现出的革命英雄气概给李大钊留下深刻的印象。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但建立起的民国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夺。1912年6月至1912年间，李大钊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开始对共和国的命运感到“隐忧”。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李大钊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开始树立起民主主义的观点。

1913年夏，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于1913年冬东渡日本求学。

在学习期间，李大钊将所学新知识同实际结合起来，他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变化。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炮制了《中华民国宪法》，并制造出种种舆论为称帝作准备。1914年11月，李大钊发表《国情》一文，驳斥了袁世凯的客卿，日本人贺长雄和美国人古德诺关于中国民智卑下，只有君主制才适合中国国情的言论，指出中国人有参政能力，能实行民主共和制。若再恢复君主制，“必欲使吾民众群起反抗无他术焉”。可看出，李大钊已具有了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914年，李大钊在东京发起组织了“神州学社”，进行反袁活动。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李大钊团结留日学生，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并担任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

同年5月，袁世凯政府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差点完全接受了“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自此之后，李大钊投入了武装反袁的斗争。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称帝，消息传来，留日学生总会召开会议，推选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负责反袁的宣传活动。1916年，李大钊主编《民彝杂志》，并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指出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本原因是君主专制造成的，代议制度则是时代的要求。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以其斗争之坚决，文笔之犀利而声誉鹊起，在留学生中成为闻名一时的人物。

1916年6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死去。但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并未从人们头脑中消除。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李大钊也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7月，李大钊应汤化龙之约，到北京办报。他为报纸起名叫《晨钟报》。

在《晨钟报》上，李大钊发表很多文章，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抨击封建文化及道德伦理。

十月革命以前，在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及思想斗争中，李大钊都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并以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唤醒民众，寄希望于人民是这一时期李大钊思想的精华。他指出：对于我国思想界的消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

####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1月，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一职。

当时的北大，汇集了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也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同陈独秀等人轮流编辑这个已成为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刊物。

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新旧矛盾冲突现象，“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李大钊也正是在苦苦探索着这条“新径路”。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消息在1918年春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一向密切关注着国际政治的李大钊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十月革命，并搜集各种资料，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迅速接受了十月革命，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性质。1918年7月，李大钊写下《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比较了俄国革命和法国18世纪大革命的不同，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这两个革命“时代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他认识到，只有俄国革命才代表了世界革命的方向。“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这是中国知识界肯定十月革命最早的文章，它体现了李大钊开始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群众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发表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接着又写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

在这两篇文章里，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们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大战，建立大帝国，“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指出：劳工阶级利用此机会进行革命，以防遏资本主义政府的战争；欧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和劳工主义的胜利，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并预言，社会主义的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之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开始认清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歌颂了十月革命，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这一方向，表明李大钊已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先驱。

在这以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系统的研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8年冬，他在北大组织了“马尔克斯研究会”，争取了几名教授参加。但不久为反动政府以“防止过激主义传播”为由而查禁。

1918年12月，李大钊同陈独秀发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它是《新青年》的姊妹刊。

不仅继承了反封建的传统，还一改《新青年》不谈政治的态度，把新文化运动同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在《每周评论》上，李大钊发表不少文章，

进一步宣传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 引导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李大钊努力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青年走马克思主义道路。五四以前，北大新旧思想斗争仍很激烈。“许多青年接触了新知识，很不满现状，要求进步，渴望新的思想境界，而李先生学贯中西，思想新颖，正是这些青年学生所向往和追求的榜样，于是对他非常敬仰，自然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1918年底，北大学生成立了两个进步的社团：《国民杂志》社和《新潮》杂志社。

李大钊应邀分别担任指导和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国民杂志》社很快走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18年秋，毛泽东来到北京，在李大钊帮助下，担任了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后来回忆道：“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为了走十月革命的路，李大钊越来越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提出，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要到劳动群众中去，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在他的倡导下，邓中夏等学生发起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爱国宣传，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 走在五四运动的前列

1919年5月，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李大钊在思想上、组织上领导了这场运动。他所指导下的几个社团领袖人物，如邓中夏、罗家伦、许德珩等都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

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阐明了这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他说：“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他还发表一系列随感，激励爱国学生和人们继续进行斗争。

同时，李大钊也亲自参加了运动。据高一涵回忆：“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悲愤之急，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

### 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中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或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团、期刊纷纷出现，形成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李大钊又走在时代的前列。

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不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马克思这三部分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李大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介绍了剩余价值原理，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灭亡的原因，并

指出“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

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还是头次，尤其是李大钊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人类历史，在当时更属创举。虽然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原理的理解尚幼稚，尤其是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不深入，但可看出，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已大大向前迈进了。

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变化，指出“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肯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过去的历史“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也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对唯物史观的正确认识，说明李大钊已全面、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完成了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成为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广泛传播，引起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家退出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改良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非难，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当时避居昌黎九峰山的李大钊看到胡适的文章后，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分歧，必须予以驳斥。很快，李大钊写成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批驳了胡适的观点。指出中国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制度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批判了胡适的改良主义。

文章还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批判了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之间的首次交锋，李大钊旗帜鲜明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

### 李大钊主张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就叫共产党

1920年1月下旬，在北京至天津的大道上，行驶着一辆马车，马车里两个商人打扮的人就是当时在思想界并驾齐驱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和陈独秀。陈独秀在1919年6月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几个月的铁窗生涯洗去了他向往法兰西文明的理想，转向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但他出狱后一直受到反动政府的监视，为了摆脱迫害，陈独秀决定避居上海，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到天津，一路上，他们讨论的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这件对中国历史有着巨大影响的事件就是在这里开始孕育的。

同年3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了解中国五四运动的情况。他到北京后，首先拜访了李大钊等人。李大钊为他安排了几次座谈会。在座谈中，维经斯基提出中国建党的问题。李大钊对此深表赞同，并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

与此同时，为了在思想上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条件，李大

钊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在北京大学经过与北大学生邓中夏等人酝酿，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以北大学生为主，参加者有高君宇、张国焘、罗章龙、何孟雄、刘仁静等人。

1921年11月17日，该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事，公开了该会的组织，研究会通过校长蔡元培争取到两间房子，作为活动场所。这两间房子被称作“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书斋”，后来“亢慕义斋”就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

研究会设有图书室，收集了许多种中、英、日、德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参考，还将会员分成若干小组，深入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的各种问题。他们定期举办讲演，约请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人，就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世界政治情形作定期报告，还举办辩论会，进行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在辩论会上，李大钊常常被邀请作评判员。

有一次，研究会举办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会，参加者有好几个大学的学生和教员，辩论十分激烈。

“最后听众都想听一听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的意见，一时满场俱寂，守常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页笔记大纲，用唯物史的观点来解答问题。”他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

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各项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锻炼了大批青年学生。

李大钊还积极帮助外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1920年秋，在李大钊帮助下，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李大钊也曾派陈为人到济南，同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起联系。

1920年7月，李大钊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职务（同时兼图书馆主任）。他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要论”、“社会主义”等课程，还到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他积极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讲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早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写下《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对唐山工人“尚不及骡马”的悲惨生活表示深切同情。这时，他更对无产阶级予以极大关注，他指出：“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是现今世界的趋势。他明确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民众运动的向导。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传播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任务也提到了历史日程上来。此时，李大钊常同陈独秀书信往来，讨论建党问题。陈独秀曾就准备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李大钊明确答复：就叫共产党。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月底，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带来了陈独秀关于建党的意见。李大钊积极赞同，并开始进行建党的具体活动。

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等人。由李大钊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三分之二作为小组活动的经费，小组还经常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和家里这两个地方开会。后来，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党小组将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清除了出去，纯洁了党的组织。并争取何孟雄等人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立场，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小组还吸收了邓中夏、高尚德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北京共产党小组一成立，在李大钊领导下，立即投入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1920年11月，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它是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读物，很快在长辛店等地流传，很受工人欢迎。1921年1月，小组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李大钊经常给予指导。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常去讲课，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并借此接近工人，培养工人骨干，在李大钊和北京党小组的启发下，北方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1921年5月1日，长辛店一千余工人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群众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工会组织。

继上海、北京党的小组成立后，济南、长沙、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党的小组。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也得到进一步结合。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因为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教务繁忙，未能抽身南下，便选派了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出席大会。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大钊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为党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 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较早地注意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1921年，他曾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杭州召开西湖会议，讨论有关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在会上，马林提出，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议就此展开了讨论，多数同志持反对态度，李大钊明确表示支持马林的意见，并同马林一起耐心地说服与会同志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这次会议是实现国共合作的一个转折点，李大钊在此起了关键作用。

会后，李大钊对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了理论上探讨，他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批评以前的国民党不重视民众运动的错误，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适应这种需要，去联合工农学商，“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阵线。”

1923年6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大钊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可利用统一战线去发展工农运动，壮大革命的力量。李大钊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使“三大”通过了正确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三大”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关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正式确立。

李大钊从广州返回北京后，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党的这个决定仍为一部分党员不理解。李大钊便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会见苏联派驻广州的常驻代表鲍罗廷，并召集北京党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与会者对于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根本观点及方式方法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由李大钊发言。他

指出，今天革命事业中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不是现在的国民党所能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上新的血液，即共产党的力量。而且由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恐怕为时尚早。“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在为必要的和适时的了”。国民党虽然缺点很多，但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将国民党大大地改组，还是大有可为的。同时，他还指出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共产党的阶级性和纯洁性。通过李大钊的耐心说服，许多同志的思想转变过来了。

李大钊在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派，担负了同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进行联络的重任。

1922年8月，李大钊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被迫避居上海。

正当他对前途感到绝望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孙中山很高兴地接待了李大钊，并同他进行多次讨论，共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有时兴之所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在一次会谈后，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

通过会谈，孙中山坚定了联共的决心，他开始冲破阻力，依靠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改组国民党。以后，他数次邀请李大钊就改组等事项进行讨论，将李大钊视为挚友。

在中国共产党“三大”期间，李大钊应邀同孙中山进行会谈，讨论了国共合作及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李大钊就此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

1923年10月中旬，孙中山又电邀李大钊赴上海，同廖仲恺一起准备国民党改组事宜，并委任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在李大钊等人推动下，孙中山很快公布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及党纲草案，加快了改组的步伐，12月中旬，孙中山派李大钊返回北京，负责进行北京地区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再次应邀南下，赴广州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工作及筹备国民党“一大”。途中经过上海，出席了中共中央为决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态度而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以李大钊为首的指导小组，领导出席大会期间党的工作，在国民党“一大”开会前夕，李大钊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挚友，被指定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是大会任职最多的一人。对于大会宣言和党章这两个主要文件，李大钊倾注了许多心血。

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引起了大会激烈争论。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意见书》，阐明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立场。他指出，中国“想摆脱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运动不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驳斥了右派的谬论，并获得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一大”顺利通过了有关国共合作的决议，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

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李大钊不辞劳苦，频繁奔走于大江南

北。他四跨长江，三赴上海，二下广州，不仅参与制定党的统一战线策略，而且直接促成国共合作，成为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的助产士。

#### 李大钊率团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1924年5月，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明令通缉，被迫避往昌黎九峰山。6日，他接到党中央通知，委派他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他冒着危险回到北京，邀集其他代表出发，从满洲里雇车趁黑夜穿过了中苏边境，到达苏联。

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大钊在第22次会议上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着重介绍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要点，说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李大钊在苏联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还提到：“为使中国的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建立牢固的组织，并且成为革命的核心。”

李大钊的这些论点初步阐述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 利用国民党旗帜进行大量工作

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反动统治，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北方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年12月，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领导东到东北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包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察哈尔、内蒙等省的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由李大钊总负责。同时，李大钊又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负责人之一，他一身二任，担负起北方国共合作的重任。他积极组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领导国民党各地基层组织，利用国民党的旗帜进行了大量工作。

北京政变后，北方局势很复杂。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于革命；皖系首领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总执政；奉系张作霖的势力也伸进了北京。李大钊同北方区委正确分析了形势，决定采取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策略。

李大钊对争取国民军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亲自对冯玉祥做了许多工作，还通过派人和书信往来对冯玉祥部下也做了不少工作，向他们宣传和解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

李大钊也亲自劝说冯玉祥同意在军队中建立政治俱乐部，对国民军进行政治工作，并派共产党员宣侠父、陶梁等人负责。同时，李大钊还派出许多同志直接到国民军中去，深入中下层官兵进行活动，后来，在国民军中不少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和其他重要职务，我党在国民军中还直接掌握了几支武装。他们对共产党的活动基本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对工农运动也持开明态度。

#### 李大钊促使冯玉祥改变下野主意

1924年11月，冯玉祥宣布下野，自释兵权，隐居天台山。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对冯玉祥下野后的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冯在此时下野会使形势急转直下，对国民革命是不利的；冯部也会因冯玉祥的引退，失去中心支柱而被

分化瓦解；同时看到，西北地区远离海口，段张势力鞭长莫及，大有活动余地，同时西北背靠苏联，可争取苏联援助。于是，党和李大钊又一次向冯玉祥伸出了援助之手。1925年1月，李大钊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同冯玉祥进行了多次交谈，说服冯玉祥接受西北边防督办一职。冯玉祥上任后，李大钊为了进一步建立冯玉祥国民军同苏联政府之间的联系，促进苏联援冯，多次亲自奔波往返于北京苏联大使馆与张家口冯玉祥国民军总部之间，进行频繁活动，终于促成了苏联援冯这一计划。在苏联援冯这件事上，苏联方面着重考虑了党和李大钊对国民军的影响。

《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中写道：“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的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特别考虑了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统战政策影响。”

1924年10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于12月来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李大钊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孙中山。在赴京途中，孙中山提出召开会议，以谋求中国统一与建设。

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及人民的支持。我党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李大钊领导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联合其他进步团体，成立了国民会议并召开了促成会，会议着重揭露反动军阀“善后会议”的实质。李大钊在会上进行了多次讲演，他还几次主持北方区委会议。听取大会汇报，对同“善后会议”的斗争策略及防止国民党右派破坏作了许多指示，在李大钊及北方区委领导下，大会开得很成功，扩大了革命影响，打击了军阀的气焰。

大会召开期间，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因病在北京去世。北方区委组织了隆重的追悼活动。李大钊对孙中山的去世异常悲恸，他是孙中山治丧委员会成员，亲自将孙中山灵柩由医院抬送至中央公园社稷坛。

孙中山出殡的那天，有十万多人送丧，形成了反对军阀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当送丧的队伍经过西华门时，愤怒的群众砸烂了设在那里的“善后会议”的牌子。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开始破坏统一战线。在李大钊领导下，北方统一战线的内部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宣布开除李大钊等人国民党党籍，并另设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争夺领导权。李大钊等人随即揭露了右派的阴谋，指出它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利益的实质。

### 出色地领导工农反帝运动

北方区委成立后，开始着手恢复工人运动。在国民军支持下，“二七”惨案中被捕的许多工人领袖被释放，京汉、正太、京绥、京奉、陇海、胶济等铁路工会相继恢复。

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它标志着北方工人运动在经历短暂的革命低潮后，又开始恢复，发展起来。

1925年5月，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上海人民举行了反帝大示威，英帝国主义公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惨案引起了举国愤怒，上海、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纷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斗争，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李大钊立即着手领导北方区委组织群众掀起了反帝运动。6月3日至25日，北方区委组织了三次游行示威，人数分别为5万，20万，30万。

四郊的农民也赶来参加，这几次运动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领导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李大钊还派赵世炎到天津、唐山等地领导反帝群众运动。

同年 8 月，李大钊发表《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一文，列举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号召全民觉醒，提出“吾人之运动口号为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三条”。

在中国人民反帝运动迅速高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企图通过骗局来平息中国人民反帝浪潮。1925 年 10 月，段祺瑞政府同英、美、法等国举行特别关税会议，讨论关税问题。

这一骗局遭到人民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起了关税自主运动，李大钊同北方区委对关税会议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它根本不可能达到关税自主的目的。只有民众以自己的力量实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后，才能实现关税自主。

北方区委先后组织了几次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力争关税自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李大钊还很重视农民运动。他曾选派青年去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批学员学成回来后，极大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他指出在中国，农民特别是贫农，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还指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提出“耕地农有”的主张。李大钊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李大钊还很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

1925 年 6 月，为配合北方革命形势发展，李大钊派吉雅泰等蒙古族党员回内蒙开展工作。并派干部在绥远、察哈尔、热河、包头成立中共工作委员会。1925 年下半年，成立了中共张家口地委，兼管热、察、绥特别区党的工作，为了团结内蒙各阶层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共决定成立统一战线性质的内蒙古人民党，李大钊对组织“内人党”的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要求内蒙古族党员参加这个组织，促进了内蒙古革命的发展。

1925 年 10 月，北方区委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李大钊、赵世炎主持大会，李大钊作了报告，特别强调蒙汉两族人民联合起来谋求解放的意义，大会选举李大钊为该同盟书记。同盟是党在内蒙古地区成立的第一个群众性组织，它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之后，内蒙古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 首都武装暴动失败

1925 年 11 月 23 日，奉系军阀内部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势力大受削弱。北京、天津及直隶等地区都掌握在倾向于革命的国民军手中。革命形势不断高涨。这些为党领导更大规模的斗争创造了条件。李大钊及北方区委决定利用此有利时机，在北京发起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可以利用冯、段之间矛盾，在张旅配合下，推翻段祺瑞政府，李大钊同意这个建议，决定由赵世炎任总指挥，领导这次起义。按起义布置，将于 11 月 28 日开始行动，分别夺取政府重要机构，使段政府陷入瘫痪，迫段下台，再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北京临时国民政府和临时政府委员会。首都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给段祺瑞政府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是我党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北方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大仇视。帝国主义与军阀密切勾结起来，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

帝国主义的挑衅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怒，3月17日，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群众包围段政府，要求以强硬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但遭段政府武力驱散。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学生总会等200多个团体，10万多名群众齐集天安门，召开示威大会，通过了反对8国通牒，驱逐8国公使等提案。会后，组织了两千人的代表团，赴段政府请愿。

李大钊在出席北方区委会议之后，也赶来参加请愿队伍，并亲自打着一面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当游行队伍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时，反动军阀政府下令向群众开枪，并用大刀砍，当时打死群众47人，伤20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当即组织群众撤退，自己也负了伤，当晚，李大钊召开了北京党、团会议，提出要将斗争坚持到底，并组织慰问伤员，抚恤、追悼死难者。

“三·一八”惨案是北方大革命风暴的高潮，也是一个转折点，反动军阀已向人民举起了屠刀。

### 坚守阵地，临危不惧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由反奉转而同奉系勾结，造成奉直合作反国民军的形势，国民军被迫全军退守南口一带。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也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到处张贴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4月26日，他们杀害了进步报纸《京报》的主笔邵飘萍。接着又处决了另一家进步报纸的主笔林白水。在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同志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的退却，他们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并取得很大成绩。仅北京一地，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

共青团的组织发展得更快。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钊同志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是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董季皋同志任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张作霖大帅府秘书。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直接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所以从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就多次被反动政府通缉。在这种异常艰苦和险恶的环境里，李大钊同志毫不畏惧，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李大钊同志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同志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1927年初，隐蔽在张作霖大帅府里的我地下党支部得悉，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同志。京师警察厅也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跟踪侦察，图谋一网打尽，妄图消灭京城的革命力量。董季皋及其他知情的同志与朋友都劝李大钊同志离开北京。

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李大钊同志的安全担心，多次劝说他离开，但李大钊同志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是常对你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他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坚持工作，坚持斗争。

李大钊同志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周围的同志。例如在李大钊同志身边工作的谭祖尧同志。他的未婚妻的父亲在北洋政府供职，知道张作霖要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就让女儿转告谭祖尧，让他躲避一下，并准备为其在广州代谋一事。谭祖尧同志回复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决不回头，只要李先生不离开北京，我也不离开北京。”谭祖尧同志与李大钊始终在北京坚持斗争，直到一同被害。

### 落入虎口，面无惧色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动军阀更加仇视李大钊，欲拔去这颗“眼中钉”而后快。

1927年4月27日，奉系军阀终于向李大钊伸出了罪恶的手，在帝国主义默许下，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及附近的几个办事机构，并进行大逮捕。

这天正是清明节，天气很温和，李夫人带着小女儿在外面散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写作，大女儿星华在外间看报，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枪声和纷乱的喊声。李大钊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别人赠给他护身的小手枪，带着星华走出院子，找了一间僻静的小屋坐了下来。他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不多久，宪兵、警察、便衣蜂拥而入，抢走了李大钊手中的枪，逮捕了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谭祖尧、范鸿劫、杨景山等人。夫人赵纫兰及两个女儿也同时被捕。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多次被审讯，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威胁和利诱，把竹签扎进大钊同志的指甲缝里，最后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连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说，李大钊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敌人无可奈何地向报界承认“李无确供”！敌人威逼利诱兼施。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妄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李大钊同志。李大钊严词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面对李大钊的凛然正气，敌人只得灰溜溜的收场。

李大钊同志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当时的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抗议。莫斯科人民举行游行示威，在列宁格勒、海参崴等城市也召开了群众大会。

在国内，北方铁路工人提出要劫狱，营救李大钊同志，并组织了劫狱队。教育界、学者、名流和李大钊的同乡，均起而营救。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4月9日，北京九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讨论营救办法。12日，北京国立、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又进一步讨论营救办法。但是当李大

钊同志得悉后，坚决反对、制止。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在这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李大钊依然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存革命实力，而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他在狱中自述里豪迈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历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为了开脱同案人员，他还写道：“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反动的奉系军阀政府见种种手段都不能使李大钊屈服，便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与人民群众的一致反对，对李大钊及其他 19 位革命志士下了毒手。

### 红色的种子，撒遍大地

1927 年 4 月 28 日，对李大钊等 20 名革命志士的秘密审判，于上午 11 时在警察厅正式开庭，至 12 时 10 分始毕。然后由军车四辆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死刑。当时在门前围观的人很多，街道都被堵断了。行刑用的新式绞刑机据说也是反动政府从美国运来的。李大钊同志神色未变，从容地首先走上绞刑台，他要求讲话，敌人不允许，他就大声叫喊，准备用生命的最后一刻来继续唤起民众。他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色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但是执刑的人蛮横地向他脸上挥拳，并把他推进一个发亮的金属制的长方形架子中，架子的上边正中有一个小圆圈正卡在颈中，旁边有一把柄，刽子手握住把柄，逐渐绞下去，直到舌头吐出，眼睛凸出，眼角流出血。刽子手松开把柄，将李大钊拖出，围绕刑台走了一圈，然后用冷水往李大钊脸上喷，等他苏醒过来，又开始第二次绞刑，共继续了三次，施刑长达 40 分钟之久。刽子手们就用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手段杀害了李大钊同志。

紧接着范鸿劫、谭祖尧等 19 位革命志士也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刽子手们将尸体装入棺中，停放在宣武门外下斜的长椿寺中，待家属、亲戚来认领。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在朋友们的募捐支持下，买了一口棺材，将烈士重新装殓，把灵柩移放至妙光阁街的佛寺里。

李大钊同志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及各界进步人士无不为之深切哀悼。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的《悼李大钊同志》的文章指出，他“是创立中国共产党之一人”，“是最勇敢的战士”，并将为中国人民所“牢记不忘”。

### 轰动北平城的李大钊出殡

大钊同志出殡的前两天，党组织负责同志找北平法学院学生李时雨谈话，指示他组织好大钊同志的出殡活动，特别是护卫好灵柩安全地送到万安公墓。

经大钊同志的乡亲，一位姓乔的女同志的引见，李时雨见到了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乔同志向李夫人介绍时，说他是李氏家族中的晚辈，现特来送葬，帮助做些工作，他们商定好，送葬时，李时雨头戴白色孝帽，专扶大钊同志的小儿子（10 多岁），紧跟灵柩，不离寸步。这既是防备军警驱逐的措施，免得他像一般群众那样被驱散；同时也考虑到，万一他被捕，也可以说是大钊同志的远房亲属，比较容易解脱。大钊同志的葬礼于 1933 年 4

月 23 日清晨举行。这天，长椿寺前殿里设了灵堂，中间挂一横幅，前后左右悬挂了许多挽联，两旁摆放了大量花圈。奏哀乐、读祭文之后，群众唱起了《国际歌》，气氛十分悲壮肃穆。

礼毕起灵，覆盖着绣有蓝色花朵棺罩的烈士灵柩，在群众的簇拥下，缓缓地被抬出长椿寺。李时雨扶着大钊同志的小儿子，同李夫人及其亲属们紧随灵柩一起步，后面跟随着数百名送葬的群众。大家胸戴白花，臂缠黑纱，一些同志抬着大钊同志的画像，扛着花圈、挽联和挽词，边走边向路边行人撒传单并高呼口号。

灵柩抬过宣武门后，送葬群众已增至千余人，到西单时，只见不少群众在路旁摆出了祭桌。

这时，宣读祭文声、燃放鞭炮声以及呼喊口号声连成一片，震撼着半个北平城。行至西单北大街时，李时雨回头往南一瞥，只见人山人海，望不到边。

队伍行至甘石桥，有人把早已准备好的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覆盖在大钊同志的灵柩上。这时，反动军警从四面八方冲击送葬的群众，他们像疯狗一样，踢翻了祭桌，殴打朗诵祭文的人，用枪托子打散送葬的群众。他们打伤了数百人，逮捕了几十人。李时雨始终扶着大钊同志的小儿子及亲属们，坚持把灵柩护送到万安公墓。

大钊同志的石碑是在红瓦市路东一个石匠作坊定刻的。起运时用黄纸把石碑上的字糊上，天未亮时就雇了辆小驴车送出城门放到万安公墓。墓志铭是：先生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死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九岁。下面刻着子女的名字。

大钊同志的出殡，可以说是轰动一时，极其悲壮的一次群众运动。它不仅敬慰了忠魂，安葬了烈士遗体，而且进一步揭露控诉了反动派的残暴。虽然这次出殡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它更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其影响是很大的。

### 第三章 毛泽东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 “第一师范是一个好学校”

毛泽东 8 岁开始读书，在韶山先后进 6 所私塾就学 6 年。1910 年秋，毛泽东离开风气闭塞的韶山，去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入学考试时，他在试题《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向。校长阅卷后大加赞赏，对同事们说：“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

这所学校实行“新法教育”，毛泽东学到很多中外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新鲜知识。

他在这里特别爱读康有为谈维新变法的文章、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受到了他们关于君主立宪主张的影响，并出于救国救民的志向和热情，产生了对康、梁的崇拜。

1911年春，17岁的毛泽东到长沙考取了汀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很快被革命党人的反清爱国宣传所吸引，他认真研究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变革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赞成君主立宪转变成为反对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

他为了表示反抗清王朝的决心，带头剪掉了辫子。

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暴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

毛泽东退伍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他读了半年后，感到中学课程肤浅，并对陈旧的校规不满，认为在校读书不如自学，就退了学。

毛泽东寄宿湘乡会馆，开始了在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

他每天早去晚归，贪婪地阅读各种中外名著。

他在湖南图书馆自修半年，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使他更加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一步克服了所受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3年春，毛泽东因父亲反对他自修，只好继续报考学校，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师范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但也存在课程繁杂等弊端。

毛泽东根据寻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专心研读哲学、史地、文学等社会科学，对其他课程不花过多的精力。

他注重自学，并制定了学习计划，读书刻苦用功，十分珍惜时间，有时通宵不眠。

他博览群书，但又有阅读重点，而且善于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和分析。

他爱看报章杂志，当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后，毛泽东很快成了它的热心读者。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常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力求做到“周知社会。”他曾多次利用寒暑假，深入农村，进行游学、考察，了解农村的弊端和农民的疾苦。

他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后，以学友会名义办了工人夜学，结识了穷苦工人，了解了他们的困境和愿望。

毛泽东在接触工农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增强了他救国救民的决心。

1915年，毛泽东参加组织第五师范进步师生开展了反日、反袁斗争。他在读了一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后，无比义愤，在封面上题词明志：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年从夏至冬，毛泽东和爱国师生一直在做宣传救国的工作，反对袁世凯称帝。

在第一师范教师中，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有较大的影响。杨昌济对毛泽东十分钟爱，极为赞赏他的远大抱负和杰出才华，认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曾在日记中写道，“资质俊秀如此，殊为难得。”毛泽东在同学中也倍受推崇，1917年学校开展“人物互选”活动，

选举范围包括德、智、体三方面，他得票全校之冠。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一个创举，是他和同学蔡和森等经过反复探讨，决定集合同志，组织团体，共同奋斗。1918年4月他们在长沙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毛泽东当选为干事。

后来，学会在毛泽东主持下，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成为当时革命性最强的团体之一，许多会员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后来回忆说：

“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第一师范。第一师范是一个好学校，替我打好了文化基础。”

毛泽东1936年在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学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五分之三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直到1927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来读报的人大多数不把他当人看待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的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更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

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 一文不名的毛泽东要到上海，却只有买票到天津的钱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天津后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而且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一点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更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又给贼偷去了。哎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

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发现已经有人募集一大笔钱，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提供了一笔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启程回长沙了。”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还有过这些游历：

我在湖南曾沿着洞庭湖徒步环行。到保定时我沿城墙走了一圈。在渤海湾的冰上散步。《三国》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

最后，我登上泰山绝顶，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媲美的成就。”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五四运动以后，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编；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协助创办

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组织。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特别是新民学会——都强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坏蛋。我们领导了一次反对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要求撤换他，并且派代表团到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鼓动——当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

张敬尧以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们的反对。”

“在这以后我又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并在那里组织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反对军阀的宣传运动。为了推动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翻，在长沙成立了一个新政权。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坚持谋求实行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纲领。”

### 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再次见到了陈独秀

“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当时还见过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的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

“谭延闿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鼓吹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掌权，就立即大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且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纲领。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胡说八道的和吹牛的对联、匾都扯了下来。”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认为是湖南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但是，赵恒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我还记得1920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场升起红旗，但是遭到警察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听，并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依靠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改革的实现。”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项工作中我的行动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可以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日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一九二一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

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出席中共一大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书记之一

“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个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起过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代，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人有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当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书记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同时也是创始人中唯一的妇女。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做得非常少。湖南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斗争频繁。1922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 and 庞要铨，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活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翼工人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而且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支持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当时已经组织成为湖南省总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阻止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

“我回到湖南后，大力推动工会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四一二”事

## 变后，毛泽东提出拉队伍“上山”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作农民问题的重要报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毛泽东和多数代表一起，批评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局成员之一，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三大”后，毛泽东赴广州出席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会后，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在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他因病于同年12月离沪回湘休养。利用养病的机会，他在韶山领导开展了半年的农民运动，办了农民夜校，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中共韶山支部。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毛泽东为这个刊物撰写了许多文章，揭露和反击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

1926年5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亲自给学员讲课，引导学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重视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国农民运动。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发言不同意陈独秀反对“耕地农有”的看法，主张进行土地革命。

会后，毛泽东带着农运是否过火的问题到湖南5个县进行32天考察。1927年5月，他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了中国革命的真正敌友，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性，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6年3月，当蒋介石制造出中山舰事件时，毛泽东曾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以武力给予坚决回击。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深感保存革命武力以应付反革命事变的紧迫性，他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主张“上山”，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49年后的这一天，毛泽东在北京病逝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

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会上，毛泽东对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等最迫切的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会议选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临时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同湖南省委多次讨论秋收起义问题，主张秋收起义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随后，他到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边界一些县的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指示，并研究制定了湘赣边界起义的行动计划。

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部队 5000 余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

1927 年 9 月 9 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最初攻占了一些城镇，但由于强敌反扑，相继失利。

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主张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找个歇脚的地方，以保存实力。

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秋收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行进途中，遭敌袭击，卢德铭不幸牺牲。

29 日，起义部队转战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对不足一千人的部队进行整编和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健全部队党的组织，班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同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随即，他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在部队占领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工农兵政府和地方武装，从而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这是中国革命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伟大转折。

在井冈山斗争的初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工农革命军的建设。他向部队提出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接着，他为部队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这些规定，加强了军队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

### 毛泽东第二次婚姻的结束

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告别了第二位妻子杨开慧，不想竟成了永诀。毛泽东的元配叫罗氏。据族谱推算，罗氏生于 1889 年 10 月 20 日，卒于 1910 年 2 月 11 日，年仅 21 岁。

据当地老人介绍，罗氏家庭富裕，有兄妹 3 人，罗氏是 18 岁到毛家的。

毛泽东当时仅 14 岁。虽然罗氏性情温顺善良，长得丰满，是一把操持家务的好手，但是，毛泽东少年大志，根本就没有想到父母这么早就为自己操办婚事，为此闷闷不乐，他拒绝与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个指头。1910 年，就在他离开韶山去湘乡读书之前，这年春节后的一天，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不幸去世。毛泽东虽然不承认这桩婚事，但一直没有忘记罗氏的亲属。

解放后，罗氏的胞兄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要求去北京，毛泽东欣然同意。1950 年，毛泽东派儿子毛岸英到韶山看望父老乡亲。岸英还特意去杨林拜望了外祖罗家，给罗氏之兄罗石泉送去 500 元钱。

杨开慧，湖南长沙人，生于 1901 年。在她少年时代就认识了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进步校友毛泽东。1918 年冬，他们在银装素裹的北国开始了在革命暴风雨中的恋爱生活。1920 年 10 月，毛泽东继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杨开慧加入了团组织。经过长期了解，两人结了婚。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杨开慧又成为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跟着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活动。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先后生育了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

1930 年，由于叛徒告密，杨开慧被反动派何键逮捕。被捕前，她沉着镇静，首先通知同志们转移，并迅速处理了党的文件。

在狱中，她受尽酷刑，遍体鳞伤，仍坚贞不屈。敌人要她交出地下党员名单，她拒绝了；敌人要她登报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关系，以换取所谓的“自由”，她又严词拒绝了。

敌人企图以她下有孩子、上有老母动摇她的意志，她大义凛然，不为所动。1930 年 11 月，29 岁的杨开慧同志从容就义，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杨开慧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江西苏区，毛泽东非常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全国一解放，毛泽东先后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回湘扫墓。1957 年，又写下了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1962 年，杨开慧的母亲去世，毛泽东在悼念信中还称烈士为“我的亲爱的夫人杨开慧同志”。

李淑一在回忆中说：

“我和开慧很早就结成了莫逆之交。1920 年，开慧的父亲、毛主席的老师杨怀中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后，开慧就随着她妈妈回到长沙上学。那时开慧剪着短发，被认为是“过激党”，学校不收。后由我父亲李肖聃的介绍，才进入长沙私立福湘女中。在福湘读书时，我和开慧好得形影不离。开慧思想进步，大公无私，待人诚恳，生活朴素。在毛主席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她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经常向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

那时候，毛主席和开慧生活很艰苦。为了支援毛主席进行建党工作，开慧动员妈妈拿出北京大学同事给她父亲奠仪的一部分款，给毛主席做经费。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开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是建党初期毛主席亲自培育的优秀共产党员之一。

不久，她就离开学校，随毛主席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工作，并和毛主席结了婚。毛主席和开慧住在长沙韭菜园附近的清水塘一栋破旧的房子里，进行党的工作，直荀和我曾到清水塘去看过他们。1923 年，开慧跟随毛主席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韶山党支部就是开慧协助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当时毛主席和开慧工作很紧张，开慧严格

要求自己，从来不因孩子和家庭困难影响革命工作。毛主席对她一直很敬佩。1927年秋，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慧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在长沙竹山铺下板仓一带开展地下工作。因叛徒告密，1930年10月，她和岸英被捕入狱。敌人多次强迫她与毛主席脱离夫妻关系，都被她严词拒绝。敌人无法使她屈服，惨无人道地枪杀了她。临刑前，开慧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显示了共产党员坚如钢铁，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开慧一生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帮助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生活上对毛主席十分关心和体贴。她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

朱、毛会师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毛泽东受到“左”倾领导人的排挤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部赴湘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宁冈砦市会师，史称“井冈山会师”。

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按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中共军委书记。

5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初步地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明确肯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统一领导军队和根据地的斗争。

6月到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

11月上旬，依中共中央的指定，重新组织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1929年1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即将遭到湘赣两省敌军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红军面临敌军封锁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后出击闽西。在转战中，他和朱德等作出了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

3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阀即将进行混战的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20余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农民武装，并与汀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

红四军于3月6日至月间，在赣南、闽西边东征西战，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地方武装，相继成立10多个县的红色政权，在当地中共组织和群众武装的配合下，初步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6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建军问题上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代表接受，未能统一思想认识。

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养病兼做地方工作。

新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后，带着中央9月来信于10月下旬回到部队。

他在11月下旬到上杭蛟洋向毛泽东传达中央指示，并陪同毛泽东一起到长汀，同朱德会合，准备召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1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和领导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并在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政

治报告。大会决定由毛泽东复任前委书记，并通过了他起草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规定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强调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原则，指明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要求对红军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领导，纠正红军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四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后来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长时期的指导作用。1930年1月，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6月，毛泽东任红军第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和中共前委书记。8月，他任红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委书记。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0月底，当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并主张东渡赣江，在根据地中心地区与敌作战，随即他和朱德等领导红军完成长期以来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变。

同年12月至次年9月，他同朱德指挥红军实行在战略上以弱胜强、在战术上以多击少的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围剿”，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重大发展。

这个时期毛泽东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受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人的反对。

1931年11月上旬，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1932年10月上旬，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严厉的不公正的批评，把他的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正确主张，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人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把他调回后方，接着又撤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是年秋，毛泽东因积劳成疾，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1933年，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中央政府工作。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下旬至2月初，他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4月至7月，他在中共粤赣省委驻地会昌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他亲临南线前沿进行军事调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使南线出现了新局面。

毛泽东的第三次婚姻

1927年10月，在江西井冈山的步云山上，贺子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大家一样，脖子上结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他的脚步走起来有点不对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脚，化脓了。几个人沿一条山间小路排着单行朝山上走，毛泽东走在最前面。他看见迎候他的人群，快步走了过去，首先同袁文才、王佐握手。然后，转过身来，把同他一起上山的战友，逐个介绍给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和王佐也把山上的同志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见面的每一个人握手问好。

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的疑团顿释，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他握住贺子珍的手说：

“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接着，大家坐下来商谈事情。

从毛泽东的介绍中，贺子珍才知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为什么带着队伍不去别的地方，却来到井冈山，原来是王新亚起的作用。王新亚离开永新后，带着安福的农民自卫军活动到湖南浏阳一带，在那里同毛泽东会合了。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大革命时期井冈山附近的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几个县革命斗争的情况，讲了几个县党组织的力量和工农自卫军发展的规模，永新暴动的结果，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自卫军至今仍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情况。王新亚还介绍了井冈山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地理条件。这一切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同安源的矿工组成了起义的第二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失利，第二团被打散，王新亚牺牲了。秋收起义的余部向何处去？毛泽东觉得，王新亚讲述过的井冈山，从党的力量、群众的基础到地理条件，都是革命军落脚的理想地方。于是带着起义队伍的余部，向井冈山方向前进。途中，队伍经过三湾时，对队伍进行了整顿和改编，打出中国工农革命第一师第一团的番号，向砦市开来。

交谈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王佐的自卫军，在革命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他提出，以后革命军要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协同作战，共同在井冈山立住脚跟。

这一次商谈，气氛融洽，双方都没有什么保留和顾虑。袁文才和王佐都很高兴。袁文才早就盼望能同上级党取得联系，为革命做点工作。因此，在这次会上，他当场表示，欢迎毛委员的队伍上井冈山领导他们干革命。安置伤病员和队伍驻扎问题，他都答应安排。他知道毛委员的队伍需要钱，事先把埋在地下的银元挖了出来，约有一千块，装了12个竹筒，带到步云山来。在这次会面中，袁文才亲自把银元交给毛泽东。这次会面后，袁文才同贺子珍一起回到茅坪。他原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这天回到家里后，异常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用客家话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形，一面讲一面笑。接着，他又对贺子珍说：

“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事干了。”

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以后，井冈山变样了！沸腾了！

革命军第一团的伤病员首先上山。开始时，还没有红军医院，袁文才

和王佐把伤病员安置在老百姓家里。

第一团的官兵并没有立即上山。他们先来到莲花、湖南的攸县和茶陵去打土豪和筹款。毛泽东因为脚伤，没有随部队出发，留在茅坪养伤了。脚伤痊愈以后，他才下山追赶部队。

在养脚伤的这段日子，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熟悉这里的地形、环境和人员的情况。他同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经常同他们促膝倾谈。对他们的身世、为人和思想，了解得比较透彻。他还与井冈山上避难的永新的共产党员刘珍、王怀、贺敏学等人多次详谈，了解永新党建立的经过和斗争情况。连生病刚愈的贺子珍，他也找过几次，听取她对怎样开展井冈山地区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还由袁文才、王佐和永新党的同志陪同，察看了井冈山的山势地形。

毛泽东开始住在步云山。步云山离茅坪不远，步行半小时就到了。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非常敬佩他，觉得毛泽东住得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主动请毛委员住到茅坪来。永新和莲花的共产党员，原来住在茅坪的八角楼，为了迎接毛泽东到茅坪居住，他们把房子腾了出来。后来毛泽东在八角楼住的那间房子，就是原先贺敏学住过的。

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晚上到平河边散步，或者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那时贺子珍疾初愈，身子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见到了，都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天。

有一次，毛泽东对贺子珍说：“井冈山的地理环境好得很。可以讲，现在我们搞革命有了落脚点，井冈山就是我们的落脚点。这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回旋余地大得很哩！”

贺子珍告诉他，井冈山附近几个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群众发动比较深入广泛。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

“井冈山这几个县都是好的，你们永新更好。永新的地理条件很重要，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也比较好。你们永新的同志应该回永新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

贺子珍还同毛泽东谈起了袁文才和王佐，毛泽东兴奋地肯定地说：“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王佐也是好的，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也是革命的队伍嘛！”

的确，毛泽东上山以后，王佐参加革命的思想稳定了，一条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半年后的1928年4月，红军第二次去湖南作战前，王佐在茅坪的一个庙里入了党。他入党后，非常高兴，逢人就爱说：“我现在也成了挂牌子（取得党员称号）的了。”对王佐的入党，毛泽东也很高兴。有一回他对王佐说：“我们现在更加是同志了。”当时国民党有的书刊把袁文才、王佐写成土匪，把他们领导的、已经改编为自卫军的队伍仍然称作土匪队伍，这完全是有意歪曲的。怎么能把共产党员说成是土匪，把有地下党领导的武装说成土匪队伍呢？在毛泽东没有上山之前，山上就有党的组织，支部书记是贺敏学。

以后，毛泽东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改编为红二团，团长是袁文才，副团长是王佐，团党委书记是贺敏学，党代表是何长工。党代表与后来的政委一样，要服从党委集体领导，但行政上团党委书记要服从党代表领导。当

时为了搞好团结，多安排几个职务。

不久，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也到了塘边村。工作队安排他住到老婆婆的家里，老婆婆高兴地把堂屋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

毛泽东一住下来，立刻听取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汇报。毛泽东一面认真地听，一面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并不时地提出问题，比如：对这种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都是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份和政治态度如何？贺子珍对这些问题，一时还归纳不起来，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思，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是怎么说的。看看自己没能够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贺子珍感到羞愧，白皙的脸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丝毫没有责备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说：“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于是，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首先是调查者自己要心里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劲，收集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另外，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用不同方法。对有的人，比如说对土改的积极分子，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是向富裕中农作调查，就要转两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也有几个弯。

贺子珍睁大眼睛听着。她从没有想到过调查研究还有这么多的研究。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接着，毛泽东不仅在塘边村深入调查，还到附近的村庄去作调查。他了解的内容，有农村土地分配情况。以后，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写了一个报告，也就是后来他十分惋惜被丢失了的《永新调查》。

《永新调查》，贺子珍曾经看过。几十年后，她还记忆犹新地说：“里面主要谈了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有关于土地革命方面的情况，也有对工商业政策的意见。当时，有的人实行过左的政策，对工商业者的财产，采取没收的政策。毛泽东实地作了调查后，纠正了这个错误。《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宁冈写的，写好以后曾经油印出来，发到井冈山各个团。”

贺子珍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对毛泽东的印象也越深。

这时，在塘边，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有一天，一支地主保安队突然向塘边村袭来。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敌人，以密集的枪弹向在要道上的塘边暴动队发起进攻。塘边地处遂川、莲花和永新三县的交界。虽然永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塘边附近几个县仍是敌人的天下。从塘边逃出去的地主向附近的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有个中央委员毛泽东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以五万大洋作悬赏，捉拿毛泽东呢！保安队一些家伙贪财心切，立即纠集起来向塘边发起突然袭击。

正在堂屋同毛泽东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和暴动队员的报告，不禁大吃一惊。她知道，塘边附近有一个连的红军，还有毛泽东的一个警卫班。但是，因为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意外，队伍全部分散到各个庄子去做群众工作，一时无法集中。暴动队员大部分没有枪，只有梭镖，光靠他们能不能顶住保安队的火力，实在是个问题，万一顶不住，毛泽东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要是毛泽东出了什么事……贺子珍越想越紧张，脑子全乱了。

她抬眼看看毛泽东，他却非常沉着冷静，仍然慢条斯理地抽他的烟，稳稳地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事实上，毛泽东正在分析

眼前的局势。贺子珍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他觉得，来者是敌人的先头部队还是一小股保安队，尚未搞清楚，这一仗如果冒险去打，有可能陷入被动，危及塘边人民的安全。于是他果断地作出决定：“通知村里群众，马上撤出村子！”

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的百姓已经有了准备。他们人数不多，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久留，在村子里抢掠一阵子就走掉了。

一小队民团，小小的一次骚扰，这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同多少重大的战役相比，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一书。但是，它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怎样镇定自若，沉着应付。这种冷静、自信和力量，正是她所缺少的。同毛泽东的接触中，贺子珍常常拿自己同毛泽东相比，都感到自己年轻幼稚，同时感到在毛泽东的身上，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有无穷的力量。毛泽东这种优异的、革命者的素质，是这样强烈的吸引着她。每当她来到他的身边，就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有他的帮助和指点，自己也变得聪明和成熟多了。

她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能够永远在他的身边工作，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该有多好！”

年轻姑娘的心事是从来不会轻易吐露的。贺子珍虽说是反封建的先锋战士，但一想到自己悄悄爱上一个人，就感到那样不好意思，胸口怦怦直跳，平时的勇敢、大胆、泼辣的作风也变得无影无踪了。毛泽东从她的神态和表情中，懂得了她的心思，仿佛看到这个年轻、质朴的姑娘那颗火热的心。

有一天，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和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看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光，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土布上衣的衣角。

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接着，他动情地讲述了他的经历和身世。

贺子珍从毛泽东谈话中，知道了他追求革命、献身革命的经过。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很久不通信了，关山远隔，杳无音信，路途又这么遥远，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

湖南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知是真是假。

听到毛泽东这些坦诚之言，贺子珍被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为了革命，抛妻别子，孑然一身。他身上的担子那么重，工作那么忙，自己的生活无暇料理，是多么困难啊！

她看看毛泽东那身好久没洗过的旧军装，在敬佩、同情的目光中，又加上更多的怜爱之情。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谈得那样投机。两颗赤诚的心不知不觉地融汇在一起了。

他们继续在塘边进行工作。塘边的山间、田野、农家小屋，处处留下他们双双的脚印。

贺子珍和毛泽东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

祝贺，在那样艰苦的年月，只能一切从简。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一下，就完了。

### 她不会被历史勾销

贺子珍同毛泽东结婚 10 年，长征到达陕北。有着强烈事业心的贺子珍不满足于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此时，夫妻间也出现裂痕。1937 年，贺子珍到了西安，为了取出身体中的弹片，转道新疆去了苏联，一住就是 9 年。而此间，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

在贺子珍家庭发生变故以后，在苏联的同学中，有人对她表示过倾慕之情。回祖国后，仍然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是，贺子珍都婉言拒绝了。许多人关心她今后的生活道路怎么走？她说：“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了。”

1954 年的一天，贺子珍正在上海哥哥的家里休息，收音机里播送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了。这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熟悉呀！她已经有 10 多年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

“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她的嫂子李立英赞了一句。

“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贺子珍回答说。

收音机把毛泽东的讲话录音播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忘了睡觉。

第二天早上，李立英起床，发现贺子珍还坐在那里，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凝神听什么。

她问李立英：“怎么收音机不响了，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李立英走过来一看，原来收音机一夜没关，已烧坏了。

从此，贺子珍病了。

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知道贺子珍是为什么病的以后，流下了眼泪。他提笔写了第二封信。听说贺子珍不肯吃药，也不肯看病，就在信中嘱咐她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要听医生的话。他听说贺子珍抽烟抽得很厉害，就在信上劝她说，不要抽那么多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

贺子珍看了这封信后，病情竟然慢慢地好起来。她也肯吃药，也肯看病，还把烟戒了。

毛泽东不时给贺子珍捎点东西来，有吃的，有用的。他知道贺子珍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她。有一次，毛泽东还捎来一千元钱。贺子珍用这些钱买了许多日用品，送给井冈山时期掩护过她的乡亲。毛泽东劝贺子珍戒烟，可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名牌香烟，他打开一包抽了一半，突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那九包没开封的烟，连同抽过的那半包烟一起包好，托人送给贺子珍。

贺子珍收到烟后，原来已经戒了烟，又抽了起来。

在毛泽东送给贺子珍的东西中，还有一块淡黄色的大手帕，是毛泽东用过的。贺子珍看到这块手帕，思念之情不能自己。她写了第四封信。她在信里写到自己对他的怀念。

并写道：你一定要注意王明这样的人对你的迫害。她深受王明的迫害。在她的观念中，王明成了一切坏人的代名词。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给贺子珍写了第三封信。信上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贺子珍也常常通过李

敏给毛泽东捎东西。毛泽东爱吃南方的青菜，像芥菜、边笋这些东西。贺子珍就把鲜嫩的青菜捎给他。一次贺子珍还给他捎去一个很精致的骨雕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这个习惯，贺子珍记住了。

1959年，她正闲居南昌。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请她上庐山。到达宾馆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她被领进一间屋子，不觉一惊，里面坐的竟是毛泽东。他微笑地站起来同她打招呼，然后倒了两杯茶。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他，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再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

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她一一都说了。他听了后，轻轻地叹了口气，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谈起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说他实在太忙，想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他又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说。

毛泽东还告诉她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他们举行婚礼。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了起来：“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谁料到，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原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见贺子珍的时候，江青正在杭州，那天夜里，她突然来了长途电话，说她第二天要来庐山。毛泽东连忙让贺子珍下山了。在批判林彪、陈伯达的时候，毛主席批评陈伯达1959年，你在庐山，没有任务，你为何下山动员了？你下山干什么去了？贺怀疑，陈可能是下山把毛泽东同贺会见的事，告诉江青了。他不敢在山上打电话，山下有个通讯连，就到那里打电话去了。所以江青突然来到山上。

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人们才发现，贺子珍这个从1929年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竟是一个“黑人”。中央组织部、上海市委都没有一份有关她的档案。正式档案没有，文书档案没有，连人头档案也没有。那伙野心家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一笔勾销。

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她！历史将永远记住她！

### 毛泽东主导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执行完全错误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在10月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红军惨遭损失和敌军封锁围堵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他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的支持。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

1935年1月7日，黔北重镇遵义宣告解放。

1月9日下午，当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

王稼祥等与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山人海、夹道欢迎红军的极为热烈的场面。毛泽东等在丰乐桥头下了马，与前来欢迎的群众一一握手。他们一齐走向旧府衙前。

在遵义，散发了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表的《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述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

1月12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下午一时，大会开始，朱德、毛泽东、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接着，毛泽东讲话，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他又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行为，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随后李富春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通俗生动，讲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使大家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一些人过去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偏见，听了他们的讲话也改变了认识。

就在这个会上，成立了黔北高原上从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纷纷成立。各族贫苦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参军，使红军扩大了五千名新战士。

黎平会议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解决从湘南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陈云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伟大的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

从长征开始，他就鲜明地树起了旗帜，与“左”倾错误战线展开斗争。对长征中的每项重大行动，他都向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反对错误的意见。他反对把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积极开展说服教育工作，提高了多数人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认识，而首先是取得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他们商谈了应如何使红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战略转移中夺取胜利的问题，商谈了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进一步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意见。

王稼祥主张把李德轰下台，正合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他（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失苏区，被迫长征。”王稼祥去找张闻天交谈，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认为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行，他也支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与因脚伤坐担架的聂荣臻一同行军，互相交谈，共同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荣臻说：“我完

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王稼祥又找周恩来和朱德交换意见，周、朱原来就很佩服与敬重毛泽东，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王稼祥的意见。

红军自黎平会议后，日下一城，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凯歌行进。在到达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当即回答道：“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些会前的活动工作。”王稼祥找张闻天交谈，张闻天支持；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同意；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义开会总结。这样，遵义会议的召开就决定下来了。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迫切期望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杨尚昆说：“在毛泽东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在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重新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泽东同志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并使红军险遭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来。”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北，智取遵义，前出松坎之后，取得了进行休整的有利条件。为召开会议保证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后，党中央即开始进行开会的准备，决定由博古准备一个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在认真作发言准备，他们三人一起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一个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发言提纲。

####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原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会议室设在二楼。因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室内生了火盆取暖。

出席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参加会议的共20人。

由于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多数是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的问题；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长征）

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又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他把不能粉碎“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等等，过分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责任。

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挥上是有某些失误的，执行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但他也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从湘南开始的争论，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李德指挥的错误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周恩来后来说，在这些争论后，“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指出大方向，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周恩来在会上的诚恳的态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对于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李德评论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

紧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

随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毛泽东在发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说明当时解决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当会议上有人提出“左”倾冒险主义政治方面的错误时，毛泽东机智地予以制止了。他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和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

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还指出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意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

周恩来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战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立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因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发言之后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作用很大，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伟大功绩，称他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毛泽东称赞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

在会议上，周恩来也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

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朱德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结成的亲密战友，他历来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卓越指挥才能。他在会上严肃批评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他声色俱厉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他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发烧，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但他仍然专注地听取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汇报了长征两个多月来五军团部队的情况，在湘

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指战员浴血奋战，连连失利，指战员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等等。毛泽东认为他讲的情况很重要，就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卓然在会议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会议上大多数人反对“左”倾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也有少数人坚持错误。凯丰坚决不同意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批判，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凯丰无言以对。他对会议持保留意见，会后一段时间仍坚持错误立场，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是照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的。他是会议的主持人，在主持会议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会后他同意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给中央新的负责人，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后来经过实践的教育，博古和凯丰都转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等斗争中，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和李德被取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李德受到了批评，对博古的批评很大一部分也是批评李德的。他在会上情绪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他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后，他要求随一军团行动，以体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仍然很尊重他，在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上有意识地经常征求他的意见。

然而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遵义会议极为不满，甚至到 70 年代初期，他在《中国纪事》中谈到遵义会议时，仍然充满愤懑，说：“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改在川滇黔边发展。

遵义会议最后还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会议还增选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云南扎西（威信）的行军途中，在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水田寨宿营时，常委开会分工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的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

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根本转折点。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核心，领导中国革命达 40 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会后不久，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界地区，先后四渡赤水，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调动和迷惑敌人，突然南渡乌江，出敌不意地威逼贵阳，乘虚疾进云南，胜利地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追堵的几十万敌军，取得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的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被人们赞叹为“用兵真如神”。

同年 6 月，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界地区退却。

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作了斗争，为了纠正他的错误进行了说服和批评，否定了他企图要挟中共中央南下川康边界的冒险主张，特别是当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暴露出危害中央的阴谋时，毛泽东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三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红军恢复一方面军番号，第一军团改为第一军，第三军团改为第三军）继续北上，10 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

11 月初，毛泽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月下旬，他直接指挥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1936 年 2 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红一方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

在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拦击情况下，为顾全抗日大局，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政策，5 月，毛泽东毅然决策回师陕北。

随后，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红举向陕甘宁边境西部地区进行西征战役，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使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并发展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

12 月，毛泽东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 1936 年整整一年中，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而倾注全部心血。他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给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各方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发出一封封书信，阐明我党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议谈判停战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参加谈判，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两次合作、团结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1937 年 1 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

此后 10 年，毛泽东坐镇延安，运筹帷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日夜操劳，延安即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8 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确定我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行向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

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8 月 25 日，他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9 月，毛泽东向八路军领导同志连续发出电报，指出：“八路军变更战略部署，三个师由集中配置变为分散配置，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深入到日军的侧翼和后方，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毛泽东的领导和部署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先后在敌后开辟了大小 19 块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38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1945 年 4 月至 6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 毛泽东思想是怎样提出的

1938 年 10 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当时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52 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之统一”这个思想原则。

遵循着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系列著作，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

1941 年 3 月，党的一个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同志，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他说：“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特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视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我们党的教育人材“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1年8月，另一些理论工作者艾思奇等同志，在《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辉煌的范例”、“典型著作”。1942年2月18、19日，张如心同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想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可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他说：“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这篇文章在反驳叶青污蔑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的时候，也从正面意义上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

1942年7月1日，朱德同志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

1942年陈毅同志为纪念党的21周年而发表的《伟大的二十一年》，从五个方面论述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并指出毛泽东同志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他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同志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载1943年7月6日《解放日报》），论述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他在文章中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同志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载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王稼祥同志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1945年3月15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会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看到的材料中，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

1945年3月31日，刘少奇同志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报告时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出发点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1945年6月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同志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及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及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刘少奇同志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定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以上材料说明，毛泽东思想在七大正式提出之前，党内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至少有四年之久。许多领导同志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上作过阐述。在酝酿的过程中，开始的提法是“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以后又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等提法，这些提法的内容实际上是相同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同时并用的，直到七大，毛泽东思想才正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并且写进了党章。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七大所作的报告，吸收了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一些提法和意见，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总之，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正如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本身的形成一样，不是出于个别同志的贡献，而是党的集体智慧的成果。

**蒋介石以为毛泽东不敢到重庆来，毛泽东将了他一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发展和准备革命战

争的方针，阐明同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作针锋相对斗争的策略。

他为了揭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毅然接受蒋介石的电邀，在 8 月下旬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以高超的斗争艺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使蒋介石被迫同意在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就扩大了对解放区的内战规模。当时，毛泽东规定了保卫解放区的基本方针，要求把练兵、生产、减租三项工作作为准备自卫战争的中心。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毛泽东分析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状况，号召人民解放军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明确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针。

从这年 6 月下旬起，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人民解放军经过八个月的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蒋介石不甘失败，集中兵力又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1947 年 3 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领 25 万国民党军进攻陕北，紧逼延安。毛泽东经过全面分析，果断地作出了我军主动撤出延安、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决策。

从此，他离别了工作、战斗、生活长达 10 年之久的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 从西柏坡到北平，毛泽东的眼睛盯住每一块中国的土地

毛泽东于 1947 年 3 月 18 日撤出延安后，为了拖住胡宗南所率部队，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留在陕北。

他同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多里，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8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向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西柏坡村前进。

5 月 26 日，毛泽东抵达河北省现属平山县的西柏坡村。中央工委随即和中央合并，因此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

1948 年下半年，中国的战争形势变得更为有利于我军。毛泽东在 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建设 500 万人民解放军、以五年左右时间（从 1946 年 7 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性，使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他纵观全局，以战略家的伟大气魄，毅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从当年 9 月到次年 1 月，在周恩来、朱德的协助下，亲自部署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大决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共歼敌 154 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歼，取得了解放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同中央主要领导人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于 25 日进驻北平，出席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受到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

进京后，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

民。

他在谋划和决定建国大计的同时，仍然夜以继日地指挥人民解放军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地区进军。

他发起渡江战役，迅速解放了南京，从而宣告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针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之势，他提出“远距离包围迂回”断敌退路的作战方针，部署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上海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贵阳战役、重庆战役、成都战役等重大胜利。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采取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加强对敌军的政治攻势，用和平方式解放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地区。随后，人民解放军又组织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许多沿海岛屿。

1949年冬至1950年初，毛泽东就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终于在1951年5月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全国大陆获得了解放和统一。

###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凌晨6点钟，东方露出了桔红色的曙光，毛主席缓步走出办公室，在院里边抽烟边散步。看上去，他的确是有些疲倦了。

他太累了！因为这几天来连续开会，非常紧张。昨天晚上，虽说没有召开会议，毛主席本想早点休息，以便今天精力充沛地出席开国大典，但是，因为手头上临时有了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他也没有休息成，在办公室里一直又工作到天亮。

在毛主席夜间工作的时候，警卫人员几次走进办公室里去提醒他，他只是口头上答应休息，可就是不离开办公桌。后来，周副主席几次来电话让警卫人员负责催促毛主席休息，说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天安门。警卫人员把周副主席的话对毛主席说过以后，毛主席这才停止了工作，站起身来，走到院子里。

毛主席虽然有些疲倦了，但看上去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因为今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今天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1947年3月18日晚上撤离延安时，毛主席就带着肯定的语气说过：

“在不久的将来，延安还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

时间才过去两年多一点，这个伟大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此时此刻，不要说毛主席高兴，全国人民都是特别兴奋呀。

出发的时间到了，首长们上了汽车。汽车从勤政殿的门口出发，开出了中南海的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往南拐弯，在中山公园后边进了故宫阙右门，往南直到天安门城楼的后边。

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下了汽车，从西头上了100个台阶，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当毛主席登上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广播员就对着麦克风，激动地大声说：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顿时，天安门广场上欢腾起来，人们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不少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事先曾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天安门城楼上检查和布置过工作。林伯渠、彭真和罗瑞卿等同志，也亲自检查督促过好几次。

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不大一会儿，林伯渠秘书长就宣布典礼开始。接着，毛主席走到麦克风跟前，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接着，在 30 万人的热烈掌声中，他亲自按动通往天安门广场中央国旗的电钮，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中国首都的上空冉冉升起。这时，在军乐声中，50 门礼炮齐鸣了 28 响。伴着隆隆礼炮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在尽情欢呼。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着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显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与信心。

阅兵式开始，由朱总司令担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同志担任总指挥。

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以后，又回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宣读完命令以后，受阅部队便开始从天安门前由东向西行进。

阅兵式历三小时才结束。结束时，天安门广场上忽一下子灯光明亮，花炮竞响。在这热烈的气氛中，欢呼的群众开始了游行。

当群众队伍经过天安门的时候，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都尽情地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听到这声声的欢呼，毛主席的心情无比激动。

他有力地挥动着右臂高声地喊道：“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人民群众和领袖的欢呼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着，经久不息。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尽管已经很累了，但他一直站在那里，一步也没有离开主席台。有些领导人关心他，说太累了，可以到休息室里去休息一下。经过多次动员，毛主席这才进了休息室。在休息室里，他坐下刚点燃一支香烟，就跟程潜先生交谈起来。他们说了几句话，还没有来得及喝口水，周恩来总理就走进来对毛主席说：“你预料得很对，你必须在天安门上连续站几个小时。你刚刚离开了主席台，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就停下来不前进了。”

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吧，疲劳也得站啊。”

说完，他将香烟熄灭，向程潜先生抱歉地笑了笑，又回到了主席台上。游行的群众队伍看见毛主席，一边欢呼着，一边又继续前进了。

这时，服务员尹莘笙同志从屋里拿过一个凳子来，对毛主席说：

“主席，你太累了，请你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毛主席说：“这太好了，谢谢你。”

毛主席把凳子往前移动一下，坐在上边，又向群众挥手致意。

呆了一会儿，尹莘笙同志又拿来了香烟，给了毛主席，还给毛主席点燃了一支。

毛主席边吸烟边对尹莘笙同志说：“你这个小同志真好，多谢你了。”

游行的队伍通过天安门之后，在广场里站着的群众，像潮水一样地涌到了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下边，都渴望着亲眼仔细看看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时，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下主席台的台阶，沿着城楼上的通道先走到城楼的东头，又从东头走到了西头，微笑着向天安门城楼下的人们招手。

已经到了晚上 9 点多钟了，从天安门城楼上往下一看，到处仍然是高举红灯和红旗的人群。

开国大典结束后，毛主席乘车回到了菊香书院里。

毛主席非常激动地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

这样，才能对得起人民呀！”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战争的创伤中接下了了一副烂摊子，他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建国初，毛泽东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尚有 3.2 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大陆上还有国民党的残余武装 200 万人，各种特务分子 60 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60 万以及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反动势力。他们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破坏活动。

在国际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受到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特别是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派遣海、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同时，美国又以第七舰队向中国领土台湾及沿海出动，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受内外敌人颠覆的危险。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顶住美帝国主义核战争的恐吓，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保卫我国安全的需要，经过反复权衡和多方征求意见，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950 年 10 月 8 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在毛泽东、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的指挥下，志愿军指战员于 10 月 25 日至次年 6 月 10 日，连续发动五次战役，使美军迭遭挫折，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帝国主义被迫于 7 月 10 日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以后，双方边谈边打，一直持续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在《板门店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中朝军队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国内，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到 1953 年，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全面的伟大胜利。在新解放区顺利地完成土改，使大约 3.1 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 7 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基本肃清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再加上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进行的没收官僚资本和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资产的冻结和清理，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是一个在 100 多年中饱受中外反动势力剥削、掠夺和压榨，又连续遭受几十年战争破坏，有 4.75 亿人口的大国、穷国。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在领导全国人民初步平抑了开国初的大涨价和国民党遗留下的通货膨胀问题之后，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及时指出：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

根本好转还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他号召全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经过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审慎研究与周密规划，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艰苦努力，在进行社会经济根本改组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地恢复，社会经济秩序得以稳定地调整。这为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重要的基础。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毛泽东还就“过渡时期”作了解释，他强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根据总路线的精神，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整风、反右、大跃进以至“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有沉痛的教训和严重的失误

为了改进党的领导，改善党群关系，正确地处理和解决存在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实践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一次重要尝试。但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全党整风，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毛泽东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场全国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一些偏差。这突出表现在指导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急于求成倾向。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的问题。同年11月，他在第二次访问苏联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要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周恩来、陈云等就1956年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进行的反冒进做错误的批评，认为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对一些不同意在经济计划中搞高指标的同志进行了批评，他要求在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独创精神。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加上党内同志普遍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乐观情绪和急于求成的心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此开始掀起“大跃进”运动的高潮。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并极大地鼓舞

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存在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一面。随着脱离实际的经济计划指标的不断提高，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等盛极一时。

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大跃进”运动中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和超越客观条件的一些做法，没有什么认识。他深深地为亿万人民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染。1958年这一年，从年初开始，毛泽东一直在全国巡回考察。从北京到杭州，再南宁、成都、上海、武汉、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北戴河、安徽、广州。他来回奔波，深入到工矿、农村，亲自搞调查访问，检查工作，研究问题，部署任务，不辞辛劳。

直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铺开，特别是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热火朝天天地搞起来后，毛泽东逐渐发现：办人民公社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为了能更集中精力地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从高饶事件后，就开始从体制上考虑接班人问题，提出搞一线、二线。1956年的“八大”正式形成了以中央书记处为一线，以政治局为二线的格局。同时，毛泽东开始提出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酝酿，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会议上，同意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由刘少奇接任。这是毛泽东为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所作的一项重要决策。不任国家主席后，毛泽东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试图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围绕着19个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许多重要思想，如要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要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人民的衣、食、住、用、行是关系到6.5亿人安定的大问题，必须安排好等。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对指导全党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搞好后来的经济调整与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毛泽东不容许从根本上批评“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他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是9个指头的问题，缺点是1个指头的问题。基于这种思想，当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他要求清理“左”倾错误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

在庐山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斗争，并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

庐山会议后开展起来的“反右倾”斗争使一大批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受到批评的“左”的口号、政策、措施，又被重新肯定下来。这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得以恶性发展。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突然单方面地中止经济援建合同，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

严峻的经济形势逐步透过“左”倾思想的封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忧心如焚。他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听说全国城镇居民的粮食和副食品削减定量供应时，他也马上宣布要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不超粮食限量标准。他曾七个多月没有吃一口肉。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很多天没吃粮，工作一天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

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多次做自我批评。1960年11月2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发给全党的文件的批语中，以中央的语气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在深刻自我反省的同时，毛泽东带领全党开始纠正错误，调整和恢复经济。

在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中，毛泽东也有沉痛的教训和严重的失误。这主要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他放弃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不适当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逐渐使之扩大化、绝对化，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误伤了一大批同志，给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 毛泽东突然提出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1972年1月10日中午，游泳后午休的毛泽东突然坐起身来，对工作人员大声叫道：“调车，我要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他的决定让工作人员震惊。

毛泽东从床上起来，穿着睡衣就要走，工作人员劝他换衣服，固执的毛泽东怎么也不肯换，他说当年与陈毅在井冈山时，就十分随便，没有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再说，现在时间紧迫，也来不及换衣服了。工作人员无奈，只好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大衣，然后驱车来到八宝山。

得知毛泽东要来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消息后，周恩来即通知有关方面：凡是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都能参加。于是宋庆龄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及一些老同志都参加了追悼会。

整个追悼会，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以致追悼会结束后，他仍然长久坐在会场，两眼茫然地盯着花圈和陈毅的遗像出神，还沉浸在对过去风雨同舟的战争岁月的回忆中。

最后，周恩来走过去，扶着他的胳膊，缓缓离开了会场。

在葬礼休息室里，毛泽东握着陈毅夫人张茜的手，深情地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他还说：“林彪打倒了那么多的人，其实，好多都不是敌我矛盾，如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句话，促成了后来邓小平的复出。1973年3月10日，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参加军委座谈会时讲话，提出要给罗瑞卿、杨成武、傅崇碧平反，并坦率地作自我批评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很快给这些同志平了反。

1974年，毛泽东又提出给贺龙平反，9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并为贺龙同志开了追悼会。

所有这些，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 毛泽东警告“四人帮”

随着“文化大革命”时间的拖长，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有所察觉。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告诫江青说：“江

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大帽子。”还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就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

1974年，毛泽东建议召开四届人大，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

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并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但江青等人认为这是篡夺更多权力的时机，于10月18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阴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他说：“反对周恩来，人民不会答应。”还告诫王洪文说：“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并再次强调，“总理还是总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正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四届人大得以胜利召开，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自1971年冬，毛泽东就患有老年性疾病，如“大叶性肺炎”等，病时轻时重，困扰着毛泽东。1972年，他突然发生休克，经抢救才得以度过危险。由于疾病的折磨，他已是四肢无力，步履艰难，听力也逐年下降，只是一颗雄心仍然不减当年。

1973年，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他站起来迎接客人以及坐下去，都拒绝工作人员的搀扶。谈话时，常有力地挥动手臂，使人根本不感觉到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

当客人问及他的身体状况时，毛泽东对这位总理说：“我现在疾病缠身，跟上帝有约会。”

威特兰十分敬仰地说：“您一直注意解决中国问题，现在，革命的未来已从中国青年一代的成长中得到了保证。”毛泽东回答说：“我和恩来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一种坦然与悲凉的心情跃然而出。

1974年，毛泽东病情进一步加重，双腿出现浮肿，行走已不方便。他很少考虑自己的身体，却以很多精力去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战友。

1975年的国庆节到了，外面欢庆的锣鼓声、音乐声幽幽入耳，毛泽东躺在床上，与工作人员孟锦谈起了贾谊的《舂鸟赋》，他说这篇赋很好，自己已读了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毛泽东还向孟锦介绍了这篇赋的大概内容。

《舂鸟赋》是贾谊被贬到长沙后，一天，一种舂鸟飞进他的屋子，贾谊见后黯然神伤，因为这种鸟属不祥之鸟，便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忧伤之下，写了这篇赋。文中列举许多强盛一世的人物，都有衰变结束的时候，以说明“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报”，“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的忧患，同时也表达了“万物变化命，固无休息”，“化为异物命，何足为患”的通达乐观心情。

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他说：“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能办到的事也耽误了。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0月21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博士。基辛格见他气色不好，便关心地

问起他的身体，毛泽东用手指指自己的头说：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另外，肺也有点毛病。”他顿了顿又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

“我也走不动了！”

毛泽东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顽强地跨进了 1976 年。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情绪很好，他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观看了电影《难忘的战斗》。但看着看着，他的情绪起了变化，电影中描述的共和国诞生前波澜壮阔的斗争，将他带到了几十年前那难忘的战争年代，当他看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人民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他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1976 年，中国旧历是龙年，按人们的愿望，龙年应该是龙腾虎跃、事事顺利的年份，可这一年却是天灾人祸接踵而来。

自然界发生了一些异常现象，给人们带来了灾难。3 月 8 日，东北吉林地区的东部，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中最大的三块陨石向西偏南方向飞落，最大的一块重量为 1770 公斤。

当工作人员读完这则新华社电讯后，毛泽东沉默不语，他走到窗前，遥望天空，禁不住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工作人员说这是迷信，毛泽东沉思道：“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是的，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不久，唐山发生大地震，再次在老人心中卷起天人感应神话的波澜，中国的大地为什么这么不平静？

如果说天灾的打击可以用人们的劳动与工作去弥补和恢复，那人的损失则永远是无法弥补的。

1 月 8 日，天低云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这对毛泽东的打击太大了，他与周恩来共同奋斗长达半个多世纪，其友情的深厚是无与伦比的。当他听到这个不祥消息时，默然无语，久久望着一个地方出神，半晌才长长叹了口气。在周恩来追悼会的那一天，身边的秘书张玉凤多么希望他也能像当年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突然决定驱车前往，但毛泽东迟迟没有讲话。张玉凤忍不住问道：“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拍拍腿，十分痛苦地说：“我也走不动了！”是啊，他的双腿已无法站立，再也不可能参加任何一个战友的追悼会了。

5 月，毛泽东的另一个亲密战友朱德逝世，这对毛泽东又是沉重的一击，他意识到自己离死神也不远了。他开始感觉到自己太累了，但他又不想休息，他还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深深思考、筹划，他还在接见外宾，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而忘我工作。

4 月下旬，毛泽东身体已极度虚弱，但还坚持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当马尔登来到中南海那古色古香的书房时，毛泽东躺在安乐椅上，在与马尔登交谈时，他的头几乎无力移动，说话很慢很慢，要费好大的劲，才喘息着吐出几个字来，但他靠顽强的意志，坚持到 10 分钟的会谈结束后才躺上床休息。

5 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华，毛泽东以极大的毅力会见了这位总理，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说话声音很小，要由他侄女王海容听清后先翻成普通话，再译成英语，这样进行交谈，毛泽东硬是坚持下来了。

6月，毛泽东已经不能下床了，尽管他还要奋斗，还要工作，但身体已不允许了，中共中央便作出决定，不再安排他会见外宾。毛泽东躺在病床上，仍然不能好好休息，他还要探索中国走向安定团结、走向富强的道路。

在病情日益加剧的时刻，毛泽东将政治局全体委员召集到病床边开会。他望着这些无言的同事们，十分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停了停，接着动情地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一生从来不考虑自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担心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8月下旬，毛泽东病情恶化，开始处于昏迷状态，有时在医生紧急抢救下，能恢复少时的清醒，但过不多久，又昏迷过去，如此反复多次。这样拖到了9月初，尽管集中很多著名医生，进行联合会诊，使用各种贵重药品及现代先进医疗器械，却不能使这位伟人生还。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与世长辞，享年83岁。巨星陨落，世界震惊，123个国家政府发来唁电，30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追悼大会。在中国，30多万人列队走过他的灵柩，瞻仰遗容。9月16日，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下午3时，全国停止工作3分钟，9亿人民，一齐肃立，默默向他致哀。工厂、火车、汽车等，全中国的汽笛齐鸣3分钟，形成葬礼的最高潮。

## 第四章 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管家”

——全世界都敬仰的人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周恩来的童年相当艰苦。祖父去世后，父亲无力持家，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和亲友接济过日子。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沈阳上小学，以后再没有回过家，甚至在他当了总理以后也没有重访故里。

早在少年时代，周恩来就关心国家的前途。一天，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一个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另一个同学说：“为明礼而读书。”一位店主的儿子老老实实地说：“为家父而读书。”他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笑声停后，周恩来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在短短的一句话里，体现了周恩来伟大的抱负。

### 在南开学校初露锋芒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离开沈阳，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当时我国正处于政治动荡时期。辛亥革命促进了人民的新觉醒，鼓励着青年人的心灵和思想，预示着一个新文化时代的即将到来。新文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开花结果了。与其他一些已觉悟了的天津与北京等城市的青年一样，周恩来很快卷入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在南开学校，他同过去一样地勤奋学习，但并未妨碍他获得新知识和开拓新思想。他还从孙中山先生赞助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后来，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周恩来读书的范围很广，从进步作家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到外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作品，无不涉猎。

周恩来在南开的第二年就成为一名学生领袖。他与三位同学发起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敬业》杂志。他虽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但极力推荐另一位创始人担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在那时就表现出谦虚大度和不图名利的优秀品质。这个团体成了一个活跃中心，同学们常来借阅进步书籍，讨论最关心的问题，唱歌或做其他事。周恩来担任《敬业》的主编，常常撰写文章，还常常在校刊《校风》上发表对时局的见解。

周恩来在南开初露才华。据与他同桌学习、同室住宿了两年的同学张鸿诰回忆，周恩来在1916年春举行的全校国文会考中名列第一，为他们班赢得了荣誉。他还是南开“演说会”的佼佼者。连续两年该校的“演说会”在全天津的校际演说竞赛中，均获优胜。

### 东渡日本

周恩来从南开毕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找工作，二是进大学，他选择了后者，决定到日本留学。1917年9月，周恩来在朋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他希望能找到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学会如何拯救祖国。当时，日本是中国优秀青年向往的国家之一。然而，后来他失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猛烈燃烧，军国主义的日本妄想趁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之机，加紧侵略软弱无能的中国。

周恩来在日本，开始学习日文，不久便掌握了日文语法，大致能阅读日本报纸。同时，他学习刻苦，准备考大学。然而，两个月后，他的注意力被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俄国十月革命——吸引住了。他努力探索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阅读他能找到的有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认真研究这一事件，了解它依据的理论基础。这是他第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此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他的一生。

### 被捕入狱

1919年初，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决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权利”转让日本。消息传来，留日中国学生十分激愤，于是开展反日运动。

在这些爱国运动中，周恩来发挥了积极作用。因分散了精力，几乎没时间准备大学考试，结果没被录取。这时，北京以段祺瑞为首的军阀政府不顺民意，不理睬民众要它停止向日出卖主权的的要求。周恩来感到祖国更需要他，便于1919年4月动身回国。

周恩来回到祖国，发现民情振奋，到处是要求变革的呼声。几星期后，愤怒迸发了。

5月4日，爱国学生反对军阀政府的运动震撼了北京，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首都的大、中学生集中在天安门前示威，反对日本的侵略，要求惩办勾结日本的卖国贼。示威群众还焚烧了亲日派曹汝霖的住宅。天津学生也群起响应，在全市举行抗议游行，还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所有学生的爱国活动，学生联合会还决定出版一份报纸，宣传新思想、新潮流，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制造舆论。

周恩来从日本回国，便成为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

由周恩来主编的这份报纸每周出两期，极受欢迎。不久又改为日报，发行量达2万多份。妇女读者也很多，因它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破除束缚妇女们的封建观念。《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还吸引了教育界以外的读者，在华北各地和上海、南京都有订户。它呼吁所有的爱国者铲除封建官僚统治。周恩来作为主编，撰写了大部分笔锋辛辣犀利的社论，他还以“飞飞”的笔名发表文章。

同年9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部分领导人又组成了觉悟社。已进南开大学学习的周恩来和回民学生领袖马骏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杰出代表；女界爱国同志会方面推选的知名人士有郭隆真、邓颖超和刘清扬等。邓颖超当时15岁，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

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用笔名写文章。共编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周恩来抓到五号，邓颖超抓到一号。为了听出来像中国人名字，他们都根据号码谐音取了笔名，周恩来称“伍豪”，邓颖超叫“逸豪”。

1920年1月，天津警方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查封了学生联合会等爱国团体。觉悟社决定发起游行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等领导示威群众到直隶省署请愿，20几名学生代表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关押了六个月。

在这段时期，邓颖超等人向警方头目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要求。一天，他们集合了24个觉悟社会员及支持者，要求警方允许他们替换狱中正在绝食的24名难友。他们说，警方关押的学生是他们的代表，应让他们去替换代表坐牢。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警方将拘留的代表转移到河北省法院，采取法律方式解决。在法庭上，站在被告席上的周恩来慷慨陈词控诉腐败的政府。

7月17日，24名被告全部获释。

8月16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等四个进步青年组织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园集会，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应邀出席会议。周恩来作为主讲人，在会上总结了天津爱国运动的成绩与教训。这是他根据中法之间勤工俭学计划赴欧留学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 留法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

1920年12月周恩来到达法国，当时他才22岁，但已是经过“五四”运动革命洗礼的趋于成熟的青年了。他到了巴黎，引起了那些先期到达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们的极大重视。因为他在这之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新苏维埃国家方面已有名气，并且在国内也赢得了英勇不屈的青年领袖的声誉。

周恩来到法国有两个目的：一是加紧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寻求医治

中国痼疾的良方。他为第一个目标所吸引，为第二个目标所推动。他越来越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这时，他成了坚定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如饥似渴地读书。

刚到巴黎，他住在郊区，靠勤工俭学得来的微薄津贴生活。他自己做饭，穿着尽管外表整洁，却有一点装体面的味道，特别是那条裤子，因穿得太久的缘故，裤腿似乎越缩越短了。他还从中国带来了一件类似鞋楦的小玩艺，用来补袜子。他养成了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习惯，直到 28 年后他当上了总理也没抛弃。

第二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那时，中国和法国之间的通信十分缓慢，这个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和在欧洲的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同年三月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在 1921 年 7 月建党前，国内外有 8 个共产主义小组在活动，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党成立后，原来属于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都被算为中共正式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1985 年 5 月 23 日发出的通知，所有这些建党前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入党时间均定为 1921。

中国共产党的巴黎组织称作“旅欧总支部”，由赵世炎担任第一届总支部书记，周恩来担任第二届书记。旅欧总支部领导的范围还包括德国和比利时。上任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创办一个刊物。

不久《少年》月刊改名为《赤光》，便成为中共在欧洲的喉舌。这份刊物在中国旅欧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吸引了国内的读者。第二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文章，作者署名“伍豪”，便是周恩来的老笔名。在巴黎，周恩来和勤工俭学者当中年龄最小的邓小平很亲近，把他当作小弟弟看。他俩常一起刻蜡纸。邓小平当时在刻蜡纸搞油印方面很拿手，还得了个“油印博士”的美名。

作为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常奔波在巴黎和柏林之间，而且在德国逗留的时间较长。有一次他去柏林，认识了比他年长 12 岁的朱德。朱德在国内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没被接受。周恩来认为他此时已够条件，并愿意介绍他入党。

### 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4 年，为了推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多干部担任务级职务。于是，便从欧洲召回许多党员。旅欧总支部书记周恩来也应召回国，于七月下旬动身回国。此时，26 岁的周恩来已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相当成熟，准备迎接他所面临的各项任务。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发动北伐战争。战争势如破竹，席卷整个长江流域。革命军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当时上海还在北洋军阀孙传芳手里。共产党便派周恩来秘密前往上海，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从内部夺取这个城市。1926 年 10 月和 1927 年 2 月举行的头两次起义因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而失败。

当时 29 岁的周恩来，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军委书记。到达上海后，他立即着手执行新任务。他与赵世炎、罗亦农领导了第三次起义。那时是 3 月中旬，北伐军进逼上海，胆战心惊的军阀孙传芳只留心通向上海的交通要道，完全没有觉察市内发生的事情。周恩来等决定 3 月 21 日中午举行总罢工，然后采取武装行动占领市政府。

根据周恩来与他的战友制订的行动计划，将上海分为 7 个区，同时发

动起义。他亲自领导由 5000 名坚定的产业工人为先锋的武装进攻。很快，他们的起义队伍发展到几万人。

虽然力量悬殊，刚发动进攻时，他们手中还不到 200 枝步枪，但是，他们的奇袭使敌人大大为震惊。因为起义者缺少武器弹药，便想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办法——在空汽油箱内放鞭炮，模仿机关枪的声音，以壮声威。经过 30 个小时英勇顽强的战斗，起义者包围了全市各警察局及其他据点，彻底击败了敌人。次日下午 6 点，当局只得投降。周恩来与他的队伍占领了上海。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充分说明，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

占领上海的工人接管了军阀政府，但后来又被自己的同盟军出卖。蒋介石的军队开进市内，对他们发动进攻。

从 4 月 12 日起，上海变成屠场，周恩来与他的战友们转入地下。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在马路上横遭屠杀，赵世炎被国民党逮捕，于 7 月 19 日被害，罗亦农也于 1928 年 4 月 21 日被害。周恩来在地下党工人的掩护下，躲过了大搜捕。

### 南昌起义

周恩来机智地逃出上海，到了武汉。在武汉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又赶到南昌，开始下一个重大行动。周恩来受党的委派，在 7 月底到达南昌，领导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为挽救革命而首次独立发动的武装斗争。

4 月以后，国民党到处搜捕他。周恩来化装离开了武汉，经九江取道去南昌。

周恩来当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到达南昌后立即开展工作。7 月 27 日他在江西大旅社起义的指挥部召集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前委开会，讨论了当时的局势，决定于 7 月 30 日深夜发动起义。

驻扎在南昌附近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公开表示对蒋介石不满，同情革命，准备投身共产主义事业。那时贺龙还不是党员，没有参加在江西大旅社召开的秘密会议。

次日周恩来亲自拜访贺龙，把他当作知心朋友，贺龙欣然同意参加起义，并把军队交与周恩来指挥。并对周恩来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

当时，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加上朱德指挥的第三军的一部分，共 3 万多人。实力可观，而国民党军队只有 1 万多人。

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革命军在预定时间发起进攻。公安局长朱德作出了贡献。他在起义前几小时，把国民党高级军官邀去吃饭，饮酒作乐，拴住了他们。战斗进行了五个小时，敌人放下了武器。1927 年 8 月 1 日上午 9 时，起义成功后，成立了由 25 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等。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阶段。

8 月 1 日成为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 8 月 1 日为建军节。

### 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委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

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还有苏兆征、向忠发、项英、蔡和森，被选为候补常委的有李立三、徐锡根、杨殷。六届大会后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及中央常委会主席。因苏兆征 1929 年 2 月去世，蔡和森 1928 年 11 月又不再担任常委职务，由李立三补上。因此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李立三，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张国焘。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担不起领导重担，于是才华出众的周恩来便成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

80 年代初，胡乔木在审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周恩来》条目稿时，对六大后加了一句话：“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他说，有的老同志当年在上海工作了解这情况，说到过。李维汉也说过，当时“政治局的决策者实际上是恩来和立三。”

### 由领导毛泽东到支持毛泽东的领导

从 1927 到 1935 年，先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在地方建业；后来毛、周同在中央苏区工作，仍是周恩来处在领导地位。周恩来很尊重毛泽东，并支持毛泽东从事军事领导工作。1935 年后，毛泽东实际上处于领导地位，周恩来便协助、配合毛泽东，在军事上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12 月又攻占湖南省西南边界的通道县城。这时，蒋介石已摸准红军准备北上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北上路上部署了五六倍于红军的 10 几万兵力，布下口袋阵，等红军钻进去然后聚歼，而博古、李德仍按原来打算不变。在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开的一个紧急会议上，李德仍主张“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则主张向西进军，进入敌人兵力较薄弱的贵州内地。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的支持并通过了。会后，中央军委发出红军进入贵州的命令。博古、李德看到命令后，仍坚持原来意见，继续令部队经黎平、锦屏地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2 月 15 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 日，在黎平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出席了会议。经激烈的争论，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对毛泽东主张的支持是强有力的。周恩来后来说：在黎平争论非常激烈，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此后不久，就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1935 年 1 月中旬，召开了遵义会议。会上，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会议还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1 月 18 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中央常委进行了

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5日后，红军一渡赤水抵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村时，中央常委会讨论了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在军事上，大的行动就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3月10日，会议研究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认为红军要到12日才能赶到新场，而滇军到时也将赶到新场与黔军会合，同时川军也可侧击红军，因此反对此行动，但因大多数人赞成，仍通过了。

晚上，毛泽东再三考虑不妥，手提马灯到了周恩来那里，建议重新考虑。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又召开负责人会议，说服与会者，取消了此次行动。此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指挥需集中，建议成立“三人团”（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南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毛泽东在组织上成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大约在1935年8月中旬。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在此次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的是周恩来。他认真分析了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红军如陷在这个地区没有前途；向南是不可能的，敌人已经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在那里集结了130个团的兵力；向西是大草原，条件更艰难；非到陕甘去建立根据地不可。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发言表示同意，说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集中力量搞好川陕甘地区，可以使苏区建立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朱德、聂荣臻、刘少奇、王稼祥、张闻天等同意周恩来所拟定北进方针。会议全体通过了周恩来报告的战略方针。此次会议情况说明当时军事主要负责人仍是周恩来。

8月上旬，在开了4日至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周恩来因积劳成疾，得了肝脓疡病。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没参加。会上，毛泽东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苏区的方针，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针。

后来，张国焘违背两河口会议决定，反对红军北上，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

叶剑英见电后告知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等赶到红三军驻地和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临时开会作出紧急决定，带领红一、三军迅速脱离险区，到达俄界。在俄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打电报继续催促张国焘北上外，还决定把已北上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

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军到达吴起镇，随即在陕北苏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事先，张闻天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在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提出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军事，自己当副手。周恩来则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最后，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

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以后，中央军委领导一直是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直到取得中国革命胜利。

张学良说：“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

此时，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安。开始，他认为红军人数不多，打败红军没有问题，但是，他同红军打了几次，都吃败仗，东北军不到三个月就被红军歼灭三个师。他的部队被红军消灭一个师，就被蒋介石取消一个番号，他很担心这样下去，东北军将会丧失殆尽。这时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担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他要中共陕甘省委做东北军106师等军队的工作，12月底，红军与驻在甘泉县的东北军达成抗日协定，互不打仗。还组织几次战斗中俘获的东北军军官参加了学习班。

1936年元旦，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阅兵式，让学习班的人也参加。周恩来在阅兵式前讲话，号召东北军与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学习班里的东北军军官高福源在苏区亲眼见到红军的所作所为；听了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亲切话语，受到很大启发。他决定回去把所见所闻告诉东北军，并亲自向张学良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正在想抗日而不得的苦闷中。

张学良在听了高福源的报告后很高兴，要高福源带一封信再去瓦窑堡，约共产党负责人在洛川相见。高福源到瓦窑堡见到周恩来，转送了张学良的信。周恩来热情赞扬他为抗日救国的事业作出贡献。然后，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洛川与张学良见面。

张学良表示“希望跟周恩来先生亲自谈一谈。”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天主教堂进行会谈。

这次会谈通宵达旦，参加的人有张学良、王以哲和周恩来、刘鼎、李克农。李克农、王以哲等在外间，周恩来、张学良在里间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周恩来在4月22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9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领导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在会谈后也对刘鼎说：“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像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地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他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还说，经过这次会谈“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50几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采访时，还回忆起这次会谈。报道说：他说“周恩来的反应极快，谈吐及见识不凡，使人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近信赖感。会谈中，我们达成了协议，取得‘中国应

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共同认识。”

1993年1月14日，张学良还同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佐藤光明谈到周恩来，说：“我们有共同的性格。这就是反应迅速，我们是坦诚相见的关系。”“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大胆的人，使共产党强大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会谈后，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的意见，改“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 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一再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蒋介石一直不听，终于发展到张、杨“兵谏”——西安事变。12月12日，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5日早晨，周恩来带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董小鹏等18人，骑马赶到延安。

17日下午周恩来一行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途中，随机来迎接的刘鼎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

周恩来来到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时，已是下午六点多。他住在东楼的三楼，当晚，他就与张学良会谈。据张学良身边工作人员应德田回忆，张学良事后对他讲了会谈的内容：

张学良讲了劝蒋没有效果，才发生西安事变，逼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看来，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他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们提出的八大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放他，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分析、说：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符合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争取到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会使中国今后走上更好前途，应该争取和平解决，走上团结抗日前途，反对新的内战。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极表同情，决定对张、杨两将军实际的积极的援助，使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能够实现。

应德田认为：“可以说，虽然张学良将军当初就打算只要蒋介石同意八大主张就放他回南京，但真正最后的决定，还是周副主席来了以后的事。”

当晚，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打电报，提出了“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18日，周恩来又与杨虎城会见，杨虎城周意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主张。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去电报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向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中共中央接周恩来的两电后，在18日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发电报说：“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提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等主张。还说：“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主张

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周恩来说：“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杨虎城在12月29日致各县县长公函中也说，蒋“曾向虎城表示”，“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并答应了六条。

放蒋，大家一致了。

然而，周恩来没想到张学良会送蒋介石回南京。25日，张学良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悄悄离开了玄凤桥高桂滋公馆，驰向西郊机场。卫士报告孙铭九，孙铭九立即去问周恩来知道不知道？周恩来惊愕地问：“我不知道，几时走的？”孙铭九说十几分钟前。周恩来马上与孙铭九乘车追赶，赶到机场时，飞机已上天。周恩来不禁叹息而回。

1937年2月，国共谈判正式开始了。周恩来多次到西安、杭州、南京、上海等地，一直谈到8月，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接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不仅注意与国民党蒋介石团结抗日，还注意同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特别是地方实力派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 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取得了全国解放的胜利

1946年底，周恩来回到延安，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47年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策划和指挥了历时数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

1950年毛泽东曾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3月18日到1948年3月23日，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余里，先后经过12个县，在37个村庄生活过。

开头几个月，特别艰苦和危险，有时距离敌军非常近，有时住和吃都很困难，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合住一个窑洞，共睡一个炕，批阅文件时坐在院子里小凳上，用锅盖放在膝上作桌子。

在转战途中，周恩来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人民经过敌军的抢劫、烧杀，生活很苦，大家要爱惜他们的一草一木。1947年，周恩来在陕北作了一个报告，讲了蒋必败，我必胜。理由是：“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20年来首次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战略进攻。此作战方针，最初由周恩来提出来。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和平已没有希望。6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与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发动全面内战，但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有幻想，周恩来彻底揭露了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

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蒋介石要很快召开“国大”，周恩

来则要争取第三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起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1947年夏，蒋介石要打内战不要和平的真面目被全国人民认清，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受到残酷镇压，民主人士遭受迫害，而在战场上，经过一年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歼灭了敌军112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从430万人降至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降至150万人；人民解放军已从战争开始时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超过100万。国民党军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所谓“重点进攻”是把主力陷于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它的战略纵深的中原和江南广大地域十分空虚。

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中央前委指挥下，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此时，蒋介石手忙脚乱，派15个旅追赶，在前面平汉路许昌以南派五个旅堵截，皖西有三个旅防堵。国民党在湖北从夔门以下没有正规军，安徽除第46师外，只有48师的1个旅与74师的3个旅，在蚌埠、合肥、长江防线只有3个旅。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湖北全境空虚。你们如能乘胜攻占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各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

刘邓大军南下直达大别山区。同时，中共中央又派陈赓、谢富治率军南渡黄河；派陈毅、粟裕率军进入鲁西南。三路大军以鼎足之势在中原大地、江淮河汉之间展开了。

这时在陕北战场，也经过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内线反攻。

周恩来说：“去年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战略也是进攻。”

1947年7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的战绩，估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将超过敌人。9月，他在陕北葭县神泉堡作报告，提出第二年战争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在蒋管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

1948年6、7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歼敌9万多。7月1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1948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如果战争的第三、四年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方的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胜利可能来得更快，我们应当有此准备”。

同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胜利。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这一胜利“证明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他认为，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开端，决战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很多电报，对于兵力

部署、作战指挥、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有过详细的指示。1948年10月2日，周恩来就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锦州后，林彪对集中兵力攻锦州的方针动摇，并要华北的兵团支援东北这事，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电。电文中指出：“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的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打下该城。”15日，锦州解放，歼敌10多万。17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部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北解放已成定局。2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要他们加紧修通中长路陶赖昭到四平段，以便解放沈阳后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推进。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

蒋介石与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9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利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12月中旬，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与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的精锐主力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胜利结束。

在指挥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参与各战略区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均用电报作了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有22份。邓颖超曾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1948年，周恩来为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番号的规定》。

1949年6月，他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式样。

1946年12月16日，周恩来被任命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都参加，展开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后，1947年1月，调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系统，以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

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蒋管区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

由于国民党的全面内战，因此军费支出猛增，物价飞涨。1946年6至10月，上海的工厂倒闭1600多家，工业产量只达到战前的四分之一。国民党接收的大批敌伪厂矿，大半没开工。外贸出现赤字，经济、财政趋向崩溃。民不聊生。1947年，学生界首先起来反抗。学生运动不断高潮。5月5日，

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

5月20日，蒋管区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浪潮波及到20多省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市民运动、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等汇成一体，持续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5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各地在学生运动中坚持党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描述过这时候的中国：“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经济、政治和士气上的。1948—1949年的混乱、骚动和危险，使城市居民痛恨国民党政府，因而也仇恨美国对它的援助。”

周恩来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既区别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合法主义，又避免了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冒险主义错误。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说：“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进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了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

国民党政府天津图书馆馆长时子周的一段话，反映了当时很多上层知识分子的心情。

人民解放军快来了，朋友们劝时子周赶快离开天津，时子周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国民党里面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互相倾轧，已经没有几个好人了，好人也不给他干了。共产党里头倒有不少好人呢！可以肝胆相照的人物，周恩来就是一个。”

周恩来一面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一面开始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和政权。

从1948年秋开始，几百个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香港、海外到解放区。为使他们平安到达，周恩来作了细致的安排。

11月初，他受已到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委托，开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1949年2月27日，他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批示把它们印成《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供大家协商讨论。

1949年4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北平与张治中率领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谈了8条24款—《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17日，周恩来说：“这8条24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20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这些条款。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大军渡过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任大会临时主席，致了开幕词。次日，他在会上作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说明：我们的共同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常委会副主任，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8月26、2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次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27日、29日，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方案。30日，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副主席。

下午6时，全体代表坐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此典礼上，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宣读了碑文。周恩来手书的碑文，镌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一位在场的外国人描写道：“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昔日皇宫主门的城楼上，悬挂着几个巨大的红色宫灯。在这座城楼上聚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员，他们是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升上了天空，乐队奏起了国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礼炮齐鸣。”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曾写道：“北京故宫的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这支中国人民的军队，从头到脚装备着从国民党分子那里缴获的美国武器……他们连续不断地通过广场，历经两个半小时。”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府首脑，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精力转到经济建设上

**建国之初，北京曾经盛传过一件事：**

一天，周恩来总理坐车到西苑飞机场（那时还没有首都机场）去送外宾，回来时，他看到路边上有一座新盖的大楼。他立刻对秘书说：这座楼是谁家盖的？建设计划中并没有呀！秘书回去一查问，果然这是计划外的建筑，是建筑公司利用几项建设后的剩余材料，自行动工兴建的。

这件事说明，周恩来对于建设事项的熟悉，真可谓全局在胸，纤毫不漏。

战争年代，周恩来管军事，也是这样。在大决战中，一次，作战参谋送来一份敌军兵力部署的详图，他一看，立刻指出，缺少了一支部队，漏写了。现在，他把自己缜密的心思、不倦的精力，用到经济建设上了。

周恩来的这个转变，是在 1949 年。

在新中国建立前，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着全国范围的大进军，他的心目中，是把战争放在第一位的。直到 1949 年 7 月，他还说：“现在人们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胜利；我们已经开始建设，但是还没有结束战争。”

“我们的一切工作，首先要为着把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战争仍旧在进行，但是周恩来的思想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

12 月，他说：“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

周恩来总理，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当时，周恩来五十多岁，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敢说敢为，为人民共和国各方面的工作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9 年 12 月，他提出了“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不料想，1950 年夏，发生了朝鲜战争，后来我国进行了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需要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同时，周恩来还要照顾到国内的事情。

在国内，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仍在进行，必须统筹安排。他的心是多么挂念着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呀！

当然，首先要保证战争的胜利，否则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之中。在战争情况稳住以后，他就在考虑怎样继续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了。

一方面是迫切的心情，另一方面又要看客观的可能。这就反映为方针的几次变化。

1950 年，国家预算赤字是百分之十二。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一个大胜利。当时，军费占全部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二，抗美援朝直接支出占军费的百分之六十，占全部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一。

1950 年 12 月，周恩来手书 1951 年的概算总方针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开支急迫需要，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

到 1951 年 4 月，周恩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这时他说：“抗美援朝仍应成为 1951 年各项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我们要“既保证国防急需，又照顾到财政状况及市场的继续稳定”，这时他加了一条：“同时也着手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

到今年 11 月，周恩来已改变了方针，是“既要保证朝鲜战争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 1952 年的要求。

后来，毛泽东概括这十二个字成为六个字：边打，边稳，边建。

1952 年度，军事费用（包括在朝鲜的战费）降到了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这年，国家经济建设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防支开。

1952 年，国内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从 1953 年开始，我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五”计划、“二五”建议、“三五”草案、“四五”纲要草案以至不少的重要年度建设计划，都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或参与指导下草拟的。1952 年初，按照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1954 年 4 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调整为由陈云任组长的八人小组编制“一五”计划。10 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聚会广州，用了一个月时间，审查通过修改以后的“一五”计划草案，然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然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颁布实施。总的说来，“一五”计划草案曾经进行过五次重大的修改和充实。周恩来经常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对计划包括细节——进行研究，直到最后定稿。

“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是很成功的。这个计划的完成，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2 年 8 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草案”提出了“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1953 年初，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上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3 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54 年 9 月 23 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讲：“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旧中国为什么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因为落后，首先是经济落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中国人民直不起身来，处于被压迫、被榨取的境地。革命胜利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是改变了生产关系，这就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中华民族才能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说自己要说的话，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

周恩来的这个思想在脑海中是很牢固的，贯穿他的一生。十年后，1963 年 9 月 5 日，他在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时，还对他们说：取得完全的独立，建设和改造一个国家，是个更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不只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要上百年。关键不仅是取得政治独立，而且要取得经济独立，才算是真正的民族独立。

实行每个五年建设计划，是我国经济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曾经多年

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吴群敢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草案，“在此期间，所有苏联援助建设的项目，包括选址、规模、配套等等，都经周恩来逐个审定并电告苏方首脑洽商。‘一五’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初步改善了我国工业的地区布局”。1952年8月，周总理审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和陈云、李富春、李强、阎宝航等同志以及计委、经委的部分同志到苏联去谈判，在双方协定苏联对我国的援助项目时，开始是九十项，以后增加五十一项，合共一四一项，到1956年时经过增补，成为一五六项，这一五六项援助项目，从项目定下来，到供货、安装、生产，以及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进行施工设计、试验研究等，周总理都是亲自过问的。

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就设想通过革命来建立新的政府，从而发展生产，开发实业，达到经济的发展。他说：“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那时候，才能使“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

现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在中国开始了，周恩来已经是政府总理，面对着旧中国半殖民地的极不合理的经济布局，他费了很多心血——对能源、电力、有色金属、重要煤矿等这类属于经济命脉性质的工业，放在什么地方；内陆地域的大片工业空白中，怎么布点等等，大到国家宏观安排，小到企业内部的一些重要措施，周恩来都考虑到。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抓紧经济建设工作，而且抓得很多，很广，很细，对许多部门的情况、问题、数字了如指掌，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重要企业，有的还不止去一次，50年代、60年代，一直这样。

#### “徐师傅，我拜你为师”

周恩来深入工厂、矿山基层，不光是视察、了解情况，而且也是学习。50年代他不止一次地到过上海钢厂。1957年7月他到上钢一厂二转炉车间时，登上了五号行车，恳切地对行车驾驶员徐金庚说：“徐师傅，我拜你为师。”他在徐师傅指点下，亲自驾驶了行车。

1958年7月17日上午和晚上，周恩来两次到上钢一厂，在炉前，他和工人一起挥舞铁锹，进料加矿石，尽管满头大汗，依然干劲十足。在劳动间隙，他和工人一起就地休息，聊天，了解情况。厂领导把冷饮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恩来一边擦汗水，一边看着手里那瓶汽水，问：“他们呢？”

一旁的工人扬起手中的汽水瓶：“我们都有。”

周恩来看见工人手中的汽水是白色的，自己手中的汽水是淡黄色的，就问厂领导：“怎么颜色不一样？”

“这是为总理预备的。”

周恩来慈祥而又严肃地说：“都是劳动者嘛，工人能喝，我为什么不能喝？不能特殊。”说着，他把自己手里的淡黄色汽水换了一瓶白色的盐汽水，和工人一起喝着谈起来。

周恩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非常内行，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广博的学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注意倾听大家的意见，直至亲自实践和体会。

周恩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概括出很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一定要落实到经济建设这个业务上；他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妥善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他认为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等等。

周恩来说，经济建设要有四个观念：整体观念，重点观念，先后观念，全面观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建设不看到整体不行，看到了整体，心中有了全局，才能够建设有重点，安排有先后，全面地考虑问题。他在 1956 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突出地强调了要“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既分工又合作的事情，必须安排得恰当，才能把全部机器都运转起来，才不至于互相妨碍或抵消，这部机器不是简单的，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领导者对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得好。

1958 年到 1961 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等因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周恩来在 1962 年说：“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是“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为了改变“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不协调现象，就必须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基辛格说：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也是不理解的，正如他 1966 年 7 月 29 日在北京的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他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一切为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党。

1966 年冬，他对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他认为当时的情况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从这些话可以想见周恩来当时的沉重心情和坚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的干部，还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巨又坚韧的战斗，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说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所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陈云说：“没有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彭真说：“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

境困难。”

周恩来的苦衷，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来。“文革”中，某省有一个干部，共产党员，贴大字报批评周恩来“别人怎么说你也跟着怎么说”。当地对这个人进行了批判，并且要进一步“审查”他。省委办公厅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就叫身边工作人员给省委打电话：“不要进行批判，不要施以压力。”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作秘书工作的顾明说过一段话，十分透彻地讲了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和态度：

现在有人提出来说周总理当时为什么不劝阻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批评毛主席？我个人认为在那个时间如果周总理批评毛主席，反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导致党的分裂，所以周总理不会批评毛主席，而且在“文革”初期周总理也没有意识到会发展成后来的那个样子。同时我认为周总理有个信心，就是他相信毛主席会自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主席是逐步认识到了，如对王、关、戚，对陈伯达，“九一三”事件批判林彪，一直到批评“四人帮”。周总理做事就是要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如果那时批评毛主席，当时情况下的很多群众就要起来反对，所以我认为在“文革”中的不幸之大幸，就是党没有分裂，而且保证了基本的生产。

1971年美国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回国后对总统尼克松说，他同周恩来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几乎无法隐藏他的苦恼。”尼克松认为这是不奇怪的。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评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小时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年。”

有位经常采访周恩来会见外宾的记者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从没看见总理有倦容。

可在1970年前后，总理的面容显然消瘦下去，头发也白多了。会见客人的时间一长，服务员就送上去一块热毛巾，总理擦把脸，又精神奕奕地谈起来。”

**26年总理，其间经历了多少辛劳和风雨呀！**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规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到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然而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

于 1973 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 CC。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

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直到 1974 年 4、5 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 5 月 29 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 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之后，他才交待了工作，向秘书口授“6 月 1 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 年 6 月 1 日，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 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上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因而更加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

1974 年 9 月 30 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5 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十余次之多。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夺权时机已到。10 月 17 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意在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邓小平坚决顶了他们。江青集团经过密谋后，派王洪文紧急赶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在医院的周恩来得知“风庆轮事件”后，10 月 19 日，在找了邓小平等同志了解了事情经过后，把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找到医院，向他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

他还表示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10 月 20 日，毛泽东在听取了“风庆轮事件”的汇报后，愤愤地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

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两次大手术后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毅然再度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周恩来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并汇报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信尾表示，“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12月间，周恩来在医院中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异常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周恩来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着。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在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几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之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经过慎重考虑，叶剑英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因为目前正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五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两人还谈到了“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王洪文搞宗派，指出：“江青有野心”。就这样，周恩来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全国亿万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生前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后，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3月间，在作肠胃镜检查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月底又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的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很显然，死神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恩来专门谈到了生死问题，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的重大，

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岗位。5月7日，周恩来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等同志，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3月到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望人4次。下面，举一些例子：

4月3日，在刚刚动完手术，病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因对方的再三恳求，躺在病床上会见了突尼斯总理努伊拉。

4月19日，得知金日成来访后，坚持下床会见，因脚肿穿不了皮鞋，特地赶制了一双圆口布鞋会见了金日成。

5月3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会后，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商定，由邓小平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次会议使得江青集团的活动稍有收敛，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6月9日，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并亲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周恩来一连鞠躬7次，以表示自己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歉疚之情。贺龙同志的家属见他病容满面，十分消瘦，劝他保重自己的身体时，周恩来表示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在场的人听到这句话无不心如刀绞，悲咽失声。

8月26日，会见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在讲话中希望他们加强团结，巩固胜利。

9月7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而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并请客人转告齐奥塞斯库，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陪见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周恩来最后预言性地表示：具有50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难以计算的会见外宾中的最后一次。

在医院的这些日子里，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他安心治病。他必须时时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提防着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举一动。四届人大后，始终把周恩来视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最大障碍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甘心企图组阁的失败，他们先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声称“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攻击周恩来。继而又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大批“投降派”，宣称“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一生曾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周恩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和悲愤，不得不为捍卫作为一个革命者高于一切的政治生命而奋起抗争。1975年7月1日，他在同泰国总理克里·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

上划××。”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他们曾跟随周恩来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不论是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也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到个人的安危，今天突然吐露出来的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1975年9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4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十二”。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无法医治。

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就在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的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度发生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各部门。10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靠近手推车时，他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周恩来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但是在这种悲剧面前，周恩来又能表示些什么呢？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时，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三！”……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想到的仍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仍是工作和他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1975年12月间，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等人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底在长沙同他们两人谈话中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12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三十八度七，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他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过去。

12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20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20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1976年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起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月7日晚11时，当医生们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他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 第五章 刘少奇

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选定的第一位接班人。

### 中国工人的总代表

刘少奇原名刘绍选，字谓璜。1898年11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离毛泽东的出身地韶山冲不远。1919年至1920年间，先后在长沙高级中学、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预备班、上海外国语学社等学校学习。在长沙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8月，刘少奇与任弼时、肖劲光等在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的同学一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刘少奇回国，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不久被派到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书记是毛泽东）。9月，被派往安源，和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

在刘少奇到安源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李立三曾到安源“考察情形，开始活动”，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1922年5月1日，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主任。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到9月间，部员发展到700多人。

安源路矿当局深感组织起来的工人所带来的威胁，于是千方百计地阴谋封禁俱乐部。

他们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就采取高压手段。9月7日，路矿当局勾结军阀诬蔑俱乐部是“乱党机关”，稟请赣西镇守使萧安国“以武力封禁”。这一举动激怒了广大工人，加之矿局拖欠工人工资，物价飞涨，工人生活痛苦不堪，使群众的反抗情绪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时，再次亲临安源考察后返回长沙的毛泽东，深感安源工人的斗争影响着湖南以至全国的形势，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因此必须派一名“得力的人去安源”，协助李立三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究竟派谁去呢？经中共湘区委员会慎重研究，认为派刘少奇去“最合适”。

1922年春，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它的任务：“发动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密切关系。”

这时候，刘少奇年仅24岁，风华正茂。在苏俄学习期间，他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处在这个时代的人，应以无穷的 hope 去促进这段历史。经过反复思索，他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志向。他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有火一样的热情，表示回国后愿意从事工人运动。

1922年夏，刘少奇奉调去湖南。这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他先是在粤汉铁路做工人工作，后和李立三等发动长沙泥木工人的反抗运动，并建立了长沙土木工会。

刘少奇去安源的前夜，毛泽东约他到长沙清水塘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从安源工人的痛苦生活，谈到安源工人渴望解放的要求，从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启蒙思想教育，谈到组织工人革命团体，从国内外形势，谈到领导安源工人罢工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毛泽东希望刘少奇依靠安源的党组织和广大工人群众开展工作。这次长谈之后，刘少奇带着重托于9月11日到达安源。

刘少奇到安源后，下矿井，进工厂，与工人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觉悟，鼓励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与此同时，他协助李立三研究和部署了罢工的计划。

就在刘少奇抵达安源的当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函路矿当局，提出3项要求：

- (一) 路矿当局须呈请行政厅出告示保护俱乐部。
- (二) 路矿当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200元。
- (三) 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7日内发清。

同时提出：限路矿当局两日内完全答复，“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

9月12日，路矿当局做出答复，表示前两项要求可以解决，至于第三项，则借口公司亏损、财政困难予以拒绝。工人甚为不满。于是俱乐部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当局在限定的时间内再作出圆满答复。同时做好各种准备，如当局拒不答复和接受有关条件，就以罢工相对抗。

当晚，工人俱乐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罢工问题。李立三说：“干是一定要干的。”

不过斗争要讲策略。罢工能不能胜利，主要看大家团结得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接着，刘少奇发言说：“只要我们团结得紧，莫说要矿局发清欠饷，就是打天下也办得到。”刘少奇分析了安源的情况，认为已经具备了罢工的条件：第一、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给安源工人以很大的鼓舞，群众的情绪很高，斗争决心很大；第二、俱乐部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只要俱乐部一发动，绝大多数工人都会行动起来；第三、敌人是害怕罢工的，路矿当局的后台是帝国主义，它们是不敢得罪帝国主义的，一旦我们一罢工，煤挖不出，它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就交不了差。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负责与各方面联系、谈判。

正在这时，工人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声援电，鼓励安源工人“努力作最后的对峙，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又收到毛泽东的来信。信的大意是：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是工人群众要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根据这个指示，李立三、刘少奇在共同研究后，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这个口号既激励了工人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各方面的同情。

紧急会议结束后，俱乐部通过各种形式，紧张地进行罢工的最后准备。当时的安源，帮会很多，其中以洪帮势力最大，其头目都是矿上的工头，他们在镇上开有赌场、鸦片烟馆和妓院。洪帮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口号欺骗工人，在俱乐部成立以前，不少工人寻求保护而加入了洪帮。刘少奇认为：帮会有两面性，有野蛮、愚昧的落后一面，又有讲义气的积极一面，我们可以争取他们，利用他们积极的一面。为此，刘少奇和李立三积极地做洪帮头目的工作，争取他们不做破坏罢工的事情，收到了成效。

同时，刘少奇十分重视加强工人内部的组织工作。在俱乐部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上，刘少奇讲述了齐心团结、维持秩序的重要性，要求各处工人代表把工人组织起来。他问洋炉炼焦处工人代表袁品高：“你一个拉得拢十个人吗？工人们都能齐心吗？”袁品高回答说：“你放心，我担保。”各处工人代表表示，要听从俱乐部的指挥，担保自己所在部门的工友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在罢工期内，各工友的举动，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维持的方法应当是各归住房而不外出。

9月13日晚，路矿当局对于俱乐部再次提出的要求，仍不予答复。要求萍乡县颁发的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送达。

午夜12时，俱乐部断然发出罢工命令。火车汽笛鸣—鸣—鸣的长鸣声，响彻巍巍的安源山。由萍乡开往株洲的首次列车先行停开，工人们将车头及机车水柜等各种重要机件完全卸下，并通知机务处各工友，次日早晨不放进班号。

9月14日凌晨3时，矿局东平巷的供电忽然中断，井里的电灯全部熄灭，运炭电车不能开动。窿内工人如潮水般涌至窿外，高举着斧头、岩尖，高呼：“罢工！罢工！”“工人要活命！”“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声震天动地。

工人们出窿后，罢工监察队员即用树枝、煤桶、坑木等将窿口填塞。俱乐部早已通知当天4点钟接班的工人不要进班，并派人在各窿口把守。矿井各窿口都竖着一面大旗，上书“罢工”两个大字。

14日上午，安源路矿大罢工按既定部署全部实现。除关系矿区安全和生活的锅炉房和电机处照常工作外，洗煤台、制造厂、修理厂、炼焦处等都停止了工作。

工人俱乐部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宣言写道：

“我们要活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

宣言还提出 17 项要求条件，主要内容是：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当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当局交涉之权；今后路矿当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从前积欠工人的存饷，一律发给；罢工期间工钱照发；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工人每日工资在 4 角以下者，须增加 2 角等。

工人俱乐部将上述条件用公函递送路矿当局，并提出：“如欲调商，请立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罢工斗争一开始就进行得坚决而有秩序。工人们听从统一指挥，一律各归住房。监察队员手持俱乐部旗帜，佩戴红袖章，拿着铁棍等器具，在街市及工厂附近巡逻，维持秩序。各处墙壁贴满俱乐部布告，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语。

罢工后的安源，显得一片定静，但却酝酿着一场尖锐的斗争。

路矿当局施展种种阴谋诡计，企图破坏和镇压罢工。先是由工头出面，以亲朋好友关系，出高价诱惑、收买一些工人入窿工作。这一阴谋被监察队制止，未能得逞。之后，他们又悬赏 600 块大洋，密遣暗探刺杀李立三。工人们严加护卫，使敌人无法下手。于是，路矿当局一面请赣西镇守使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任命李鸿程为戒严司令，妄图实行武力镇压；一面又请商会出面调停，欲使罢工自动停止。

9 月 14 日下午，商会代表谢岚舫和地方绅士陈盛芳来到工人俱乐部，表示愿为调停人，促请双方协商解决罢工风潮。

刘少奇出面接待，提出以 17 条要求为基础进行协商。

当晚，谢、陈带来路矿当局的回话：“路矿当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刘少奇当即严正指出：“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当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9 月 15 日，路矿当局派全权代表到商会，邀请李立三去谈判。谈判中，当局仍坚持先开工后商条件为辞，工人方面严辞拒绝。谈判无结果。

第二天早晨，绅商学界来信劝工人让步先开工。俱乐部发表宣言，明确表示路矿当局“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

9 月 16 日下午，路矿两局派人来到工人俱乐部，请工人代表去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

来人一进门便大声喝问：“谁是工人代表？戒严司令部请他”。

刘少奇挺身而出，声音宏亮地回答道：“我就是工人代表。”说完，叫来人引路，往戒严司令部走去。

工人群众担心自己的代表受到迫害，对刘少奇说：“他们不安好心，你不能去。”

刘少奇解释说：“请大家放心，我会注意的。我们不去谈判，资本家反会说我们无理，我们就会上他们的当。我们正好利用这个谈判机会，同他们面对面的进行说理斗争。”

有位老工人说：“你去戒严司令部谈判，他们会害你，这是入虎穴啊！”

“不要紧。我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光荣。”刘少奇毫不犹豫地说了。

戒严司令部设在矿局公事房内，戒备森严。台阶两边，架着机关枪，楼梯口、走廊里，都有士兵站岗，真是如临大敌。刘少奇赤手空拳，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跨入戒严司令部，与戒严司令李鸿程开始了谈判。

李鸿程先是假装客气地询问罢工过程，并做了一番劝导，然后张口追

问：“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刘少奇毫不畏惧，反问道：“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

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把问题越搞越大？”

李鸿程以命令的口气说：“请工人先上工，路局每日先开火车两次。”

刘少奇断然回答说：“这不能答应。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的希望。”

李鸿程立刻现出本来面目，威逼说：“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你这个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毫不为之所动，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如不能达到万余工人的要求，虽把我斫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戒严司令吼叫起来说：“我对万余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

刘少奇愤然说道：“那就请你下令制裁去！”

稍后，副矿长舒楚生来到，与刘少奇说了些工人罢工无理的话，要求工人即时上工。

刘少奇请其磋商条件，舒楚生不肯。

这时候，外面喧声如雷。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包围了，提出请代表出来，有事请司令和矿长到俱乐部商量。

刘少奇出外向大家解释说：“工友们！现在正在谈判，请大家耐心等待。”然后进戒严司令部继续谈判。

最后，李鸿程以调和的口气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

刘少奇当即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说时怒不可遏。

刘少奇在谈判中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表现了他作为工人总代表的胆识与才干，也表现了他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工人们称赞刘少奇“浑身都是胆，真是我们工人的好领袖”。当年安源工人集体创作的歌谣《劳工记》中有这样几句词：

“少奇同志好胆量，我往矿局去一趟。

代表全体众工人，见机而作把事行。”

“明知山中出猛虎，岂肯贪生又怕死。

偏偏要向虎山行，贪生怕死枉为人。

少奇下了决心，特到安源办工运。

任他把我为甚难，不畏汤火与刀山。”

9月17日，发电厂抽水机和打风机房因燃料用完而有停机的危险。一旦停机，所有矿井都将报废。路矿当局迫于工人群众的威势，不得不软了下来，答应继续与工人代表“从事磋商条件”的谈判。

9月18日上午9时，路矿当局全权代表与工人俱乐部代表在达成的13项协议上签字。

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答应了发清拖欠的工资、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少量提高工资等要求。至此，历时5天的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当天，萍乡安源路矿工人发表《上工宣言》。宣言说：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知识呵！”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的权利去奋斗！”

9月18日下午，1万多工人涌到大操场，举行罢工胜利庆祝大会。李立三在宣布胜利成果后发表演说称：“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接着，刘少奇讲话。他说：“工友们，这次罢工，我们胜利了。这是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坚决的结果。但是，这次胜利，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要继续团结，共同战斗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全场掌声雷动。工人们执帽欢呼：“劳工万岁！”“罢工胜利万岁！”口号声和爆竹声汇成一片，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

会后，由李立三、刘少奇为前导，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刘少奇说：这一次大罢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胜利，不仅对当时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鼓舞，而且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初露才华

1922年10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组，李立三任俱乐部总主任，朱少连任路局主任，刘少奇任窿外主任，余江涛任窿内主任。1923年4月，李立三调离安源，刘少奇代理俱乐部总主任兼窿内主任。8月16日，俱乐部改选，刘少奇当选为总主任，全面负责安源工运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少奇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决策作用日渐突出。他井井有条地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工作，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

1923年9月，工人俱乐部举行罢工胜利一周年庆祝活动，刘少奇发表题为《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演讲，提出了安源工人今后的任务。他说：“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度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刘少奇认为，后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前一项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他指出：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努力建设与进行内部整顿，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团体的基础；（二）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

自大罢工胜利后，有更多的安源工人加入俱乐部，部员很快发展到1.2万多人。当时全国矿工加入工会组织的共有2.6万多人，其中安源工会会员就占了近一半。刘少奇认为，“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为此，他主持制订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规定：俱乐部的基本组织为十人团，即部员每10人（或10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1人；再由10个（或10个以下）十人团选举百代表1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1人。百代表、总代表由各处十代表选举之。由各处总代表组成最高代表会，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由各百代表组织的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总主任、路局主任、窿外主任和窿内主任，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对外为俱乐部全权代表。在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作为俱乐部的办事机构。“总

章”施行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按照“民主的集权制”原则，把工人群众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团结战斗，成为当时全国“组织最好的工会”之一。

自 1923 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差不多都被封闭，或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搞秘密活动。在阴霾密布的白色恐怖的大气候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却搞得有声有色，以雄伟的姿态巍然独存，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低潮时期“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在大罢工胜利后的安源，工人俱乐部打破包工制，为工人群众谋得了一大福利。过去，安源煤矿实行包工制，窿内煤工、炼焦工等由矿局包与工头，工资以银元数计，而工头发给工人工资时则以铜元数计。工头每月剥削所得，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超过工人工资好几倍。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废除了包工制，实行合作制，议定合作条规，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包工都由工人合作，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自 10 元起至 30 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规定不改，其余各项消耗归合作帐内开支，所有红利工头占 15%，管班占 5%，其余 80% 由工人平分。这样，实行了 20 多年的包工制破天荒地完全打破了。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创办了不少的文化福利事业。设立工人学校 7 所，对工人“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工友们得到必需知识，促进改革社会的精神”，经常参加学习的工人子弟学生有 700 多人，工人补习学生有 600 多人。还有工人读书处 5 处，工人图书馆 1 所。建筑大讲演厅 1 所，能坐听 2000 人，购买房产 3 栋，并有化装讲演，各种游艺活动。组织青年部，作为掌管青年工人教育的机构。还有经常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

并办有消费合作社 2 所，资本 2 万元。这样，安源的工人做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参加各种游艺活动。子弟读书不要钱，社会秩序有纠察团维持，不受军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青年部进行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合作社，不致受商人的中间剥削。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继续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如举行“二七”纪念、“五一”纪念、罢工胜利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集会或示威游行。每次集会及游行，群众精神异常振作，秩序异常整齐严肃，旗帜、口号、呼声等，莫不惊振一时。

取得罢工胜利的安源工人还大力支援各地的工人斗争。如从经济上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近 2000 元；援助株洲、长沙等地水灾难民 1000 多元。安源工人俱乐部并联络汉阳钢铁厂、汉阳轮驳工会、大冶铁厂工人俱乐部、下陆铁厂工人俱乐部，于 1922 年 12 月成立了汉冶萍总工会，后又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开中国劳动运动未有之创举”，为恢复和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大罢工胜利后，安源的党团组织也有了发展。到 1923 年底，共产党员由罢工前的 10 多人发展到 60 人左右。1925 年 5 月，安源有党支部 15 个，党员增加到 300 多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 1/3。1925 年，安源的团支部发展到 36 个，团员有 400 多人。

为了培训党员，1923 年冬，安源办起了党校，由刘少奇兼任校长。校址设在三十间房子（地名）。1924 年冬，党团校合办，设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招收工人党团员，高级班主要培训学生党团员。学员结业后，有的被送去广州黄埔军校或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多数被派往工厂、农村开展革命工作，对各地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安源工人的生活有了改善，地位大大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并且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的警察及监狱等。但是，在胜利的喜悦中，出现了新的问题。许多工人头脑发热，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还要盲目行动，以致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例如，要求再增加工资，超过了实际可能的程度；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 12 小时减至 4 小时，以致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不听管理人员、工头指挥，自由行动；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一些职员、工头则借机制造事端，对工作故意不负责任，任凭工人自由行动，把事情做坏，使产量下降，然后煽动说：“工人们要这样，现在有工人俱乐部领导，我们管不着工人了。”将生产减低的责任推给俱乐部。路矿当局则借此向工人施加压力。当时在二七罢工失败以后，资本家与军阀勾结向工人进攻，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独自为战，犹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实行退却与防御的方针，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使刘少奇“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的长远利益，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确定了安源工人运动“立取守势”的策略，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防止资本家的进攻；同时，对资本家的破坏，奋斗到底，毫不退缩。刘少奇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教育工人“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目的”。

刘少奇指出，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并不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而是“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他认为，这种经济斗争，从工人将来的全部的利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须从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做起，使工人从切身利益中看见利害，“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

刘少奇强调，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而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不要以为要求越高越好，更不能因为工人俱乐部是“青天衙门”，就不顾一切地“事事冒险直冲”，“盲目的奋斗”。刘少奇指出，除保障工人利益外，“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在工作上服从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都是俱乐部的主要任务”。当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遵守协议，保证矿区产量，消除资本家制造事端的借口。

1923 年夏，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邀集各处总代表与矿局矿师、总管段长等召开联席会议，共商整顿矿局生产的办法，刘少奇在会上依据调查得来的材料指出：煤矿出产减少的原因，第一为缺桶；第二为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太不负责；第三为一部分工人见工头职员完全不负责，不服指挥。他要求矿局采取补救办法，如添制新桶，赶修烂桶，严令各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切实负责。同时，要求俱乐部教育工人在工作上服从工头职员在其责任范围内的正当指挥。1924 年 6 月和 11 月，刘少奇又先后写了《救护汉冶萍公司》和《整顿萍矿意见书》，提出了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生产的建议，这是后话。联席会议后，安源煤矿的生产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产量逐步上升。

刘少奇以正确的策略武装工人，使刚刚兴起的安源工人运动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1922 年 9 月的大罢工胜利后，安源工人不但没有被资本家夺走其已争得的利益，而且还取得不少新的胜利。

大罢工胜利不久，1922年12月23日下午，刘少奇即与窿内主任余江涛去找矿长李寿铨（镜澄）交涉，谈工人要求加发半月工资的事情。因为大罢工时劳资双方达成的13项协议中有“每年12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一条，这时工人即向矿局要求发给年终夹薪。12月25日，矿长约见刘少奇等说：“矿局经济困难，难于照发”。

并要刘少奇劝导工人“勿再要求”。后几经交涉，路矿当局尚不能圆满答复。且11、12月的工资亦以经济困难为由拖着不发。工人俱乐部坚持文明交涉，提出月饷可待下月再发，先发年终夹薪，矿局亦不承认。于是，工人群众十分气愤，以致要以怠工相对抗。

至1923年1月中旬，矿局同意先发夹薪的一半，其余一半夹薪待后缓发；上年11、12月份工资移至下月初发。

### 索饷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3年6月，路矿当局私自给少数亲近的工人增加工资，引起多数工人的不满。工人俱乐部认为这样做不合理，于是提出“要增一起增”的要求。路矿当局以经济困难为理由，不同意普遍增资。从6月11日起，刘少奇多次代表工人俱乐部找矿长李寿铨磋商。7月11日，他与矿局代表签订了协议条件。具体内容是：

一、凡薪资每日在1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工资者，照原薪增加5%。

二、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1000元（原有200之津贴在内）。从1923年7月起付给。

三、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

四、矿局对于学徒，每年须考查其成绩一次。

五、俱乐部对于矿局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每日平均出产额达到2300吨以上之数目。

六、矿局所订工人通（遵）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皆应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该规则办理。

七、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

接洽，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

1924年7月以后，矿局又施出拖欠工资的老办法来困迫工人。到当年年终，矿局不仅拖欠工人11、12月份的工资不发，且要取消年终夹薪。1925年1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发《快邮代电》，申明要“向矿局索取夹饷，给清积欠工资，非达到目的不止”。

1925年1月15日，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举行第二次大罢工。

在罢工之前，路矿工人俱乐部先礼后兵，向矿局提出要求：（一）当欠饷未发清时，萍矿运往汉冶及轮驳的焦煤一概停运，若售卖以发工饷者，则照常运驶；（二）当欠饷未发清时，须多煤售卖以发工饷，饷未清时或以后工饷无着时，得将此办法延长，卖煤之经济，并须公开；（三）欠饷每月2分5之息，须1月15日算起。矿局对工人的要求不加理睬。1月15日，根据工人俱乐部的命令，安源工人举行罢工，拒绝运焦煤。

罢工两天后，资本家被工人包围，只得请求与工人代表谈判。于是刘少奇代表工人俱乐部与矿局代表进行了谈判，使矿局答应在两星期内发清欠饷，照发年终夹薪。安源工人的斗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 工人阶级最奋发的战士

1925年春，刘少奇作为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前往广州，参加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

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议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等30多个决议案。这些议案多是刘少奇起草的。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选举林伟民为全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

会后不久，刘少奇受全总的委派，到上海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镇压上海工人罢工，枪杀了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这是五卅运动的导火线。1939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工人学校做以《中国职工管理简史》为题的讲演时，回顾了这件事发生后的情形。他说：

“那时，我们用一切方法去动员群众，拿被打伤者的血衣及被打死的工人照片，到学校去做鼓动工作，结果各学校、工厂都决定，五月卅日这一天动员群众上街，召集群众开会，号召上海市各界起来援助工人。学生的一支宣传队走到南京路，英国巡捕施行逮捕，结果大家包围巡捕房，迎捕房下令开枪，打死了许多中国人。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求工人罢工自由，要为顾正红伸冤，反对交易所等，这便是南京路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后，青岛、汉口、九江等地又相继发生帝国主义军队屠杀中国民众的惨案。

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宝山里2号挂牌办公，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月6日，全总上海办事处在闸北宝通路顺泰里正式成立，由刘少奇总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

上海总工会成立的当天，就发表了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宣布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帝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刘少奇曾经生动地描述上海“三罢”斗争的情景：

“此时，上海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此时的上海，真的陷入荒凉恐怖之境况。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正当反帝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由动摇走向妥协。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宣布，将于6月26日单独提前开市。当天晚，刘少奇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对付上海总商会开市的态度和办法。到会的有6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多人。大会议决：不管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要坚持罢工到底，6月25日，上海总工会发出通告，号召工人坚持罢工。“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得（达）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可上！”

6月末商界开市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开始集中力量镇压工人运动。

8月22日下午5时许，上海工团联合会指派工贼、流氓数十人，手持

刀枪、铁棒等凶器，冲入上海总工会，捣毁办公室，当场打伤职员 8 人，并图谋抓捕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四处寻找，但没有找到。

原来，刘少奇早有警觉，迅速把文件、帐册收拾好，便离开总工会，去向中央报告了。李立三也在工人的掩护下，从房顶上出去报警了。

及至工人纠察队赶来，工贼、流氓匆忙逃窜。

从 8 月初开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人先后开市，学生因放暑假纷纷离校，工人只能孤军奋战。为了保存力量，巩固既有成果，上海总工会决定改变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有领导地有组织地复工。8 月 10 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 9 项复工条件：

- (一) 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堂；
- (二) 租界内(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 (三) 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
- (四) 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 (五) 工人复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 (六) 发给罢工期间工资 50%；
- (七) 增加工资 15%，工资一律发给大洋；
- (八) 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
- (九) 赔偿死伤学生、工人。

当时，有些工人对复工想不通。刘少奇便深入工厂，耐心地做说服解释工作。8 月 29 日，刘少奇出席华商纱厂代表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华商纱厂快要开工，开工以前，必须对厂主提出一些要求，否则，厂主将会有不利于工人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举动，但是，所提条件应当能够做得到，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来不得解决，不如先提较低的条件，以得到胜利。

9 月间，经各厂工会同厂方交涉，复工条件得到部分实现。大多数工厂先后复工。

这时，刘少奇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工会组织的任务。9 月 12 日，他在召集日商工厂代表会议时说：我们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现在要进厂做工了；但各工友不要以为有了工会就骄傲起来，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会还未十分稳固，现在资本家还是想使用种种手段来破坏。所以，我们要对工会加以整顿，努力使工会更加坚固。

9 月 18 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刘少奇。面对反动派的镇压、迫害，刘少奇毫不畏惧，更是出生入死，继续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旋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患了肺病，但仍然抱病坚持工作。11 月间，他的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原籍湖南养病。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人在 1968 年提出的对刘少奇的所谓《审查报告》中，诬蔑刘少奇在五卅运动后“畏惧斗争”，“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刘少奇当时离开上海去长沙的原因，从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即可以得到回答。

1925 年 10 月 16 日出版的《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发表了题为《刘少奇的奋斗》的报道：

“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

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项事件。

昨日刘君与某工友云，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为断，而某工友异常钦佩刘君奋斗的精神。”

另有 1925 年 11 月 19 日上海英国（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英文报纸）刊登的一份情报说：

“昨晚 6 时约 7 名罢工鼓动者，包括刘华（当时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引者注）在闸北谭子湾三德里 31 弄 32 号碰头。刘华说：原总工会成员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

这些记载，足以戳穿林彪、江青一伙人的谎言，从侧面证实刘少奇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

刘少奇回长沙后，于 1925 年 12 月 16 日被军阀赵恒惕逮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救援。这样的通电，有时一天多达 40 多份。全总致电赵恒惕说：刘少奇“历年尽瘁爱国运动，为工人群众所爱戴”。在五卅运动中，他“更废寝忘餐从事奔走，号召国人为救国运动，以全力为罢工工人后盾，爱国热诚，举国同钦。”电报谴责赵恒惕，要求即速释放刘少奇。

经多方营救，刘少奇于 1926 年 1 月 16 日获释出狱，但被赵恒惕驱逐出湖南省。

2 月 19 日，刘少奇抵达广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迎。这时，为响应上海人民反帝斗争而发起的省港大罢工仍在继续。3 月 3 日下午，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欢迎刘少奇大会，到会群众有 1500 多人。全总宣传部主任邓中夏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介绍了刘少奇为工人阶级英勇奋斗的历史，称赞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接着，刘少奇讲话，对工友及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着重讲了领导工人运动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帝国主义要来解决省港罢工，一定要与我们工人来订条约；第二、我们要严守秘密；第三、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第四、我们内部应该团结得像铁一样，将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刘少奇讲话后，全场掌声雷动，高呼口号：“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省港罢工胜利万岁！”

在这期间，因全总委员长林伟民身患重病，由刘少奇代理全总委员长职务。他和邓中夏、苏兆征等共同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这时，省港大罢工虽已持续近 10 个月，但广州、香港的工会组织涣散、派系很多，行动不统一，直接影响到工人阶级战斗力的发挥。为促成各工会组织的联合，刘少奇做了大量工作。1926 年 4 月 1 日，他出席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致词中明确指出：你们以后的责任，是应该怎样整理自己的内部，巩固这个战线，延长这个战线，以及于全中国全世界。会后不久，广州各派工会成立了统一的工人代表会，加入的工会组织有 210 多个。香港原来有 100 多个大小工会，分属于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和无所属的三个派系，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也正式成立了香港总工会。4 月 9 日，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刘少奇在会上强调了组织统一工会的重要性，指出：香港工人甚多，但是没有系统，如果我们不能统一力量，就不能一致地与帝国主义奋斗，就不能战胜敌人，所以，要组织这个统一的总工会。

1926 年 5 月 1 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共 502 人，代表全国 699 个工会团体和 124 万有组织的工人。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好是一年时间。5 月 4 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题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他说：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中，更有长足的进步。

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的进步与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比如香港、广东工会的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下，尚能有 20 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以此即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已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他认为：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的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大会选举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全总秘书长。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刘少奇坚决保护工人利益，支持工人的正义要求，逐步成为深受工人爱戴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1927 年，是中国革命浪潮大起大落的一年。继上年 10 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后，1927 年初春，北伐军又打到南京、上海一线，革命区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人民大革命的高潮。

武汉三镇地处长江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1926 年 10 月 10 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全国革命的重心由广州转移到武汉。这里革命气势很盛，工人运动十分活跃。在北伐前夕，武汉地区只有 13 个工会；到 1927 年初，工会发展到 300 多个，会员达 30 万人。从 1926 年 10 月起的半年时间里，武汉工人举行罢工 300 多次，大多数取得了胜利。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从 1926 年 9 月起，大部分中共中央委员相继到达武汉。

1926 年 10 月 21 日，刘少奇抵达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武汉做准备，并兼任全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1927 年 2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在全总领导成员未到齐之前，由刘少奇、朱少连、项英、李立三等组成临时常委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在这期间，刘少奇将相当精力用于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早在广州时，他曾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开办的劳动学院讲授《中国工会组织法》，通俗、系统地说明工会的组织原理和组织方法，深受学员欢迎。到武汉后，他即应邀到工人运动讲习所讲授《工会组织法》和《工会经济问题》等课程。

1926 年 12 月 26 日至 28 日，刘少奇在汉口友益街 16 号湖北省总工会办公室提笔疾书，先后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3 本小册子，交由湖北全省总工会宣传部印行，对会员进行教育。

在这些小册子中，刘少奇着重阐明工会的组织原则及其作用，指出：“工会是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同时又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人所包办，变成专制。”他强调：“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他说，要使大家懂得，“支部、小

组是工会的基础，工会是建筑在支部、小组之上，支部、小组若不坚固，工会的基础就不坚固，有了好的支部和小组，工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

1927年1月1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华商总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月3日，刘少奇在会上作组织报告，指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要求各级工会给以正确的指导；武汉的工人，大部分已参加工会；但是，各工会的组织，还没有在群众中建立的基础；因此，武汉各工会及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

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几个工人急急忙忙跑进会场，气喘吁吁地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快，不好了！出大事了！”

“怎么回事？”刘少奇站起身来警觉地问。

几位工人答道：“英国水兵打伤了好多中国人。”

“这帮帝国主义强盗！”刘少奇把棉大衣往桌上一甩，手一挥，愤怒地说：“走！”

“我们到现场去。”说着，大步向出事地点奔去。

原来，从1927年元旦起，连续3天，武汉各界为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举行各种活动。1月3日下午3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面的广场上讲演，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听众越聚越多。

这时，全副武装的英国水兵从租界冲出来，当场打死码头工人李大生，打伤群众30多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刘少奇赶到现场，望着地上的血迹，怒不可遏地说：“这笔血债，我们一定要他们偿还！”他向工人纠察队员招手说：

“跟我来！我们去向英国当局提出抗议！”

夜深了，汉口友益街16号三层楼上仍灯火通明。刘少奇和李立三主持召开全总汉口办事处和湖北全省总工会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刘少奇在会上报告了“一三”惨案有关情况，并就如何领导群众斗争发表了意见。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通话说：

“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全省有组织之三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兹经全体一致决议，提出下列条件：

（一）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

（二）在英租界未收回之前，要求英租界当局立即撤销电网、沙包及各军事上之准备，并绝对不得在租界内干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讲演等自由。

（三）要求立即撤退在华军舰，以后租界内永远不得有外国武装军警驻扎，由公安局派警驻扎租界。

（四）要求赔偿死伤损失。

（五）要求英政府向我政府道歉，并担保以后不得有此等事件发生。

（六）要求凶手即移送我政府惩办。

汉口的英国租界，是1861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设立的，面积计有115英亩。它濒临长江，南起歆生路（今江汉路），北至界限路（今合作路）对面的大智路一带，四周筑有一道砖墙，各界路口装有铁栅和铁门，不许中国人进入。租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1月4日上午，李立三、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前往国民政府商谈，要求政府立即与英方交涉，通过外交途径收回英租界。

中午，刘少奇出席武汉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6项条件为基础，补充为8项，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交涉，限其在72小时内答复。会后，国民政府表示全部接受8项条件，以之与英方交涉，与人民一致行动。

1月5日下午，武汉三镇30万市民从四面八方方向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坪汇集，举行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刘少奇站在队伍前列，和各界群众一起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者们的罪行。大会向全国各团体发出《通电》，要求英国租界当局圆满答复武汉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8项条件。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像波涛汹涌的扬子江水，向英租界行进。刘少奇带领工人纠察队奋勇在前，冲入租界。在英国巡捕房的屋顶上很快升起了中国国旗。被英帝国主义强占了了几十年的中国领土，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

当晚9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普海春大酒店举行招待会，招待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到会的工人代表有400多人。刘少奇在招待会上发表演说。他讲道：我们的立脚点是什么？就是解除一切束缚，完成革命。“现在虽然解除了一部分的束缚，但是还有帝国主义者及未打倒的军阀，仍然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准备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血，往前奋斗。”

4月3日下午，日本水兵在汉口乘坐人力车不给车钱，并行凶杀死前来干涉的中国工人。附近群众闻讯赶来，同日本水兵搏斗，当场捉住几名肇事者。日本租界当局调动大批水兵，对中国民众开枪射击，死4人，伤40多人。造成“四三”惨案。

第二天下午3时，武汉各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刘少奇代表全总在会上报告了“四三”惨案的情况。晚上7时，全国总工会又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到会代表六七百人。刘少奇报告了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的情况。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工人阶级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同胞的惨杀，取消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4月9日，刘少奇在全总召集的代表大会上报告，号召工人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们的屠杀，反对妥协。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行为的斗争很快开展起来，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

革命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原来存在的矛盾日益尖锐地表露出来。当时，已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唆使暂编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倪弼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反共的一个重要信号。

陈赞贤，江西南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因领导当地人民反抗军阀拉夫的斗争，遭搜捕。后去广东南雄开展工农运动。1926年7月间，他到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找刘少奇谈话。他说：“现在国民政府北伐，江西的工人，没有很多组织，请全国总工会派我回江西，先到赣州去秘密组织。将来一方面在战争上可以帮助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在公开后工会就有了基础。”刘少奇对他主动请求去江西做秘密工作的胆识，很是佩服，即刻写了一张委任状，委他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回江西开展工人运动。

陈赞贤到江西没有数月，就组织了数万工人，领导他们开展经济斗争，

被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

陈赞贤被杀害后，刘少奇于 1927 年 3 月 17 日发表了《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一文，揭露蒋介石镇压工人行动的罪行。文章指出：“江西这事件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一致起来奋斗，督促政府及党部肃清一切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到达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刘少奇的预料，蒋介石从赣州开始，一路走，一路杀，从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一直杀奔到上海。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上海滩顿时成了恐怖世界。

像闪电，像惊雷，蒋介石的血腥暴行很快传到武汉，各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 月 16 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讨蒋通电，列举了蒋介石的 6 大罪状，号召“全湖北工人阶级应当尽其力量，与革命同志一致行动，向敌进攻……以求打倒蒋介石。”这个通电，表明了湖北工人群众的严正立场和革命决心。

这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1927 年 4 月上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这次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未能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少奇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继续领导工人群众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 年 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5 月 17 日，驻在宜昌的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进攻武汉。5 月 21 日，反对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解除工农革命武装，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即将同蒋介石公开合流的信号。

5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政治局势及对付反革命叛乱的方针。刘少奇列席了会议，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刘少奇深知武装工人的重要性。早在 1926 年 10 月湖北全省总工会一成立，就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到 1927 年 5 月，队员发展到 5000 多人，拥有约 3000 支枪。在武汉三镇，到处都可以看到工人纠察队员。他们身穿蓝卡布中山装，佩带着红布上缝有“工纠”二字的臂章，帽子上面安着红帽花，腿缠绑带，俨然是军人打扮，显得威武雄壮。省总工会纠察委员会制订培育计划，举办训练班，请刘少奇、邓中夏等去讲课，对队员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夏斗寅叛变后，工人纠察队担负起卫戍武汉三镇、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的任务。5 月 19 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第 198 号通告，要求各工会负责人领导全体工友“共同努力，以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号召工人武装纠察队“正式荷枪弹”，讨伐夏斗寅。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人武装纠察队配合叶挺部，击败了叛军，保卫了武汉的安全。

6 月 14 日，刘少奇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

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和夏斗寅、许克祥的行为，应一致反对。他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削平湖南叛乱”。

大会通过了《武汉工人目前主张》决议案，提出明令拿办许克祥、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 8 项主张。

6 月 19 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政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 刘少奇第一次遭反“右倾”

进入 1927 年月以后，武汉的政治风云异常险恶。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向全国发出《讨共宣言》，制造借口，企图在武汉发动军事叛乱。

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反革命企图日益暴露，中中央决定紧急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凡是能秘密返回本省工作的，都回本省工作；适宜于到其他地方工作的，分配到其他地方去；还有一批人送去苏联学习。刘少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做了妥善安排，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同时，又新调进一批干部来坚持工作。采取这些应变措施，为的是使党组织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6 月 28 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住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即将发生的事变。会议决定：为了削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共中央把这个决定交给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解散纠察队的布告》。随后，将一些破旧枪枝送交武汉卫戍司令部汉口办事处，而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7 月 2 日，刘少奇作为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秘书长，被指责“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已陷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从对于目前革命情绪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向黄色工会领袖的屈服与投降”，“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因此，临时中央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击”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这之后，临时中央认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还公开批判刘少奇。4 月 25 日，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再次批评刘少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久，刘少奇离开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任党团书记。他虽然受到临时中央“左”倾领导的打击，但仍然不畏风雨，坚持真理，怀着一颗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一面深入沪东区纱厂从事党的基层建设工作，一面努力学习，研究白区和苏区的工人运动理论，为扭转白区职工运动屡遭失败的严重局面做了不懈的努力。

### 在毛泽东家里遇见了第一位夫人

1945 年 3 月 22 日，刘少奇在延安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亲密伴侣何宝珍，为她写了一篇小传：

“何宝珍，女，湖南道县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党。因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被开除学籍，

一九二三年到安源路矿工会所办之工人子弟学校教书，是年与我结婚。

和我一道参加过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满洲等地党的、工会的、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生二子一女。

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入狱，被判徒（刑）十五年，由南京第一监狱执行。因她与狱外党的组织发生关系被发现，第二年判决在南京枪毙。”

在这篇言短情长的传记里，记录了刘少奇和何宝珍在白区的艰苦条件下并肩战斗的历程。

1923年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新调来一位女教师。她20岁出头，个子不高，但干劲十足，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同时兼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这位教师就是何宝珍。

刘少奇与何宝珍第一次见面，是在何宝珍到安源之前——1922年的秋天。当时，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刘少奇到长沙清水塘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恰好，何宝珍因领导衡州第三女师学生进行反对反动校长欧阳骏的斗争，被学校开除来到长沙，住在毛泽东家里。在毛家的初次见面，使他们彼此有了一些印象。

何宝珍到安源后，刘少奇与她接触多了，逐渐了解到这位农村姑娘有着一段颇为曲折的生活经历。

何宝珍，又名葆珍、葆贞，乳名林英。1902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父亲何瑞蓉是个潦倒的穷秀才，靠做小买卖维护5口之家的生计。本来家境就十分清贫，加上苛捐杂税、荒年歉月，生活更加窘迫，父母不得不忍着骨肉离散的悲痛，把宝珍送给地主家的女佣做童养媳。此后，她随着婆婆在地主家侍候小姐。年纪稍长时，地主命她陪小姐到私塾念书，后又到县立国民女子小学堂伴读。宝珍聪敏好学，博得了老师的同情和赞赏，被允许作为正式学生与小姐同班上课。苦难生活的磨练，养成了宝珍那种勇敢、坚强的性格。

后来，宝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游行、演讲等活动，接受了新思想，成为第三女师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宝珍在长沙期间，受到毛泽东、何叔衡等的亲切关怀和教育。毛泽东给她取了“葆贞”的名字，勉励她永保革命精神，做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不久，何宝珍被中共湘区区委派去安源。行前，毛泽东对她说：“安源工人俱乐部极需要女同志去工作，你去很好。”

何宝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到安源后，何宝珍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她在工作中表现得那样热情、认真，在生活上又那样开朗、淳朴。没有教材，她找来李六如、陈清河编写的《平民读本》、《工人补习教科书》，自己动手抄刻蜡纸，油印成书。缺少纸笔，她就发动工人自制石板石笔。她还经常运用参观访问、化装演说、组织辩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有一次，她讲《农夫们辛苦了》一课时，先教大家熟读课文：“成群的牛羊，很大的瓜；金黄的稻子，白白的棉花……”；然后又把学生带到矿区附近的三号桥，直接听农民讲怎样种田耕地，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当年，曾听何宝珍讲过课的周德华回忆说：“何老师教书，把课文引到我们心里，至今我还

能背诵许多课文。”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 1923 年 4 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俩结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这种结合，没有花前月下的偎依，也没有林荫道上的甜言蜜语。但其同的理想和信念，却使幸福和充实感在他们内心深处洋溢常驻。他们心甘情愿地准备为革命事业去共同承受各种艰难阻险的考验。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斌斌（允斌）出世了。孩子还不到一岁，刘少奇就调离安源。为了工作方便，何宝珍只好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抚养。

之后，刘少奇在白区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何宝珍随同他四进上海。

第一次是在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当时，刘少奇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何宝珍从安源来到刘少奇身边，担负通讯联络、管理文件、抄写资料等工作，同时细心照料身患肺病的丈夫。同年底，刘少奇回湖南养病，不幸被捕入狱。何宝珍四处奔走，多方营救，先是找在长沙长郡中学任教的李治安，争取他的同情和帮助，后又通过关系找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疏通，让宁乡籍省议员及绅士出面保释。

北伐战争期间，何宝珍随刘少奇进入武汉。她除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文件收发管理工作外，还经常参加慰问北伐军伤病员和救济妇女、儿童的活动，热情帮助派到武汉工作的同志解决困难。1927 年 7 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武汉形势日趋险恶。

刘少奇正在庐山养病，记挂着留在汉口的何宝珍，于是立即通过关系转告她马上转移到庐山。此时，他们的女儿爱琴呱呱坠地来到人间只有几个月。何宝珍为了革命工作，只好把女儿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家里。

1927 年 10 月，何宝珍同刘少奇再次来到上海。那里上海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捕革命同志。有一次，刘少奇正在工人宿舍里开会，一群流氓打手闻风赶来搜捕。刘少奇立即布置转移。这时，何宝珍站了起来，把手一挥说：“我们与敌人决一死斗！”拔腿就往外冲。刘少奇一把拖住她，严肃地说：“快走，这是命令！”把她推了出去。1929 年春，刘少奇从顺直省委调回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何宝珍随他第三次到上海。不久，又同刘少奇一道去满洲省委工作。

1930 年 3 月，何宝珍随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第四次到上海工作。这次在上海期间，她当过交通，住过机关，搞过联络，守过店铺，任过教员，进过工厂。她不顾个人安危，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同志们排忧解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刘少奇仍有忙不完的工作，何宝珍就坐在灯下，默默地为他抄写文件。人们不难看到，在刘少奇的成功后面，凝聚着何宝珍艰辛的劳动。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刘少奇和何宝珍过惯了患难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

1932 年冬，刘少奇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何宝珍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工作，担任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他俩又一次分离。

互济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专门做援助困难同志及其家属的工作的革命群众团体，于 1925 年 10 月在上海成立。到 1929 年时，全国有会员 1.5 万多人。何宝珍到互济会就任后，化名王芬芳，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负责同赤色国际互济总会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同时，四处奔走，

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营救被捕同志。1933年3月，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地下党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于是何宝珍多次与张琼夫妇联系，并和他们一道去做何香凝的工作，保释廖承志出狱。

何宝珍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何宝珍的住处。她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就机智地抱起年仅3岁的小儿子毛毛（允若），迅速塞到邻居一位大嫂的怀里，说：“请帮助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说罢立即转回室内，销毁了机密文件，然后从容地应付前来搜捕她的敌人。由于猝不及防，她终于落入敌人的魔掌。

何宝珍被捕后，被囚禁在上海市公安局。敌人把刑具放在她面前，威逼她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何宝珍说：“我是家属，也当过教师。”敌人不相信，说：“不对，你是政治犯！”何宝珍装着听不懂，一笑答曰：“我只会煮饭，不会蒸饭。”敌人对她严刑拷打了几次，始终没有问出结果，便将她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仲夏的南京——闻名全国的“火炉”，又闷又热，一丝微风也没有。关押在老虎桥“模范监狱”里的“囚犯”更加受罪，空气里散发出霉烂的臭味，简直要令人窒息。三号号子是专门关押女“政治犯”的牢房。这是一个小独院，一条走廊里共有10间小牢房，关了30多个犯人。大家挤在一起，热得浑身汗水涔涔，实在难过，只盼望晚饭时刻早点到来，因为饭后小放风时可以到井边打水洗一洗。可是，火辣辣的太阳仍高挂在天边，离晚饭时刻还早呢！

突然，哐啷一声，牢门打开了。姐妹们惊异地朝门口望去，一个新难友被推了进来。

她30岁出头，身材细瘦，穿咖啡色的旗袍，一副女教师模样。从她那披肩的长发，苍白的脸色看去，大概已被关了好久，也经受了不多少磨难，但那清瘦的脸盘上一对大大的眼睛，却闪烁着倔强、坚毅的光芒。她就是何宝珍。

何宝珍走进牢房，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夏之栩愣住了。

“你……”，夏之栩正欲开口呼其真名，何宝珍机智地抢先说：“还认得我王芬芳吗？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她巧妙地告诉夏之栩等人自己用的是化名。

经过多次审讯，何宝珍坚不吐实，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最后，敌人判她15年徒刑。

被关押期间，何宝珍和早先被捕的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等几位老大姐同在一个牢房。她是岁数较小的一个，但处事却很老练、果断，所以姐妹们称她为“小大姐”。

一天，从事秘密工作的熊天荆遵照地下党的指示，以探监为名，来同狱中难友联系。

她路过何宝珍所在的女牢房时，从窗孔里塞进去一个小纸团。何宝珍拾起纸团，还未来得及打开看，就传来了看守开牢门的声音。她急忙将纸团扔入便桶，从难友黄海明手中接过抱着的孩子说：“你坐在便桶上，我来逗娃娃。”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逗起了孩子。看守闹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到别的号子去了。看守一走，何宝珍马上从便桶里取出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让她们转递给男号子的一个重要消息。何宝珍立即将

纸条夹在食品里传递了出去。

有一次，一个名叫“二科长”的狱吏在大家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闯入牢房来。他发现了帅孟奇正在起草的一份报告，如获至宝，奸笑着质问道：“你不是不识字的工人吗？这回又怎么解释呢！”“在监狱里闷得慌，不识字，还不兴学？这是抄书练字。”帅孟奇回答说。帅孟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判了无期徒刑。何宝珍平时很敬重这位老大姐。见状，马上机敏地接口说：“我是她们的老师，我教他们认字。”

你对这个号子有什么不放心啊！一个小脚，一个半瞎子，一个老实得连话都不说的。我嘛，是个小学教员，平时就爱唱唱。对这些人有啥搞头啊！”何宝珍指着旁边一本《世界知识》说：“那些话不就是从上面抄下来的吗！”

“二科长”翻了翻那本杂志，毫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去。

何宝珍不仅机智、聪敏，而且活泼、开朗，爱唱歌、唱戏，还擅长表演，她不但常把一些带有鼓励性的故事讲给同志们听，而且常把旧戏曲填上自己编的新词唱给同志们听。她常唱《国际歌》，有时唱《打渔杀家》，以此来鼓舞大家的斗志，给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段骂蒋介石的京戏：“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她那丰富的表情，诙谐的动作，引得姐妹们捧腹大笑。在饭后小放风的时候，别的号子的难友要小大姐表演一个节目，她总是大大方方地唱上一段。她的歌声，驱走了难友们的寂寞，带来了激昂奋发的欢乐。

何宝珍很会关心体贴同志。看到耿大姐是小脚，帅大姐受刑时损坏了眼睛和腿，行动不便，她总是抢着去提水、刷碗、倒便桶。她乘放风的机会，与其他号子的姐妹接触，打听消息，为难友们排解疑难。所以，姐妹们都很喜欢这位小大姐。

在阴森恐怖的铁窗里，何宝珍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利用一切机会同敌人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帅孟奇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狱中，我们常常为改善生活进行绝食斗争。每次斗争，小大姐都积极参加。记得，当时职工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牛兰夫妇被捕，恰恰也关在我们这个监狱里。社会上的人士不断声援，要求释放他们，牛兰夫妇也在狱中绝食。为了援救牛兰夫妇，我们向监狱当局提出释放牛兰夫妇，允许向监内送书、送食品，改善伙食，每周吃一次肉等要求。

接着就开始了绝食。要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必须大伙心齐，否则不是饿死人，就是坚持不下去，使斗争失败。阴险的监狱当局就采取分化的办法，先下令把我们几个判无期徒刑的拉出去打一顿，然后由狱长跑来训话：‘你们这些人闹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关几年就可以出去。你们别跟着那几个无期的闹。她们是没指望的，你们还有希望。’但是姐妹们团结得很好，没有一个动摇的。平时饭量好的人，两三天后就开始呕吐，到后来都吐出了绿水，但大家仍然坚持着。俗话说，‘七日不食则死’。七天过去，监狱当局害怕饿死人，不得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斗争胜利了。不久，牛兰夫妇被释放出狱了。走前，牛兰夫人到牢房来看望了我们。”

“绝食斗争的胜利，使监狱内的情况改善了不少，外面可以来探监，可以送书、送食品进牢；伙食也改善了些，每周吃一次荤。但是没隔多久，监狱当局又下令禁止送食品进狱了，这激怒了我们。一天，最凶恶的‘二科长’来查号子时，宝珍质问他：‘为什么不许送吃的？’”

‘二科长’说她带头闹事，下令将她拉出去打。姐妹们火了，大家都闹了起来。为了这次闹监，我们每人都遭到一顿毒打，于是又开始了绝食。四天以后，狱方只得再同意恢复向牢内送食品的制度。”

何宝珍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但有时也呆呆地坐着发愣。姐妹们知道，这是她在思念自己的亲人。有一回，一位妹妹问起何宝珍的孩子，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最使她放心不下的还是毛毛。毛毛现在怎样了？邻居会好好照看他吗？有人去领他吗？这些问题，就像一根根针一样，刺痛着慈母的心。但何宝珍毕竟是位坚强、刚毅的妇女。她很快抹去眼角上挂着的泪珠，把手一甩说：“咳，干革命还顾得了这些！人民不解放，我们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苦的环境里挣扎着生存下去。只要他们活着，等革命成功后，找到他们，一定要送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学科学，学技术，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说到这里，她又和姐妹们开怀地笑了起来。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云暗天低。荷枪实弹的狱警恶狼般地嚎叫着，前来押解“王芬芳”。姐妹们深为小大姐担心，不知又出了什么事情。何宝珍听到呼叫她的化名，整理了一下衣服，便从容地离开号子。走到门口时，她回转身来，用沉毅的目光默默地和姐妹们告别。原来，敌人已决定枪杀何宝珍，这是她和姐妹们的永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何宝珍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一个年仅32岁的妇女，把青春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用鲜血染红了雨花台。

何宝珍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姐妹们都哭了，无不感到格外的悲痛。

何宝珍是被叛徒出卖了。出卖她的人，是互济会的一个女干部，曾经被捕关押在模范监狱。当时，这个人害怕丈夫供出自己，发生了动摇，何宝珍为此曾做过她的思想工作，对她说：“你有孕在身，你丈夫不会供出你的，只要你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到生孩子时是可以取保释放的。”不久，她获释出狱，仍在互济会工作。有一次，她来监狱探监，何宝珍还嘱咐她帮助一位难友家属解决困难。不料，这个女干部后来重新被捕，经不住严刑逼供，供出了何宝珍的真实身份，致使何宝珍重新被提审。

敌人对何宝珍用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她招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审判官气得发疯，最后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选择。要活命，就老实招来。顽抗，则死路一条。”何宝珍响亮地回答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革命者是杀不尽的！”何宝珍在敌人的法庭上，就像绝壁上的一棵苍松，无论怎样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傲然屹立，宁折不弯，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松柏气节和云水襟怀。

帅孟奇在《一件永远不会忘记的事》一文中，称赞何宝珍“是一个模范党员……具备了共产党员优秀高贵的品质，对党一贯忠实，为党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利益。……平日她热爱她的孩子们，当被捕之后，却忘记一切。她常说：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牺牲是光荣的。”“她以她生命的光辉，照耀了在狱中的同志们，……更坚定了斗争的意志。”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建立起了一种高尚纯洁的爱情。刘少奇在追念何宝珍时，称颂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1951年12月初，刘少奇到南京视察时，曾参谒雨花台烈士陵园，深切悼念何宝珍和其他烈士。

何宝珍生前，对未来满怀希望。她希望推翻黑暗的旧世界，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学习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何宝珍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在她牺牲后的第四年，周恩来派人在武汉找回了她的女儿、已沦为童养媳的爱琴。

爱琴在《女儿的怀念》一书中回忆这段生活经历时说：

“为了革命工作，父母亲把我寄养在汉口一个工运积极分子的家里。到了这家，奶妈刚生了一个男孩，她用乳汁和眼泪抚育着我们两个瘦弱的孩子。她心地善良，对我像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开始，党通过父亲的亲属和旧谊，经常给奶妈一些经济补贴，日子还过得去。几年后，这个关系断了。生活的重担逼迫着奶妈，眼看饿得皮包骨头，不得不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把我卖给武汉的一家人去当童养媳，讨碗饭吃。临走的前一天，奶妈像被剜了心头肉一样，哭了整整一夜。”

1938年4月，爱琴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刘少奇。刘少奇深情地对女儿说：你受了苦，不要紧的，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里来了。刘少奇给爱琴讲述了何宝珍牺牲的经过，接着说：“你的母亲牺牲了，她是为革命牺牲的，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把她杀害的。你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很快就要回来了，找你们都很费劲，弟弟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当时为什么把你们送出去？我们没办法长期在那儿住，革命嘛，今天住这里，明天在那里，带着小孩子不方便，就把你们寄养给人家了。现在你回来了，不是挺好吗？”

这一年的夏天，允斌也由湖南老家被接到延安。他1岁多时就离开了母亲，稍一懂事，就开始放牛做活，经受了苦难生活的折磨。如今，兄妹俩一起生活在父亲身边。刘少奇教导他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母亲，学习你们母亲的精神。

要晓得她为什么牺牲，国民党为什么杀害她。”

过了夏天，允斌和爱琴进了延安保育小学。第二年，他们被送往苏联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行前，刘少奇嘱咐他们：“你们到了那儿，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本领。另外要把身体搞好，把身体锻炼健壮，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他们深感任重而道远，在异国勤奋学习，逐渐成长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允斌结束了十年制学校的学习，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后转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系。1957年从苏联回国，曾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爱琴于1949年8月回到北京，第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毕业后先分配到国家计委，后到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参加边疆建设。

允若直到1946年才从苏北农村找回来。当年何宝珍被捕后不久，他被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做养子。十二、三岁时流落在上海、苏北等地，卖报，当学徒，拣破烂，受尽了百般折磨。回到父亲身边后，他先中学毕业，后入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学习。1960年夏回国，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工作。

三个孩子都学得了一门专长，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何宝珍烈士可以

含笑于九泉了。

### 刘少奇的一个英明决策

1936年初春，西北高原上寒风凛冽。一天黄昏，在陕西耀县通往临潼的大道上，一队人马在急急地赶路。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稳稳地骑在一匹骏马上。他身穿棕色缎面皮袍，头戴礼帽，俨然像个富商，眼睛里透出沉着、聪慧、机警的光亮。他身后跟着一头颠着碎步的毛驴，上面骑着一位“阔妇”。这就是刘少奇和他的夫人谢飞。几位随行人员扯开大步，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他们是护送刘少奇去临潼的游击队员。

刘少奇是在1936年春，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牺牲化”。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已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

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无力进行领导。少奇同志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集会，冒险进攻。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极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这次冒险行动，遭到敌人的镇压。

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很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不应地消耗掉了。

刘少奇看到这种情况，并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他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同志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枫、徐冰，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荷华、黄敬，则表示坚决支持。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刘少奇在北方局的《火线报》上发表了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他写道：“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

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还说：“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刘少奇同志又用陶尚行、莫文华、胡服的笔名，在《自由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阐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经过“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的教训，看到刘少奇的文章，对党的正确主张，普遍表示拥护。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使党的号召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用极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北平、天津两个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京东、津地、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都恢复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后成立起来；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党的组织。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地区的党员，发展到5000多名。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现了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和下乡工作队等等，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活跃起来。

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刘少奇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

从1936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刘少奇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起来了，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党中央对北方局的这一段工作，评价很高。当时，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在刘少奇来到北方局工作的时候，薄一波和一些同志还被关在北平的国民党监狱里，狱中的党支部，组织他们学习了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又学习了刘少奇的文章。大家注视着华北和全国出现的新形势，看到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斗争和多次挫折之后，重又展现出广阔天地和胜利曙光！

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在这一工作中，既要团结反日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可能合作的分子。于是，北方局把当时可能抽调的干部都陆续派往华北各省、市。薄一波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派往山西。

1936年8月下旬，薄一波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的代表来见他，拿着阎的电报，邀他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他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

过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第二天，徐冰来告诉薄一波：“胡服同志说，机会难得，要去！”又告诉我，刘少奇还指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9月，薄一波来到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对山西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深深地体会到刘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提出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是非常正确的。随后，他见了阎锡山，表示回山西帮助搞抗日救亡工作，还要同远方朋友商量商量。阎锡山完全意识到他是要向党组织请示去的，表示理解。他返回北平作了汇报，北方局分析了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动态，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

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他在山西经营了20多年，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义下，办了35家大企业，修了同蒲路，还有银行、钱庄之类。

他的家当和他的势力都在山西。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保住这些的。当时，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统治摇摇欲坠。日本侵略者向华北步步紧逼，山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随着日军的进逼而激化。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有同蒋介石的矛盾，在反共这点上，虽然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一面暗地策动河东道独立，一面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山西的墙脚。在这种情况下，阎和蒋的矛盾也激化了。

这时，在阎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他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借用我党的力量。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使阎锡山感到共产党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看到共产党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联共可能还是一条出路。在他的头脑里，联共和反共是并行不悖的，只是次序先后和分量轻重的问题。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依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人和应付蒋介石，同时和共产党周旋，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阎锡山说过：“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是，他表示愿意抗战和同我们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因此，北方局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他、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刘少奇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

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

经过分析研究，北方局认为在山西大有可为，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同薄一波一起，第一批去太原。临行前，徐冰传达了刘少奇对他们的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同志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到了太原，薄一波等就同阎锡山正式谈了一次。

薄一波等提出：第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不应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东西，我们都做；不利的东西，我们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对于我们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当时阎锡山一一同意。

为了便于发动群众，薄一波工作一开始，就接过了阎锡山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组织，名义上阎锡山还是“会长”，实际上领导权很快转到我们手里。他们把它适当加以改组，扩大群众基础，通过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按照刘少奇提出的要抓实权，做实际工作，反对空谈主义的方针，制定了牺盟会的行动纲领，迅速把工作开展起来，在工厂（包括兵工厂）、学校（包括军事学校）、农村，广泛发展牺盟会组织。为了迅速培养干部，他们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下，办起了“临时村政协训班”、“军政干部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当地的和全国各地来到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收起来，加以培养训练。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应当指出，经过培训的牺盟会特派员，都是比较优秀的党员，派往各县工作，同时担负着党组织交给的建党任务。

牺盟会工作的迅速开展，引起了顽固分子惊慌。阎锡山的亲信、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带领反共军官七八十人，向阎锡山请愿，要求解散牺盟会，驱逐共产党。阎锡山对王靖国等说：你们目光短浅，看不到前途。

在刘少奇提出的正确策略原则指导下，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在阎锡山的眼里，薄一波等是共产党员，但又不是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而是他请来帮助做抗日救亡工作的，用的是他的形式、他的口号，戴的是“山西帽子”，搞起来的组织还是他的。而对共产党来说，则是利用合法形式和“官办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推动阎锡山抗日，壮大抗日救亡的力量。

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刘少奇和北方局先后来到太原，直接加强了对山西党的工作的领导。

刘少奇来到后，立刻向薄一波等传达了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刘少奇指示他们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刘少奇向他们指出：一年来，你们在山西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但是，

一定要看到，现在抗战开始了，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是准备抗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要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全面的民族抗战。因此，在我们的策略上应当有所改变。要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左”倾关门主义还是要反对的，但是主要的注意力应该放在防右上。当形势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但当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就不要再等待，就要大胆地前进。现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杠杠，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持续下去。他批评我们当时的做法还不够放手，还有包办群众运动的味道。刘少奇后来还一再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反对迁就主义的“一切经过”。他说过：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党的会议说过：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并且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由于少奇同志的正确指导，使得山西的统战工作，在形势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迷失方向，并且很快开创了新的局面。

刘少奇还给牺盟总会的负责干部包括非党干部公开作了一次报告，分析了抗战开始后的形势，要求牺盟会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号召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子，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他还亲自起草了《山西农会章程》，用牺盟会的名义发布，使党和一切进步团体都能利用这个章程，合法地去发动农民群众。

刘少奇在太原还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见了面，谈了话。他着重地向梁说了下面一段话：牺盟会是共产党帮助发展起来的。发展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中华民族，不是为私利，不应有谁挖谁的墙脚的问题。我们之间是可以长期合作的。在统一战线中，阎先生是会发展的，共产党当然也要发展，限制我们的发展那是不行的。少奇同志明确、有力的谈话，缓和了阎锡山的疑虑，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1937年秋，雁北失守，太原深受威胁。正在这个时候，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日。这对山西以及整个华北地区抗日军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在党的领导下，以八路军为骨干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使敌后根据地很快就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八路军在挺进。山西旧军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却一触即溃。阎锡山虽然枪毙了他的部下李服膺，也未能阻止溃败之势。这时阎对旧军已逐渐失去信心。于是就来找薄一波等帮他的忙。根据党中央历来指示的精神，薄一波等对阎锡山说：看起来仅仅依靠旧军是不行了，有必要赶快组织一支新军。阎锡山也有组织新军的想法。他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要薄一波先组一个团，试试看。薄一波当即向刘少奇报告了这种事，他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一个团也要搞。并决定由牛荫冠同志接替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

一支实际上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很快就诞生了。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军不断壮大。决死队发展到四个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从团发展到旅，又发展了三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不算牺盟会在各地的游击队，有正式番号、列入正式建制的有五十个团，实际的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当时的旧军。

刘少奇同志当时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两条：一是动员平津和华北各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二是在三个月内扩大部队到 10 万。当时党内也有少数同志反对这个方针，认为根本不应当提出让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认为扩大部队到十万，一来不可能，二来会破裂统一战线。但是，少奇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为了独立自主坚持华北敌后的抗战，必须这样做。那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山西，他在一封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胡服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且具体部署，扩大部队时，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这个方针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来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9 月下旬，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省牺盟会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会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党中央对党在牺盟会工作的指示。根据报告的精神，大会修改了牺盟会工作纲领，强调全民总动员，反对片面抗战；把我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结合山西抗战的新形势，写进牺盟会新的工作纲领中。

11 月 8 日，太原失守。第二年，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向南进攻，攻占临汾，直进到黄河北岸的风陵渡。山西主要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都已沦陷。牺盟会和决死队在党的领导下，撤出城市和铁路线，退到两侧，留在敌后，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扩大根据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盟会逐步掌握了县政权。在阎锡山的旧军队、旧政权溃败时，许多县的牺盟会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有些人就接过了县长的职务。山西全省有七个行政区，其中五个行政区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领导的，这些行政区的县长都是由我们经阎锡山直接任命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其他行政区也有一些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全省 105 个县，有 70 个县长是共产党人。

1938 年秋初，少奇同志调离北方局。在刘少奇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建立和发展了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共产党有了群众基础，有了政权，有了新军，有了根据地，形成了一支新的强大力量。那时人们把它叫做山西新派。这支力量，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的建树。

刘少奇同志领导华北白区斗争的胜利实践，又一次证明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诽谤诬陷，终究遮不住少奇同志的革命的光辉。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是我党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又一伟大胜利。

### 刘少奇代替毛泽东的主席职务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去重庆谈判时，绝大部分中央同志到前方各地区去了。毛主席离开延安前，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确定由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就是说，中央的工作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了。这段时期，他既要抓好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又要配合好毛主席在重庆同蒋介石集团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沟通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我军的互相联系与协同动作，指挥好前线的斗争。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少奇同志一生中为党为革命，工作最繁重、最劳神、最紧张的一个时期。

这段时间的重大工作有以下几项：一、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群运的全面工作；二、果断处理我解放区附近地区的日军投降及有关事宜；

三、坚决回击国民党的一切破坏和挑衅活动，并加强壮大我们的实力；四、依形势和发展要求，坚决迅速调整和积极部署我军主力，争取战略优势；五、大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努力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六、尽力做好统战工作，等等。少奇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意图，严肃认真，小心谨慎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一件件大事，并且处理得很好。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挑衅活动大大增多了，而我军给予对方的回击和惩罚也异常及时而凌厉，每次都以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而告终。在双方矛盾、冲突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有些同志曾担心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是否有保障，对这个问题，少奇同志作了非常精辟、明确的解释，他说：“蒋介石只懂得拳头，不懂得道理。前方对他的打击越坚决、越沉重，在实际行动中越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他越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触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障。”他还说：“这是毛主席临动身前给我的指示和交待，我在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意旨行事。”毛主席于1945年10月11日从重庆回延安后，健康状况一直不大好，所以，从那时起，直到1947年初，仍由少奇同志协助毛主席领导党中央的全面工作。这个阶段是我们革命力量将在全国范围内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大决战的极其重要的准备时期，这个时期我党的全面准备工作做得很好，是和少奇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毋庸置疑，这个时期，少奇同志处理一切重大原则问题，都是同毛主席商量并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和决定办的。许多问题，都是事先请示，或事后向毛主席汇报的。他这种谦虚谨慎、认真负责和对毛主席的尊重与忠诚，以及同毛主席长期来亲密无间的合作的精神确实使人十分感动、十分敬佩。这个时期的形势是复杂而多变的。少奇同志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和毛主席给他的重托，给全党树立了光辉的工作范例。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1946年2月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在这之后不久，少奇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中央上述指示的传达报告。在报告中他要大家认清时局的变化，要善于掌握局势的发展和适应形势的变化。同时强调指出，我们要有两手准备，既要学会在和平形势下的工作，即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也要准备对付意外，即当敌人向我们发动军事进攻，或进行突然袭击时，给予坚决的反击。他把应付和平与战争的两手准备工作，总括为：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这是完全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这种部署就是为了全党在日常工作中做好两手准备，特别是为了应付敌人可能发动战争的准备。在备战工作中，他尤其注意调整华东、中原地区我军的部署，以防备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并注意加强华北和东北的军力与干部的配备。1946年6月，国民党以五十万军队分四路重点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中心地区——宣化店。事件发生后不久，大约7月间，毛主席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分析了形势，检查和总结了入党前一段的工作。毛主席指出，不应忽视宣化店事件，因为它事实上意味着全面内战的开始，应该从中汲取严重的教训。少奇同志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分析和估计。此后，中央工作的指导方针路线，正是按照上述指示精神贯彻的。毛主席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大大扭转了《双十协定》发表后在党内产生的某种认识和估计。我们目前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战略上占有有利形势。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以全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就是说，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使用在一个方向上，对付主要敌人。两翼虽

有敌人的威胁，但危险不大，因为他们的力量较弱，而又受到牵制。我们的后方是稳固的（只是在东北地区要加紧剿匪、肃清内部敌人），必须认清这个局势，决不可丢失这个良好时机和有利的战略形势。

### 刘少奇作出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在我抗日军民8年的英勇抗战和苏联红军的沉重打击下，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时，八路军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我军迅速行动，去接受日伪军投降。

同时，命令原在冀热辽坚持抗战的李运昌部立即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收缴敌伪武器，接管东北城市，维持社会治安。李运昌同志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冀东丰润县左家坞附近大王屯开会研究，决定分几路向东北进军。十三军分区向承德方向，十五军分区向赤峰方面。曾克林和唐凯同志奉命带领第十六军分区的部队从冀东出发，向沈阳进军。

一路上，曾克林等接管了绥中，打下了山海关，解放了锦州，沿途共接管了13个县、两个市。接着进了沈阳。

当时，沈阳的局面很复杂，伪满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先遣军”，伪省长当了维持会会长，反动武装蠢蠢欲动，汉奸、土匪十分猖獗。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曾克林及时组织了沈阳市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担任司令员。同时，组织新政府，由焦若遇同志任市长。及时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初步控制了局面。

但是，我军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也是第一次接管这么大的城市，面前重重困难，曾克林深深感到力不胜任。因此，几个领导同志聚在一起，总是谈着，党中央何时派人前来？关里的主力部队何时到达？他们曾数次用电台同晋察冀军区和延安联系，但因功率低，都没联系上。为了早一天得到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冀热辽军区前委决定让曾克林去延安直接向党中央汇报。

9月14日，曾克林从沈阳北陵机场乘苏军飞机出发，15日上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当曾克林回到离别了8年的党中央所在地时，就像孩子投身于母亲的温暖怀抱，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幸福。飞机在延安东关机场着陆后，杨尚昆、伍修权同志迎接他，并安排了食宿。接着，汽车把他送到王家坪，并在那里吃了午饭。

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彭真同志带曾克林到一间宽敞明亮的窑洞里。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彭德怀、叶剑英、任弼时、陈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高兴地站起来同曾克林握手。少奇同志衣着朴素，态度和蔼可亲。当年在长征路上，曾克林在中央警卫营工作时多次受到少奇同志的亲切教诲，今天再次见到少奇同志，感到格外亲切。

他连忙走过去，向他敬了个礼，少奇同志微笑着说：“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接着，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少奇同志首先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党中央根据当前的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收缴日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发动群众维持治安，肃清土匪，建立根据地，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加强全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的早日到来。少奇同志接着

说：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曾克林谈谈东北情况，越详细越好。当时，曾克林就向少奇同志和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了他带领的部队进军东北，沿途接管各城市 and 进驻沈阳的经过，以及部队发展壮大的情况。在曾克林汇报过程中，少奇同志一边抽着烟，一边静静地听，眉宇间不时流露出喜悦的表情。在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中，少奇同志几次插话，他指着地图说：东北是战略要地，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邻蒙古，有山区，有大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少奇同志还说：东北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国民党一定不死心，会派大量军队争夺东北。我们要和他们针锋相对，力争这个战略地区。少奇同志作着有力的手势说：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的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讲到这里，少奇同志的目光中充满着坚定的信念。

他指出：抗日战争开始时，毛主席就预料，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现在抗战胜利了，只要我们继续战斗下去，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会建立起来。少奇同志还表扬曾克林冀热辽军区的部队行动快，进展迅速。在曾克林汇报结束后，中央负责同志又提出好多问题来问他。他们特别询问了东北人民的生活。少奇同志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当了亡国奴，他们的生活苦呀！朱总司令也说：东北人民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压迫，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到党和人民军队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入人心，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更是重大。

当天晚上，曾克林和少奇同志等中央首长一起吃了饭，席间，彭总对曾克林说：你们首先进入东北，是有功的，希望你们以后多搞点武器和大炮。过去战争时期我们的部队没有大炮，敌人就欺侮我们。今后我们有了大炮，力量大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就守不住了。临走时，曾克林还把随身带的手枪、子弹及望远镜留给彭总作纪念。

第二天一早，彭真同志告诉曾克林，他和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同志马上和他一起乘飞机到东北去。他还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已作出新的战略决策：为了加强东北的力量，完成控制东北的任务，中央决定将原来计划派到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改派到东北去，并从各解放区抽调 10 万主力部队和几万干部到东北，同时还将派 20 余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加强东北的领导工作。听到党中央这一重大决定，曾克林非常高兴和激动。

当他们回到沈阳的时候，冀热辽军区李运昌司令员和东北抗联的周保中、冯仲云等负责同志已经来了。曾克林把情况向李运昌同志和唐凯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听了都很高兴。不久，中央又陆续派张闻天，李富春、罗荣桓、肖劲光、程子华、谭政、李立三、林枫、陶铸、刘亚楼等领导同志加强东北领导。黄克诚、吕正操、肖华、邓华、万毅等领导同志率领的主力部队也到达东北。从此，在党中央和彭真同志为首的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我军全面展开了接管工作。北至齐齐哈尔、佳木斯、哈尔滨，南到安东、营口、旅大，东至抚顺、吉林，西到承德，赤峰、锦州、山海关，到处都有八路军部队。同时，我军根据七大精神和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开展

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消灭土匪、敌伪残余势力，建立东北全区和各地民主政权。东北人民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大批失业的产业工人踊跃参军，加上出关部队作骨干，我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仅冀热辽军区出关的部队就扩大发展到 10 余万人，组建了 12 个旅。到 1945 年底，各解放区的出关部队（包括抗联部队）已发展到 40 余万人，东北的形势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歼灭了几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彻底解放了全东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与斯大林商量建国大计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1949 年 5 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遣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国访问。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7 月 2 日，少奇同志率领代表团从北京乘火车至大连，然后经朝鲜上空飞抵伯力。以后又在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等地作了短暂的停留，直到第六天下午才到莫斯科。下面是师哲的回忆。

在莫斯科的奥斯特罗夫 8 号公寓休息了两天后，第三天的下午，代表团被邀请到斯大林的别墅（在孔策沃附近）。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都站在门前迎接客人。宾主相互握手问候之后，斯大林设宴招待少奇同志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十分自然。虽然是随意交谈，但也涉及某些重大的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这次宴会将近四个小时。

回到寓所后，少奇同志召集代表团同志，一起回忆

这次会见的情况和谈话的内容，分析谈话中涉及的问题哪些是重点，哪些问题斯大林已经明白，哪些问题他还很不了解，然后拟出下一次会谈的要目，并整理出简报。

同斯大林的会谈共有五六次之多。每一次会谈都有

令人难忘的重要内容。例如：在第三次会谈中，斯大林热情称颂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表示赞赏。第四次会谈后，苏方还给代表团放映了一部电影纪录片——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现场实况。据说，这是苏联第一次让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

第五次聚会实际上是一次招待宴会。时间是在 7 月

末，地点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在这次宴会上，斯大林讲了一些极不寻常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两句是说：

“我们两党两国兄弟之间的团结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在世，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也应该是团结的！”

他祝愿彼此在一切方面永远携手、共同前进，并争取最大的成功与胜利！他指出：世界革命中心逐步东移，将来中国在世界上是要承担更多更重要的义务的。他说：

“弟弟应该赶上兄长，学生应该超过先生！愿中国人民奋力前进，赶上和超过他的老大哥！”

第六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送别会，参加的人数不多，而且时间也比前几次短些。这次除相互讲了些惜别、祝愿的话以外，斯大林还许下诺言，可以向中国派遣中国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夕，少奇同志又应邀到斯大林居

住的孔策沃别墅。斯大林陪同少奇同志参观他自己在园里种植的蕃茄、

豆角、谷子等农作物。他指着谷子说：

“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的，由我自己栽培，等谷子成熟了拿来款待你们，多么有意思呀！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他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高高兴兴度过了几个钟头。据了解，斯大林以这样的方式接待客人是很不寻常的。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同

志是信任和尊重的，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同志的每句话，体会少奇同志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同志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经过多次会谈，少奇同志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如何

进行互助合作取得了共同的认识，也就个别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口头上的协定。

根据当时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双方初步议定，由苏方选派 200 余名各行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来中国工作。当少奇同志回国时，苏方已选好 80 余名专家，和少奇同志一起来中国。他们到达中国后，首先被安置在东北沈阳临时工作。为了使苏联专家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少奇同志做了一系列细致、具体而周到的工作。他还亲自去探望专家，了解专家的住宿条件和饮食情况。总之，他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他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十分感人的。苏联专家中也有人感动地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你们对我们这样亲热，尤其像刘少奇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关怀我们，并且一直注意我们的生活细节方面的问题，不能不使我们深受感动。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尽心努力做好工作、完成任务、做出成绩，那我们将问心有愧，不起两国的劳动人民。”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少奇同志参观过一些工厂，如

灿承滚珠厂、精密仪器厂、刃具量具厂、汽车制造厂等等。参观时，除了了解工厂的设备情况、生产情况以及工人的劳动情况、生活情况、培训情况等等之外，还仔细了解了企业行政领导、党委和工会三个方面的职权、职责、工作范围以及如何统一步调，共同保证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

在那些日子里，少奇同志还访问了全苏计划委员会、国家财经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部，着重了解经济计划工作、经营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还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列宁博物馆、列宁图书馆、莫斯科市苏维埃（即市政府）、历史博物馆、建筑材料陈列馆、煤炭工业展览馆等。此外，他还邀请苏联财经专家给代表团同志们作了有关经济问题的专题报告。总之，少奇同志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的史册将永远记载刘少奇同志的不朽功绩。

#### 1987 年 10 月毛泽东选定的第一个接班人

刘少奇第一次正式与毛泽东结交是始于安源煤矿工作时期，毛泽东当时作为中共湘区委书记常来安源视察工作。在清水塘，他与毛泽东经常接触，这是他们友谊的开始。刘少奇也是第一个向毛泽东谈及对苏联印象的留苏学生。1932 - 1934 年期间，刘少奇在闽赣边区工作期间，毛泽东曾一度从党中央被撤换下来，闲住在离瑞金西 5 里的一个山村，刘少奇曾与毛泽东在一

起。

刘少奇与毛泽东曾共同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这个“左”倾宗派小集团曾一度控制了党的领导。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均在瑞金召开，在会上，这批留苏学生不但攻击毛泽东，也指责刘少奇在“白区”的城市工会工作，给毛泽东与刘少奇都贴上“右倾分子”的标签。因而刘少奇与毛泽东站在一起于1935年举行的遵义会议上反对“留苏学生”，从而使毛泽东得以领导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在1966年10月曾作过如下回忆：

在遵义会议上，他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还是很宝贵的。洛甫（张闻天）非常顽固。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同志也是如此。

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说明对刘少奇的支持以及反对陈绍禹的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

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

自此以后，刘少奇作为城市工作的正确代表和敌占区华北组织的领导人这一地位更进一步得到肯定和改善。1940年，刘少奇向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同志作报告时说：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刘少奇1943年所写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也是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这是第一篇正式出版的提及“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随着抗日战争的即将结束，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已载入《毛泽东选集》的附录中，该文对刘少奇白区工作路线给予了肯定。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1927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1924年至1927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隐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

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的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系，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属的群众”。

三个星期以后，刘少奇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作报告，在该报告中，

他提到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不下 105 次之多。刘少奇参与起草的修改的党章中，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每一个党员都必需认真学习它。

1967 年 2 月，陈毅在一次讲话中曾声称：毛泽东思想在刘少奇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

确实是这样，如林彪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也适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提法，早在 1945 年刘的讲话中已经有了。刘在他的“七大报告”中“就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中不仅是先锋队，而且还是领导者和理论上的指导人。”刘少奇 1946 年会见路易·斯特朗的谈话中就曾指出毛泽东思想原理及其在国际上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毫无疑问是适用于各国的，但如何将这一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上来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分析了中国的具体问题，领导中国人民在他们的斗争中走向胜利，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实际问题，他是第一个在这方面作得成功的范例。”

陈毅曾说，早在 1945 年七大时，刘少奇就已被明确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从形式上来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七大中央委员会选出后，刘的选票是第三多的，因而他在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中是在毛泽东、朱德之后名列第三。但从实际领导责任来说，刘是仅次于毛泽东。1945 年 8 月，当毛泽东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时，刘在延安代理毛的职务达数月之久，同时兼任组织部长。1947 年 3 月，国民党部队迫使中共撤离延安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仍然留在陕北继续与国民党部队周旋；而刘少奇和朱德及他们率领的第二个作预备的中央委员会撤至晋、冀边区。毛泽东当时就通告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央退出边区，刘领导的委员会就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刘少奇的这个第二中央委员会一直留在石家庄地区直到 1948 年 5 月毛泽东及其率领的中央机关搬来为止。1950 年，当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刘少奇也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五次会议。1951 年 3 月，毛泽东生病时，他也将管理政府的职权交给刘少奇。

从 1945 年直到 1955 年，邓小平接替他以前，刘少奇一直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而且是主管国内的日常事务，有重要立法时，总是他出来作报告，有时还代替毛泽东参加一些礼仪活动。1950 年 6 月，他作的土地法的报告，明确了全国的阶级划分。1952 年 9 月，刘少奇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苏逗留三个多月。

1954 年他担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并就此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1956 年 9 月他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在该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负责干部应下放基层，以此作为克服党内官僚主义的方法之一。在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会上以及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都作了重要发言。为了对形势获得第一手材料，刘少奇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都在全国范围内巡视调查。

1958 年 12 月底，毛泽东为了减轻他所负担的工作，宣布要辞去政府职务后，1959 年 4 月 20 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正式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此同时，在官方正式的出版物上，刘少奇被称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1961 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勋爵，在答复他的接班人

是谁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这已明确定下来了，那就是刘少奇。

由于后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一些“左”的思想和作法有不同看法而产生了分歧，毛泽东便认为刘少奇是中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刘少奇不仅被打倒，而且被迫害致死。

## 第六章 朱德

共和国第一元帅。

### “天兵天将的后代”

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带的老人们中间，流传过一个神话故事：在远古的时候，有几位天神骑着天马路过这里，看见这一带土瘦民贫，饿殍遍野，便萌发恻隐之心，把他们随身带的粮食撒在地上，并且留下来一些天兵天将，让他们在这里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耕种。因此老人们都说，马鞍场这一带是天神关注的地方，迟早有一天会变成稻菽成山的米粮川；居住在马鞍场一带的人，大都是天兵天将的后代，迟早有一天要出能人！

1886年12月1日，朱德就出生在这里。

朱家租种着地主丁邱川家的20亩地。一家大小14口人，为了生活不得不起早贪黑，拚死拚活地干。

祖父朱邦俊是个刚正朴实的老农民，有一副健壮的身体和一双勤劳的手。老人的一生都是在田野里度过的。

祖母潘氏虽不识字，却是个有胆识、有魄力、有组织才能的人。她骨头硬，办法多，挑起全家老少十几口人的生产和生活的重担。在朱德的眼里，祖母简直是万能的，只怕天塌了她也撑得起呢。

母亲钟氏是个贤淑，宽厚的人。她健壮，每天除了下地干活之外，还要洗衣、做饭、养蚕、喂猪……她任劳任怨，和家人相处得很和睦。

母亲虽然钟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但因生育过多（一共生了13个孩子，活下来8个），再加上家务忙，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照料稍大一点的朱德。从弟弟降生，朱德就从母亲怀里下来，在土里滚，在地上爬。除吃、穿、住以外，事事都能自理。他就像琳琅山上充满生机的小松树一样，迎着阳光，泼泼辣辣地成长起来。

1911年8月，朱德从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毕业后，被分配到蔡锷领  
参加云南起义

导的新军第十九镇（师）七十四标（团）第二营左队（连）任司务长，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这年，全国革命形势十分高涨，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武装斗争此起彼伏。朱德接受云南同盟会的派遣，到新军步兵中去秘密工作。他利用四川同乡的关系和哥老会的关系为掩护，向士兵们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启发他们认识清王朝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压迫人民的反动本质，鼓动他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虽然这项工作相当危险，随时都有被杀危险。但朱德机智灵活，沉着勇敢，悄悄在士兵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喜讯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准备起义的云南革命党人。蔡锷等领导人分析了当时云南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在10月30日，（重阳节）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军浩浩荡荡地从巫家坝向省城进发，25岁的左队队长朱德，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一面快步前进，一面回头招呼部队：“跟上，不准掉队！”

躲在总督衙门里的反动总督李经羲万分惊恐，急令骑兵团阻击起义军。谁知这个骑兵团的许多军官和士兵，早就成了朱德的密友。他们不但不阻击，反而加入到朱德的队伍中来。

午夜12时，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先头部队已来到省城东南门。按照事先的秘密约定，城里的革命党人马上打开城门。这时，朱德从地上一跃而起，威严地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在城里城外一片纷乱的枪声中，起义军冲入城内。

城里到处是枪声、火光。敌人炸了营，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朱德带着部队甩开零散敌人的纠缠，直插总督衙门。

李经羲为了保住他这个最后巢穴，在衙门内外修了很多工事，并调两个营的兵力和两个机枪连守卫。朱德早就秘密结识了卫队营营长李凤楼，并通过他了解了反动当局捕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计划。现在，两军相遇，是争取卫队营的最好时机。朱德于是让士兵们向衙门里喊话：“卫队营的弟兄们，站过来吧，让我们团结携手，共同消灭李经羲！”

喊话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仍有几个李经羲的亲信想顽抗。李凤楼火了，立即下令：“把那几个家伙先抓起来！”接着，带领全营向起义军缴了械。朱德带领士兵冲到总督衙门的高墙下，迅速翻墙进去，打开大门，冲进总督府。

李经羲早已化装潜逃了。一天以后，朱德才在四堆集的一个姓肖的巡捕家里找到了他。在朱德面前，李经羲浑身直打哆嗦。朱德叫他坐在椅子上，然后告诉他不用害怕，只要他能令云南境内所有的清兵缴械投降，就可以立功自赎。李经羲无奈，只得写信给他的部下夏豹伯（任镇台）、龚心湛（任蒙自关道尹），叫他们停止抵抗，缴械投降。

于是，云南40几个清朝的边巡防营共100多人便放下了武器。几天内，云南全省兵不血刃地改换了共和旗号。

之后，朱德逐渐在云南军中得到提升，并随军转战川、滇两省。

### 拒绝了杨森的师长职位

1922年5月，朱德接到曾在云南护国军中共过事、如今已成川东大军阀的杨森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朱德“念在旧交”，到重庆“聚首”。

重庆朝天门码头。任四川督军的大军阀刘湘和任重庆警备司令、川军第二军军长的杨森，伫立在码头，迎接朱德。

当朱德踏上码头的时候，岸上的士兵和群众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刘湘、杨森走上前和朱德握手，之后把他接进一座豪华的别墅。

宴会，美酒，歌舞，……刘湘和杨森以最隆重的礼仪接待他。

朱德冷静地应付着这一切。他极少讲话，他要看看杨森请他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终于杨森说话了。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消灭熊克武的川军第一军，平定整个四川。你是威震川滇、能征善战的一员虎将。就留在我们这里干吧。”

给你个师长干，怎么样？”

朱德丝毫没有被杨森所出的“高价”所激动。

筵席散了，但谈话仍在继续。朱德冷静而委婉地说：“谢谢二位的盛情。不过我已决定出国留学。”

“什么？要出国留学？”杨森很惊愕，接着哈哈大笑起来，“你老兄怕是喝多了吧？”

“不！这是真的！”朱德严肃地说。

坐在一旁的刘湘劝他道：“仁兄已是 36 岁的人了，还留什么学？别浪费时间和金钱了。如果你是累了，何不到峨眉山去休息休息？”

朱德笑着摇摇头。

真是怪人！杨森怎么也猜不透这个十几年驰骋疆场的虎将，如今却想抛弃高官厚禄去念书。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好吧。”最后，杨森无可奈何地说：“既然老兄主意已定，我们就只好从命了。日后留学归来，小弟仍然虚席以待！”

### 孙中山要朱德回滇军工作

1922 年，朱德冲破了旧世界的樊笼，踏上新的征途，从此揭开了他生命史上崭新的一页。

6 月，朱德到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他怀着求知的欲望，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这里有高楼大厦，有琳琅满目的商店，有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还有咖啡馆和舞厅，有钱人过的是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可在贫民区里，却居住着面黄肌瘦的穷人。他还看见一群群无家可归的苦力，蜷卧在摩天大楼的阴影里。……

朱德边看边思索：看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贫穷、疾病和悲惨的结局，严重地威胁着上海的劳动人民。

“上海太烂，不成样子！”他不愿再呆下去，决定立即北上。

他到了北京，与好友孙炳文会合了。他们彻夜促膝畅谈，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来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谈到在全国各地掀起的罢工热潮，谈到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当谈到帝国主义者怎样用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和咒骂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会心地笑了。朱德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然后对孙炳文说：“如果这个党被帝国主义者用最恶毒的字眼攻击和咒骂，就正好说明这个党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从而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的。这样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党，正是咱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所要寻找的党啊！”

他们最后商议，应立即去拜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因当时陈独秀在上海。

于是他们又决定去上海。

到上海后，通过孙炳文的介绍，他们先拜会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朱德早就对孙中山先生的为人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敬佩不已，但是对他的革命策略和方法，朱德却认为是不成功的。所以，当孙中山建议他们重回滇军工作，组织驻贵滇军，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 10 万元作为整编部队的经费时，朱德却婉言谢绝了。朱德说：“我们已经决定去德国研究共产主义，研究军事学，并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结果。”

“要出国去考察？好！很好！”孙中山赞许地说：“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到

美国去留学？而偏偏去欧洲？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

这时，朱德和孙炳文十分坦率地回答了孙中山提出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美国，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援助为争取民主共和而进行斗争的人们，相反地却帮助他们的敌人。西欧各国的统治者和美国的统治者一样，都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去研究研究这个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这对我们中国也许更有好处。”

孙中山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 陈独秀拒绝了朱德的入党要求

不久，朱德和孙炳文终于在闸北区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朱德当时十分高兴，他想：这次可算找到了自己日夜向往的共产党了。

他兴致勃勃地向陈独秀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并诚恳地提出入党要求。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鼎鼎大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竟对热心革命的朱德十分冷淡。

因为朱德是一个旧军队赫赫有名的将军，陈独秀十分怀疑他要求入党的动机，陈独秀冷冷地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要时刻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人，需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感到失望，感到痛心。为什么行伍出身的人，就没有资格参加革命？

朱德和孙炳文商议，决定按原计划到德国去寻找革命真理和党的组织。

#### 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的一天，法国邮船“安得列册”号徐徐离开上海港，开始了去欧洲的航行。朱德和孙炳文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泪水夺眶而出。

邮船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孟买、科伦坡、地中海到达法国的马赛。登岸后，朱德二人立即乘火车到达巴黎。

他们在巴黎的一个中国商人家里住下来。在这里，他们得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好消息：旅欧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是大学生周恩来。听说周恩来刚离开巴黎，到德国柏林去组织新的支部。朱德十分兴奋，他和孙炳文又急忙乘火车赶到柏林。

这天傍晚，他们来到柏林康德大街周恩来住所门前。此刻，朱德的心情是既兴奋又忐忑不安。他想：周恩来会热情接待我吗？会不会对我投以怀疑的眼光？会不会因为我在旧军队中的经历而把我拒之门外呢？

门打开了。一个英姿焕发、两眼炯炯有神的青年出现在面前，并请他们进屋坐下，之后他亲切地问：“请告诉我，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朱德面对比自己年轻12岁的青年，激动地讲述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为寻找自己的新生命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来到欧洲。并恳切提出自己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表示一定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周恩来看着朱德那朴实的脸庞，侧着头，认真地听着他的讲述，不时点点头。朱德从对方亲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信任和支持。

听完朱德的叙述，周恩来十分高兴，他认为像他这样一位在推翻清王

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重大贡献，又不满社会现实，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远涉重洋，积极寻找革命真理，愿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人，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此他满腔热情地接受了朱德的要求，同意和张申府一起，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经过党组织批准，朱德于同年 11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朱德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

###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朱德回国后，担任了南昌市的公安局长。

1927 年 7 月下旬，南昌连续出现高温燥热天气。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风暴就要在这里爆发。

按照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起义的时间定在 8 月 1 日凌晨一点钟。

几天来，根据朱德提供的大量情况，前敌委员会对敌情和南昌周围的地形已了如指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各起义部队也都有了明确的分工。这些天来，朱德一方面要和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发动起义的具体事宜，另一方面还要与开进南昌的贺龙、叶挺等秘密接头，有时还要巧妙应付滇军上层人士和国民党反动当局。

前敌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分配给朱德一项重大任务，要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及声望，在起义开始时想办法麻痹和牵制敌人的指挥官。

7 月 31 日，驻扎在南昌城里的敌第二十三团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团长肖曰文以及一个姓蒋的副团长，同时收到一份印制精致的红色请柬。原来是原滇军少将旅长、现任军官教育团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邀请他们晚上去赴宴。三个人受宠若惊，顿觉身价百倍。傍晚，他们都满面春风地赶来赴会了。

朱德以消闲自若的神态，将客人们迎入大厅。大厅里，灯火通明，乐声悠扬。一张圆桌上，摆满了珍馐佳肴，玉液琼浆。朱德兴致勃勃地举杯道：“咱弟兄们十几年来东征西战，南北漂泊，难得在一起聚会。今日良辰，邀请诸位大驾光临，只是为了开怀畅饮，叙叙旧。我朱德感谢各位赏光。来！干了这杯！”

宴会从晚 6 点一直进行到 9 点，已是酒足饭饱了。朱德又邀请客人们到院里打麻将。

卢泽明高兴地说：“好啊，我的手早痒了。”

朱德为了稳住这几位客人，故意输给他们不少钱。客人们越打越不想撒手。

就在此时此刻，院子的外面，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正在加紧准备。城里已戒严，起义军总指挥已下达了“河山统一”的特殊口令。埋伏在各个指定地点的起义军战士已在臂上缠上白毛巾，电筒上贴上红十字条……一切都安排就绪。

10 点钟左右，一个滇军的副营长急忙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客人们报告说，他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解除自己所辖地区里的滇军武装，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院里的空气骤紧。大家都停下手。朱德的心里一紧，随即哈哈大笑：“谣言！纯属谣言！大家尽管打牌，不要受这些流言蜚语的干扰。”

但是，客人们无心坐下来打牌了。肖曰文坚持要回去看看，卢泽明也

如热锅上的蚂蚁般地来回踱步。朱德思索了一下，而后以惋惜的口吻说：“那只好悉听尊便，改日再会吧。”

当客人们消失在大门外，朱德马上换上军服，跃出大门，向起义军总指挥部奔去。

他向总指挥部报告说：“起义的消息已泄露，要赶快动手！”

午夜 11 时，南昌城里枪声大作，杀声四起，起义军战士从各个地方向沉睡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二十三、二十四两个主力团因失去指挥，很快就被起义军消灭。接着，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的学员们及部分警察，也投入了搜索敌人的战斗。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城里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在起义军总指挥部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的楼顶上，一面鲜艳的红旗，在晨风中猎猎飘动。它象征着南昌起义的胜利，象征着人民军队的诞生。

南昌起义胜利后，朱德被任命为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许杵从未到任）。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起义军于 8 月 3 日撤离南昌，向广东方向挺进。朱德陈毅率第九军于 9 月 20 日抵达三河坝，并在此驻守。

### 朱毛会师

1928 年春天，湖南的革命形势本来很好。但由于党湘南特委执行了乱烧乱杀的“左”的错误政策，致使一部分群众产生了恐惧心理而远离革命。加上当时粤、桂、湘的军阀混战刚结束，已达到暂时的妥协。于是便勾结起来，以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湘南实行“联合会剿”。朱德、陈毅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果断决定：除留下部分地方武装在湘南坚持斗争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4 月 25 日，朱德、陈毅率起义军和湘南的农军共 1000 余人，到达江西宁冈的砦市。

1928 年 4 月 28 日，两个伟大的人物——毛泽东和朱德在砦市的龙江书院见面了。四只扭转乾坤的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5 月 4 日，在砦市河东沙洲的广场上，门板和竹竿搭起的高大的主席台，无数面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竖立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巨幅标语。一大早，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会场。茅坪、新城、源头、柏露等地的农民群众，也举着小红旗，赶来参加大会。

不到 10 点，草坪上已坐满 2 万多人。

一会，毛泽东、朱德及其他负责人登上了主席台。全场一片掌声雷动。

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在会上宣布：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会场上扬起阵阵欢呼声。

朱德健步走到主席台前、神采飞扬地开始讲话。他强调了这次会师的重大历史意义，分析了红军发展的前途。他说：“我们胜利会师，大家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就让敌人难过去，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

毛泽东的讲话，也不时被掌声打断。他说：“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就不怕打不败敌人。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强有弱。我们要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力量狠狠地打。打胜了，就立刻分散躲到敌人的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

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

他的讲话，使大家信心倍增。

朱、毛会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军队发展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也是朱德革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此以后，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

“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1935年8月中旬，由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军左路军，按8月4日党中央在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精神，继续向北开进。

队伍在卓克基稍事休息，便进入了茫茫无际的水草地。

经过10几天的艰苦行军，部队终于来到了草地的中心地带阿坝。

按原定计划，左路军从阿坝再往东北方向走，渡过噶曲河，就可到达班佑，同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会师，再一起北上。

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权迷心窍的张国焘以噶曲河水上涨不能通过为借口，擅自下令左路军停止前进，改道南下，并命令已渡过噶曲河到达墨洼的左路军先头部队，重新渡河南下。

朱总司令与刘伯承总参谋长听到这个决定，既震惊，又气愤。他们一同去找张国焘。

朱德说：“北上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定下来的，怎么能随便推翻呢？”

刘伯承也说：“我和一些同志亲自去试过了，河虽然涨水，但有些地方河面宽，水并不深，部队渡河没问题。”

“哎呀——”张国焘很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些同志，怎么不看看实际情况呢？我们不能光听一两个人的汇报和相信两个地点的测试，就认为可以渡得了河。现在这里正是雨季，雨一下子停不了，水也不会马上退，总呆在这里是危险的。根据敌情的变化，根据天时、地利，目前已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军应回师南下的问题。”

听了张国焘的这番话，朱德和刘伯承的心情沉重起来。张国焘是仗恃自己人多枪多，一心要与党中央闹分裂，从而实现他自立为王的个人野心！

朱德的分析不错。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朱德读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是张国焘的部下联名发到党中央的，表示拥护张国焘当党中央书记及军委主席。朱德看后，很奇怪：“共产党里怎么竟会发生这样争权夺利的事？张国焘可算是第一个。”

他们更感到局势的严重。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行为，党中央多次来电对他进行了批评，并命令他立即率部北上，不得拖延。

电报一份又一份来，张国焘却都往地上一扔。

9月上旬，张国焘密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竞争”，企图危害中央。密电到了巴西，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得兴高采烈。他接过电报，顾不上细看，顺手交给身边的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看后，立即把电报装在口袋里，若无其事地走出会场，之后飞快跑到党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感到情况十分紧急，便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下来，把原件交给叶剑英，告诉他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要提高警惕。等叶剑英急速赶回会场，陈昌浩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

毛泽东带着这份密电的抄件，立即和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他们一致认为，张国焘既已背着中央，秘令要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竞争”，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不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接着，他们很快赶到三军团驻地，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致决定党中央和一、三军团连夜北上，脱离险区。

张国焘于9月15日制定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7日又悍然发布大军南下的命令，并再次电告陈昌浩于9月下旬将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从草地带回。

张国焘的一系列反党活动，遭到了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与严正斥责。显然，朱德与刘伯承已成了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巨大障碍。对此，张国焘怀恨在心，把朱德、刘伯承视为眼中钉，恨不得置他们于死地。于是，张国焘一手制造的一次次非难、一回回陷害，便向他们扑来。

在张国焘亲自组织的一次所谓“党内活动分子会议”上，张国焘的“活动分子”们讥讽、喧闹、跺脚、谩骂，拍桌子、吐口水。张国焘阴险地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任凭他的“活动分子”们歇斯底里地对朱德叫嚷：

“快说，你为什么要坚持北上？”

朱德镇静地答道：“北上的决议，我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举过手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我坚决拥护。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决议。”停一下他又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的行动应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执行。”

“行了，别说这些。我们现在要南下，你究竟支持不支持？”

“我是支持北上的。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们这样做，就是分裂党，分裂红军！”

“北上！北上！你为什么不在现在就北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这里并不需要你！”

朱德理直气壮地反驳：“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共同北上。既然你们现在不肯北上，那我只好等待。”又说：“不过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顾大局、识大体的。他们最终是会走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来的。”

这时有人大声喊叫：“你说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

“不让他当总司令！”

“住嘴！”坐在朱德旁边的刘伯承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站起来厉声喝道：“你们这是开的什么会？是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

如此一来，斗争的矛头又转向刘伯承：

“你咋唬什么，你的罪状还少么？你们当总司令、参谋长的，把几十万红军都领导到哪里去了？今天还想指挥我们，让我们跟着你们北上逃跑，我们不上这个当！”

刘伯承看朱总司令解了围，心里才平静了一点。他又劝告大家：“北上是为了抗日救国，怎么就是逃跑？川、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敌人又多，对我们十分不利。

南下是一定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的部队并没有走，你们南下，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这时，坐在一旁的张国焘，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对刘伯承大声嚷道：“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刘伯承扶扶眼镜，冷笑道：“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路线！”

不管“活动分子”们怎么骂，怎么斗，朱德始终沉着地坐在那里，时而翻书，时而静听，时而进行有力的反驳。但在北上问题上，他毫不让步。

斗争会开不下去了，张国焘只好宣布散会。

开会回来后，康克清见朱总司令一言不发，脸色阴沉，十分关切地问：“老总，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他们是不是仍要坚持南下？”

朱德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怎么办呢？”

“没别的办法，咱们只好忍辱负重，做‘牛皮糖’，用最大的耐心去做工作。”

不久，张国焘正式下达了南下命令。临行，有人还挑衅地对朱总司令说：“如果你还要北上，现在就走吧！”

朱总司令回答：“我不能走！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我是党派来做工作的。你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0月5日，左路军开始二过草地向南去。在从阿坝到松岗的路上，张国焘把朱总司令与刘总参谋长调离司令部，让他们跟前线部队一起行军、宿营，实际上是撤了他们的职。

一到卓克基，张国焘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公然成立了“中央”、“中央军委”等非法组织，并自封“主席”。为遮人耳目，还强行把朱德、刘伯承等拉入伪中央，并以“中央”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命令他们“以后不许再冒用中央的名义”，甚至悍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应撤消工作，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及党籍，下令通缉。”同时，为了欺骗舆论，张国焘还威逼朱德发表反对毛泽东及北上抗日的宣言。

朱德拒绝了他们的要挟，明确表示：“北上的决议，我是举过手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我不能反对。我只能服从一个中央，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我永远不会做墙头草。过去人们都把朱、毛当成一个人，朱怎么能反对毛呢？你们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这番话，激怒了张国焘以及张国焘的亲信打手们。有的骂朱德是“老不死”、“老顽固”；有的几次掏出枪来，但被张国焘制止。因为张国焘怕引起一场内部血战。因为这里不光有四方面军的部队，还有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一打起来，对双方均不利。

况且，把这两位云、贵、川一带名震遐迩的将领留在身边，也可与川军中的旧友通融，减少部队所遇的阻力。

之后，张国焘对朱总司令的刁难和迫害愈演愈烈。他们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攻击和排挤他：不让他听消息，不让他看文件，不让他参加会议，不让他过问事务，甚至连行动都受到限制。实际上是把朱德软禁起来了。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朱总司令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他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朱总司令的心里装着四方面军的同志。四方面军的同志也惦念着总司令。部队里很多同志不顾张国焘的监视，前去探望朱总司令，并向他传递消息，请示该如何做。朱总司令从挽救整个红军

的大局出发，置个人的荣辱度外，一再告诉部队同志：要看到革命的长远利益，服从现在领导的指挥；要搞好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不能搞分裂；要少讲空话，多做实际工作；不要鲁莽行事，……

朱总司令的指示，使大家心里豁然开朗。但大家看到朱总司令一天天消瘦下去，心里都十分难过。他们一再请求：

“总司令！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啊！”

“总司令！你有什么困难？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朱总司令微笑着回答：“谢谢同志们，我很好！我个人什么困难也没有！”稍停，他又说：“可是，红军有困难，革命有困难啊！请转告同志们，无论如何要从大局考虑，注意团结。你们当领导的，要多关心部队，体贴照顾好同志们，要团结一心，去战胜困难，最后还是会胜利的。”

但朱总司令凭着他的坚强意志和铮铮铁骨，继续与张国焘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他多次地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是横下了一条心，坚决跟党中央、毛主席走。就是套上一千条水牛，也别想把我拉回去！”

和朱总司令预料的一样，张国焘率军一到天全、芦山一带，便陷入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部队的重重包围之中。越打越残酷。尽管战士们浴血苦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接连受挫，陷入绝望的困境。在万般无奈下，张国焘才被迫决定撤出川、康边界，向西北方向的道孚、炉霍、甘孜转移。这时，部队已由 8 万多人减少到 4 万多，损失过半。

年已 50 的朱德，和战士们一样，走在风雪弥漫的险道上，他还亲手把掉进雪坑里的战士拉上来，又搀扶体弱的同志爬上很陡的山崖。

部队由于连续苦战，加上饥饿、疾病、寒冷，仍有数以万计的同志倒在风雪中。这些坚强的战士含着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遗恨，永远倒在这冰封的险谷之中……

“南下！南下！南下的结果是什么？是冻死！是饿死！是惨败！”

“张国焘呵张国焘，你可把人给害苦了！”

战士们怨声载道。

四方面军中更多的同志清醒过来。

1936 年 6 月，贺龙、任弼时等根据朱德的电令，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来到甘孜，和左路军胜利会师，并于 7 月初召开了有两军领导干部参加的甘孜会议。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加上左路军中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才只好同意北上。

部队在朱德的率领下，来到阿坝。

部队在此休整了几天，做一些思想及物质准备。临出发前，朱德把驻在杂谷脑的兵站部部长吴先恩找来，开门见山地问：

“你们兵站还有多少伤病员？”

“600 多。”

“都能带走吗？”

吴先恩说：“目前只有 100 多副担架，200 多匹驮枪枝弹药的骡马，伤病员无法全部带走。”

朱德思索一下，以商量口气问：“能不能把驮枪枝弹药的牲口都腾出来驮伤病员？”

“当然可以，但这么多枪枝怎么办？”

“带不走，统统毁掉！”

“这……”吴先恩犹豫了一下，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按四方面军的规定，枪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毁枪是要受处分的。”

“这个规定也是对的。”朱德拍着吴先恩的肩膀说：“但现在具体情况不同。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员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有了人，还愁将来没有枪？我看要人不要枪。如果受处分，我替你顶着。现在我给你下个命令：一个伤病员也不准丢下，丢了，就处分你！”

“是！我保证把伤病员都带走，一个也不丢下！”吴先恩坚定地说。

部队沿着广漠的草地继续北进。

毛泽东对朱德说：“元帅升帐了，好神气！”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总司令，朱德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

由于朱德战功卓著，1955年，毛泽东亲点他为开国第一元帅。9月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朱德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曾任中央领导人专职摄影师的侯波记录下了当时领袖与元帅之间亲密无间、赤诚相待的感人情景：

“授衔的庄严气氛到了休息室便换成了轻松愉快。毛泽东容光焕发，缓步走到元帅们面前。他忽然向前倾了身子，直视着朱德的脸，用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欢愉的口气打趣说：‘啊，元帅升帐了，好神气！’元帅们都开心地笑了。陈毅和贺龙还挺胸昂首，挥动双臂，迈着正步从他们面前走过，接受军委主席和总司令的检阅……”

“心怀叵测呀！”

从1966年起，中华大地突然卷起漫天风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街上的高音喇叭播送着林彪、江青一伙的“指示”：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人们窃窃私语。

形势继续恶化。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领导，都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站了。接着，攻击彭德怀、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师的大字报也先后出现，甚至还有要打倒周总理的大标语。

年事已高的朱德再也坐不住了。他拄着手杖，巡视在一排排大字报中间。面对那些离奇的谣言和无中生有的捏造和中伤他有时冷笑，有时愤懑。凭他丰富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他看清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居心。

“心怀叵测呀！”这是他当时常说的一句话。

他总想抽时间去同多年的老战友周恩来说说心里话。但，动乱的局面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混乱。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什么都要管，每天工作十几、二十几个小时，实在太忙、太累了，怎么好再去增加他的负担呢。

1967年1月，朱德在玉泉山小住几日后，又回到中南海的家里。一进门，只见里里外外都贴满了“打倒”、“炮轰”之类的大字报，他心里十分懊恼。但他又想：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历史是最公正的。

这天，有人告诉朱德，街上出现了攻击和诬蔑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大

军阀”、“黑司令”、“黑帮总根子”、“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并带来了一份“揪朱联络站”印发的传单，说他秘密成立了一个什么党，还在什么地方开过会，任这个党的“主席”。朱德戴上老花镜，把传单看了一遍后冷漠地笑了。

这时康克清问道：“老总，你笑什么？”

“根本没这回事，是造谣嘛！”朱德鄙夷地挥着手说：“让他们造去，将来会弄清楚的。”

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北京已成立了“揪朱兵团”，并已派出了部分“战士”到四川仪陇“造反”。

康克清不安地说：“如今，你是‘黑司令’，我是‘走资派’。今后，还会怎么样啊？”

朱德却很坦然。他很有信心地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关系。他们最了解我。”接着，他又宽慰地说：“不要紧，定的‘走资派’越多，越不是‘走资派’，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襟怀坦荡的陈毅站出来为朱德说话了：“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的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位和朱德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师，说出了全党全军的心里话！

然而，康克清多次被造反派们揪去批斗。造反派头头们嚷道：“你要老实交代你的走资派罪行！还要老实交代朱德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康克清昂起头，冷冷地回答：“我不是‘走资派’，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朱老总同毛主席是一起战斗几十年的战友，他更不会反对毛主席。”

“那你说，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山会师的？”

康克清摇摇头，说：“这不是事实，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领湘南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的。历史明摆着，不是谁想改就改得了的。”

这一回答，使得造反派们又嚷起来：“她还不老实呀！还不老实呀！”

#### 遭软禁的委员长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同时，林彪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定为接班人。江青、叶群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亲信占了半数以上。

朱德是抱病参加“九大”的。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不肯放过他，在开会期间，他们组织一帮人，多次批斗朱德，逼他作检讨。

一天，朱德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吴法宪吗？”

康克清摇摇头。

“那邱会作呢？”

康克清又摇摇头。

朱德急了，说：“你怎么会不认识邱会作？”

“我的确不认识他嘛。”康克清肯定地说。

“那你总认识李作鹏吧？”

“李——作——鹏？”康克清想了半晌，终于想起来了：“噢，就是过去在你的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

朱德“嗯”了一声。

康克清感到老总突然提到这几个人，定有原因，便追问：

“你问这几个人是什么意思？”

朱德叹口气说：“这几个人呢，都‘左’得不可收拾哟！”

“九大”后的一天，林彪死党黄永胜的秘书，在电话上传达了“首长”的一道勒令：

“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必须老实交代反党罪行！”

朱德接到这个“勒令”，冷笑着说：“不要理它！”10月18日，林彪又擅自发出所谓“第一个号令”，要把住在北京的“老机”（“机会主义者”）们，“疏散”到全国各地去。

康克清也曾怀疑地问朱老总：“是真的要打仗么？”

朱德淡淡一笑，说：“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打仗之前，总会有许多预兆。可是现在根本看不出战争的迹象嘛。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根据这一“号令”，陈毅要到石家庄，徐向前要到开封，叶剑英要到湖南，谭震林要到桂林，而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则要到广州。并且限令在10月20日之前，必须全部“疏散”完。

临离开北京，朱德身边什么人也没有。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正在被“专政”的康克清。

“康克清，你得跟我一起走啊！”

康克清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军代表要不点头，我想走也走不了啊。”

朱德拿着电话机，沉吟半晌，无可奈何地说：“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跟他们说。”

电话打通了，康克清很快回来了。

1969年10月20日，一架大型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了。朱德、董必武等被人搀扶着，走下舷梯。

迎面走过来的几个人，没有微笑，没有寒暄，只有伸过来的一只冰冷的手。

广州，朱德过去来过多次。那时，一下飞机，就有很多人笑着迎上来，热情地问候。

可是今天，他成了“大军阀”、“黑司令”、“反党分子”！

连续乘坐3个多小时的飞机，83岁的朱德已相当疲劳。

但他还不能马上去驻地休息，因为，驻地还没收拾打扫。

据说原来是准备让朱德住在广州内的珍岛宾馆的，可后来又决定：让他到从化“呆着”去吧！

在从化前后9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负责人来看望过朱德。

他已经失去了自由！他想到附近的工厂搞调查研究，但却“不行！”

他想自由地散步，但却“不准超过桥头警戒线！”

这已和软禁没有什么分别。

这样的软禁生活，一直持续到1970年8月，朱德才回到北京。

毛泽东说，朱德是红司令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投敌，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件事，使全国人民拍手称快，也使一些被林彪蒙蔽的人醒悟过来。

朱德怀着激愤的心情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当我从文件中看到林彪及其一伙妄图谋害毛主席时，我感到异常愤慨。他们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林彪这颗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了。”

从此以后，朱德的处境才开始好了些。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召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们谈话时，向阔别已久的朱德走过来。他热情地和朱德握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

听到这些话，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他太激动了。

1975年1月，康克清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回来，对朱德说：“我刚才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要把手伸到军队里去。”

朱德沉思片刻，自信地说：“你不用担心。军队里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再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让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让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们，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赞成。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 送别恩来

1976年1月8日，全国各民族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朱德斜躺在沙发上，直盯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脸上的热泪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他不断地念叨着：“恩来呢？恩来在哪里？……”

“老总！你要安静些！”

“爸爸！您有病刚好，千万可不能着急呀！”

康克清和孩子们围坐在他周围，用各种宽慰的话想使他平静下来。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人们在门外急得团团转，搓着手，流着泪。

“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你们应该了解总理伟大的一生啊！”朱德稍微平静后，向周围的人们发问。

人们频频点头，但谁也没有说话。

在54年的战斗生活中，朱德和周恩来结下了十分深厚的革命友谊。从柏林会晤到“文化大革命”时期，50多年来，他们一起挑起沉重的历史重担，一同经历过磨难和风雨。他们像手足一样，相互离不开。

1月11日上午，朱德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到北京医院，向恩来的遗体告别。一路上，他都在流泪，坐在汽车里就要脱帽。到了恩来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自己一生最亲密的战友敬礼告别，他凝神注视，迟迟不愿离开。

从医院回来，他仿佛觉得这只是一场噩梦，但又知道这是真的。

为恩来同志举行追悼会的那天，秘书来请示：“去不去参加？”

“去！当然去！”朱德毫不迟疑地回答。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汽车已在门口等候。可是因几天来寝食不安，彻夜流泪，朱德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站不起来了。“唉！去不成了！怎么对得起恩来？”他十分不安地瘫坐在沙发里。

“快把电视打开！就是坐在家，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里传来哀乐。朱德闪着泪光的眼睛，紧盯电视屏幕上那系着黑纱的灵车，经过10里长街，一路向西，向西……

然而，巨大的悲痛并没有压倒这位坚强的老人。他对周围的人们说：“总理去世，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工作。”又说：“人活着是干什么的？就是要革命，要工作，要斗争！”

### 最后时刻

1976年6月21日，朱德的病情恶化。但按原来的安排，他还要去接见一批外宾。同志们建议他休息，请中央其他首长代替接见。而他说：“这是党安排的，我怎么能够因为身体不好，就随便不去呢？”结果，他吃了药，还是去了。

6月25日，经过医生会诊，决定让他立即住院治疗。可是，在原定日程里，第二天上午还有一次接见外宾的任务。朱德坚持说：“不要紧嘛，等明天我接见完了外宾，再去医院也不晚。”

然而，第二天上午，病情突然恶化，朱德才不得不同意住院治疗。

7月1日那天，朱德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肺炎之外，又增加肠胃炎和肾病，持续高烧不退。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十分着急。可是朱德躺在病床上，还把秘书叫到跟前问：“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夜，静悄悄的。

病房里，医生、护士们忙碌了一阵之后，安静下来。朱德打过安眠针后，慢慢闭上了眼睛。他实在太疲惫了。

一直守候在病房外的康克清，隔着玻璃窗，忧郁地望着朱德那双困倦的双眼。她为他两天来总也睡不着觉而感到焦虑。几十年来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没有谁能比她更了解朱德的心思和性格。过去，他常常失眠，是因为在考虑党、国家、军队的大事。

而现在，“四人帮”把党和国家搞成了这个样子，满目疮痍，怎么能静下心来睡觉呢？

“护士同志，老总睡着了么？”康克清轻声问道。

护士轻手轻脚走到门口，笑着朝康大姐点点头。

这时，康克清回想起最近几天朱德对她说过的一些话。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里虽然出现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林彪、‘四人帮’是拉不走的。干部中，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则更是反对他们一伙的倒行逆施，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真理，不管是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对革命都要有坚定的信心。”

“……几十年来，我尽心尽力地去工作，去战斗，扪心自问，对党对人民是无愧的。

我唯一不放心的是咱们的晚辈。如果将来晚辈们的思想染上了恶习，经过多方教育，仍然不肯悔改，那你就同他们脱离亲属关系，免得他们打着招牌做坏事。我们积蓄的钱，你要全部交给党，不给子孙们留下分文……”

又经过几天的综合治疗，朱德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严重了。7月初的一天，党中央的一位负责人赶到医院看望他时，朱德连说话都很吃力了。他拉着这位同志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要抓经济！……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也只能上，不能下！……无

论如何也要把生产……搞上去！我还能做事……要工作……  
革命到底！”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的红司令朱德同志安详地睡了。

## 第七章 任弼时

被誉为党的“骆驼”，中共七大后的五大书记之一。

### 毛泽东介绍任弼时赴俄

新屋村，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一个教书先生的家里，其父任振声，得子，十分高兴，取奶名二南。

二南天资聪慧，4岁时就在父亲指导下，悬臂练写柳公权的字帖，抄写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等文。二南7岁时，辛亥革命爆发。这年，父亲送他到本乡的作民小学读书，学名叫培国。培国成绩优秀，跳班至序贤初等小学三年级。这所小学是新式教育。由其父任振声讲国文，他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讲了国耻，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讲满清政府的腐败，任培国幼小心灵里，激起了爱国之情。

1915年，任培国在序贤初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初等小学。

长沙第一师范有个学生自治会，是个传播新思想，提倡新社会的进步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讲演等活动。毛泽东就是这个自治会的成员，他经常讲演，任培国当时很喜欢听他的讲演。

一天，任培国与两个同学到学生阅报室里看报，正巧有几个学生自治会的高年级学生正谈论国家大事。任培国看见毛泽东也在其中，就上前自我介绍道：“我们是高山部的，想参加你们的活动，不知行不行？”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笑着说：“好哇，欢迎你们。”接着，毛泽东又热情地向这三位低年级同学介绍了自治会的情况，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为国争光，从此任培国便经常向毛泽东请教。

在学校，任培国还选了拳术、美术为自修科目。并结识了英语教师肖三，任培国经常得到他的教诲，受益匪浅。1920年，任培国已16岁了，再读一个学期就高中毕业，面临毕业后的出路问题。穷学生都觉前途暗淡，有的托人，有的找路。任培国当时已绘得一手好画，至少毕业后可卖画糊口。这时，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湖南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人也都去了。任培国的校友李富春也走了。一天，任培国收到李富春的来信，信中讲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要他也去。这天晚上，任培国手握着信，久久不能入睡，他很想去做勤工俭学，但他想到家中父母年迈，三个妹妹又小，不忍远离。正好他的叔父经商到长沙，知他想远涉重洋，立加劝阻。任培国，最后终于没有去成。不久，又有一批同学去了法国，任培国又心动了。

这天，任培国和同学肖劲光来到岳麓山下。任培国说：“劲光，我们国家如同一支破船，正在风浪中寻觅方向，我辈热血青年，应担此重任，岂能

把眼光放在一碗饭上？”

肖劲光说：“培国，你说的对，我辈当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

任培国说：“去法国勤工俭学已错过机会，可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到世界各地走步，古人还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呢。”

肖劲光皱眉道：“我们到哪里去呢？”

任培国眼一亮说：“咱们去找毛泽东，他是个有办法的人。”

当下，二人便找到毛泽东，把想法说了，毛泽东笑着说：“上海有一批青年要到俄国去留学，如你们愿意去，我可以写信介绍你们，和他们一起去。”任、肖二人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哇，我们一定去。法国没去成，我们去俄国。”

毛泽东又取来地图，把俄国的位置指给他们看，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还讲到了列宁。任培国与肖劲光越听越兴奋，终于下了最后决心，到俄国留学。

毛泽东见这两名青年劲头如此之足，也很高兴，立即写信和上海联系，几天之后，上海回信答复，可以启程。1926年11月，任培国与肖劲光乘江轮东下到上海，任培国到上海后，才给家中写了一封书信，但为了保密，措词很隐晦。他和肖劲光住在上海贝勒路的一家湖南人开的小旅馆。在此，他们又结识了张太雷、恽代英等革命青年。这些青年，已是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与这些人交往，使任、肖二人眼界大开。

任培国在上海做赴俄准备之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次年初春，任培国与肖劲光等青年一起，从黄埔港搭乘一艘日本客轮，前往海参崴，踏上了奔向十月革命故乡的漫漫旅途。

1926，任弼时托王一飞把未婚妻陈琼英从家乡带到了上海。他们是在患难中结下的友谊，之后他们结了婚。在此之前，有人要在上海给任弼时介绍对象，被任弼时拒绝了。

婚后，陈琼英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员，夫妻二人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

他们结婚不久，也就是1926年的10月，任弼时二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

他告别陈琼英，离开了上海。

### 与陈独秀针锋相对

任弼时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正是风云变幻之时，先是北伐军势如破竹，继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张作霖也在北方屠杀李大钊。汪精卫摆出了“十分革命”的嘴脸，在武汉大骂蒋介石，接着宁汉分裂，“马日事变”，中共召开“五大”会议，汪精卫、冯玉祥郑州会谈，冯玉祥投蒋，武汉挥师东征讨蒋，血雨腥风，笼罩着武汉上空。而中共内部对时局看法也各持己见，四分五裂。这时，任弼时回到了国内，他一到武汉，就嗅出风声不对。

这天，他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住处。

任弼时进门后，夏明翰、蔡和森、方志敏、毛泽民、毛泽东都在，正在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个个慷慨激昂，指责陈独秀要把中国共产党推向火坑。他们见任弼时进来，都起身让坐，任弼时没坐下，而把手中一张撕碎的《民国时报》往桌上一扔，满面怒容地说：“看吧，这张报纸是一个国民革命军官在大街上撕的，那军官边撕边骂，这上边登了什么？登的鄂南农

民组织农会、斗争恶霸地主的新闻，一个小小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没人撑腰，敢这么大胆吗？”这时，任弼时又把手中的一份材料往桌上一放说：“这是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致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只看了几眼，见其中提到武装斗争，当场就把它撕了。还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任弼时手指发抖地说：“难道我们就这样看着任人宰割吗？”

蔡和森为任弼时倒了碗水，任弼时喝了一口水又问：“共产国际来了指示，你们知道是什么内容吗？”

众人都说不知道。任弼时说：“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5月13日到了苏联中山大学，接见了中国学生，斯大林对蒋之举十分愤慨，他痛斥了蒋，谈了武汉政府和土地革命的问题，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发来了致中共的电报。”

蔡和森气愤地说：“既然有电报，为什么不在党内公开？”

任弼时锁着双眉说：“我去找陈独秀问个明白。”

毛泽东立即拉住他：“弼时，今天下午开党中央扩大会议，会上问吧。”

任弼时说：“也好”。

192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紧急会议，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等都来了，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时局，陈独秀先发了言。自然说要向前看，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陈独秀发言刚完，任弼时就起身问：“独秀同志，共产国际的指示，你为什么不在党内公布？”

任弼时这么一问，到会的很多人都一愣，都不知任弼时的话从何而言，吴玉章问张太雷：“共产国际来了什么指示？”

张太雷说：“我也刚听说，还不知道内容。”

这时，陈独秀的脸色，由黄变白，由白变青。而后喊道：

“任弼时，这指示不须让你知道，你不必多问！”

任弼时以极大的忍耐力克制了冲动。散会后，他仰天长叹：“如此下去，我等将无葬身之地！”

接着，任弼时参加了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之后，他先到鄂南指导鄂南农民暴动，后奔赴湖南考察秋收起义情况。任弼时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见到了彭公达、夏明翰、谢觉哉等省委领导人。任弼时主持召开了省常委会议。当时，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在长沙举行暴动，不少同志在会上摩拳擦掌，要与敌人决斗。

任弼时问道：“长沙城内有敌多少？”

有人粗算了一下，说：“9000。”

任弼时又问：“枪支呢？”

答：“7000多。”

问：“我们的队伍呢？”

答：“有3000多。”

实际上3000名战士中，包括起义后拉过来的2000名，实际只有1000多。任弼时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

有人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啊。”

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

#### 第一次被捕

就在这时，任弼时被调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不久，他又以党中

央特派员的身份，派到安徽省检查工作。

此时，安徽党的工作已遭到了很大破坏，恢复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刻不容缓。这天，任弼时按约来到南陵县公园开会，他穿着件长衫，戴着眼镜，脚踏一双平底布鞋，手里拿着一本书，就像读书的大学生一样，任弼时坐在一个亭子里，读起书来。一本《论语》读完了，还不见约的人来。任弼时正在想为什么之时，见几个人走进园里，边走边四下张望，任弼时一见，知道不妙，正想起身要走，还没抬腿，两个人来到他面前，他们 30 多岁，青布裤儿，两袖口儿露着半截白边儿，任弼时一看断定不是个好人，又要走，一人把两臂一伸，笑道：“先生再坐会儿罢，干么忙着走哇，你看这古亭子多好哇。”

任弼时说：“古亭再好，也不是久居之地呀。”说着就往外走。

那人笑道：“你等的同志没来，怎么就走了呢？”

任弼时一听，心头一跳，暗道：这人说的话，分明来者不善。但他镇定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取出一支香烟，在手指盖上戳了戳，吸着后，说：

“什么意思？你很清楚。”

任弼时把身子一转，再走，那人又到了任弼时面前，说：“怎么，想走，走不了啦。”

警备司令部的板凳等着你去坐呢。”

说着，露出腰中手枪。

这时，从树丛之中，又钻出几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任弼时心里明白，出了叛徒了。

他愤怒地对眼前这人道：“你们要干什么？”

一个斜眼子的说：“把他扣起来，少跟他罗嗦。”

斜眼子话音没落，过来两个人，抖开手中链子，将任弼时锁上：“朋友，没说的，跟我们走一趟吧。”说着，把任弼时带出公园。

往公园外走的时候，任弼时看到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些是他不认识的人。他暗想：敌人为什么要抓许多普通老百姓呢？一定是情报不确凿，捕风捉影。想到此，他暗自拿了主意：决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任弼时等被捕后在南陵县被关了一夜，第二天，又被押到了安庆警备司令部。从南陵到安庆要走水路。为防止他们逃跑，便将他们放在船头，那些乘客听说船上押了“赤脑党”，都过来看热闹。

押在船头的任弼时无意抬头一看，看见一张熟面孔，再定睛一看，认出他是家乡的彭佑亭。彭佑亭也看到了任弼时，正要说话，任弼时一使眼色，彭就不开口了。这时，过来个持枪的士兵，对围观的众旅客说：“都走，都走！几个红脑壳，有什么好看的！”

任弼时见彭佑亭要离开，大声喊道：“我不是红脑壳，我叫胡文甫！”

士兵回身冲任弼时喊道：“喊什么？再喊老子枪毙了你！”

任弼时又继续大声喊：“谁不知我胡文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我是来买货的，不信你们去问我媳妇，她叫陈琮英，在上海霞飞路 276 号，她在工厂做工。”

任弼时这是给彭佑亭递话，暗说，你快去告诉我爱人，让她去保我，我现在叫胡文甫，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

船到了安庆码头后，任弼时一行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彭佑亭看准后，

急忙奔向上海。

任弼时被押到安庆警备司令部后，立即受审，一个小个子军官恶狠狠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任弼时不慌不忙地答：“胡文甫。”

小个子瞪着眼继续问：“哪里人，做什么的，老实交待，胆敢胡说，老子撕烂你的嘴。”

任弼时说：“长沙陈岳云纸铺的学徒工。”

小个子又问：“到南陵县做什么？”

任弼时依然不慌不忙地答：“替老板买货。”

小个子眼珠子转了转、又问：“既然买货，为什么又去公园开会？”

任弼时装做糊涂的样子说：“我到公园是玩儿的。”小个子哼一声说：“看来不动刑你是不招的。”说着上前，打了任弼时几个耳光，打得任弼时嘴角流血，而后，小个子问道：“到哪家货店买货？”

任弼时装做害怕的样子，哭着说：“我还没去买呢，就被你们抓来了。”

小个子见任弼时对答如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个帮审，在小个子耳边嘀咕，说共产党不狠打不行。小个子点点头。

当下，小个子令人将任弼时上大刑，先是跪铁链子，接着压杠子、顶砖头。任弼时被折腾了一天，已遍体鳞伤，可他心里明白，只要不改口供，敌人就发现不了自己的身份。

彭佑亭来到上海，在霞飞路 276 号找到陈琮英，把任弼时被捕和在船上偶遇的情况讲了一遍，陈琮英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她抱起小女儿苏明，来到上海党组织所在地，向党组织做了汇报，接着又准备去长沙。当她到上海火车站时，火车刚开走。陈琮英咬咬牙，爬上一辆敞棚的运煤车。母子俩冒着长夜寒风，赶到长沙，找到了五哥陈岳云。陈在长沙开了一个纸铺。陈琮英把任弼时被捕和任弼时捎的话说了一遍。兄妹俩研究一番，统一了口径。陈琮英返回上海，将情况报告了党组织。几天后，一个姓何的律师从长沙来到安庆。他买通警备司令部的人，把案子从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庆法院，之后，何律师又把几卷光洋暗中递过去，法院假模假样的过了堂，便把任弼时放了。

这个何律师是党组织派去的人。当任弼时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到了上海家时，陈琮英一下扑在他身上痛哭。任弼时四下看看，问：“我那爱女苏明呢？”

陈琮英哭的更厉害了，她哭着告诉他，他们的女儿小苏明，在随陈琮英去长沙时，坐运煤火车受风寒得了重病，几天前已死去了。任弼时一听，好一阵才悲痛地说：“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 第二次被捕

任弼时出狱后，中共中央安排他做巡视工作，并安排他任江苏省委常委。这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由彭湃负责抓军事工作，斗争很复杂，当时陈独秀与苏联托派联系在一起，在党内，彭述之、江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和陈独秀一起向党攻击，任弼时与李维汉、彭湃等与这些托派进行了斗争，最后，省委在 1929 年做出决议，将彭、江、马、蔡四人开除出党。

一天晚上，任弼时和陈琮英一起刻印文件，忽听门响，从敲门声断定是自己人，任弼时开门后，进来的果然是从浦东回来的交通员，不久前，浦东曾举行了一次暴动，结果失败。

任弼时忙问交通员：“那情况怎样？”

交通员说：“浦东来了人。他们准备再大干一场，举行新的暴动。”

任弼时让交通员坐下，认真地听了交通员介绍的情况，后说：“还有吗？”

交通员搔搔头皮说：“就这么多，只要省委点头，那里就动手，工人们劲头很足。”

任弼时没说什么，吸着烟，在屋里走了一阵，突然问：

“浦东来的同志住在哪里？”

交通员一听，立时明白，任弼时要亲自找浦东来人了解情况，他忙说：“这，你不能去，那里不安全。”

任弼时已起身穿上了大衣，说：“亲自谈谈，情况更熟，决心才好下呀。”

任弼时便同交通员一起出门，来到了浦东区负责人刘晓住的旅馆。

这天晚上，在刘晓屋中，任弼时与他一直谈到深夜，任弼时全面了解了浦东的情况后，认为目前进行武装暴动条件不成熟，决定取消暴动计划。

刘晓大吃一惊，说：“弼时同志，……”

任弼时看着刘晓，语重心长地说：“刘晓同志，我们都是负责同志，任何一个决定，都牵涉到好多同志的性命啊。”

刘晓紧握住任弼时的手说：“弼时同志，你的话我明白了。”

任弼时回到家里，已深夜两点过。陈琮英还没休息。见任弼时回来，她一边帮他脱大衣一边说：“弼时，今晚的行动，你太冒险了。”

任弼时说：“为了同志们少流血，我只得冒险哪。我们党内好多好同志牺牲了，都是因为一些领导不负责任地乱下决心所致。”

9月的一天早上，那雨越下越大，街里的水几乎成了河。吃过早饭，任弼时对陈琮英说：“12点回来吃午饭，下午还要参加一个会。”说完，就冒雨出了家门。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到街上买了10个铜板的面，又买了2个铜板的雪里红，回到家里，做起午饭，午饭做好了，12点，任弼时没回来，下午1点、2点、3点……到次日清晨，任弼时也没回来，陈琮英十分焦急，猜想凶多吉少。他忙到江苏省委书记罗迈同志那里打听消息。才知道任弼时又被捕了，陈琮英一听，差点儿栽倒地上。

任弼时冒雨到开会地点后，刚把门推开一半，见院里的陌生人探头探脑，他便感到情况不对，刚要转身，这时，两个满脸横肉的大汉，将他双膀拧住。两个大汉把他推到院内一间房中，房子里有个女同志，任弼时认识，这是房东，也是中央机关内负责联络的同志，敌人指着任弼时，问那女同志认不认识他。女同志摇头说：“不认识。”

任弼时也说自己走错了门。正在这时，女同志身边的三岁小孩子见到任弼时，立即跑过去，抱住任弼时的腿，喊：

“任伯伯。”

敌人一见此情，立即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任弼时趁敌人不备，把衣袋中一页秘密文件吞进肚内。

这次抓任弼时的，是英租界的巡捕房。英巡捕把他押到西牢后，进行搜身，结果，只搜出一张月票，月票上有任弼时的照片和详细地址，敌人拿照片与任弼时对照一下，果然不差。又按照月票上提供的地址去核查门牌号码，根本没这所房屋，如此，任弼时的身份更引起敌人的怀疑，敌人立即用

严刑拷打他，问他是什么人。任弼时说：“我叫胡长吉，从湖南来上海做生意的。”

一个洋巡捕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问：“家住上海哪里？”

任弼时说：“生意人，行踪不定，住处不定。”

没等他说完，几个耳光已打了过来。打完后，几个洋巡捕又举鞭子向任弼时身上乱抽，任弼时因刚出狱不久，身体还很虚弱，又发着高烧，他眼前不由一阵发昏，但他咬定牙关，再不开口。巡捕们又用绳子将他口勒开，面对敌人暴行，任弼时十分愤怒，当一个巡捕举起皮鞭朝他身上抽打之时，他猛地扬起手臂朝那巡捕胳膊打去，鞭子一下打到站立一旁的法官身上。这样一来，敌人激怒了，皮鞭、电刑一起上，任弼时昏了过去。

法官又令人取来冷水，将任弼时浇醒。任弼时刚睁眼，法官又问他口供。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姓胡名长吉，湖南人，来上海做桐油生意。法官又令人用电刑。当巡警们把任弼时的手脚和后背都绑好导线，大鼻子黄头发的法官合上电闸，任弼时周身肌肉都跳动起来，像有无数钢针在刺，他脑壳发胀，眼球外突，天旋地转，……但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抵住了酷刑。法官见任弼时仍不说，立时加大电流，直到任弼时又昏死过去，待任弼时苏醒后，敌人又再用电刑，使他再次昏厥。如此反复用刑，两个电极把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

无论敌人怎样用刑，任弼时就是不改口供，敌人无奈，只好将他投入监狱。

任弼时被捕的消息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周恩来指示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组织营救，陈赓立即通过关系，探明案情，陈赓找到陈琼英，把组织要他营救的话告诉了她，并要陈琼英配合营救。陈琼英含泪道：“陈赓同志，该怎么办，你就说吧，为了救弼时，我入刀山火海都行。”

陈赓说：“敌人现在还没抓到弼时的任何证据，特科在德培里给你找了间房子，在那里住了一个姓杜的老太太，待有人来查问时，老太太权做你的女佣人，你是闻讯从湖南长沙来这里救夫的。”

陈琼英点点头。立即与陈赓来到德培里，陈琼英与杜老太太接上了头。杜老太太也是革命的老妈妈。她对陈琼英说：“孩子，放心吧，他们特科的同志本事大，准能救出弼时。”

陈琼英说：“这我知道。”

陈赓又通过关系把外面情况告诉任弼时，之后，让陈琼英出面，在巡捕房上下打点，因使了钱，加之巡捕们也没抓到任弼时的任何口供及证据，对任弼时的审问也放松了。

但也不放过他，只把他关在牢里。陈赓又去找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杨登瀛当时已完全热心为中共服务，他听了陈赓介绍的情况后，当天便在英租界一家大酒楼摆了一桌盛宴，宴请英巡捕房的头子兰普逊。席间，杨登瀛说：“我有个亲戚从湖南来上海做买卖，被你们的手下关进了监牢。”

兰普逊与杨登瀛过从甚密，听了杨的话后，说：“是你的亲戚，好说，回头把他放了就是。”

酒席宴摆的第三天，任弼时被放了出来，当他与陈琼英见面时，已形同两人，只见他面容憔悴，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后背被电击成的洞，用手一按，冒着黑血水，陈琼英抱住任弼时，泪珠儿不由得滚了下来。

任弼时的“童养媳”

任弼时与陈琼英的姻缘可谓“父母之命”，也算娃娃亲，但陈琼英却非一般童养媳。

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与原配夫人陈氏感情很好，不幸陈氏婚后一年即逝。为了维持和陈家的亲戚关系，任振声和陈氏的兄弟定下了后一辈的秦晋之好。1914年，陈琼英12岁便来到任家当童养媳，这一年任弼时才10岁。任弼时聪明睿智，知书达理；陈琼英性情谦和，朴实淳厚。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处十分融洽。

1915年夏，任弼时考入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师资优良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读书。不久，陈琼英也到长沙北门外一个小袜厂当童工。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任弼时就去看望陈琼英。陈琼英总是尽力弄一点好吃的饭菜给任弼时。

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任家的生活十分清苦。父亲教书失业，母亲虽然拼命纺线种菜，仍然难以维持家中的各种开支，任弼时的学费已成家中极大的经济负担。每一次开学时，母亲只能交给他一吊钱，合1000个小铜钱。善良的母亲知道，一个学期的书费、学杂用费，远远不是1000个铜钱所能支付的，但她再也没有办法给儿子筹集更多的钱了。

任弼时经济上的这种窘迫，瞒不过陈琼英的眼睛。为了资助任弼时完成学业，陈琼英把每月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工钱，省吃俭用，一个一个铜板积攒起来，悄悄地交给任弼时，并低声说：“给你读书用吧。”这使任弼时非常感动。

任弼时与陈琼英的感情正是在这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患难之中缔结起来的。

1921年，任弼时告别了陈琼英，长途跋涉，去苏俄留学。在莫斯科，任弼时经常写信给陈琼英。但陈琼英因母亲早逝，父亲长年在外谋生，因而没有机会踏进学校，任弼时的来信她看不懂，只得求助别人。

陈琼英是个倔强的姑娘，她不愿意这样长期求人念信，更不愿他的来信让别的姑娘读到；同时也为了自己将来更配得上任弼时的这个文化，加之任弼时赴莫行前给父亲的家书中曾特写道：“仪芳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任家也积极筹划，终于让陈琼英上了自治职业学校。上午她在校学习，下午去工厂上班，风雨无阻，天天如此。紧张的生活使陈琼英疲惫、消瘦，但却磨练得她精神充实，意志坚强。她日夜思念、惦记着任弼时。就这样熬过了4个春秋。

1924年8月，任弼时返回祖国，即刻投入了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到上海大学教授俄文，向青年学生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决定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请他为创刊不久的《中国青年》写文章，在青年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上海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方，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十分恶劣。特别是“五卅惨案”发生以后，革命者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没有家属的男同志处境更是艰难。因此，1926年，党组织决定把陈琼英接到上海掩护任弼时工作。

任弼时原本打算亲自回乡看望母亲，接陈琼英到上海。船票买好了，行李也搬到船上了，但突然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到北京开会。他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马上把行李搬到另一只船上，到北京去了。等任弼时从

北京回来，组织上已托王一飞把陈琼英从长沙接到了上海。望着陈琼英，任弼时抑制不住内心的阵阵喜悦。

这已是 1926 年春了。自从 1920 年夏任弼时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留学始，他们一别已近 6 年。当年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成长为机敏持重的青年革命者；当年袜厂的小童工，也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花花绿绿的上海，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它迎接陈琼英的是神秘和陌生。不同变化各种色彩的霓虹灯，眨动幽深的眼睛，耸峙拥挤的高楼大厦，直向云空，密密麻麻的街巷，则如同大山里的深谷。这一切，她都看不习惯。尤其使她不习惯的，是那些打扮时髦的绅士淑女们，总是向她投来冰冷的目光，讥笑她这个土里土气的外乡人，使她感到如同芒刺在背，鱼鲠在喉。任弼时知道了陈琼英这些烦恼之后，就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斗争的。你也要学会斗争。”望着任弼时坚毅的面孔，陈琼英心里热乎乎的，她低沉而坚定地表示：“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学会斗争，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是年 4 月初，任弼时和陈琼英在上海结婚。这颗在贫困土壤里播下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开花了。婚礼，没有豪华的摆设，没有丰盛的酒宴。新房，仍是原来任弼时住的亭子间，没有增加一件东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破书架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在这里，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也是一个战斗的据点。

就在他们婚后不久，北伐战争开始了。任弼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北伐军，并领导上海的青年工人、学生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非常紧张繁忙。任弼时有时把胡子蓄得很长，有时又刮得精光，有时穿长袍，有时又换上学生装，以迷惑敌人的侦探。陈琼英担任了党的秘密交通，并兼搞油印，工作也很忙。但她还是尽力从生活上关心照顾任弼时。有时，任弼时要忙到天快亮时才回家，陈琼英就一直等着，只要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便马上高兴地去开门，并张罗着给任弼时做饭。但任弼时总是不让她弄，自己倒一杯开水，咕噜咕噜喝下肚去，然后倒床就睡。还没睡上两三个小时，窗外放明，他又一弹而起，披衣出门。

看着任弼时披上旧棉袍，咬着冷大饼，将几张报纸插进口袋，急匆匆地向门外走去，消失在刺骨寒风中的街道拐弯处，陈琼英总是久久地倚在门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感动。

任弼时第二次出狱之后，组织上考虑他已两次被捕，如果再被抓去，可就难办了，因此不适宜再在上海工作，于是决定让他到武汉去，担任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

当时的武汉，也和上海一样，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年来，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组织和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著名的革命家夏明翰、向警予等都先后在这里牺牲了。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有先烈们的鲜血！还有许多同志失去了联系。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而叛徒、特务的活动却日益猖狂，街头巷尾到处贴有政府的“通缉令”，车站码头经常有鬼头鬼脑的便衣特务出没。

任弼时化装成画师，提着小皮箱，泰然自若地走上人声嘈杂的汉口码头。前来迎接的同志把他们领到党组织的秘密处所——中山路一家西药店的楼上。药铺主人叫贺诚，他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部门的负责人。

同志们本来给任弼时和陈琼英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找到了一个住处。但任弼时认为：那里倒不一定安全，还是钻到敌人鼻子下面去，在人多

的地方找个住处，可能更便于隐蔽。于是，法租界附近的一条热闹街上，出现了一家画像馆。任弼时住在这里一个小楼的楼下。房东很快发现，这个画像馆很奇怪，既不画像，也不挂牌子，好像根本不准备接待来画像的人，所以生意很冷落。

的确是这样。任弼时的心思根本就不在画像上。他经常到中山路党组织的秘密处所，向大家介绍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一起研究怎样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新的工作。当时，李立三领导的中央强令举行全国总暴动，确定南方由李富春负责，长江一带由任弼时负责，准备实现红军会师武汉。面对这样的指示，任弼时心情沉重，疑虑很多。他在这间小楼上，和同来负责长江局军事工作的关向应一起研究怎样对待中央的指示，要求大家对反对派决不让步，但是也不要轻易举行罢工等斗争，要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要注意观察形势的变化，善于应付复杂险恶的环境，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要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顺利地开展工作。任弼时十分紧张而忙碌，几乎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因此，墙上挂了几幅画像，他画的一幅未完成的人像，一直放在桌子上。每天，陈琮英扫去上面的灰尘，可就是没有把它画完。有一天，房东又看到陈琮英在清扫，就忍不住地问：“为什么不挂出个招牌来？你们还怕招引顾客呀？”“我们才学画，画得还不太好，想过一个时候再挂牌创号，免得先把坏名声传出去，影响以后的生意。”陈琮英机灵地做了解释，房东“哦”

了一声，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几年来的秘密工作，锻炼了陈琮英。这位童工出身的女共产党员，从自己丈夫的身上学到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学到了大胆、沉着的工作作风，也学到了高度的警惕性。有足够的警惕，才有可靠的安全。因此，房东无意间说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等任弼时回家时，她就把房东的话和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妻子的话，引起了任弼时的深思。他用手抚摸着那张未完成的人像画，想了很多很多。苏区来的一位同志被捕，帅孟奇、贺诚失去音讯，还有一些同志被捕、被杀害……而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央却要进行总暴动，这不是白白断送革命力量吗？他考虑了一会儿说：“看来，如果长期不开业，就会引起特务暗探的注意。那咱们就把牌子挂出去吧。”陈琮英点了点头，但又不无担心地问：“如果真的来很多画像的人，怎么办？”“那你就大大地要价，他们就不会画了。”

这办法很灵。画像馆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之后，果然有不少人前来画像。还有人来洽谈业务。陈琮英一方面热情接待，一方面漫天要价，把来的人又一一打发走了。而任弼时，又以全部身心投入了党的工作。就这样，不但党的组织很快恢复起来，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奇怪的画像馆，在敌人眼皮底下的闹市区，居然安然无恙。

陈琮英伴随任弼时走完了一生的革命岁月。

### 率“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

早在1930年8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4次讨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那时，任弼时被指定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之一。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的小布正式成立，任弼时是9名成员之一，但他仍在上海。当时在苏区中央局工作的，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3人。

直到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对于苏区中央局已正式成立一事尚未得到

正式报告。2月6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增派王稼祥去中央苏区，以加强理论宣传工作，得到同意。在会上还决定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4人为常委、项英为代理书记，任弼时管组织，王稼祥管宣传，毛泽东管军事。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派顾作霖为团中央代表去苏区中央局工作，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提议，第一批去苏区的同志应成为政治局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此议获通过。于是，便有了“中央代表团”。

这时，赣西南苏区发生了“富田事变”。为处理“富田事变”，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中央代表团前往“全盘解决”，并委托任弼时代表中央起草一信。2月23日，任弼时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的信件发出。信中告知：中央已决定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变”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未到以前，从总前委起直到各地支部，所有组织立即停止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正式决定，“中央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并立即动身前往苏区。

中央当时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赋予如下使命：一是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二是建立和健全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机构，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三是全权调查处理“富田事变”。四是协助苏区中央局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除筹备召开“一苏大会”一项外，其余几项很快完成。从1931年5月开始，任弼时等不再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开展工作，而是参予苏区中央局正常的领导活动。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各苏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代表中央，并明确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

于是，苏区中央局与“中央代表团”职能合而为一。

#### 支持毛泽东的工作

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上，任弼时等人尽管执行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及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但客观上全力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

在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训的决议》里，任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工作路线，给予了肯定。

并对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工作，给予了诸多批评。

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曾山等5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后，苏区中央局于同年4月、7月和10月，先后3次报请中央批准。中央后来虽没同意，但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任弼时等人的支持。

在军事上，任弼时、王稼祥等人支持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主张。1931年3、4月间，苏区中央局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发生激烈争论。经过半月的争论，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任弼时也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给予积极支持。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说到这段历史时，说：“在当时，我们感觉到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又说：“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

难的。”5月24日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之中，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由毛泽东任临时总前委书记，负责领导战争和前方所有工作，而项英、任弼时等中央局其他成员则留于后方工作。6月中旬，又由毛泽东接替项英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改任副主席，于是，就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这个决定，也是得到任弼时等人支持的结果。

任弼时等人提出“以毛代项”的主张，支持毛泽东代替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0月下旬，临时中央复电同意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在土地改革政策方面，任弼时支持毛泽东关于“按人口平分”的主张。当时毛泽东关于土地斗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张，被临时中央指责为“富农路线”加以批判。但无论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还是在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任弼时都支持毛泽东“按人口平分”的主张。直到1931年10月31日苏区中央局在复临时中央的电报中，仍认为“分配土地决定以人口为标准，遂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中农贫农的利益”。

#### 调任湘赣省委书记

此时，一件意外的打击向任弼时袭来。陈琼英在上海被捕。就在任弼时3月离开上海一个星期，陈琼英生下女儿任远志。6月，因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陈琼英抱着襁褓中的孩子，被关进了潮湿阴暗的牢房。

消息从上海传到中央苏区。同志们都为陈琼英和孩子担心，也为弼时担心。

12月，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特地来看望弼时，他关切地问：“琼英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任弼时摇摇头，说：“不要紧，她会经得起考验的。”

周恩来信任地点了点头，并再次和上海党组织联系，指示中央特科尽快设法营救。

1932年初，上海方面来信了。报告了一个好消息，经党组织的多方营救，陈琼英和孩子已安全出狱。周恩来十分高兴地说：好！让她马上到中央苏区来！接着，他又指示给陈琼英发电报。陈琼英接到电报，把孩子送回老家，只身来到中央苏区。

陈琼英到达中央苏区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她的工作和生活，说：陈琼英同志是可靠的，安排作机要工作吧！

这时，任弼时与周恩来同住在长汀的一座小楼里。周恩来一有空就来看望任弼时与陈琼英，任弼时十分感动。他对陈琼英说：“这是到了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要加倍努力工作和学习。”

不久，原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搬进江西苏区，“左”倾路线在苏区占统治地位。

1933年5月，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任弼时执行政策不力，免去了他的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便派他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 为革命保存了伟大力量

1934年7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指导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完全陷入被动困境。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军事顾

问李德，处在彷徨中：既想作战略转移，又命令中央红军继续与敌人拚消耗，企图守住苏区。在此情况下，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的任弼时，受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同在黔东活动的红三军联系，以共同北上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

按中央中共、中革军委 7 月 23 日《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任弼时任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红六军团领导人、军政委员会委员萧克、王震一起，领导湘赣苏区广大军民进行转移准备。8 月 7 日，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开始突围西征，连续行军作战近 80 天，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敌境 500 多里，突破数倍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重重困难，于 10 月 24 日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和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

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时，中央红军已开始战略转移，红四方面军刚结束艰苦的反“六路围攻”，又准备应付敌人的“川陕会剿”。

任弼时纵观战争全局，十分明确自己所处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说：“在配合各方的作战当中，我二、六军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两军会师的实力共 7000 多人，又处在不巩固的黔东苏区，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任弼时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他知道，首先必须搞好两军的团结与统一。在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上，任弼时宣读了中央贺电，并作了当时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还特意把贺龙介绍给六军团指战员，他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对贺龙的推崇之意溢于言表，为加强两军团结作出了表率。之后，中革军委任命贺龙、任弼时为红二军团军政首长，统一领导二、六军团，始终强调两个军团的团结。正如贺龙评价的，“二、六军团会师是好的，可说是全军会师的模范。”

当时中革军委一再指示两军团分开行动，但任弼时等总观当前形势，一致赞同贺龙的主张，两个军团暂集中行动，发动湘西攻势，这一正确决策，对之后二、六军团胜利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彻底纠正夏曦错误方面，任弼时起了很大作用。夏曦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往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兼任红三军政治委员。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政策，在对敌斗争、红军建设、根据地建设、肃反等方面，都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使红三军实力锐减，濒临绝境。贺龙曾描绘两军会师时的红三军：“那时，红三军的情况如同东北流亡歌曲一样，苏区丢光了，干部杀完了，只剩四个党员，其余都不是党员，是党员也不敢承认是党员，好像一个小孩，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贺龙等很多干部曾与夏曦作过多次斗争，但夏曦是中央代表又不认错，与党中央也失去联络，无力解决。任弼时知道这些情况后，即以高度责任感，大力支持纠正夏曦错误。

在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占领永顺后，任弼时先后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及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逐步深入地批评纠正夏曦错误，进一步加强了红二军团建设，任弼时还与萧克、王震联名向党中央及军委系统报告了夏曦的错误，“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肖、任副之。”肯定红二军团成绩，指明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任务。1934 年 11 月 16 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又一次指出夏曦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决定创立湘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夏、

关、肖、王等为委员……组织黔川湘边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由贺、任兼任。”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和军委，决定组织湘鄂川黔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贺龙任主席，任弼时等任委员。这对贺龙等的正确意见，是极大的支持，同时为两军团共同行动确立了正确领导。

1934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央红军处在湘江战役前后的严重困难时期。红二、六军团向湘西发起攻势，首战龙家寨，歼敌两个旅大部，威胁湘敌侧背；继沿沅江东下，占桃源，围常德，又击溃敌军3个团，震动长沙。何键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并急令“追剿”中央红军的湘军第十九、第六十二、第十六师兼程回援常、桃，在江西的敌军第二十六师亦奉令驰援常德；鄂湘川边区“剿共”总司令徐源泉为求自保，不顾蒋介石要他率部入川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指令，将3个师另2个旅陈兵于湘鄂边。二、六军团的行动，“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的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野战军的行动。”

红二、六军团湘西攻势，共击溃、歼灭敌军近20个团，恢复与开辟约2.5万平方公里地区，奠定了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基础。面对敌人将临的大规模“围剿”，任弼时在省委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反“围剿”动员报告。说：各个战线都是在军委统一意志之下互相配合、呼应的进行战斗，每一战线的胜利或失败都会影响整个战局。“我们这块苏区在整个战线上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靠近反动中心的武汉和长沙，是整个战线上一个前进阵地，同时又是在进攻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主要敌人的侧后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这个新阵地，迅速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举进攻……牵制、分散敌人的后方，来动摇敌人的整个阵势，直接帮助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迅速取得决战的胜利。”

1935年2月至8月，任弼时、贺龙等领导湘鄂川黔苏区军民进行了曲折的反“围剿”斗争。作战初期，因采取等待敌人前进，从正面迎击，和对敌估计上的错误，没能大量歼敌及阻止敌人进攻，陷入被动。红二、六军团在准备撤出苏区转移时，贺龙、任弼时抓住有利战机，取得陈家河——桃子溪战役的胜利，歼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及3个团，迅速扭转局势，转入反攻。接连取得忠堡、板栗园、芭蕉寨等重要战斗胜利，至8月完全打破敌人的“围剿”，并东进到石门、临澧、澧州、津市等既富庶又重要的战略地区。

红二、六军团在半年多反“围剿”中，吸引敌军81个团到自己周围，与10倍于己的强大敌人艰苦战斗，先后击败敌军70余团，毙伤俘战约2万，缴枪近万，扩大新战士达8000人。任弼时在阐述这次反“围剿”胜利的意义时说：“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但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

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1935年，留在长沙以南的红2、6军团与党中央失去通讯联络。因任弼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更不知与2、6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由张国焘携带。1935年12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其中在军事战略决议案第17条提出，要尽快“完成与2、6军团的通讯联络”。

1936年1月，2、6军团在一次与四方面军通报中突然听到一个不知呼号、不知所属的电台呼叫2、6军团，经询问，才知是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亲自上机呼叫，才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络。但因没密码本，中央发来的第一份电报用的是明码，大意是：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留老四处……弟豪。这是曾化名伍豪的周恩来发给任弼时的一份简短明码电报，说明中央已到陕北，与原2、6军团联络的密码本留在红四方面军。

1936年9月29日，三大主力将会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红二方面军：“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 在莫斯科协助周恩来工作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苏维埃革命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曾给予高度评价，但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及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也不甚了了。193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延安，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任弼时先后两次以书面及口头补充形式，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几个月来发动群众，配合友军，采用敌后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和方法，英勇御敌的历程，又向各国兄弟党及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

共产国际听取了任弼时的报告，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说毛泽东领导八路军联蒋抗日的新政策是“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8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治疗效果不佳，中共中央决定让他赴苏医治。9月，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分别一年多，任弼时和周恩来异国相逢。周恩来一见弼时，便大步迎上前紧紧拥抱，连声问好。这时，任弼时先注意到的是周恩来负伤的右臂。

“很痛吗？”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伤势。

“没什么关系。”周恩来笑着说。

任弼时亲自替战友联系医院，安排治疗，并要周恩来好好养病。但周恩来不愿整天躺在床上。住院期间，他仍和弼时一起工作。他们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因缺乏技术和教员，教学难以进行，要求帮助解决。

12月下旬，周恩来出院，当即全力以赴投入工作，29日，为共产国际撰写的长达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接着，在任弼时的荐请下向共产国际介绍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及其他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此期间，任弼时和周恩来分工合作，一边与驻共产国际各国代表团联系，让他们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争取援助，一边开始作回国准备。

因任弼时身份特殊，回国途中怕出意外，便决定：凡秘密文件、甚至弼时本人的东西都交周恩来携带，周恩来在国共合作中有公开的社会身份，不怕纠缠。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任弼时负责的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讯密码等，都由周恩来带在身上。

1940年2月25日，任弼时、周恩来、陈琼英、邓颖超等一行9人，乘

火车离开莫斯科到苏联阿拉木图，转乘飞机回到祖国。

和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中央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任远远在纪念父亲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41年父亲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先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父亲几次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提出必须马上纠正，后来，毛主席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使整风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44年父亲明确阐明了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

“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看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

“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

1944年受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委托，父亲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父亲以全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

历史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个集体领导下所取得的。1950年，毛泽东主席回忆他最得意的解放战争时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总理补充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961年周总理在和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动情地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这一代领导集体是相辅相成、团结友爱、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的完美整体。这正如鲜红的旗帜上凝聚着五颗金星，代表我们祖国一样。

毛主席从重庆回延安后休息一段，从1946年5月底至11月初父亲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他提出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并着重指出：

“在有利于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投资……外资可以独办某些企业，约定一定年限由政府收回；也可以合股经营，按股分利……为着发展解放区工业，吸引民族资本以致外国资本到解放区繁荣经济，我们必须防止过左的劳动政策。”

1948年当全国土地改革高潮中亟需纠正“左”的错误时，毛泽东主席致电刘少奇同志：“我们准备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演讲，不发表一月决定草

案（即中央1月18日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这篇演讲作为中央的政策性文件，对土地改革的顺利发展和保证全国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这篇讲演中，父亲还最早提出了新中国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 和毛泽东的一次激烈争执

1947年3月12日，一架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在延安上空丢下成串的炸弹。顿时，延河两岸燃起了熊熊大火和阵阵硝烟。同时，国民党的34个旅共23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向延安逼近。

党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依靠群众和有利的地形，打人民战争。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不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及后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和前委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及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等率领，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绥解放区工作。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全部武装起来，与警卫部队一起编为中央支队，任弼时任支队司令，陆定一任政治委员。

任弼时一方面与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一方面指挥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的几十万虎狼之师进行周旋，以确保党中央的安全。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不久，便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痛击了胡宗南的部队。

为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令胡宗南不顾一切同人民解放军决战。中共中央命令西北野战军避敌锋芒，挺进陇东。1947年6月7日，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多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从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央机关仅几里。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兵由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当时，红军主力在陇东地区，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有几百里。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仅4个连。把炊事员、饲养员等后勤人员算在内，也不过300来人，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200多人，形势极严峻。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任弼时以支队司令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走，如有情况再向东走。任弼时认为西面和北面均有敌人，向北走路宽，活动余地大，情况紧急时还可过黄河，这样可确保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安全。

部队接到通知后，整装待发。两个钟头过去了，还没得到出发命令。中央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沉不住气了，他走进毛泽东的住地，正听到任弼时与毛泽东正为此事进行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不同意向北、向东转移，更不同意一有情况就过黄河。他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而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

“部队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部队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没有保障……”任弼时心里很不踏实。

作为中央支队司令的任弼时，对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担负着重大责任。每到一地，他总是嘱咐身边的同志，首先为毛泽东安排一个较安静的工作与休息的环境。

任弼时记得，朱总司令在率中央工委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时，再三嘱

咐留在陕北的警卫部队：“你们的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

因此，任弼时把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看成是全党赋予他的重托。中央留在陕北，任弼时是完全同意的。但现在遇到险情，他自然地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他想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具有超人的审时度势、洞察一切的才能。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他考虑的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语重心长地对任弼时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战略问题，这样可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毛泽东还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速度也很慢，向北到高阳岔，是一条大路，敌人如追过来，速度很快。经过争论，任弼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后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是正确的。

之后形势稍微稳定，部队到达天赐湾后，毛泽东又批评了任弼时，并撤了他中央支队司令的职务，由周恩来接替。是因为任弼时在决定部队行动方向时，事先没和毛泽东、周恩来商量就下达命令，违反了党内的纪律。任弼时，忠诚坦白，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积极协助周恩来工作。

#### 毛泽东为任弼时赴苏治病亲自致信斯大林

1949年3月，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在欢呼声中进了北京城。

不料，参加完西郊机场的阅兵式，刚回到驻地的任弼时便病倒了。这次发病血压（低压）高达150毫米水银柱，心脏每分钟跳动110次以上。

党中央连夜开会决定：弼时必须立即全休静养，直到康复。

任弼时服从党的决定，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西郊寂静而清幽的玉泉山。

关于行军路线的争执不但没引起毛泽东在工作上对任弼时的不信任，同时也没影响他们的私人感情。毛泽东始终很关心任弼时。

1949年任弼时再度休养后，毛泽东还派人将一缸红鱼送到任弼时的住所，附信说：“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任弼时在国内休养了一段时间，病情虽有好转，但没有根本改变，于是，中央决定送任弼时到苏联治疗。毛泽东还于11月21日亲自致信斯大林，商议任弼时去苏养病一事。

斯大林表示欢迎他去苏联，并特地派著名的医学博士歌诺瓦洛夫乘专列到北京接他。

任弼时赴苏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特地前往任弼时的寓所为他送行。毛泽东紧握任弼时的手，一再嘱咐他安心养病，尽早恢复健康。

12月16日，毛泽东来到苏联访问。当时任弼时正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毛泽东亲自到医院看望了任弼时和其他一些在苏治病的中国同志。

1950年初，任弼时从皇宫医院转到郊区巴拉维赫疗养院。毛泽东又专程到疗养院看望他。当毛泽东从苏联医生的口中了解到任弼时的血压已降下来时，他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一天，任弼时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到中国代表团的驻地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特意吩咐厨师做了两样不放盐的菜，还准备了一盘有湖南风味的辣酱烧黄鱼。但当毛泽东听说医生不允许任弼时吃辣子时，又把那盘鱼端着远远的，幽默地说：“对不起呀！”

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能不听啊！”二人都笑了。

在饭桌上，任弼时向毛泽东建议，应尽快选派一批政治觉悟高，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学习，以培养我们自己的建设人才。

毛泽东很赞赏任弼时的远见卓识。他风趣地说：“今后要大规模地搞建设了，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一批人来取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派人来取经，有飞机坐，有黄油面包吃，还有专人欢迎接待，碰杯祝酒，舒服得很哩！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

任弼时不断点头，两位战友心心相印。

这时，周恩来急匆匆赶来。他是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是来参加中苏会谈工作的。他刚与莫洛托夫会谈完毕，准备与毛泽东讨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事。

任弼时看毛泽东与周恩来很忙，不忍再坐，便起身告辞。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将他送到了大门口。

任弼时坐在车里想：“毛主席、恩来、少奇、朱老总，他们都太忙、太累了，我应该赶快把身体养好，帮他们分挑一点担子才对！”

1950年5月底，任弼时返回祖国。医生本打算让他再养一段时间，但任弼时躺不住了。

6月25日，电台报道了朝鲜发生内战的消息。26日，任弼时致信毛泽东要求恢复部分工作。

信里说：“我回抵北京后已近1月，血压尚继续下降中（160左右），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4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傅连璋医生与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任弼时的病情。经中央商议，同意任弼时每天工作4个小时。

不久，任弼时便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加到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把工作时间增加到8小时，实际上他通常都工作8小时以上。

#### 毛泽东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

因劳累过度，任弼时恢复工作不久，病情又加重了。但他全然不顾。他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以革命者的顽强意志支撑着自己，直到生命的尽头……

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很悲痛，他禁不住热泪盈眶。他叮嘱任弼时的夫人陈琼英：一定要抚养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

10月28日，任弼时逝世的第二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当日上午9点，毛泽东到景山东街任弼时住处亲视入殓，并亲自扶灵，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还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在汉白玉墓碑的正面，端端正正地镌刻着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 江泽民的评价

中共中央总书记于1994年4月23日在《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出版发行暨任弼时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对任弼时同志作了高度的评价。江泽民说：

任弼时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他从年轻时起就投身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是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赴苏俄学习的先进青年中的一个，并在那里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16岁起，他度过了整整30年的革命生涯，成为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任弼时同志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那时候，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团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他明确提出把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

五卅运动期间，团的组织迅速发展在全国大多数地区，而且有三分之一的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

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任弼时同志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斗争，积极主张党要有自己的独立主张，要实行土地革命。面对陈独秀的粗暴压制，他始终以维护革命利益为重，坚持真理，坚持原则。那时，他只有23岁。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受严重摧残。任弼时同志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包围下，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沉着奋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纠正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和全党同志一道，为发展工农武装，推进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国民党统治区把党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半合法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使革命运动逐步走向复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28年和1929年，任弼时同志曾两次被捕，受到敌人严刑折磨，但他大义凛然，始终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

红军长征时，任弼时同志已经成长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领导人。他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出发，突围西征、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伍，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

任弼时同志有着坚强的党性。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当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他和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终于使党和红军摆脱危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和朱德、彭德怀同志一起，率领八路军深入山西敌后，扩大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

当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任弼时同志

受中央委托，到共产国际去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不久，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这和任弼时同志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四十年代初，任弼时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筹备召开党的七大，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助手之一。

任弼时同志富有政治远见。在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他就明确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是不胜利的，就是胜利了也不能巩固。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同志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留在陕北主持党中央工作。

他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地把握航向。在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发展时，他带病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周围 20 多个村子进行调查，还了解了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及时指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纠正。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对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纠正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倾向，保证土地改革的健康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

任弼时同志的工作作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实在。他历来注意调查研究，严格尊重事实，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办事细致周到，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

任弼时同志为人正直，对同志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公道正派，不分亲疏，从而得到干部、群众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他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症；长期抱病坚持繁重的工作。

当他病情加重时，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这种坚韧不拔、甘于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被同志们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

任弼时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立下很大功劳的。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他去世的时候只有 46 岁，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前进。

## 第八章 董必武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 年的开国大典，能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仅有毛泽东和董必武。

### 绕道回家的秀才

1885 年 3 月 5 日，董必武出生于河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的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中。黄安，是出了许多共产党的将军的地方，他原名资棕，又名用威，字洁斋，号壁武。

从事革命活动以后改名必武。

董必武全家近 30 口人，这近 30 张嘴主要靠他的父亲董基人，以及四叔教塾馆的收入和大伯、二伯给官府管地亩钱粮册书得来的钱来维持。董必武的母亲蔡氏是位典型的传统型的中国劳动妇女。她克勤克俭、纺纱织布，操持家务。当时，家中虽然人口众多，年龄差别也很大，但他们兄弟之间却能互谅互让，彼此理解，和睦相处。董必武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虽贫穷却很和睦的家庭中。这样温良谦让的家庭氛围对董必武的人生道路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5 岁时，父亲董基人在黄安县城内东街广善庵教书，董必武也常常跟去，但他并不是跟去听课，因为他年岁很小，只不过是在一旁玩耍。有一天，父亲在广善庵三殿内考问就读的叔伯兄弟背诵《三字经》，竟然没有一个能背全，这时，正在窗外玩耍的董必武即大胆地高声代答，居然一字不差。父亲喜出望外，随即让年幼的董必武跟班就读。

由于家境贫困，董必武所用的书，多是父辈或兄长用过的旧书，天长日久，书中已有许多字迹不清楚，他只好用纸粘好，再照别人的书补上。

9 岁时，他随四叔住校就读，常常在四叔起床之前，就悄悄地起来洒水扫地，开始学习。

十岁时，他随父亲到麻城县张杰弯读书。这以后，他转入黄安县城福生祠书馆学习。

这期间，他除了熟读四书五经、翻阅父亲、四叔的藏书外，还向同学和亲朋借阅了不少演义和历史著作，渐渐充实了他的文史知识。这时，他的文章已经相当通达洗练，几次参加县的“观风”考试，都名列前茅，并受到鼓励。

清朝末年，传统观念、世俗之风认为科举考试是猎取功名，耀祖光宗，提高家庭地位的阶梯。董必武的家庭也不例外，特别是父亲和四叔，见他学业日渐长进，非常希望他选择适当的时机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这样将会十分有助于改变家庭的窘态。

在全家人的鼓励下，1903 年，董必武赴黄州府报名应试。

不出所料，他没有辜负家人的希望，中了秀才。

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中了秀才回来，乡邻总要在城外鸣放鞭炮迎接，表示祝贺，但董必武却故意绕道回家。

### 醉心于维新变法的康梁思想

在武昌学习期间，董必武经常光顾的场所是距司衙巷不远的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

在那里，董必武阅读各种报刊杂志，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识，思考着明天，思考着未来。当时，日知会的司理是革命党人刘静庵，他原是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负责人，因清政府无理查封了该所，才不得已隐藏在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刘静庵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用日知会的名义，广泛收集国内外各种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而且还组织星期日演讲会，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热心革命的志士仁人，纷纷云集这里，针砭时弊，抨击朝政。

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看到了国内外的不少新书和报刊杂志，眼界豁然开朗。

开始，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时，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议论，感到十分新鲜，同时也非常赞赏，又被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流畅文笔所吸引。很快就成为他们的著作和《新民丛报》的热心读者。

渐渐地，董必武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对年轻的董必武影响很大。

在日知会，董必武首次读到《猛回头》、《警世钟》。

《警世钟》起首的四句诗给董必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四句话是：“长梦千岁何日醒，睡乡谁道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的确，中华大好河山就要断送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中。广大的中国民众何日才能猛醒？又将由谁来唤醒他们？中国的出路在哪？这样许多的问题常常困扰着董必武。

另外，刘静庵还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二本书介绍给董必武，嘱他好好读。

《扬州十日记》记述了1645年清军屠杀扬州人民的暴行。《嘉定屠城记略》记述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在嘉定（今上海嘉定）进行三次大屠杀的暴行。

读了这二部书，使董必武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更加痛恨清政府的残暴。怎样才能救民？董必武在思索。

在一次演说会上，刘静庵激昂慷慨地说道：“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国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二重亡国奴了！……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国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中国就要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迫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奴隶牛马……。”听了这番话，董必武激动地整夜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反复思索。他和刘静庵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

在日知会时，起初他被改良主义的重要刊物《新民丛报》所深深吸引，开始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认为“梁启超笔下常有感情，煽动性大”，对自己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这以后不久，董必武得知：中国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7、8月间在日本东京成立。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

同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革命派同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大论战。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首次公开提出：“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号召实行民族民主革命。

董必武细心钻研了《民报》和章炳麟（太炎 1869—1936）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书籍。他以严肃的态度，认真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反复思索对比，思想上逐渐明确起来：“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之处，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当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

问题想通了，董必武的心情十分激动，认为国家有了希望，并预感到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于是毅然抛弃了康、梁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思想，转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同盟会派人到湖北策应。由于叛徒出卖，1907年1月，日知会组织遭到破坏，刘静庵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刘静庵慷慨陈词“劲挺不

稍回曲”，“慷慨言中国危殆”，力陈救亡的革命的必要，后死于狱中。刘静庵这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对董必武影响很大。董必武把刘静庵看作是自己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师”。

### 投身“二次革命”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在短短两个月内，全国已有13个省和上海市以及部分省份的州、县宣布起义。清王朝的统治迅速瓦解。

在中华大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行将就木。

武昌起义后，建立了革命的军政府。董必武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武昌，并参加到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工作。

这期间，清政府调集重兵向汉口反攻。起义军和清军在刘家庙和三道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为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董必武从武昌迅速赶到汉口参加了兵站工作。组织支援前线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

后来，他回忆说：“当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到革命军与清军作战的英勇气概，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少对革命军的积极帮助，那种自动馈送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真是难以用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粮库和管钱局的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前线者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董必武精神振奋，情绪高昂，他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能多吃一些就多做一些。后因清军援军不断增加，双方力量悬殊，汉口、汉阳先后失守，武昌成为一座孤城。虽然形势万分危急，董必武仍毅然加入到保卫武昌的战斗中。后来因为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响应，保卫武昌的战斗终于取得了首战的胜利。

1913年，为了策应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董必武与湖北革命党人曾积极进行准备。

“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对湖北革命党人大肆屠杀。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张国恩等革命党人在湖北无法立足，不得不逃亡上海。

### 同盟会的元老

1914年1月，在朋友的帮助下，董必武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学习期间，正巧孙中山也在日本，他正忙于重组中华革命党。当时处于革命的低潮期，许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失去信心，处于一种苦闷，彷徨的状态。因此，当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加入者仅仅数百人。

董必武很清楚：散漫不统一是国民党的致命弱点。所以他十分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在他的《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孙中山对革命的信心给董必武很大鼓舞。他在学校攻读法律的同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投入到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中。

孙中山领导组成中华革命党以后，进一步开展反袁世凯独裁、卖国、

复辟的武装斗争。

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奉孙中山之命归国，同上海的革命党人潘怡如等取得了联系。

董必武怀着变革中国社会和为人民多做贡献的一片赤诚，抱定“做得一分是一分”的决心，很快回到湖北，谋划反袁的秘密军事行动。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旧友李愈友密商如何起事。

1917年2月21日，董必武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应驻防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

1919年1月27日夜，靖国军唐克明勾结川军旅军方化南，乘蔡济民不备，袭击蔡部将蔡谋杀。

当时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很快赶回，可人们尚不明白事情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了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电报多封，才揭出了案件的本来面目。

同事们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有关方面申诉。

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但孙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实施。

董必武于是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陈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

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

### 痛苦的思索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

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与李汉俊、

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

董必武在读书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

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

他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

董必武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董必武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和世界问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 创建中国共产党

1937年，董必武会见英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到创立中国共产党时说：

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这个组织于1920年9月组成。

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于1935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

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我们还决定党员不能加入任何别的政党，包括孙中山的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我记得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

除我以外，在创党人中，还有一些是老同盟会员，例如陈独秀、戴季陶和沈玄庐。

那时，武汉中学成为湖北共产党的中心。党支部由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组成。不久，我的最进步的十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后来，在创建党支部的五个人中，有三个人离开了党，一个成为自由职业者，一个现在在南京，一个现在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坚持信仰。我不知道陈潭秋怎样了，但是我想他还活着。

不久，武汉成为一个共产党的重要基地。党原拟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作为宣传中心。

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叫马耶夫和他的妻子来到武汉任教，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上海。

1921年夏天，陈独秀亲自到武汉，并在一所教会学校——文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

他恰巧遇到一个与该校有联系的工人，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这工人加入了河北省共产党，并通过他和棉厂的一些工人联系。这样，党在工业部门获得了扩展。

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亲农村运动”。这个团体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他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早期最优秀的青年领导人之一。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恽代英在四川入了党，于1932年牺牲。

我们湖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有30名代表出席。我们派学生到农村去建立组织和进行宣传，他们的工作对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有很大影响。

我的第二个工作是去四川重新做我们过去做过的争取军事力量转向革命的工作，这是老的策略。那时，四川某些军队有反军阀倾向，所以我到那里去开展这个运动。我花了一年时间做这个工作，后来党命令我回湖北。另外，武汉中学急需经费，也要我回来为之筹款。

我回来看到学校和工厂党的工作有了如此大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那时，平汉铁路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我们有个劳动组合书记部设在长辛店。

我父亲在武昌教书，病了，我送他回老家，回去不久死了。当我回到武汉时，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张国焘担任大罢工的领导工作。

因我仅仅被人认为是一个有名的国民党员，并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仍然能够留在武汉。直到1925年——1927年大革命以前，连我家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我的妻子到武汉时才发觉。她是一个老式的妻子，1910年家里让我与她结婚。我只有一个小孩，她就死了。

#### 参加国民党“一大”、“二大”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

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和筹建国民党组织的指示，以国民党联络员的身份，积极进行筹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汉口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党部，并先后建立起了武昌、黄梅、黄冈、黄陂、汉川、黄安、麻城等17个县的国民党组织。这些市县党部的委员，基本上也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

在此期间，董必武通过共产党员石炳乾在安徽的泾县、宿松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在江西德安、河南商城国民党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地

方先后建立起了由湖北省党部领导的国民党党部或区分部。董必武积极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组织形式，重点吸收工农大众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7月，在董必武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河北省国民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

会议结束后，董必武迅速返回武汉，立即召开全省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指出国民党“二大”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但国民党右派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险性。他要求大家竭力协助国民党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展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1926年3、4月间，董必武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派遣秘密奔赴长沙，做争取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转向革命的工作。由于多方努力，董必武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使唐部于5月下旬改编为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军，唐任该军军长，参加了北伐。

在全国反帝运动日益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国共合作继续发展的条件下，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为此，会议决定党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开展群众工作，还决定重建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董必武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立即着手进行准备，以策应即将到来的北伐。

3月，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为促进北伐开始了准备工作。董必武遵照党的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双重身份，于3月下旬秘密前往湖南长沙，协助作北伐前的准备工作。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

7月下旬，董必武率领湖北各部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先头部队。

随后，董必武和潘怡如等根据国民党中央决定，又组织了一个特种委员会，以配合北伐的军事行动。

7、8月间，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

8月下旬，董必武派人在汀泗桥组织了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的活动。同时，他发动群众，支援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斗。

北伐军取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于9、10月间先后攻克了汉阳、汉口和武昌。

北伐军占领武昌和广东国民政府迁鄂之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势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根据地。”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革命的猛烈发展，引起了一些反动集团或

派别的恐惧和仇视。蒋介石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儿设立了他的总司令部，同时把他的嫡系部队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带，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以便使这些地区处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他篡夺胜利果实的目的。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看穿了蒋介石这一阴谋，并坚持反对这项阴谋。

1927年2月24日，武汉三镇国民党党部15000余名党员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董必武在致词中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挽救党，反对个人独裁，恢复党权。他说：“他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

3月20日，武汉100万群众在阅马场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妥协者”等重要提案，击中了蒋介石新军阀独裁统治的要害，把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妥协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政府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

董必武根据党的指导，及时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

他与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将力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

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央鄂东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

#### 赴苏学习

12月，李汉俊、詹大悲等在武汉被捕，并当即惨遭杀害，情况万分危急，为了保存力量，党中央派董必武去苏联学习。

到达苏联后，董必武即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即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校专为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李哲时等30几人办了一个特别班。

由于学员年龄较大，大家都称特别班为“老头班”。1929年春，董必武因英文比较好，由共产国际保送，转入列宁学院（即苏共党校）英文班进修，在一起学习的还有张国焘、王若飞、李立三等。

董必武在莫斯科期间，始终努力学习，深入钻研，深得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的敬佩。

在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时，他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刻苦攻读英文和俄文。

以至有人提意见说，董必武总是占着图书馆的一张桌子，到吃饭时才离开。

董必武在自己努力学习的同时，还担任列宁学院中国工人特别班的语文课和政治辅导工作。

他将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体会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对照，并亲自下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

在巴库油田和列宁格勒工厂，他深入到群众中，同工人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并将这种亲身体会整理成报告。报告得到很高的评价，并在全校展出。

1931年冬，他从列宁学院毕业，因其学习成绩优异，列宁学院计划将他留校工作。

后因国内斗争的需要，遵照党中央的决定，董必武于次年3月离开苏联回国。

### 中共第一任法院院长

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要求红军在敌合围未成之前，就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随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董必武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革命根据地以后，苏区中央即准备创办学校，决定取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党校，校址设在叶坪，后迁到沙洲坝。董必武被调去办党校，任教务长。

党校校长是洛甫（张闻天），副校长是杨尚昆。

不久，杨尚昆调到三军团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后任校长。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党校于3月13日（马克思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天）正式开学。

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二月，被委任为临时最高法院主席，随后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

他对严明党纪和革命法制十分重视，同时要求办案要严格手读，要建立档案，以备有据可查。在他的领导下，党纪和法制得到加强，工作效率，劳动纪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 长征途中，任妇女队队长

年过半百的董必武同志也参加了长征。

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共100多人，目的是照顾那些年老体弱、生病负伤的干部、战士，以及女同志等。其中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谢觉哉、蔡畅、贺子珍、成仿吾等，都编在这个连里。

后来，董必武被调到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的妇女队任队长。

董必武等人率领的这支小队伍，战胜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历史的奇迹。

董必武在《长征中的女英雄》一文中，热情地歌颂了这些巾帼英雄的事迹，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到董必武当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

文中写道：

“……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这

是异常艰苦的工作。那完全是夜行军，又不准点火把，若遇天雨路滑，担架更走不动。民工的步伐是不会整齐的，体力不一样，没有抬惯，前后两人换肩走路都不合拍，对革命的认识程度又不一致，有的是在路上临时请来的。照料担架的女同志跟着担架走，跟得着前面的一副，又怕后面的掉队，跟着后一副，前面又没有人照管，休息时候要防着民工开小差。

民工可以打盹，她们都不敢眨眼。特别是每晚快到天亮的时候，民工的身体疲乏了总想打个瞌睡，宿营地还隔若干里，前后队全都催赶快走。这时，他们就在几副担架的前后跑，督促和安慰，劝说和鼓励，用一切法子来推动民工往前走。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中体力强健的，就只好代民工担肩……”

“做工作的女同志，绝大多数自背行李，包裹一卸，马上又要去做群众工作，这些都和男子一样。有两个女同志真是步行二万五千里，马一下也没骑过……”

又写道：

“……四个怀孕的女同志，都是在旅寓中生产，产前一晚半日就要行动，应有的休养和调理是得不到的。一个女同志在藏民区的下打鼓生小孩，连青稞麦她也不够吃，偶然分得一点羊肉，此外是没有什么营养可说了，产后休息了几天，经过草地，也平安地到达了瓦窑堡。”

长征队伍到黎平，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分配董必武等担任妇女队长，管理伤员，是不恰当的，建议另行安排。董必武这才被调到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

不久，又调进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与干休连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组成连党支部委员会，同徐特立、谢觉哉并称干休连“三老”。为了坚持长途行军，董必武在黎平才买下了一双破胶鞋。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为此，董必武十分兴奋，虽然他平时不喝酒，这次也特意买酒庆贺。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董必武不仅在四渡赤水、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金山、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时都顺利地随大部队行走，而且常把分配给他的马匹，让给伤病员骑用，自己徒步行走。

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董必武回忆这段长征经历曾说：

“十三个月时光，在不断地战胜敌人五百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二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是英勇无畏的红军的创作，已为全世界人惊叹为空前的奇迹了。”

#### 中共中央为董必武发电祝寿

1939年到1944年，董必武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重庆等城市战斗了7年。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揭露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1943年，董必武将满58岁。“当时重庆政治空气恶劣，好友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禁网之一法”。为了扩大我党的影响，党中央决定给董必武提前祝寿，以“祝寿”活动作为突破封锁、广泛交友的一种手段。

1944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贺董必武六十大寿，对董必武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必武同志：

庆贺今年你的六十大寿。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中华民族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你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

三十二年来，你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4 年元旦

董必武把自己工作中的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1月3日，他给中共中央发了感谢电：

中央委员会：

奉读中央元旦贺电，不胜感谢之致。我在中央领导下不断学习和工作着，抗战以来，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着，感到无上的光荣。我党的二十二年来伟大的发展，光辉的成绩，已搏得全中国全世界要求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赞扬，正因为全党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才获得了这样的成功。我自愧在这中间没有更多更大的贡献，使党给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成为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个名实相符的战士，随着中央随着全党同志继续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而奋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董必武

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临终留下一句没有说完的话：“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1949年，董必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全身心的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律事务上。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废除国民党的旧体制，建立人民的新法制的规定，董必武领导并参与了废除国民党的旧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人民新法制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60年代末70年代初，董必武已是八旬老人，且身体多病。按理，为人民奋斗了一辈子，身体又不好，应该享受晚年的欢乐。如若是在平常百姓家，这是极容易做到的。然而，董必武同志心里装的不是过去的功劳，他心里想的是国家。

“文革”前，中共中央成立了党史起草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文革”期间，董必武对于江青等人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那一套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对于他们创造“帮派史学”更是深恶痛绝，编史工作自然就搁浅了。

在那些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岁月里，多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诬陷、迫害。许多曾经战斗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被扣上种种罪名，打成“特务”、“反革命”，关进监狱。董必武不顾个人安危，顶住逆流，实事求是地为这些同志写了证明材料，使得他们免遭诬陷、迫害。

1965年5月，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董必武用了三个半天的时间，给支

部的同志们详细地讲党史，高度赞扬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邓小平同志、叶帅、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

1970年除夕，董必武在广州遇到老战友叶剑英，“幸存者”相遇，真是喜出望外，题诗《羊城农历除夕喜遇叶剑英》：

羊城农历岁月凋，  
满眼风光兴趣饶。  
破旧已无花上市，  
迎新将有艺如潮。  
曾经绚烂归平淡，  
不信怀柔与叫嚣。  
备战相逢岂易得，  
余生能乐几分宵？

董必武为老战友而喜，同时又感叹“岁月凋”，“余生能乐几今宵？”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许多老战友、老同事被迫害致死，今宵能与叶帅相逢，实属不易。分手后又不知何时能与君见面。凄婉的声调跃然纸上。

1975年3月5日，董必武90生日，他带病题诗《九十初度》，总结自己度过的“九十光阴”：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磋砣。  
五朝敝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洗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董必武始终怀着“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信念，以“主义遵从马列坚”为行为准则。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董必武与世长辞了。他临终时说了一句未说完的话：“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 第九章 陈云

从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 孤苦的童年

青浦县有三个大镇，即青浦镇（县城）、朱家角镇和练塘镇。

练塘镇便是陈云的故乡，那儿地处上海市最西南隅，距市区约60公里。

一条名叫市河（当地人称“市河港”）的小河，流经那里。小河两岸建起一幢幢房子，沿河形成了长带形的练塘镇，河上架起八座桥梁。这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水乡古镇，米行、酱园、南北货店、竹木行、烟纸糖果铺，簇拥在市河两岸。

公历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这座江南古镇。那时，这座小镇

大约 6 千来人，叫“章练塘镇”，比现今多一个“章”字。相传这里古代为官塘，唐朝天祐年间，高州刺史章仔钧携妻杨氏，住在小镇。杨氏世居练溪，人称练夫人。于是，以“童练”命名官塘，称“章练塘”。解放后改称“练塘”。

章练塘镇有两条街，一条叫上塘街，一条叫下塘街。在下塘街潭业里阅宅旁边，有一座低矮的小屋，那是陈云父亲早年居住的地方。后来，他父亲迁往陈徐祠堂东面一座平房里，陈云在那儿出生。陈姓是章练塘的大姓，沈、张、陈、王四姓在小镇上最多。

陈徐祠堂，是陈、徐两姓宗祠。

陈云尚未降生，父亲便已病逝。母亲艰难地带着陈云和他的姐姐两人过日子。

疾病和贫穷紧相随。陈云尚不足 4 岁，母亲又被病魔夺去！从此，他和姐姐成了孤儿，只得靠外祖母抚养。不久，外祖母也离开了人世，舅父母收养了他。

陈云的舅父母收养了陈云，改姓廖，因此陈云小时叫“廖陈云”，有时也写作“廖程云”。

舅父以裁缝为业，家境也不宽裕。于是，舅母设法相助，在临街的小平屋里放了张四方桌，几条板凳，砌了个灶头，开起小酒店。不过，舅母亦患风湿症，手臂力弱，陈云稍长，便成了舅母的小助手。小店里劈柴、洗菜之类杂务，由陈云承担。他还照看体质孱弱的表弟。

7 岁时，陈云进入本镇贻善小学读书。贫困的家，无力支持他上学，不久他便陷入失学的痛苦之中。天无绝人之路。在舅母小店的顾客之中，有一位占叫杜衡伯的，乃是小镇上颜安国民小学校长。杜衡伯常来喝酒，见陈云聪明伶俐，手脚又勤快，觉得失学太可惜，答应让他免费入学，这样，陈云有了求学的机会。陈云一直记得颜安小学给予他的帮助。1986 年 9 月，当颜安小学希望陈云题写校名时，陈云欣然命笔。

离陈家咫尺之遥，有一“混堂浜”。那里有清朝末年开设的练塘镇上第一家书场。

名叫“畅园”。镇上的居民喜欢听评弹，“畅园”生意兴隆。于是，另一家名叫“长春园”的书场也在混堂浜冒出，跟“畅园”唱“对台戏”。做完功课，忙完小酒店里的杂务，陈云的最大乐趣就是听评弹。好在小孩子家不收费，陈云成了“评弹迷”。从评弹中，他懂得了许多历史故事，也增加了他的文学修养。至今，他仍是评弹的热心听众，跟评弹界有着许多交往，最初的渊源便始于“混堂浜”。

评弹引发他对音乐的兴趣，他学会了吹箫、吹笛，也会拉一手二胡。

### “社会大学”

1919 年，14 岁的陈云小学毕业。贫苦的他，没钱进入中学学习。他的老师张见仁十分喜欢他。张见仁的弟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就介绍陈云到那里当学徒。这样，陈云离开了练塘小镇，进入了大上海。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创办于上海。最初印刷商业簿册、表报，故名“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夏瑞芳善于经营，由印刷簿册转为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工具书、科学和文学著作。不久，清朝进士张元济（曾任刑部主事）因参加戊戌政变遭革职，由官场进入商务印书馆，创办广有影响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

以及编辑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于是商务印书馆名声大振。

陈云来到商务印书馆，如同遨游于书海、书城，知识猛进。最初，他在排字房当学徒。后来在发行所当店员。到今，陈云用牛皮纸包书、用绳子捆扎，那动作仍很利索，便是当年当店员时练就的基本功。他的毛笔字也不错，那也是因为往外寄书，得端端正正在牛皮纸上用毛笔写地址及收书人姓名，练出了一手好字。

陈云思想活跃，又富于组织能力，很快就成了工人中的核心人物。1925年，20岁的他参加了五卅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迄今尚存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第一届执行委员们的合影之中，身穿白色长衫、理平头的陈云居中而坐。

### 26岁成为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成员

1927年4月，陈云突然回到了老家。那是因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陈云被列上了通缉名单。

陈云化名“陈明”，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派遣，回到了家乡，从工人运动转到农民运动。

人熟地熟，陈云在农民中如鱼入水。练塘镇不远处，有个小蒸镇。农历十月初一（公历10月25日），小蒸庙会，人头济济。陈云出现在那里，向数千农民发表演说，进行鼓动。1928年1月初，“沪杭路（松江段）农民革命军”成立，陈云出任党代表，正、副总指挥为吴志喜和陆龙飞。1月19日，在跟敌军作战中，正、副总指挥双双被捕。1月26日，正、副总指挥双双牺牲于刑场！陈云处境危急，他转入秘密工作，先后担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

1928年9月下旬，陈云在练塘召开秘密会议，被敌人察觉。千钧一发之际，他的老同学刘国桢把陈云藏进小船，悄悄离开练塘，前往上海。

在上海，陈云担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共法南区委书记。

1930年9月24日，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幢豪华的花园洋房里，神不知，鬼不晓，46名中共高级干部聚集在那儿，开了四天会。这便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主持会议的是戴近视眼镜的“白面书生”式的人物，他便是瞿秋白。他刚和周恩来从莫斯科归来。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陈云以“廖程云”这个名字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李立三（当时叫“柏山”）“左”倾错误。在这次会上，补选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八人，内中有“廖程云”、朱德（未出席会议）、恽代英、陈潭秋等。这样，陈云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之中，这时他不过25岁！

由于陈云自身的努力，也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强调重视工人出身的干部，陈云出身于印刷工人，他得到器重。4个月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八号，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秘密举行。26岁的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又过了8个多月——1931年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成员为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

这样，陈云进入了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核心。

### 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

1933年1月，陈云同志离开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继续参加

党中央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在领导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中，他深入实际，依靠群众，纠正了当时发生的若干“左”的错误倾向。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夏，负责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需生产。

### 把红军长征的壮举传播到世界去的第一人

在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的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他担任五军团（后卫军团）中央代表，后改任军委纵队政委。10月20日他率五军团十三师最后渡过于都河向湘西进军。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省遵义县城时，陈云同志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到部队传达。

这个提纲是在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得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

红军四渡赤水进入云南后，他任渡河司令部政委，同司令员刘伯承同志一道指挥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

1935年6月，他遵照中央的决定，作为中央代表，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经雅安、重庆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又受命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他化名“廉臣”，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起，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随后，他进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大学任教。

1937年4月他回国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统一新疆代表。5月，他和滕代远同志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同志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同志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很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培养使用干部、党员教育、群众工作以及秘密工作等。他先后发表了《论干部政策》、《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学会领导方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等重要著作，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

1938年5月，他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是毛泽东同志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之一。他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

1944年3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 坚持南满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云同志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1月初，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

11月底，他在起草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地把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个正确主张，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

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以后，他用大量时间在宾县、通河、方正、木兰等地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

1946年6月，他任东北局副局长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7月，他为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经东北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这一决议按照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关键的工作方针；对敌作战则应遵守不重于城市和要地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原则，从而进一步统一了东北党政军的思想，使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大步前进。

10月，在国民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重兵进攻南满解放区的危难时刻，他出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提出坚持南满斗争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在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个江南”的配合下，他同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同志等指挥南满部队“四保临江”，这一胜利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又指挥南满部队参加对国民党军的夏季攻势，同时领导辽东地区的土地改革，使南满解放区得到恢复和扩大。

1948年1月，陈云同志回到哈尔滨，继续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后又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并参加组织指挥辽沈战役。

### 接收沈阳受党中央表扬

11月沈阳解放后，他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接收沈阳这个大城市的任务。中央认为接收沈阳的做法，是成功的经验，并加以推广。陈云同志在参加领导东北三军解放战争中，坚定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并提出了若干关系全局的正确意见。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全境的解放，为东北经济的复苏和大部队顺利进关作战，作出了突出贡献。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49年5月，他奉命到北平（今北京）参加筹组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

### 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

重大措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才能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当时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和安定人民生活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他通过调查研究，首先领导了反击投机资本家哄抬市场物价的严重斗争，很快就平抑了市场物价。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高度评价。

随后，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党中央、政务院于1950年3月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到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接着，他针对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困难局势，提出财经工作方针，应该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最后才是其他各种经济和文化支出，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1953年10月，根据他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建议，党和国家先后决定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保证了城市人民生活 and 工业生产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及其价格的稳定，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

1954年2月，他兼任中央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组长。他在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以后的经济领导工作中，一贯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他主张，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他认为，只有按比例发展，才能取得最快的速度 and 最好的效益。1956年9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对改革经济体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这是陈云同志在五十年代中期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富有创见的构想。

#### 毛泽东对陈云的评价

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同志评价很高。毛泽东同志说，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

这个评价为全会所接受。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56年11月，他兼任商业部部长。1957年1月，他兼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1958年6月改设财经小组）组长。11月，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

他指出，现在集权太多，分权太少。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集权不能过分，但职权下放以后，也要注意地方可能发生的不顾全局的倾向。这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最早的尝

试。1956年8月，他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 陈云较早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问题

从1958年开始，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发生“左”的错误，随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城乡人民的生活发生很大困难。陈云同志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

1958年12月他提议，不要公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之后他又指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这些正确意见，当时没有受到重视。1959年4月，他提出要增产节约粮食、组织城市副食品的供应、专门安排日用必需品生产、精简城市多余职工、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的运输等措施，以缓和和市场供应异常紧张的状态。

5月，他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对当时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进行调整。

此后他在因病休养期间，到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等地，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问题和人民生活问题。他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后指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同时要留足农民自留地。1961年春，他提出进口粮食，对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以回笼货币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几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小组会上作了《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发言，针对当时片面强调主观意志的倾向，提出看问题一定要互相“交换”意见，要作多方面的“比较”，还要根据实践经验“反复”考虑，才能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实际，指导工作才能大体正确。2月，他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级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调整国民经济和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 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当时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严重困难，他支持并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建议。1962年4月，陈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道，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同志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

### 下放江西“蹲点”三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

1969年他被下放到广西南昌的一个工厂“蹲点”，长达三年之久。他在这段时间里，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并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1973年至1974年，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就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

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利用外资的任务。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5年1月他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 对叶剑英说：和“四人帮”的斗争不可避免

1976年他积极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他曾对叶剑英同志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郑重提出和坚持支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他积极支持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

1978年3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同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率先提出平反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彻底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错误政治结论，承认彭德怀同志是对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共产党员。

同时指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进行审查。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进军中，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他主张采取积极措施，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下来，使之休养生息；工业的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拥而上；应给各省市一定的机动财力。所有这些，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978年12月，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正确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期间，他在若干重大的关键问题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和主张。

#### 力主为刘少奇、潘汉年平反昭雪

陈云同志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

1979年1月，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议讨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提请中央审议。

同年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央组织部开始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按照陈云同志的提议并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决定予以平反昭雪。

### 提出经济建设主要错误是“左”

陈云同志从 1979 年 3 月至 1980 年 3 月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79 年 7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在 1979 年 3 月写的提纲《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要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此后，他还指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

他的这些观点，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对推动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我国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针对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他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用两三年时间依照按比例发展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中央根据这一建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的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改革。

### 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

他特别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指出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集中是不行的，只有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微观搞活，做到活而不乱。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他还指出，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但由于改革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广大干部还很不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他一贯主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

他在 1981 年底明确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这是经济工作的大方针。他还一贯主张，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他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生产，提醒大家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个历史经验。

### 主张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

陈云同志十分关心新时期党的建设，参与制订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提出要立即着手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 1980 年 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出要作好党的领导干部交接班的工作。他说，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是中央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

1981 年春，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一项战略任务。他多次强调，提拔使用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对头。他再次强调，要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公正确，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他大力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搞调查研究，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他高度重视党风建设，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指出，党的领导机关端正党风，首要的问题是坚持和执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要有民主空气，应该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在改

革开放中，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他多次提醒各级领导部门，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两个文明一起抓。他高度重视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认为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搞不好也会翻船。他为加强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对香港、澳门主权的恢复行使，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 **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的老百姓**

陈云同志热切关心和要求革命后代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保持党的光荣传统。早在1949年6月，陈云同志写信给一位战友的儿子，要求他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并切记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1983年春节，陈云同志在家里同一起建党初期参加革命、后陆续牺牲的烈士的子女团聚，对他们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子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也是陈云同志对我国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 **提出要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陈云同志非常关心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问题。1982年7月，他写信给中央政策局常委，提出要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认为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984年9月，他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他很关心古籍整理工作，认为这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件大事。他还关心评弹艺术的发展，鼓励大家要“出人、出书、走正路”。

### **堪称楷模**

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陈云同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89年反对动乱中，陈云同志旗帜鲜明地为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的生活，但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1994年春节前夕，陈云同志在上海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他强调，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陈云同志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陈云同志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云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 第十章 邓小平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 “油印博士”

1920年12月，邓小平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从此，他便走上了漫长、曲折而又光辉的救国救民之路。

16岁的邓小平到达法国后，严峻的生存环境使他不得不花多数时间做工。他开始在克娄梭钢铁厂打杂，后又在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当过钳工，在火车上当过铲煤的司炉，还到饭馆里做工。只有极短时间在贝页中学、夏蒂荣中学等校学习。

俄国十月革命对法国影响很大，法国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广为流行，邓小平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22年又参加了由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青年创建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下半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领导。在此时期，他参与主办帮助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中国同志学习理论的油印杂志《赤光》，他不但参加编辑、撰写，还刻蜡纸、油印、散发，十分活跃。

因为他刻写的字迹端正、有力、版式设计美观、活泼，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

1925年，邓小平又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并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及华工运动。

由于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遭到了法国政府的迫害，于是在第二年1月从巴黎经柏林到莫斯科，先到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读书。

### 蒋经国的团小组长

在中山大学学习时邓小平曾担任一个班的团小组长，而蒋经国也就被编在这个小组。

当时蒋经国仅有15岁，个子矮小，只有1.51米多点，但在全校数百名学生中却是年纪最小、又最活泼的一个。

邓小平虽比蒋经国大6岁，但个子也不高，排队时总和蒋经国站在一

起，肩挨着肩。

邓小平爱说爱笑，具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而且知识渊博，再加上邓小平是蒋经国的组长，因此蒋经国很尊重邓小平，把邓小平看成是“大哥”、“学长”。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柯街，是一座规划宏大的四层楼房。冬天的莫斯科河结着厚厚的冰，如一条银白色的带子。尽管这时的莫斯科十分寒冷，邓小平、蒋经国等同学还是喜欢在饭后到操场上或莫斯科河畔散步、聊天。他们最爱听邓小平讲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那时邓小平总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一天散步时，蒋经国好奇地问邓小平：你干吗老围着这么一条大围脖？邓小平对他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特别是拣马粪挣钱最多，干一天能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这样一条。邓小平每次谈话，都能激起蒋经国的浓厚兴趣。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蒋经国和邓小平亲密无间。后来，邓小平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里“学习得不错”。谁也没能料到两个当年同窗共读的学友，60年后，会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

### 23岁的中共中央秘书长

中共中央根据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及邓小平的实际表现，1927年春天决定调邓小平回国工作，同年2月，邓小平从莫斯科出发，回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上海。

邓小平回国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处于走向破裂的前夕，政局十分动荡。3月，党中央分配邓小平到西安，在那位接近共产党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

1927年6月，冯玉祥下令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河南开封，名为训练，实是“礼送出境”。这时，邓小平按照党的安排，离开西安，转赴当时从上海迁到汉口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邓小平到了汉口后，向党中央汇报了冯玉祥对共产党人的政治态度及中山军政学校的情况，中共中央负责人赞许了邓小平在中山军政学校工作时的业绩，并任命他为中共中央秘书，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

随后，武汉政府公开反共，制造了“七·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内政治局势更加恶化。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环境，保护革命利益，邓小平将原来邓希贤的名字改为邓小平。1927年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并确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邓小平列席会议，并在会上听到了毛泽东的重要发言，认为毛泽东的观点十分正确，而且措施具体，是当前党应采取的。从此，邓小平和毛泽东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八七”会议后，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到了上海。不久，23岁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共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在党最困难的时期，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工作需要，邓小平留在上海党中央机关，以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李维汉、任弼时等负责人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指导各个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与白区的秘密斗争。

## 到广西改造旧军队

1929年3月，爆发了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战争，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战败，被驱逐出广西，由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主政。俞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任广西省绥靖司令。那时俞、李正酝酿反对蒋介石，他们全部释放了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者罗小彦等人，并且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合作，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他们部队工作。

获知这个信息后，中共中央立刻进行了研究。

“派邓小平同志去！”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

因为邓小平回国后工作干得相当出色。

经周恩来推荐和中央批准，年仅25岁的邓小平便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于当年7月初到达了南宁。张云逸、叶季壮也前往广西，领导当地党的工作。

邓小平到达南宁，化名邓斌，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并发展革命力量。他了解到俞系国民党左派领袖，“四·一二”政变后曾被桂系军阀政府通缉，一度还逃往香港，经验使他倾向中国共产党。而李明瑞也不满桂系军阀排除异己和迫害俞作柏的行为，也对共产党有了好感。

邓小平还了解到中共党员俞作豫是俞作柏的弟弟和李明瑞的表弟，他的革命行动对俞作柏和李明瑞影响很大。于是，邓小平通过俞作豫，及时地做好了上层工作。促使俞、李同意创办军官教导总队，并把中共党员渗入到广西省党政军机关中任要职，当时共产党员张云逸在教导总队任副总队长，共产党员罗少彦任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共产党员陈可福、陈可夫任俞作柏的秘书。

为达到改造旧军队的目的，邓小平还从各地抽调了1000多名觉悟较高的老班长和老兵到军官教导总队学习，从广西、广东选调工人和学生党员担任教导大队各连队的连长、排长，并在各连相继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不到两个月时间相继发展了李天佑、卢绍武等300多人为中共党员，使教导大队增加了党的血液，对改造旧军队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军官，邓小平采取“调虎离山”之计。一方面给他们较高的职位，一方面削弱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再也不能影响士兵群众。

邓小平还派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警备第五大队长，张云逸担任警备第四大队长、李谦为副大队长。使共产党人得到了这两个大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张云逸、李谦、俞作豫又按邓小平的指示，对第四大队、第五大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工作。两个大队的人数分别由1000多扩展到2000多人。

为了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邓小平和广西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深入到南宁郊区调查研究，指导农民运动。后通过俞作豫对俞作柏、李明瑞多次作工作，达成了同意在广西建立各级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决定。

8月中旬，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胜利召开，会议成立了广西省农民协会，选举共产党员雷经天为会长、共产党员韦拔群为副会长，黄永达、张弟杰、张震球、李干、黄西祥、陈洪淋等为委员，并决定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后来此刊成为中共广西省委指导工作的机关报，对革命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和俞作柏多次交涉，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名义，拨给东兰县凤山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并推荐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右江、左江各县县长。

9月1日，邓小平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强调要警惕蒋介石、汪精卫和桂系军阀势力的活动，抓紧有利时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准备起义，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

会后，邓小平获知汪精卫派薛岳到广西南宁游说，想拉拢俞、李与张发奎联合反蒋，他一方面亲自劝说俞、李不要出兵参加混战，一方面指示所属部队做好准备，以应付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劝阻而出兵失败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使我党掌握的三支部队可随时离开南宁，到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邓小平的所料，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执意出兵西江攻打广东。邓小平当即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是新建部队及需要保卫后方为由，把部队留在南宁。同时，张云逸还被委任为南宁警备司令。

9月底，俞、李在南宁召开讨蒋誓师大会，10月初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

俞、李部队还没出广西，其部属杨腾飞、王权和吕焕炎就率三个师叛变，投降了李宗仁。王权甚至还通电拥蒋，俞、李反蒋失败。消息传来，邓小平立即按预定计划行动，指示第四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协助地方发动群众。

张云逸还以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接收了省军械库储存的武器弹药，准备好10多艘汽船和民船停在邕江边，随时准备将武器弹药运到左江。

10月中旬，在南宁海关码头，大批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协助部队，把军用物资搬上了船。邓小平也率领党委机关干部、警卫部队，随船驶往百色。两天后，张云逸按邓小平的布置，也率领第四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的部分学员，由陆路沿右江向百色前进。

正当张云逸率队赴百色时，俞作豫根据邓小平的安排，亲率第五警备大队向龙州开去，为后来的龙州起义准备了条件。1929年10月20日，邓小平率领的军械船和警卫人员到达了恩隆县平马镇，和从陆路行军早到达的张云逸会师。后来张云逸曾在回忆中写道：

“……我们到达平马不久，军械船也到了。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步安详。

我们马上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们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哦，您就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邓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一时忘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相互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一些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保存起来。

“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 除掉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

10月22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队到达右江地区。

他们立刻开展宣传，组织、动员群众、筹划武装起义、成立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的准备工作。当时右江地区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热

情十分高张。邓小平迅速召开前敌委员会，在会上，他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群众明确武装起义对推翻旧政府，建立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以及打土豪、分田地、改善工农生活的意义。

在工作基础好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进行反霸斗争。

为保证武装起义的胜利，邓小平还强调在部队中要清洗反革命分子，邓小平还从教导总队中抽调优秀学员补充担任营、连、排领导骨干，从农民自己的队伍中抽调一些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的队员充实各连队，使部队增加了新的血液，出现了官兵平等，军政、军民关系和睦的新气象。

在整顿军队的同时，邓小平还充分发挥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的作用，团结教育贫苦农民，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接着组织七八人的宣传队，深入山区、农村、街道广泛开展宣传，进一步奠定了武装起义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部队进驻百色后，右江地区的地主豪绅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他们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占据要点，一面和熊镐率领的警卫第三大队秘密勾结，妄图消灭第四大队，镇压革命群众及武装起义。

邓小平和张云逸等看穿了熊镐的面目，认识到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表面与第四大队是“兄弟”部队，实际听命于桂系军阀。

这时，奉议农民截获到黄绍竑给熊镐发出的“先发制人”的密令，邓小平果断命令张云逸作好准备，歼灭熊镐部队。在邓小平、张云逸的指挥下，第四大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全歼第三大队 1000 余人，并击毙大队长熊镐等反动军官。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将农民协会改名为县革命委员会。

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百色沸腾了，张云逸宣布成立红七军

1929 年 11 月初，党中央批准在广西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传达到百色，要求在左右江创立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红 7 军的番号，并委任了负责人。

邓小平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中央指示，并就武装起义的重大问题及具体部署作出了决定。会议决定，用 40 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起义准备工作，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1929 年 12 月 1 日，邓小平率一部分干部要到左江地区去部署龙州起义。临出发，他紧握张云逸的手说：“云逸同志，百色起义时间不变，记住了吧，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

“党代表放心，我们一定准时起义。”张云逸说。

邓小平又说：“按照中央的决定，你出任红 7 军军长，我对内是前委书记，对外是红 7 军政委。我这一走，起义时的具体工作就由你和陈豪人同志主持。龙州那边随后也将起义，成立红 8 军，中央还要我去兼任政委。”

“邓代表身负重任，两处都要顾及，够辛苦的。”张云逸说。

“其实，我只是跟你们一起开了个头，不少工作留给了你们。中央指名要我去上海汇报广西的情况，我到龙州停一两天又得走。”邓小平说着，跨上马，急驰而去。

张云逸根据党委会议的决定和邓小平的部署，领导右江地区军民完成了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组织上，进行部队整编。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及地方武装编成三个纵

队。第1纵队由原第4大队组成，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2纵队由原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组成，纵队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3纵队由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组成，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同时，扩大教导队。

起义前夕，部队总人数已达到4000多人。

在思想上，进行充分的发动。张云逸等同志深入基层，亲自给部队的干部、战士作报告，宣传革命纲领，起义前，广大干部、战士就当红军的光荣和红军的任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929年12月11日，百色县城东门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大早，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商人和居民5000多人聚集在广场上。

张云逸穿着崭新的灰色军装，头戴红星军帽，迈着雄健的步伐走出粤东会馆大门。

他注目前方，几千双眼睛期待着，起义部队集合的方块队前，一面鲜红的大旗迎风招展，旗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9个字十分醒目。

张云逸心潮激荡，久久不能平静。

“吹集合号！”他发出第一道命令。

军号声响彻右江上空，驻百色的4大队、教导总队官兵身着一色灰军装，佩戴红领带，头顶红星帽，扛着步枪精神抖擞地来到广场上。顿时，广场上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等领导人登上主席台。陈豪人庄严宣布：“同志们，乡亲们，今天，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在这里光荣诞生了！”

一时间，整个广场沸腾起来，人们呼喊，庆贺人民军队的诞生。

接着，陈豪人宣布红7军领导机构成员：“红7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邓小平的化名），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大会结束后，是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反动政府！”阵阵口号回荡在山城上空。

红7军诞生及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右江沿岸各县也相继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百色起义前，李明瑞从龙州来到百色，邓小平、张云逸代表党组织与他进行了谈话。

他表示愿留在革命队伍里，随即返回龙州参加领导龙州起义的工作。

### 领导龙州起义

龙州，位于广西左江上游，是我国西南部的边陲重镇，水陆交通便利，也是左江各县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的前夕，曾派共产党员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先到龙州，配合早些时候在龙州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何建南等，恢复和发展群众运动，扩大武装力量，准备武装起义。

俞作豫在1929年10月初到达龙州后，便召开了党员会议，传达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关于在龙州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部署了收编、改编旧军队的工作，使龙州地区的共产党员明确了工作方向，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邓小平与共产党员何世昌、严敏等来到龙州后，检查了俞作豫前两月的工作情况，并介绍了右江第四大队改造军队的经验，明确提出要抓紧对部

队进行改编。

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分头动手，以共产党员替换了反动军官，并对部队进行整顿和充实，争取了大多数士兵。

邓小平还将原来的《群众报》改为《工农日报》，增加了党的刊物《左江红旗》，大造革命舆论，一批优秀的工农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党的组织。

邓小平到龙州虽只有很短的时间，却对龙州起义起了极大的作用。

1930年2月1日，龙州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红色的标语，农会会员，农民赤卫队员，肩扛梭镖、土枪，涌进城来，工人赤卫队员佩戴红袖章，步伐整齐地走向中心广场，士兵们举着大旗列队经过……革命歌声、口号此起彼伏。

主席台上，起义的领导人胸佩红花，在热闹的气氛中宣布了起义的开始和中共中央颁发给起义队伍红八军的番号及领导人的委任。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

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在会上讲了话。

俞作豫还带领全体红八军将士面向军旗庄严宣誓，表示坚决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不怕任何牺牲。

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后，为了加强地方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左江特区委员会和左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严敏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王逸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建南任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兼左江工农赤卫队大队长。凭祥、宁明、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等县也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工农民主政府。

为了壮大革命队伍，果断决定红八军迅速向左江靠拢，与红七军会合。

邓小平亲手组建了第一纵队党委，他在党委会上对全体党委成员说：“党委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过纵队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

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

### 奔向中央苏区

1931年1月5日，邓小平指挥红七军攻克了广东省连县，并在此稍作休整。

1月16日，又举旗向南，日夜兼程，向广东韶关、乐昌之间的杨溪渡口前进，准备渡过武水，到中央苏区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

武水水流湍急。部队不能直接涉水过河，又无大桥可通。仅有两条木船，每次只能渡20多人，而且往返一趟需10多分钟。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如红七军不能迅速渡河，就有被广东敌人前后夹击围歼的危险。红七军的最高指挥员邓小平不顾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在观察地形和分析后，果断地决定由他和李明瑞、许卓率领五十五团先渡河，过河后，选择有利地形，一面防备对岸的敌人偷袭，一面掩护后面红军渡河，张云逸率五十八团和军直机关殿后。当邓小平率五十五团和军直机关部分人员刚渡过河，广东军阀的大批部队乘汽车便从韶关赶来，向立足未稳的红军五十五团冲来。邓小平一面指挥已渡河的红军战士散开队列，抢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一面叮嘱李明瑞率部分红军掩护后续部队过河。因敌势强大，不仅前方的敌人蜂拥而至，后面的追兵也到岸边，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只好回身与敌交

战，根本不暇渡河。于是，红七军被截成两段，双方失去联系。

邓小平在同李明瑞、许卓等人率五十五团给敌人重大杀伤后，迅速地撤离战场。尔后，巧妙地避开了敌人主力，摆脱了敌人追击，沿着粤赣边境山间的羊肠小道，于1931年2月上旬，安全到达了江西省崇义县。到此，红七军五十五团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跋涉7000余里，终于来到了中央苏区边缘。

由邓小平率领的红七军五十五团到达崇义后，很快与地方特委取得联系，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和加强地方武装建设。邓小平还从部队里选派了一批有经验的政工干部参加地方工作，并协助特委把崇南游击大队升编为红色独立营。邓小平还协助当地党委举办干部训练班，工作安排就绪后，经前委研究决定，邓小平前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

红七军前委书记由许卓代理。

1931年4月初，红七军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历尽艰辛终于重新相聚。

7月初，红七军在兴国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邓小平离开崇义，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上海，并向党中央报了到。党中央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听取了邓小平的汇报后，高度赞扬了邓小平为首的红七军全体指战员。

周恩来激动地指出，红七军从广西出发，转战1年，行程7000余里，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许多敌人，历尽艰险、英勇奋斗，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诗篇，周恩来紧握住邓小平的手，嘱咐他好好休息，然后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

###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1931年8月，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不久，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担任一年多的瑞金县委书记以来，成绩卓著。1932年冬季，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找邓小平谈话，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领导这三县的工作。

不久，邓小平从瑞金到达会昌，他不耻下问，调查研究，彻底摸清三个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他认为会、寻、安的工作搞不上去的原因主要是“左”得太厉害，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

在邓的带动下，军分区和中心县委机关学习马列主义蔚然成风，大家的认识也得到提高。

为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邓小平还领导三县人民办了很多夜校、列宁小学、扫盲班、读报小组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后，邓小平重点抓了农业生产。分别召开了会、寻、安三县的党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决策。

根据邓小平的布置，1933年春，会、寻、安三县都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各村成立了生产突击队，还成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

邓小平还身体力行，经常参加劳动。大大地促进了群众的工作积极性。

由于邓小平和会、寻、安三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三县的粮食产量都大幅度上升，人民的生活提高，革命的积极性也日益高涨。同时，地方武装在邓小平的具体领导下开展了剿匪工作，消灭了残存的地主武装，红色政权稳定，各项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

因为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注意。1933年他到会昌检查工作时，看到这里的大好形势，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诗句。

### 调任总政代理秘书长

但是，正当邓小平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导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工作，并把三县的建党、建政、扩大红军、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搞得十分火热的时候，刚到中央苏区不久的临时中央却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他们派出自己在中央局的代表，对会寻安中心县委的工作妄加批评，对邓小平进行蛮横无理的指责，并调离了他在该处的工作。随即又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对他们进行打击。

邓小平被撤职后，下放到农村劳动。

这个消息被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里知道了。王稼祥是个很正直的干部，他对邓小平是了解的。早在莫斯科留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回国后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创立红七军，既有政治远见，又有指挥才能。

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

贺昌、罗荣桓说：“稼祥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对，我们赞同。”

于是王稼祥打电话给临时中央，推荐邓小平到军委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工作。

临时中央个别领导听到王稼祥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以惊奇的口气回答：“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立既反驳：“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当，我看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应用成功，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他越说越激动，“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怒气冲冲地把电话一甩，来回踱步，连连说：“埋没人才呀。”

过了一段时间，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还没答复，王稼祥十分着急，又从病床上坐起，吩咐警卫员唐继章给驻在瑞金县沙洲坝下霄村的博古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拿起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决定了吗？我等着他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你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

博古与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就是同窗好友，他很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平从宁都农村劳动点调来沙洲坝白屋子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

于是，邓小平调任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长征中又参加了遵义会议。

### 长生口之战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邓小平人不卸甲，马不下鞍，随军东征。

东征后，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协助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抓红军的政治工作。

因王稼祥在中央苏区时受过伤，身体不好，总政治部工作的重担，就落到了邓小平肩上。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便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7月15日，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提交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按双方的协议，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于1937年8月，将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8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加强一二九师的领导，特派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并肩战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在长达13年的共同革命斗争中，邓小平与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月6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辽县召开了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他们总结了一二九师及地方部队过去作战的经验和特点。

邓小平说：“我们打仗的特点是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

不久，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3万多人的兵力，分从平汉、同蒲、道清等铁路线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准备反攻的30万大军又不断撤退。

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邓小平、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朱德的命令，将分散活动的一二九师各主力团集中，向正太线东段并陘的敌人进击。

2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翻越山脉，抵达长岭，立即召集三八六和三八五旅的干部开会，决定发动长生口战斗，袭击并（陘）平（定）公路上的日军重要据点旧关，以吸引并陘日军出援，并在中途歼灭它。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向娘娘庙一带前进。21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设伏于并陘、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当天夜晚，部队开始行动，当我吸援部队于22日拂晓袭入旧关时，并陘的日军果然中了圈套，派出快速部队200余人，分乘8辆汽车驰援，立即陷入伏击圈，结果被击毙130余人，毁汽车5辆。

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长生口战斗获胜后，立即率一二九师向晋南转移。

### 神头岭大捷

进攻晋南的日军一八师团是沿河北省邯郸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屯留、良马等直至山西临汾这条路线出击的，于是邯（郸）长（治）大道及由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便成了日军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而黎城则是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要地。刘伯承和邓小平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头，袭击日军占领的重镇黎城，吸引潞城之敌驰

援，以便在神头村附近设伏，歼灭日军。

神头岭地形复杂，日军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却利于隐蔽埋伏。我方在兵力部署上，决定以1个营的兵力作吸援部队奇袭黎城，而以三八六旅的3个团作主攻部队，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

事态的发展，一切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设计进行着，由于伏击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日军毫无察觉，战斗一打响，日军步兵还未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兵来不及支炮架，就被八路军的重火力消灭了。整个战斗从3月16日拂晓袭击黎城开始，到当日下午4点结束。结果，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一八师团、一一六师团的1500人，除100余人逃脱外，全被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一二九师在神头岭歼灭。

这两次采取的“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是刘伯承、邓小平精心部署出来的，是游击战歼灭大批敌人的范例。

神头岭战斗后，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3人又共同提出进行响堂铺战斗，响堂铺是日本侵华军一八师团作战地域的后方交通线，在涉县境内，这次战斗的胜利对粉碎日军进攻以及创建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批准，3月31日刘、邓率部进行伏击，朱德、彭德怀还邀请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前来观战，这次特大的伏击战因组织实施得法，打得很漂亮，日军被歼数千人。前来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 急袭长乐村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和游击战争的普遍开展，特别是一二九师在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等一系列战斗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使侵华日军惶惶不安。1938年4月初，日军以一八师团为主，纠集3万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妄图将八路军主力兵力歼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针对日军的企图，制定了以部分兵力钳制多路敌人，集中主力击破一路敌人的反围攻作战总方针。

当各路日军开始出动时，刘伯承、邓小平奉总部命令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向辽县以南、向东进至日军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

从东、西、北三面进犯之敌相继于4月10日前后侵入抗日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三四四旅及决死一纵队英勇地阻击日军，使日军合击八路军主力于辽、榆、武地区的狂妄计划完全落空。

但是，日军倚仗优势兵力，企图突破八路军阻击，以摆脱被迟滞的状态。在这严重态势下，只有给日军沉重打击，才能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这时，南面日军一八师团步兵、骑兵6000余人，分两路北犯，4月13日，这两路日军窜入辽县、武乡、遭到当地抗日游击队的袭扰，加之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日军很快陷入恐慌。刘伯承、邓小平立即抓住战机，于14日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六八九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15日，主力部队开到武乡县附近寻机歼敌。当日黄昏，侵入武乡的日军一八师团的第25旅团第117联队及炮骑辎重共3000余人，从武乡出发，沿浊漳河东窜。刘伯承与邓小平及时决定紧咬这股东窜之敌，进行急袭。他们命令一二九师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七七一团，分两路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实施平行追击，并以七六团为后续部队，沿大道紧跟。一二九师的两路纵

队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下，于 16 日早晨在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地区追上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截断了其后段 1500 余人，接着又在型村、李庄一带将日军截成数股，分割围歼。刘伯承与邓小平抓住战机，指挥一二九师各团战士们从山头上、山谷里，甚至从几丈高的山陡坡上冲向大道，排山倒海般地冲入敌群，用刺刀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搏斗，给敌重大杀伤。刘伯承和邓小平为巩固胜利，果断地决定用少数兵力在前线布成游击网，打击和迷惑敌人，命令主力部队撤出战斗。

长乐村地区的战斗，共歼日军 2200 余人，是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的决定性战斗，闻名全国。接着八路军乘胜追击，彻底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将敌全部赶出晋东南。

### 粉碎秋季大“扫荡”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则在华北、华东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使日军陷入游击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时的日军几乎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进攻，转而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集中主要兵力进攻敌后八路军。

1939 年 1 月，日军纠集了 3 万余人的兵力，分 11 路向冀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刘伯承、邓小平针对平原地形便于敌快速部队行动的特点，确定了一二九师主力分为几个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活动，寻机歼敌，并派出小部队迟滞和消耗敌人。在这种反“扫荡”决策指导下，部队在不到 3 个月时间进行了大小战斗 100 余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3 月，敌我双方的战斗重点转入山区。刘伯承和邓小平为加强山区的对敌斗争，在妥善安排了冀南斗争后，遂于 3 月 7 日率一二九师师部、三八六旅主力及其他部队返回太行山，对付日军的“扫荡”。

7 月，日军集中了 5 万余人的重兵对太行山发动了最大规模的秋季“扫荡”，企图打通晋冀豫的交通线，将抗日根据地分割，然后逐步压缩摧毁。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及三四四旅进行反“扫荡”，作战 70 余次，歼灭日伪军 2000 余人，粉碎了日军秋季“扫荡”，接着又在年底进行了邯郸战役，使太行山南部与北部连成一片。日军从秋季“扫荡”以来，对太行山区根据地分割的企图彻底破灭。

###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起了重大作用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此时，党员人数已达 121 万，正规军 91 万，民兵 220 万，解放区人口 9500 万。

1945 年夏，抗日战争已近尾声，国民党企图在美国的帮助下控制大城市并缴获已投降的日军武器，而共产党人则发动了进攻，尽可能争取扩大控制区。最后，除哈尔滨被苏军控制外，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及中国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则控制东北的农村地区及华北大部地区。

早在和谈时期，国共两党就有多次较量。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领导的 129 师从 1945 年起改名为晋冀鲁豫野战军，1947 年又改为中原野战军，通常称为第二野战军。1946 年 6 月，内战全面爆发时，第二野战军的人数已达 20 万。解放军乘胜前进，6 月 30 日，第二野战军渡过了黄河，刘伯承在黄河的不同地方发动两次转移视线的进攻，牵制敌人。在开

封附近，以宽达 1 公里的黄河大坝为防线。负责保证渡河的物质条件，即渡船、运输及后勤补充的组织工作，20 万部队安然渡过黄河。4 月 14 日，在开封以东同 3 个师的敌人遭遇。刘伯承、邓小平部队三面包围了国民党军队，全歼敌军。

1947 年，11 月间，开始了中国本世纪最大的战役——淮海战役。这次战役从 1948 年 11 月 6 日持续到 1949 年元月。战役在淮河沿岸地区进行，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的三野部队同时参战。为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参加了前委的工作，统筹前后方一切事宜。

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的军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各被歼灭。蒋介石损失了 56 个师达 55.5 万人。国民党的不少将领也被击毙或被俘。

1949 年 1 月战役结束，从而为陈毅、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渡过长江、直捣蒋介石的老巢——南京，开辟了道路。

淮海战役结束不到两周，傅作义将军在不动枪炮的情况下把北平让给围城的解放军。

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分给刘伯承和邓小平部队的攻击目标是又宽又深的长江中段。

北岸的小河、运河里隐藏了为渡江准备的成千上万的大小船只及舢板。部队做了几周的登陆和冲锋演习。为渡江战役准备的旗帜上写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渡江战役是 4 月 21 日开始的，百万大军几天内就出现在南岸，解放战争接近尾声。

内战结束时，第二野战军的部队约 30 万。据历史学家记述，第二野战军在 4 年中大仗、小仗共打了 1343 次，歼敌达 33 万。

1949 年 9 月底，邓小平到北京参加 10 月 1 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成立宣言。

这时，邓小平只有 45 岁。他已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伊始，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这支军队在几个月里继续追击敌人，把人民的政权扩大到西藏。

全国战事结束后，中国开始了艰巨的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工作。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翌日，苏联，接着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先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障国家政权职能的充分发挥，需要重新全面划分行政机构。就像在解放区那样，军队始终是政权的基石，军队领导人换上便服，手中仍掌握所在地区的领导权力。有鉴于此，全国分成几个“大行政区”，每一行政区实际上就是某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已分为野战军和战区）管辖的区域。为此，原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改组。

因此，每个“大行政区”成立了军事行政委员会的混合机构。名单如下：以第一野战军司令彭德怀为首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以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为首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以第四野战军司令林彪为首的中南军政委员会。东北地区，即满洲那里的情况比较特殊，1948 年解放后就成立了以高岗为首的人民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但这种特殊情况的结局是戏剧性的。

西南行政区包括 4 个省——贵州、云南、西康和四川。四川是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省份，下面又分为 4 个行政区。刘伯承把这个 1 亿多人口的大区的权力实际上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贺龙。贺龙

率一个兵团参加过解放四川的战斗，于是他就成了拥有与行政区同等权力的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则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书记。

耐人寻味的是，这 3 个领导机构人员的组成也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刘伯承是西南局党委第二书记，但他又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两个副主席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贺龙；而邓小平同时又是西南军区的政治委员。这种“职务重叠”现象在以后的时间里，几乎对整个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同地区和省的基地在全国政治中的影响一样。几十年来一个特点是，一些政治家（除了几个最主要的领导人）尽管绝大部分时间住在首都，但仍保留着省和地区的领导职务。

邓本人 1952 年前，首先是在西南地区领导工作，虽然那时他在中央也担任职务。1949 年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直到 1954 年 9 月上述机构改组为止。他于 1952 年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但 1953 年西南军事行政委员会改组（去掉了“军事”两字）时，邓仍然是这个机构的副主席，并一直延续到 1954 年。在这期间，邓小平在北京被委任越来越多的职务：他当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不久又被委任为中央政务院财政部部长，不过这一职务任期不长，翌年夏天便辞职了。1952 年至 1954 年他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显然，在政府、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都翘望着他走马上任。

他是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会的秘书长，因此许多中央选举的筹备工作都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54 年国家机关进行改组，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又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4 年 5 月得知：这位杰出的组织者将成为领导国家的党的机关的关键人物。这时第一次提到他是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主管党中央委员会各部的工作。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召开了中共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邓小平是这次大会的主角之一。会上毛泽东致了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做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邓小平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

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先选进最高领导班子。在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中，邓小平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居第 6 位。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保持了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他 1954 年的职务“秘书长”一词，主要突出行政工作性质；新的职务“总书记”，则强调其政治份量。

从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的近 10 年中，邓小平在最高的领导核心里担任着党和国家关键性的职务。

党的总书记必然处在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有些时候，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如何执行这些决定。当然，作为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的代表的邓小平，这些年也必然与党的主席相对立。当他想捍卫党，捍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的永无休止的各种运动时，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一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

“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刘少奇与邓小平就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连亲属也受到株连，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大儿子邓朴方被迫害致残。

其他子女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1969年，林彪乘中苏边境局势紧张，签署了“一号命令”，要全军处于出击的一级战斗状态，首都实行“战备疏散”。

在此命令下，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在一天内分别遣散到河南、广东、江西、安徽、江苏、云南等省，由当地省军区负责监护。

1985年4月15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兼桑给巴尔总统姆维尼谈及“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话。邓小平说：“你是1973年秋来中国的，我那年2月从江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许多老干部打倒了，关进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呆了几年。”

那么他在江西的几年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呢？谁也想不到，当时邓小平是在离南昌8公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度过的。

1969年10月21日下午，江西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担任过毛主席警卫的陈昌奉、程惠远坐了一辆吉普车专程从南昌来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走进厂党支部书记罗朋的办公室，提出：“罗朋，你是厂里的主要负责人，现在省革委经过研究决定把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们厂来完成。”

罗朋一听，神经高度紧张，立即问：“什么重要任务？”陈昌奉直截了当地说：“什么任务？讲出来大家都会知道，中央决定把党内的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下放到江西劳动，改造世界观。省革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厂，你们厂的具体任务有三：一、确保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范围是进了厂区，由你们厂负责，主要由你负责，如在厂里出了事，首先唯你是问；出了厂区，由外勤人员负责。”

陈昌奉盯着罗朋进一步说：“为什么，因为邓小平不但在国内有影响，而且在国外有影响，同时，怕造反派揪斗他，怕坏人把邓弄掉、弄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要你的脑袋。邓小平在此劳动，你厂工人知道就算了，不能告诉家属，要保密。有什么事，直接到保卫部找我陈昌奉”。

陈昌奉与程惠远向罗朋交待完后，便离开了。

罗朋听了陈昌奉的布置，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他越想越觉得这个任务不但重而且复杂。回想自己从广州不畏艰险投奔延安，从一般干部一直担任到中央公安部的副局长。

1959年反右倾后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下放江西，“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再受到冲击，人间甘苦已经尝尽。如今，在这偏僻一隅的小厂，又要负责接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同时又是过去的老首长，真是感慨万端。

江西省革委作出邓小平安排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的决定后，需要物色一名邓小平的管理秘书兼警卫。军区政治部干部处考虑的人选是黄文华。

程惠远与黄文华进行了单独谈话。

程惠远说：“邓小平到江西，需要长期住下来，按中央规定：一个干部和他住在一起。你的任务是：一、安排他的生活；二、保卫他的安全，劳动要跟着他去，还要督促一下他的学习，实际上你是他的管理秘书。”

## 邓小平一家住进了“将军楼”

一辆载着邓小平、卓琳夫妇同继母夏培根的汽车，从中南海向机场驰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打倒”“火烧”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叫刘邓永世不得翻身的巨幅标语。

飞机越过泰山、黄河、长江，在南昌市郊向塘机场安全着陆。

邓小平夫妇和继母夏培根 3 人在两位解放军战士的护卫下，走下舷梯。

身着军服的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秘书们已等候在机场，他们把小汽车开到舷梯旁，让邓小平一家上车。

小车从向塘经莲塘驶进南昌市，在江西省军区招待所停下。秘书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里休息。

邓小平夫妇在这个招待所住了三天。

一天晚饭后，邓小平在塘边散步，引起了住在招待所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们们的注意。

“怎么，邓小平来这里了呀！喏，快来看。”这件事很快传到省军区。一位省军区的“负责人”对邓小平夫妇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警告他们不要随便外出。

黄文华接到命令，在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秘书赵子昌的陪同下，来到省军区招待所二楼与邓小平夫妇见面。

赵子昌介绍道：“这是省里派来的管理秘书黄文华，以后劳动、学习、生活上的事情都由他负责。”

邓小平看着这个陌生的军人，沉默着。

黄文华请邓小平上车。

邓小平说声“好”，便随黄文华走下楼。

黄文华又告诉卓琳，东西可以装在卡车上。

卓琳说：“我们东西很少，飞机把全家的财产都带来了。”

说着一只手提了个皮箱便上了车。

邓小平夫妇和继母 3 人坐在汽车后面，黄文华则坐在司机旁边。

汽车驶出军区招待所进入八一大道。

邓小平在车上打量着这条宽阔的大道，大道两边被大字报、标语装饰着，自己的姓名不是倒着写，便是打着红叉。

汽车出八一大道驶上八一大桥。黄文华介绍道：“这就是八一大桥，桥下是赣江，赣江流向鄱阳湖，我们住的地方距这里约 8 公里。”

过了八一大桥，汽车沿赣江上游继续向西南方急驶，过了一个山坡，便是新建县委的所在地——长凌镇。

汽车经长凌，行驶六七公里后来到望城岗，在望城岗的旁边便是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这个步兵学校的校长徐光友少将，原在省里支左。程世清来后，便调走了，他的住房被人称为“将军楼”。邓小平一家乘坐的车在军校门前停了下来，黄文华下车同执勤的解放军战士交涉后，汽车开进了步校。

进了将军楼的院子，邓小平一家下了车。这是一栋两层楼房，楼上 6 间，楼下除大厅外，只有两个单间。

邓小平一家到达“将军楼”已夜幕降临，他们夫妇和继母 3 人住楼上右边的 3 间房子，邓小平夫妇住一个套间，里面住人，外面是会客室，继母住在靠卫生间的后屋。他们从汽车上搬下行李，又从楼下搬到楼上，铺好床

铺，黄文华又跑到炮团食堂买回十几个馒头，煮了一大碗蛋汤，才各自休息了。

黄文华住在楼下靠右边的房间，正对着上面邓小平夫妇的房间，房间装有一部电话，可随时与校外联系，起到严密监视的作用。黄文华的左侧对面的房间是解放军战士贺福柱的卧室，贺福柱是专门负责帮助邓小平夫妇买菜的。后来邓朴方来了，住在楼下左侧的后间，尔后来的邓榕、邓朴方、邓楠、邓林都住在二楼。

从这一天起，邓小平开始了近3年的监禁劳动生涯。

### 失去自由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邓小平被院内的小鸟惊醒，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披衣走出楼房。邓小平舒动筋骨，迈开大步，在庭院散起步来。

院子毕竟太小，他想到外面走走，来到院门，见外面有两名解放军站岗。战士警惕地看着他，又说“不准出去”，邓小平心中一震，这才想起他是被监护着，他抬头看看鸟儿自由地飞进飞出，真是人不如鸟。

早饭后，卓琳随黄文华开车到长凌镇和望城岗公社购买油盐柴米。卓琳说：“黄同志，买点面粉吧？”

这次共买了几十斤面粉、50斤晚稻米、4斤油，又买了几百斤干柴和一些青菜、萝卜、大蒜，满载而归。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由黄文华到新建县人民医院开些常用药。黄文华问邓小平：“要些什么药？”

邓小平说：“我没病，主要是睡眠不好，可弄点眠尔通之类的药品，辅助睡眠。卓琳病多，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病，可弄些这方面的药储备。”

黄文华记下后，心有疑虑，便驱车来到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请示程惠远。

黄文华不安地说：“程主任，老邓要用安眠药，我不放心，……”

程惠远低头考虑了一番说：“邓小平来江西劳动，提出要吃安眠药，可给他吃，不过要每天晚上送一次，每次按规定吃，不可超量，具体剂量遵医嘱。”

黄文华又提出一个不放心的问题：“我每天送一次，汇积起来，也怕出问题。”

程惠远思索一下说：“你每次送去，看到邓小平在临睡前用开水吞完后再下楼。”

### “邓小平来了”

一天，邓小平找到黄文华说：“我离开北京到江西时，办公厅有人和我谈过，让我在这里长期住下去，通过劳动搞点调查研究，改造思想。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劳动？”

黄文华说：“至于劳动嘛，这几天不急，先把家务安排好再说。”

邓小平答：“家务不需要再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反正东西不多。”黄文华见邓小平要提前到厂里劳动，冷冷地说：“这几天天气不好，如明天不下雨，明天就去劳动，你看行不行？”

“行！行！”邓小平回答。又进一步问，“明天什么时候去？”

黄文华考虑一下道：“明天上午8点钟吧。”黄文华又向邓小平说明：“工人是七点半钟进车间，我们就8点钟吧。”

邓小平连说：“行，那行。”

11月9日上午8点半，邓小平与卓琳两人穿上了特制的蓝纱卡工人装，脚穿黄色军用力士鞋。

在黄文华的警卫下，来到位于厂房大门右侧的党支部办公室，黄文华把邓小平、卓琳介绍给罗朋，罗朋一愣，连忙起身，眼前两位“老师傅”竟是自己20多年前的首长吗？

罗朋对邓小平一向尊敬。早在解放战争初期，他从延安调东北工作时，在太行山区不幸病倒，留在太行山，参加上党战役后，任过高树勋被俘军官队的政治教官，亲耳聆听过邓小平政委的报告，至今他还记得二十多年前邓小平政委讲的几句名言。邓小平说：“上党战役是我们转变的开始，从太行山下到邯郸，今后我们要打大仗了。人家说我们是山精妖怪，因此，我们军队作风要注意，用实际行动来粉碎敌人的谣言。”

黄文华打破沉默，向邓小平夫妇介绍道：“这就是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罗朋同志。”

罗朋回过神来，招呼邓小平夫妇坐下，简单介绍了厂里的情况。罗朋说：“这是一个小厂子，只有80多个人，做的是修理农用配件，生产还蛮好的，工人干劲蛮大。”讲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对面的一间空房子说：“这间房子原来是办公室，现在专门腾出来给你们用，劳动累了，或不舒服，就到这间房里休息，我就住在对面，有什么事可随时联系。”

邓小平看了看那间空房，对罗朋的安排表示满意，他微笑着说：“好！”

接着，罗朋与黄文华带着邓小平夫妇走出办公室，向车间走去。有的工人眼尖，认出其中一位老师傅便是邓小平。因事先有纪律，不许同邓小平接触，于是工人中在窃窃地传递着一个信息：“邓小平来了！”

### “老邓”

作为监管人员的黄文华，与邓小平一家一起生活好几天了。他却为了一件敏感的事犯愁，就是不知如何称呼邓小平，总是“喂”、“喂”，他想，邓小平以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当时来讲，他是中共中央七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国内外也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文化大革命”虽对他作了一些批判，但党中央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称他“邓小平”，直呼其名，又觉得自己有居高临下的意思；叫“邓小平同志”，目前邓小平是走资派，又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不能称同志；叫“首长”，又属监督劳动、无职无权，也不妥。虽然，省革委保卫部部长陈昌奉和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交待称邓小平为“老邓”，但他怎么也叫不出口。

一天，邓小平从楼上下来，主动对黄文华说：“你今后就叫我老邓，这样还自然。”

于是“老邓”这个称呼便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修理车间叫开了。

### 每天的生活单调而有规律

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奇在《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每天早上在监管人员的押送下，邓小平同妻子步行到距离20分钟远的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去参加劳动。邓的女儿在回忆文章里提到，邓像45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一样干的钳工，他的妻子则做拆洗线圈的工作。在工厂也是监督劳动，看管人员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忠于职守是以自家的脑袋做担保的。这是一种奇特的惩罚，也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上午3位老人在看守的监护下干自己力所能及的

劳动（因此，邓要求做钳工工作），没有得到许可，不准讲话和干别的事情，这个并非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不合逻辑的事。尽管如此，但与从前比较起来，对邓来说，总还算是宽慰的变化，在长期与世隔绝后，他现在能够收听电台广播和阅读《人民日报》，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他可以从字里行间了解一些情况。经受两年的软禁后，现在在他干活的车间能得到与外界、与社会接触的机会。正如邓的女儿所写的那样，开始，大多数工人怀着好奇的心，后来逐渐对这一对老年夫妇产生了同情。3年中，他们一天也没缺勤过……

每日上午他们在工厂劳动半天，下午在用冬青和竹篱笆围成的空地边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等各色菜蔬。这样他同妻子可补充一些食品。这样做是很必要的，因为当时他们的工资被扣发，只留给一点生活费。邓小平当时已65岁，这3位老人的年龄相加在一起已超过了200岁—3人中邓是壮劳力。所以，那些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活，自然由他来做。他的妻子卓琳洗衣、打扫卫生。她患有高血压病，常卧床不起，这时邓还得细心照料她。邓小平自生母去世后，抚养他及其他子女成人的是他的继母。这时她年事已高，每日为3人操劳做饭。

每天的生活很单调，倒也有规律。早晨，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几个小时，中午回家吃饭，一起听新闻广播，下午在园中耕作，间或读书看报。老祖母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有看守监视着，绝对不许外人进他们的宅院。邓小平每天就寝前总围着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一小时。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一圈一圈地走着。有时祖母养的小鸡也跟在他的脚后结队而行。天长日久，他的脚步出了一条细细的小路。他在为过去、也为将来深思熟虑着。1971年当局准许残废的邓朴方回到3位老人身边。从此，他们还要照料这个致残的儿子。为儿子擦澡翻身这一最重的活，就落在邓小平的身上了。后来，邓小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支持他的力量—政治情况有了好转，使他漂泊四方的其他子女有可能短期来看望他们。就像在中国亲属离异各在一方可享有探亲那样，邓小平夫妇的几个子女用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做盘缠，一个接一个地来到那儿看望他们。从1971年起，他们的几个子女索性都搬迁来与父母同住。流放地遂成了他们家庭聚首的地方。1971年11月5日，他和妻子一起参加一次会议回到家里心情十分激动，这一天全家都很振奋。

被通知去参加工厂召开的会议，这本身就是桩大事。自邓小平“倒台”以来还是首次让他参加政治活动。当然，他已经猜到可能出了什么事，因为1971年10月1日的国庆节，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林彪的名字已好几个星期没有在报上出现。留在家里的孩子们不知是福是祸，坐立不安地等着父母回来。中午时分，传来惯常的脚步声，看守人和两个“被看守者”回来了。父母的表情显得十分紧张，但由于看守人在场只能用双目示意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卓琳把女儿拉到厨房，悄悄地在女儿的手心中写了4个字：“林彪死了”。直到看守人吃晚饭去了，他们才对子女细述在工厂听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 恢复了工作

1971年9月，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失败和自我爆炸，使邓小平复出。但，这却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林彪事件后先期返回北京的王震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为革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老将军，他回京后，向毛泽东揭发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并详细汇

报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力荐毛泽东起用邓小平。

1972年8月4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后，迅即作出指示，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也没有做的。又特别强调指出：“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是起用邓小平的信号。

周恩来一面将毛泽东的指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印刷若干份，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以便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一面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并指示原来的公务员和秘书立即到江西新建拖拉机修配厂邓小平的身边，改善他的日常生活。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重要批示。会议一致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3月20日，邓小平一家坐上南昌到北京的直快列车。

经两天一夜的行程，邓小平一家，顺利地抵达北京车站，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欢迎。

周恩来看见邓小平，精神抖擞地回到北京，内心充满了喜悦。这位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兄长对邓小平在江西3年多的日子，时刻给予着关心，周总理把邓小平的近况报告了毛泽东。

4月13日，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请邓小平去作陪。当邓小平和周恩来并肩步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首都各报记者和电视台对准他们，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第二天，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不久，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工作并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

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表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很强，人才难得”，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

1974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并说明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宣布中国永不做强国。邓小平说，中国发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

1974年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1975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 大刀阔斧的整顿——针对“文革”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力挽狂澜，对十年浩劫造成的混乱局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召开的该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了整顿军队的讲话。他指出：“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提出恢复优良传统，减少膨胀起来的军队人数，处理过多的编外干部，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的措施。

7月14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详细讲了军队整顿的任务。他指出部分单位和同志主要存在“肿、散、骄、奢、惰”五个字，并分析了滋生这些毛病的原因。接着他讲了整顿这五个方面问题的措施，主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训练、指挥水平和管理水平。另外，他还特别讲了整编中的干部处理、安置、调整和交流问题。

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又讲了“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问题。

邓小平恢复工作两个月后的5月3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他着重讲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急迫问题。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呢？

邓小平指出：“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针对当时“铁路事故惊人”的现象，强调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

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了整顿钢铁工业的重点要解决的四个问题：一、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二、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三、认真落实政策；四、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3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讲了关于发展工业的七点意见：一、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四、整顿企业管理秩序；五、抓好产品质量；六、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关于整顿党风的问题：7月4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时针对当时“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和“党讲话不大灵”的严重问题，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讲到党的作风，强调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指出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

9月27日和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又特别强调了“要敢字当头”是这个整顿的前提。

从1月5日复职到10月4日，邓小平在短短的八九个月的时间里，对整顿问题仅公开发表的正式讲话就做了八九次之多。对各个方面的整顿，都作了针对性很强的论述及部署。

### 邓小平第三次“下”

江青一伙人，对邓小平复出工作，一开始就极力进行阻挠。他们凭着野心家的敏感，似乎意识到，邓小平重新工作，决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职务变化，而关系到他们视为生命线的“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一位西方记者发过一条电讯，说邓的复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证据。

江青等人一心想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旗下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而邓小平复出，却构成了他们实现阴谋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他们万分惊恐，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四人帮”也深知，有周恩来的支持，要打倒邓的罪恶企图是难以

如愿的。于是，他们首先掀起了矛头暗指积极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周恩来的批判浪潮。什么“反潮流”运动，什么“批孔”运动，大批“兴天国、继绝世、举逸民”。

他们的司马昭之心，就在于为倒邓铺路。

1975年8月，又上演了评《水浒》、批宋江的闹剧，说《水浒》作者的罪责之一是“摒晁盖于108人之外”，指桑骂槐，暗示毛泽东被架空了。

同年10月，他们又开始了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12月中旬，“四人帮”通过清华、北大某些人，贴出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大字报，掀起了“批邓”的恶浪。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病逝，举国上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而“四人帮”搞的“批邓”运动却有增无减地在继续进行。当时，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无法公开执行职务了。真是乌云压城城欲摧！全国人民都对当时坏人嚣张，好人受气的局面而义愤填膺！

这年4月5日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终于出现了百万人痛悼周恩来的悲壮场面。实际上，这是一次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

“四人帮”一方面急不可待地定天安门的群众运动为反革命事件，大加镇压；另一方面，诬指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就这样，他被第三次打倒了。

### 总设计师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1990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接受他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

